

# 傳播文化與政治

ISSN 2411-4006

第16期 2022年12月



## 專題論文

- 對位解讀下的聲音：重讀李金銓的《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兼談資訊流通與國家自主
- 文人與侍從：李金銓的新聞史研究
- 《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的美麗意外：只有中道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
- 台灣解嚴前後之傳媒盛事的觀察者：李金銓為言論事的驚異奇航之旅（1982-1999）
- 傳播、民主與媒體環境的期待：從李金銓「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談起

## 研究誌要

- 臺灣報紙受平台科技影響：新聞與民主的警訊

## 歷史與現場

- 當代公共知識分子：杭士基（Chomsky）座談會

# 傳播文化與政治

2015年6月創刊

半年刊，6、12月出刊

出版：2022年12月 第十六期

## 主辦機構

媒體改造學社

## 編輯顧問

卜衛	中國社會科學院
井迎瑞	台南藝術大學
王春泉	西北大學
王嵩音	中正大學
王毓莉	文化大學
史安斌	清華大學(北京)
吳予敏	深圳大學
呂新雨	華東師範大學
李金銓	政治大學
林元輝	政治大學
林東泰	臺灣師範大學
林靜伶	輔仁大學
邱林川	新加坡國立大學
胡光夏	世新大學
胡泳	北京大學
倪炎元	銘傳大學
展江	北京外國語大學
翁秀琪	世新大學
張志安	中山大學(廣州)
張裕亮	南華大學
張錦華	台灣大學
張國良	交通大學(上海)
郭良文	交通大學(上海)
陳衛星	中國傳媒大學
單波	武漢大學
曹晉	復旦大學
劉海龍	人民大學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
趙月枝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蕭蘋	中山大學(高雄)

## 編輯委員會

主編	羅世宏	中正大學
編輯委員	林富美	世新大學(執行編輯)
	馮建三	政治大學
	陳光興	交通大學
	洪貞玲	台灣大學
助理編輯	劉忠博	華南理工大學

## 出版

發行人 媒體改造學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02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25221499

傳真 (0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本刊網址: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封面提字 黃勻祺

封面設計 馮議徽

## 訂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本刊採用創意公有授權條款，如下



# 目次

編輯室報告：.....i

## 專題論文

對位解讀下的聲音：

重讀李金銓的《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兼談資訊流通與國家自主  
...唐士哲/1

文人與侍從：李金銓的新聞史研究.....黃順星/25

《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的美麗意外：

只有中道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陳志賢/53

台灣解嚴前後之傳媒盛事的觀察者：

李金銓為言論事的驚異奇航之旅（1982-1999）.....程宗明/87

傳播、民主與媒體環境的期待：

從李金銓〈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談起.....管中祥/115

## 研究誌要

臺灣報紙受平台科技影響：新聞與民主的警訊.....林照真/139

## 歷史與現場

當代公共知識分子：

杭士基（Chomsky）座談會.....傅大為、馮建三、李泳泉、李行德、  
汪宏倫（與談）、郭力昕（主持）/165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六期  
2022 年 12 月

## 稿約

稿約詳情請見 <http://twmedia.org/archives/502>

## 編輯室報告：

對話、辯詰、反思、批判是理論知識解構、重構與創新的重要歷程。該歷程，體現了知識工作者在理論體系結構中，勇於挑戰，任性突圍的本真；及透過滔滔論述的交鋒與批駁，不忘傳承；在相知相惜中，不斷創新與突圍的本色與價值關懷。當大學校長的遴選，募款能力成為指標；受制於評鑑，大學師生關係與學術研究，質變成近乎市場管考機制時，這種來自於學術本真的反思與批判，仿如空谷足音，聲聲清澈響亮，令人動容。

是以，為了向這群任性、堅持，回歸學理對話；滔滔舉證、辯詰又具延伸理論回韻，不斷創新開展研究視角，回歸學術本真的學者們致敬。本期的專題與歷史與現場，期刊有幸企劃並留下藉由先進後學，對影響台灣傳播學門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李金銓老師，與當代思想巨擘杭士基（Chomsky）大師的精采學術反思、對話，所產出的實證資料與座談記錄。該資料與記錄，除留下世代交融文獻與令人動容的精采片語外；更期盼透過這樣的內容，向大師的原典著作與理論文獻致敬。

專題有五篇，第一篇是由唐士哲老師所撰寫的〈對位解讀下的聲音：重讀李金銓的《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兼談資訊流通與國家自主〉。該文取徑薩依德（Edward Said）的對位解讀，聚焦李金銓關於資訊流通的相關討論，並對照當代全球資訊流通的現狀，提陳大師洞燭機先的論點，十分精采；第二篇是由黃順星所撰〈文人與侍從：李金銓的新聞史研究〉，就李金銓老師之侍從報業體制，析論知識份子 in 第三世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角色，檢視行動者在結構中的限制與能動性；第三篇是陳志賢所撰的〈《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的美麗意外：只有中道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乙文，該文回顧李老師在傳播研究上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聚焦其對於馬克思主義、國家與階級、數位科技與平台、媒體專業主義與勞動的看法和評價，及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研究的啟發與影響；第四篇則是程宗明所撰的〈台灣解嚴前後之傳媒盛事的觀察者：李金銓為言論事的驚異奇航之旅（1982-1999）〉乙文，該文以親身經驗，論述在台灣走向解嚴開放的歷史脈絡中，對當時就讀傳播科系大學

生的他，如何受到李老師於 1982 年所著《大眾傳播學》的啟蒙經驗，以提陳該書對於傳播學群研究與個體在社會行動中的影響；第五篇是由管中祥所寫的〈傳播、民主與媒體環境的期待：從李金銓「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談起〉，則以李金銓老師〈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一文為起點，擴及其在 1987 年出版的《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吞吞吐吐的文章：新聞圈與學術圈》、《傳播帝國主義》三本著作，及 1993 年李金銓表於澄社出版的《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中的總結文章〈台灣廣播電視藍圖〉，了解李金銓對「傳播」的基本界定與主張，並在這樣的基礎上，討論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的關連；反思媒體操控除了政治勢力，資本集團的壟斷，對言論之壟斷，傷害更大，更應規範。五篇文章，篇篇精采，除了有大師的理論回韻外，更有承先啟後的創新視角，值得細讀。

本期的研究誌要，則是由林照真所寫的〈臺灣報紙受平台科技影響：新聞與民主的警訊〉，該文針對國內三家綜合性報紙《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進行資料搜集與訪談，其研究發現說明了原本扮演臺灣新聞主要提供者的傳統報紙，出現地方新聞人力、國際外派新聞人力嚴重衰退現象，影響國內言論市場的多元性；臺灣報紙數位廣告成長 616%，傳統紙版廣告則衰退九成以上，廣告收益已難維持優質內容；臺灣報紙網路新聞半數以上（52%-58%）流量，來自 Google 和 Facebook 平台導流，其依賴程度，令人堪憂。該實證資料除具引用價值外，該文更咸盼政府與民眾，能關注報紙沒落的現象，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以挽救臺灣的新聞與民主。

如同前述，本期的歷史現場，完整再現一場由當代公共知識分子討論杭士基（Chomsky）學理與論點的座談會內容。該座談由郭力昕主持，集學界難得齊聚的大咖學者：馮建三、李泳泉、李行德、傅大為、汪宏倫與談；更難得的是迎來令人驚豔的學者朱元鴻、盧倩儀、張小虹、蔡維天、楊儒賓、方念萱、許家馨、黃正德等，參與回應與討論。正所謂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內容十分精采豐富。是以，我們完整實錄了該座談的內容，深怕錯過或遺漏了過程中的隻字片語。原因無它，只因這是近年討論有關杭士基（Chomsky）學理與論點，最豐富與精采的一場座談會。字裡行間，除了觀點的啟發，也有更多值得延展的研究視角與論點，句句吸睛洗腦，令人佩服。

如同該計劃主持傅大為所述，俄烏戰爭以來，杭士基多年來對國際政治與美國世界霸權的分析，更形重要。本期有幸留下這麼精采的座談內容，感謝在這動蕩、不確定的時代裡，仍讓我們感受到學術熱情不死的希望，能懷抱著這樣的學術溫暖，有動力續行的這群可敬又可愛的學者先進們，表達由衷的感謝。

《傳播文化與政治》編輯委員會

2022年12月19日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六期  
2022 年 12 月

對位解讀下的聲音：  
重讀李金銓的《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  
兼談資訊流通與國家自主

唐士哲\*

本文引用格式

唐士哲（2022）。〈對位解讀下的聲音：重讀李金銓的《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兼談資訊流通與國家自主〉，《傳播、文化與政治》，16:1-23。

---

投稿日期：2022 年 9 月 5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10 月 30 日

\* 作者唐士哲為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e-mail: shihjet@gmail.com

## 《摘要》

李金銓於 1980 年出版英文專著《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在當時資訊自由流通與文化帝國主義論辯對峙下，李金銓主張兩方說法各自成理，卻也各有偏差。他強調理論上折衷取兩方之優，但證據先行，應對各國的傳統與現狀，以及內、外條件作個案的綜合分析，並主張第三世界國家應該自主構畫傳播政策。本文取徑薩依德(Edward Said)的對位解讀，聚焦李金銓關於資訊流通與個案複雜性的相關討論。對照相隔了四十多年後，當前全球資訊流通現狀，本文探討李金銓早期的立場，如何一定程度上仍起燭照現狀的作用。

**關鍵詞:** 李金銓、對位解讀、資訊流通、媒介帝國、傳播政策、主權

## 壹、前言

對於台灣大多數成長於 1980 至 1990 年代的學子而言，「李金銓」這個名字既遙遠又熟悉。近半世紀的學術旅程中，李金銓的教學現場橫跨香港中文大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以及香港城市大學，卻唯獨沒有在台灣的大學裡教過書。一直要到 2019 年，透過母校政治大學的推薦，李金銓出任教育部玉山學者，終於在他教學生涯的末端，站上母校的講台。

雖然大半輩子在台灣的大學課堂裡缺席，李金銓卻仍是桃李滿天下。不同世代在大學就讀的學生，包括筆者，都是透過他的《大眾傳播理論》被引進傳播研究的領域裡。媒介學的倡導者德布雷（Regis Debray）曾說，傳播是一時一地的，傳承卻是生生不息，但前提是必須倚靠特定的傳播技術或行為。蘇格拉底（Socrates）的思想傳播現場在希臘城邦的市場角落，但真正傳世的，卻是後學柏拉圖（Plato）的記載、傳抄，乃至後來印刷書的大量流通。印刷在人不在場時不斷延續思想的感染力，傳播因此成了「傳承」（transmission）的一個面向（Debray, 2000／劉文玲譯，2014）。當不同世代的傳播學術工作者書架上都有《大眾傳播理論》，這似乎註銷了李金銓在本地的缺席！在傳承的意義上，他也成為兩岸三地與北美華語傳播研究圈裡共同語彙資產。

透過學刊、規劃以學術人為名的致敬專題，似乎無法抽離在「李老師」著作的字裡行間，尋找學術人在不同學思階段的身影，或者回溯來時路。本文即便不脫離這個主軸，但我認為時代機緣下的每個發聲，都是在既存的論述、學派或說法中尋求棲息處或介入點，作為一位於 1970 年代「留洋」的傳播學術工作者，李金銓也不例外。因此，即便本文論述的主角是李金銓，但我採用的策略是「挪用」，在方法上挪用一個李金銓近期治學仰慕對象的閱讀路數，來重讀李金銓。

這位仰慕對象即是後殖民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透過薩伊德發展出來的「對位解讀」，我希望重讀李金銓早年的媒介帝國主義專著，並藉此突顯一個國際傳播研究裡聲音不絕的關鍵詞，即「資訊流通」。這個字眼行

生出的理論、概念與論辯，某種程度定位了國際傳播在不同歷史脈絡下的發展。李金銓於 1970 年代末期，躬逢其盛地參與了因為這字眼掀起的論辯，也成為 C. C. Lee 為西方學界所認識的關鍵起點。

什麼是對位解讀？又為何透過對位解讀，探索李金銓早期著作中關於政策研究的立場？容我在下一個章節說明。但聚焦在資訊流通上，因為這個字眼在不同歷史場景裡，成了理解國際關係與國家主體性的關鍵要素。傳播科技的發展，使得資訊流通快速、廣泛，但有些國家卻視境外流進的資訊為洪水猛獸。資訊流通帶來了理念、文化的交流，卻無法脫離其社會力量，以及薩伊德所說的「權力輪廓」(configurations of power) 問題 (Said, 1978 / 王志弘等譯, 1999, 頁 7)。資訊流通但非對等地交流，是李金銓近期對於國際傳播研究缺乏真正多樣與宏觀的國際視野提出的批判。回顧學術發展的歷史，當國際傳播研究被美國的特定政治或經濟旨趣所壟斷，展現出的便是以西方狹隘且抽象的普遍性原則，強加於全世界的「區域研究」(李金銓, 2022, 頁 317)。因此，國際傳播的研究如何真正是「以區域為基礎」的研究，如何使得區域知識真正由區域長出，並整合為有意義的理論框架，成為李金銓在近年關切的重點 (同上, 頁 333)。在《「國際傳播」國際化》裡 (2022, 原書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集眾家之言，重構區域比較研究的認知論與方法，顯然便是希望在多元文化主義成為許多國度裡保護邊陲弱勢族群的專有名詞之餘，也讓多元的精神解放國際傳播研究的「區域研究」視野，真正擁抱世界。

因此以「資訊流通」作為石蕊測試，對早期李金銓著作進行對位解讀，我希望在本文以他對媒介帝國主義概念的原初解剖中，突顯國家自主的傳播政策如何與資訊流通發展出截然不同的關係。當時對比時隔四十年後的今天，在科技條件、市場型態與地緣政治衝突日趨複雜的脈絡下，國家的傳播政策面臨什麼樣現勢的挑戰。這些挑戰，皆突顯在該書繕寫的時空裡，李金銓處理一個近似方法論的企圖，即對於個案的綜合分析，如何顯露出全稱性理論的偏差，以及跨出國際傳播的區域研究宿命，關照全域的地區研究為何至關重要。

## 貳、關於「對位閱讀」

薩伊德的「對位閱讀」(contrapuntal reading)靈感來自音樂。樂理創作的對位法，追求的不是旋律進展過程中，音部之間和諧的縱向發展，而是橫向的、不同旋律同時發聲但彼此融合的技術。李金銓曾主張對位閱讀作為方法，可以修正、發展、延伸，甚至淘汰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媒研究文獻中的理論概念(李金銓，2022，頁 343、344)。

但怎麼樣算是對位閱讀？簡單來說，即是對脈絡的聯想。薩伊德主張：當每一個英國家庭餐桌上的糖罐子成為生活必需品，這便可以同時聯想到海外英屬殖民地的甘蔗莊園。任何文學文本的閱讀，皆不應被侷限於文本形式上的歷史起點與終點，閱讀也同時包含聯想到任何可能與文本指涉的意涵有所牽連的層面。薩伊德的讀法，是由西方的文學經典中，扣連到歐美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就像西方近代的文學典律，除了是歐、美現代性的縮影，也蘊含了受西方帝國主義宰制社會裡雜多異質且沉默的底層大眾。對位閱讀試圖含納那些曾經被拒斥在文本之外的事物，因此也是一種抵抗的策略(Said, 1993, pp. 66-67)。

即便適用範疇有別，薩依德的對位閱讀與阿圖賽的「徵兆性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同樣透過挖掘文本表象沒有浮現的深層意義，來擴大文本解讀過程涵蓋的社會或文化範圍。因此，指認文本的意識形態潛流，成為聯想、扣連讀法的策略目標。資訊流通在李金銓等身的著作裡，或許不是從一而終的關懷，但在早期步入西方學術界時，卻是他為西方學術界所認識的關鍵詞。1970年代以前，資訊流通是西方(特別是美國)主導的國際傳播顯學；而這個關鍵詞也成為走過1950年代的發展主義思維後，全球南方的知識份子與西方社會的新左派回頭反思與批判的重點。資訊流通該是無條件地自由流通，還是有條件地限縮在國家自主的傳播政策下「自由且均衡地流通」，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意圖透過宣言、揭示文化為全球傳播政策的關鍵詞。李金銓在當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對於這個字眼針鋒相對時，選擇以折衷的角色，主張個案認定，或者套用他的說法，「取精用宏」。

以下的討論，將是以「資訊流通」為關鍵字眼，檢視李金銓在 1980 年代兩本論述媒介帝國主義的專著裡，關於資訊自由流通與國家自主兩種對立價值的討論。本文「對位」之處，在於將早期李金銓對於流通與個案複雜性的論述立場，對照相隔了四十多年的資訊流通現狀，看看早期的立場，是否一定程度仍起詮釋現狀的作用。對位閱讀是本文採取的閱讀策略，但重點並不擺在加持或減否個人，而是透過文本顯現的一些徵兆，對其採取對位思考，以薩伊德的企圖而言，便是發掘「帝國」意涵的意識形態潛流。然而，如果薩伊德的對位式閱讀有西方對比於殖民世界文化空間的對等性，本文的「挪用」則是突顯跨時、斷點的對等：對位閱讀「資訊流通」於 1980 年前後，以及相隔四十年後的今天，思索國家制定傳播政策的自主性，面臨什麼樣的權力輪廓的轉變。

### 參、為什麼談流通？特別是「資訊流通」？

「資訊流通」成為一個擾動意識型態潛流的關鍵字，首見於聯合國成立之初。在美國主導，但美、俄對峙的國際論壇氛圍下，資訊的自由流通成為檢視人權狀態的主要指標（Hamelink, 1997）。1948 年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十九條規定：「任何人皆有意見表達的自由權利；這項權利包括不受干擾地持有意見，以及可無視國界的限制，藉由任何媒介搜尋、接收、分享資訊與觀念。」（The United Nations, 1948）但規定是否要附上但書，引發自由與共產兩大陣營的盟主激烈辯論。以美、英為首的自由主義陣營，視資訊自由流通視為人權的表徵，不因個別國家或社會的差異而打折。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則強調，第十九條中明示的權利，保障的不只是使用資訊的個人，更是經營與販賣資訊的傳播機構。資訊自由無異是「華爾街的銀行家、企業家所代表的民主」，極有可能淪為西方少數資本主義企業的「商品輸出自由」，因此極力主張國家管制的重要性（唐士哲、魏玟，2022）。

這個字眼成為聯合國論壇對決的關鍵字的第二回合，發生在 1970 年代中期。由南半球國家發起的重建「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New World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簡稱 NWICO），透過教科文組織的調查委員會與宣言，希望正視南、北半球日益嚴重的資訊落差。這種落差反映在南半球國家資訊基礎設施的缺乏、既有傳播的機構淪為外資控制，以及傳播內容再現文化與社會的西方觀點偏差等。因此南半球國家要求透過政策介入，建立國際間資訊流通的新秩序。關於 NWICO 的經過與成敗，國際傳播研究相關書籍已是汗牛充棟，本文便不贅述。

提到聯合國關於資訊自由流通的兩回合論辯，用意在於突顯這個「價值」成為國際組織明文保障的宣言或報告時，總是掀起自由流通與其對立面的激辯——即國家對於資訊治理的主權。兩個回合的論辯裡，強調國家在資訊流通上的角色扮演，指涉的對象頗為不同。許多參與第二回合論辯的成員，在美、蘇對峙的第一回合時，不是尚未獨立建國，便是剛剛由殖民地狀態脫離出來。這些多半位居南半球的「新興民族國家」，在經歷 1960 年代的非結盟運動後，成為自外於自由、共產陣營的「第三世界」。除了經濟與社會發展仍在起步階段，第三世界與「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共同反映出國家在解殖、邁向主權獨立的過程中，如何受到種種外來的，以及傳統在地的權力宰制，與社會、文化、經濟乃至個人心理等自我調適的過程。在法農（Franz Fanon / 陳瑞樺譯，2007）、南地（Ashis Nandy, 2009）等人的書寫中，皆可以感受到這種新、舊社會交雜，內、外勢力夾攻下，新社會轉型與個人認同意識再造的複雜性。如法農在新興國家的去殖民過程中，看到殖民時僥倖存留的權勢團體如何與前殖民勢力裡應外合、操縱對立來進行國族主義的鬥爭。南地筆下的殖民後印度社會裡，即便西方的統治者隨著解殖而離開印度，帝國意識（imperial consciousness）卻仍舊縈繞在已然西化的常民階級腦中。

這個通稱「後殖民」的書寫，在 1980 年代以後也迴向至歐陸與美國的學術界，成為開啟對於第一世界啟蒙二元思維的批判（Spivak, 1988; Bhabha, 1994）。本文並不在此細數這種種歷程，而是藉這個片段，引出「第三世界」所觸發的一個關鍵詞，即「帝國主義」。這個字眼在十九世紀出現時，便與

當時的媒介生態有密切的關係。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電報搭配海底電纜，使得國際通訊社的資訊、新聞流通範圍括及全球，也象徵歐洲殖民型態的轉變。電報的快速，使得殖民的意義不再僅等同於工業資本主義榨取便宜的原物料、勞工來源，以及傾銷過剩的商品等經濟掠奪行為，而是歐洲帝國統御制度的對外延伸、向外輸出，落實了文化、社會等多重關係的宰制。1870 年，西方三大通訊社路透、哈瓦斯與沃爾夫社「瓜分」了全世界的採訪範圍，三家壟斷事業同意互不競爭，分享報導。國際通訊社的跨域新聞採訪、交換，加上國營的越洋電報網絡延伸，使得通訊社的影響力跨越國界，遠披至帝國的海外殖民地，即時的訊息傳達統合了帝國範圍內的視聽，通訊社也成了中介商業與政治勢力的要角。凱瑞（James Carey, 1989, p. 212）主張，此時「帝國」或「帝國主義」成為流行的語彙不是巧合，因為越洋電纜的鋪設、啟用，不僅克服了訊息傳遞的時差，更具體的意義是打造了「帝國資本」，即調和帝國與邊陲間的政治、軍事，以及商業等多方勢力。因此，電報與電纜透過海洋的力量（sea power），將殖民主義轉化為帝國主義：一個帝國的中心不再僅是被動回應邊陲，而是主動發號施令的治理體系。

傳播媒介與帝國的關聯，到了二十世紀中期以後，更加密切。即便歐洲殖民帝國開始步下歷史舞台，但帝國主義所指涉的對於一地的壟斷性控制與權力不對等，仍在經濟與文化上牢牢地掌控這些國族國家世界系統的新成員。在歷經解殖、獨立建國的歷程，新興民族國家關切的重點不再僅是建國初期的國族整合以及社會、經濟的現代化發展，而是國族文化表現的自主性。隨著傳播科技帶來資訊流通的渠道日趨多元，現代化成為國家發展、進入世界體系的誘因，包含報社、通訊社、電影院、收音機廣播等象徵西方現代化的媒介，陸續進入新興民族國家。透過這些媒介帶來外來的資訊，「境外」從此不再是地緣關係上的「疆界以外」，而是跨越文化認知障礙的訊息互動。

即便流通創造活水，是一地文化得以延續、創造的關鍵，但是一旦跨越國界的流通是單向的流通，卻沒有對等的資訊回流，現代化大眾傳播媒介帶動的資訊流通，成為既有國際政治經濟權力關係位階的複製。「主權國家」對於這些外來的訊息、機構，乃至廣告強銷的商品消費，該行使什麼主權意

識，採行什麼管制措施，便交雜了複雜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考量，包含統治階級政權的維繫、滿足與平衡市場營利的需求，乃至各種組織或利益團體的結盟，推動的掃盲、疾病防治，農耕技術改良等（見 Katz and Wedell, 1977, p. 9）。

電視無疑使得問題更為複雜。電視技術在設置初期是花費高昂的投資。包含電視機的生產與轉播系統的設置，以及開播後節目內容來源，林林總總加總起來，使得電視對於許多國家（包含第一、第三世界國家）是一個未必實惠的設置。因此，電視對於許多第三世界的新興民族國家而言，是「國策」層次的問題，背負了國族整合、社會經濟的現代化，以及文化傳承等使命（Katz and Wedell, 1977）。電視事業在台灣的興辦，背負了執政者建設「自由中國」模範的意志，以及不能落後中國大陸的壓力（見程宗明，2002 年 11 月）。此外，電視也被期待成為散播現代社會消費意識的代理者。柯裕棻研究電視的引進對於台灣在 1960 年代時的社會與經濟意涵，便主張電視被賦予的文化功能，除了不斷與當時的中華文化復興、反共復國的政治意識型態扣連，另一方面也反映一種科技拜物的情結，即強調電視可以促進市場的開發，是現代化消費生活的表徵（柯裕棻，2012）。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可以試圖彰顯資訊流通與國家政策的自主性的複雜互動關係，而李金銓正是試圖由國家內、外條件的複雜性入手，作為構思國族自治傳播政策的起點。

## 肆、重讀《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ation of Television Culture（中譯《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電視文化的同質化》，以下簡稱《再商榷》）原先出自李金銓於 1978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經過兩年的改寫、籌備，於 1980 年由聖者（Sage）出版社出版。該書的主要論點經彙整、改寫，於 1987 年在台灣由久大出版社發行《傳播帝國主義》。

根據李金銓於〈跋 傳播縱橫 學術生涯五十年〉一文（2019，頁 573-616）

的自述：他以此書參與了自由多元派的「資訊自由流通」和激進派的「傳播帝國主義」的辯論。在分述流通論者正面看待媒體自由市場的運作機制，以及文化帝國主義論者的批判立場，他主張各國的處境與條件不同，因此兩方說法各自成理，以辯證的角度，「資訊自由流通」與「帝國主義」論述合起來缺一不可（同上，頁 587）

然而，書名既曰「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顯然在當時資訊流通的世界系統裡存在於國與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以及國際影視流通的霸權結構，是立論關切的重點。左翼學者如許勒提出「文化帝國主義」，受到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影響，主張世界的風貌依照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路徑，已被區分為核心、半邊陲與邊陲地區，且彼此發展出不同層面的依附關係，而文化／傳播的發展為這種依附關係提供合理的文化條件。因此，文化帝國主義是許多過程的總和，透過這些過程，特定社會被吸納進現代世界體系內，且這個社會的主控階層塑造出的社會機構制度，屈就於居核心位置且佔據支配地位的國家種種價值觀與結構（Schiller, 1976）。

李金銓認為文化帝國主義優點，在於能簡約地解釋國內與國際權力結構的緊密聯繫，以及「中心」與「邊陲」的動態關係。但他也強調不應一味以外因作為解釋，國際權力結構裡，對應經濟表現的影視文化產品輸出／輸入，或者影視制度的複製，造成第三世界國家的影視環境的依附處境，雖然顯得斑斑可考，但各國的情勢有別，不能一概而論。他論及 1970 年代的伊朗建立了第三世界最強大的傳播系統（在美國多國企業的協助下），卻仍舊敵不過保守宗教領袖何梅尼的傳單，傳統或原始的傳播方式其力量仍不容小覷（李金銓，1987，頁 85）。

因此，他傾向使用「媒介帝國主義」，而不是「文化帝國主義」，來考察一些較具實證意涵的電視發展面向，如節目的進出口、媒介組織所有權控制、廣播制度的公共意涵與商品化間的關係，以及資本主義世界觀對於接收國造成哪些生活面向的影響等。他呼應坦士多（Jeremy Tunstall）、卡茲與魏多（Elihu Katz & George Wedell）等人的分析，也就是必須細察各國的歷史條件與狀況的殊異。外因固然重要，內在因素如政府的態度，因應廣電媒體的引進而進行國內各種資源的調配，乃至如何將廣電系統調整為適當地

的社會情況等，皆有可能翻轉依附的情勢。他主張即便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跳不出外力的依附圈，有些國家卻在一定範圍內凝聚內在力量，抵禦外來壓力。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媒介景況不盡然是宰制經濟結構的複製。即便一個國家的經濟採行的是自由市場的體制，未必表示其媒體文化上也必然充斥外來影視產品的影響。

李金銓以 1970 年代的台灣為例，說明這種經濟結構與媒體文化的不對稱性。他主張台灣雖然基於政經考量引進美國的商業電視制度，但文化的自主權並未就此淪陷。1970 年代的台灣，雖然經濟表現已是高度依賴國際貿易，但統治階級並沒有鬆手對於文化主權的掌握，這反映在當時電視節目的自製率高，且媒體經營權結構的外資佔比低。他因此強調台灣當時面臨的文化依附困境，主要來自於內部的政治因素：政府縱容媒體過度商業化發展，卻又在政治意識型態上緊握著大中國統一論，造成強壓多元的在地語言與生活文化。與台灣這個發展中經濟體相較，加拿大顯然成了李金銓筆下一個強烈的對照組。地緣關係上，加拿大雖然位居第一世界陣營，但英、法殖民的過往，以及與美國為鄰的語言、文化重疊，卻註定使得這個國家成為第一世界裡的第三世界，其媒介制度的發展，必須糾結於複雜的歷史、地理環境與經濟現實中。電視節目的「依附」情況是包裹在包含電影、雜誌與有線電視的媒介帝國主義現象中（Lee, 1980, 見第四、五章討論）。

即便強調資訊自由流通與帝國主義論述各自成理，也各有偏差，但主張缺一不可、取精用宏的同時，他也「左右開弓」，左批新左派的經濟決定論疏忽了各國內在的情勢差異，右批資訊自由流通獨尊自由主義市場邏輯，把國家當成自足的分析單位，卻看不到國際間權力結構的傾軋（李金銓，1987，頁 142）。他檢視在當時頗流行的「產品生命循環」論（product lifecycle），指出這個為資訊自由流通辯護的說法即便有啟發價值，但一方面文化產品不似工業化產品，產業升級與取代談何容易，另一方面，在當時美國強勢主導電視節目外銷的國際市場裡，產品生命循環論在發展中國家並未能找到任何相應的案例（1980, p. 49）。而他贊同文化帝國主義論突顯在國際間權力關係失衡下資訊流通的宰制意涵，並強調理論與政策應互為表裡，但他對於新左派提出的「解方」，即政策上「走社會主義路線」，全然由全球資本主義

世界體系撤走，也深感不切實際。免除國際依賴的同時，並不能夠保證本土的文化經驗不會免於國境內的政治依賴（1987，頁 64）。

在意圖辯證資訊自由流通與文化帝國主義兩者互斥、但並非無交集可能的前提下，李金銓主張應讓個案的證據說話。他強調非科學主義的實證性，反映在他以「例外」的個案突顯理論的片面性：

我主張要具體分析各國的傳統與目前的綜合狀況，以衡量其內在與外在因素的交互運作，最後才能定奪那一種理論可以成立（李金銓，1987，頁 142）。

日後，當李金銓於《國際傳播國際化》（2015/2022）中重啟文化帝國主義的討論，他再次強調不以理論的全稱性套用至解釋個案複雜性的立場。他引用斯帕克斯（Collin Sparks）的一個核心提問，來解釋他對於理論與個案實證的態度。斯帕克斯不鍾意「文化帝國主義」或「媒介帝國主義」等詞，寧願以結果論斷，理解國際傳播是帝國主義所產生的「文化後果」。李金銓強調斯帕克斯的觀點直指一個核心問題，即如何保證分析關照全域（holistic），又不陷入全稱命題（totalistic）的泥沼？關照全域、不把社會的有機整體碎裂化；而如果堅持全稱命題，使得分析未能對應到社會整體面貌，且犧牲了個案釋出的差異面向，僅是成就了抽象、本質化的理論全稱命題（頁 34-35）。

今天重讀李金銓關於媒介帝國主義的兩本專著，可以發現他對於理論的折衷立場，同樣反映在理論之所為用，純然因時因地制宜的實用路線。對他而言，媒介政策分析必須充分考量歷史與當前景況的差異。就像他主張國際傳播組織的所有權、市場與資源，以及利潤，各個產業別的表现各有不同，不能夠一概而論（李金銓，1987，頁 103-4），理論為現象服務，且現象有其無法被歸因的複雜性。他贊同馬克思主義學說將理論與政策視為表裡如一（李金銓，1987，頁 143），在當時美國仍是行為科學當道的傳播研究裡，他強調為第三世界國家應追求自給自足的傳播政策，但並非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路線分歧中二擇一。對他而言，商業化的傳播制度並非一無是處，與

其激進地鼓吹革命，一步到位，他更強調要漸進地改革。他主張採取中庸之道，「既爭取文化主權的獨立自主，也不能放棄資訊的合理暢通。」（李金銓，1987，頁 64）

以構畫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政策研究的動機而言，透過「個案」對於當時擅場的全稱性理論產生質疑，顯然是他立論最突出之處。構成他分析的內、外因素，他主張應多元檢視包括文化傳統、資源、語言、地理分佈、人口、菁英份子的眼光或決策，乃至社會力量的結合、政治經濟結構的因素，尋求這些歷史、文化與社會景況的解釋（李金銓，1987，頁 142）。就像在討論台灣的媒介發展時，他以「兩個台灣」破題，並援用哈佛大學漢學家費正清的「大陸中國」與「海洋中國」說法，來帶出夾雜在虛幻的大中國傳統文化想像以及務實的市場經濟營運的電視政策。

在地狀況的綜合分析作為政策分析的起手勢，意圖在資訊自由流通與媒介結構宰制兩派分立下，尋找中間值，理論的折衷主義傾向不免意圖左右逢源。對照 1980 年代以後的國際傳播景況，當時的特性在於跨國資訊流通仍處於相對封閉的資訊環境，類如電視、廣播、報紙、雜誌這些大眾媒介，在頻道、內容，以及通路相對集中的環境中，國家政府對於資訊的流出與流入，仍具有主導的權力。然而，當時以例外的個案，彰顯兩個理論典範的缺漏，卻叩合了 1980 年代以後的媒介技術、經濟與社會發展。「例外」以其對於既定認知、構念或說法界線的挑戰、差異的突顯、幽微意義的探索，但仍寄居於既有理論的認知架構下打游擊，成為一種務實的文化政策批判。

面對詭譎多變的國際情勢，個例狀況的綜合分析預示了接下來歷史舞台的發展：新自由主義由英、美的經濟政策到席捲全球的私有化與商品化風潮，冷戰結束後加速的全球市場整合，傳播與電腦科技帶動更快速、多面向的跨國資訊流通，以及這些資本主義市場與科技的動因所造成的全球社會結構變遷，皆使得「例外」成為常態。為了突顯這個常態，我們或許可以試著將李金銓主張的內、外因素作為一個參照的架構，來檢視自那個寫作的時間點以後，國際傳播局勢的變化。

## 伍、例外的常態化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帶動的世界局勢變動，相當程度改變了國家在傳播政策上扮演的角色。如果資訊的自由流通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自主權曾經是針鋒相對的價值，面臨全球化過程中強大的世界市場整合趨力，以及資訊傳播科技無遠弗屆的滲透力，兩者之間似乎已難是河井不犯，國家對於疆界內、外資訊流通的掌控力顯得倍受挑戰，但也亟思突破，既有守勢也有攻勢。

以傳播科技的進展而言，從 1980 年代的有線電視、1990 年代的國際直播衛星、2000 年以後網際網路的盛行，乃至近期網路平台所驅動的數位經濟型態，每一種新的科技形式皆帶來資訊流通與管制不同的問題。每一種科技形式的出現，加上既有科技形式的質變，使得國家政府難以單純透過政策阻擋的方式，將此科技形式防堵在外。有的僅是以對等的手段，在國內複製一個自主的媒介科技體系。

當影、音、資訊、資料跨越地理界線的流動串起了國家與世界體系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過往以政府做為決策主角的國際傳播舞台上，湧現更多分享或瓜分決策權力的新起要角：跨國媒體集團、大型科技公司、各種跨政府或非政府國際組織或協定，乃至人權機構，皆可能在變動詭譎的國際傳播生態中，進入權力的角逐場。

與 1980 年代以前相較，不同之處在於今天的媒介形式與渠道日漸多元，資訊的自由流通雖然仍是西方跨國媒體集團行走全球市場的護身符，但它也有可能成為非西方國家或組織擴張國族或區域認同的手段。九 0 年代中期以後，拜直播衛星之賜，產生像 CNN、BBC World 等代表英語世界觀點的全球衛星頻道，隨著 CNN 打造的 7/24 新聞模式在全球各地被複製，衛星頻道也成為許多非西方世界的傳播組織或機構觸及特定文化或族群意識的管道。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南方電視台（teleSUR）分別象徵泛阿拉伯與泛拉美的跨區域觀點，透過衛星傳送，走向全球的收視群，挑戰國際新聞的英美霸權。總部位於倫敦的庫德族衛星頻道 MED TV，則以散居土耳其、伊拉克、伊朗、敘利亞的庫德族人為目標收視眾，並以倡導建國（庫德斯坦）

為終極目的 (Price, 2002)。這些前第三世界的地區、或曾經是第三世界國度裡倍受剝削、排擠的族裔，如今也懂得利用衛星作為呈現另類觀點，或倡議特定區域認同的利器。圖蘇 (Daya Kishan Thussu, 2007) 依此主張：衛星訊號賦予的不再僅是由西方流向其他世界的資訊流通，而是多方位的「逆流」 (contra-flows)，這些跨國或有地緣文化意涵的逆流一定程度平衡了歐美主控的國際視聽。即便它們的經濟規模與影響性仍無法與全球流通的「順流」匹敵，但國際的話語霸權型構因此更形複雜 (Thussu, 2016)。

這些國際傳播的發展，皆對資訊流通空間的「地上主權」，也就是各國政府，形成挑戰。半島電視台的出現，不僅讓美國頭痛，也同樣不見容於阿拉伯世界裡的一些國家 (Seib, 2005)。土耳其則竭盡所能，阻擋 MED TV 訊號在境內落地 (Price, 2002, p.21)。誠如學者普萊斯 (Monroe E. Price) 強調，因應國際間資訊流通的日益多元、複雜，各國政府為維護國族的「認同泡泡」 (bubble of identity)，顯得費盡心機。國族認同向心力的維繫，關乎一地政府能否主導資訊流通的空間，同時也關乎國家的對外形象塑造或國力展現，能否利用資訊流通的優勢。國家在國際傳播所採取的政策或作為，因此交雜於資訊「流入」 (inflows) 與「流出」 (outflows) 的多重考量中 (Price, 2002)。

一方面，國族國家的政府相較於過往，更加處心積慮地維護疆域內的資訊空間主導權，抵禦強勢的外來文化影響。包括保障本地產業環境、支持有助於彰顯國族認同的傳統或新創文化、維護國家安全的資訊環境，以及強化公民權利的認知等，皆成為政府管制境外流入的資訊的合理聲稱。政府的「守勢」，包括運用科技的阻擋手段（如冷戰時期的蘇聯以電波干擾阻擋短波收音機訊號、馬來西亞以限制直播衛星接受碟的尺寸意圖控制衛星訊號下鍊的範圍），進口管制（如法、韓兩國在電影進口上採取配額制以及以賦稅補貼國內的製作產業），查緝境外內容的非法流通管道，乃至動用非正式的外交手段或商業談判手段，阻絕特定境外內容的引進（如新聞集團於 1990 年代欲進入中國市場，交換條件是其衛星服務不得提供中國認為對其不友善的 BBC 頻道，以及土耳其以支持恐怖組織為理由，要求英國不核發執照給 MED TV），上述種種手段，皆是以維護國家的資訊主權為理由，阻擋外來資訊的

流入 (Price, 2002, pp. 18-23)。

另一方面，許多國家的政府也開始反守為攻，透過改變或影響疆界以外的資訊空間，擴張國族或文化認同可及的範圍。所謂自主的資訊空間，不再像過往廣播、電影或電視等大眾傳播時期的媒介，僅是包含在國土疆界範圍的「容器」中。透過更靈活的經濟與文化外交，使得一國的影、音或出版品得以打開國外的通路，手段日趨多元，包括：利用資金行走全球的特性，以合資、併購等方式進入他國市場；以靈活的文化外交手段，在他國設立文化機構，讓標榜國族文化的內容流向全球；搭上全球資本的勢力，使得一國的產製能力與全球的產業鍊接軌。這些手段皆使得國族文化的目的，不只對內形塑認同，更增添了對外展演的意涵。文化象徵的建構，從此摻雜了複雜的國際發行與宣傳考量 (Croft, 2000)。包括近年來強勢的韓流，以及中國 CCTV 的大外宣，皆可看到政府在資訊流出上，或直接或間接的參與。所謂「軟實力」一說，強調資訊的輸出作為擴張一國外交或市場影響力，打的算盤便是當一國的可以成功撩動其他國家對其的仰慕或想望，這個國家便有可能不費一兵一卒，影響這些國家內政的優先順序 (Nye & Owens, 1996)。

如果將上述這些資訊流出與流入現象，籠統解釋為全球化過程對於民族國家資訊空間的「穿透」，或許不算言過其實，然而，相較於 1980 年代以前，這些透過經濟或科技條件所賦予的機會或限制所突顯的差異在於，今天已難用「國內媒體」(domestic media) 這個清楚的指涉，來對應構成「國家資訊主權」的概念 (Price, 2002, p. 19)。如果文化帝國主義原初的論述，在於「抗拒」外來勢力的影響，維繫一國國內資訊環境的自主，當前資訊流通的現象、亂象交雜，治絲益棼，在制度上全然抗拒談何容易！在施行民主體制的社會裡，國家政府面對資訊邊界的模糊，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成為葛蘭西霸權論的實踐者，即文化條件的創造，需結合文化的實踐與政治的運作，串起不同群體利益或社會需求，以在特定的時局裡成為代表「民族全民」(national popular) 的意志或文化的國家。因此，資訊主權的伸張與讓渡，時不時在國內媒體範圍之下或之上合縱連橫，商業勢力、政治勢力或民間勢力，皆可能成為霸權創造或維繫過程可資運用的籌碼。

而另一方面，所謂資訊自由流通所獨尊的自由市場價值，早已隨著全球

資本企業的攻城掠地而信用破產。對於許多國家的政府而言，開放國內的影視文化市場，有時是犧牲文化以換得其他產業區塊的產品的輸出，有時可能是在主權不及的狀況下的無奈（例如國際串流平台由境外提供資料庫下載影音內容，但實則行境內放送之實）。自由市場與國家自主的價值分立，已隨著現狀的不斷改變所造成的資訊主權的含糊，而難再清楚劃分。哥倫比亞傳播學者荷蘇斯·馬丁巴貝羅（Jesus Martin-Barbero, 1987）審視拉丁美洲在引進電視後，電視為日常生活帶來的影響，便強調國家並非一個理性的決策單位，而是一個充滿矛盾與衝突的場域，文化認同在這個場域裡恆常處於協商的狀態。

李金銓呼籲，發展中國家不論大小，都應該自主設計適合自己的傳播方向，並且掌握自己的媒體未來的傳播政策，四十多年後，這個主張一定程度地兌現在少數資訊流出或流入主導權的「上升」國家上。全球化過程對地方的穿透，對多數國家是危機，卻也可能為極少數國家帶來機會，促使國家政府扮演的角色更彈性、使用的手段更多元。這相當程度地反駁了一些全球化將使國家的角色更式微，或地理界線從此無法限制網路世界來往自如的個體使用者的主張（Negroponte, 1996; Ohmae, 1995）。例如中國由建立網路防火牆，到近期互聯網力推主導 5G 技術標準，在在希望透過軟、硬體設施的布建，打造一個自主但封閉的資訊空間；相較而言，南韓則是在攻、守兼具的影視音文化政策下，意圖打入向來稱霸的英語世界全球流行文化場域。然而不管展現科技銳實力或文化軟實力，這些竄起的上升國度畢竟極為少數。整體而言，不論採攻勢或守勢，是步步高升、原地踱步或節節敗退，國家為了確保資訊空間的自主所下的決策，皆無法不去考慮來自境外的枝節影響，並與之互動。國與國之間，已不再是涇渭分明，而是多所交疊。而強國與弱國的陣營，也可能因為不同的經濟、政治乃至科技條件而重組。

然而即便國家的政策手段可攻可守，顯然早已不再是大眾傳播媒介時期的美國一國獨大，迫使全世界國家皆採守勢的景況，這並不意味「帝國」作為一種突顯世界體系裡的權力失衡的認知論不再具有解釋力。反倒是傳播科技形式的進展，使得近期資訊流通的世界生態，頗為詭譎地像是歷史處境的倒帶重播：

網際網路所驅動的資料經濟，在表象上看似資訊的流通更自由，也更彰顯國家採取的管制角色必須更趨靈活。當行動裝置如手機、平板電腦等連線裝置使得使用者透過上網產生巨量的資料，這些資料的蒐集、傳輸、儲存與處理，落入全球少數以提供無償使用服務而竄起的平台業者的手裡。一方面，美式企業如 Google、蘋果、亞馬遜、臉書、微軟仍是主導全球資訊產業的「守門」業者，但另一方面，中國的華為、騰訊、百度等業者則竄起，成為挑戰勢力。

基於當前全球資料經濟的維繫，倚靠的是這些守門業者透過服務所榨取的使用者資料，當美、中兩強成為這些全球數據企業的宗主國，這兩個國度也佔據了絕佳的位置，得以取用、開發資料價值，乃至成為網路各種增值服務技術標準的制定者。這種資料推動的資本主義經濟運作方式，與過往的資本運作型態最大的差異，在於資料自由流通所衍生的外溢效應：除了掌握誰是使用者、消費者，開發新的商品或服務，也在於透過通訊基礎架構或基礎設施的設置或營運，將各個不同的國度整合入資料經濟的價值鍊。因此，流通涉及的權力意涵，不再僅限於文化認同或社會意義的塑造，也包括掌握網路科技的通路，榨取日常生活的使用者樣態，並量化為資料，以進行各種運用程式的開發。這些資料既可打包販售，獲取利潤，也可作為全社會監控的利器。

這也使得表象上看似彈性的資訊流通上，究其實並無法自外於平台經濟所打造的資料生態系。當全球的網路消費者與資料生產散居不同國度，但榨取與處理資料的權力，僅由兩大掌握資訊銳實力的國家壟斷，基於資本化動因所轉化的國際系統的資訊失衡，正在上演因為傳播技術與市場化過程所造成的「依附」現象。對此，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便警示，當全球發展中國家淪為資料經濟的「原料」（資料）提供者，因資料驅動的數位經濟形成了國際關係裡新的中心與邊陲模式，且位於中心的僅有美國與中國，其餘世界各國皆淪為資料經濟的新邊陲（UNCTAD, 2019）。

這種科技型態的中心與邊陲，使得近期「數位殖民主義」之說浮現（Avila, 2020; Quijano, 2007; Couldry & Mejias, 2018）。跨國科技公司除了提供平台服務，也透過提供關鍵的網路基礎設施如線纜服務、軟硬體設施，或者協助

發展教育的雲端環境等，介入一個特定國家的資通訊環境。UNCTAD 警告，由於這些總部設於美國與中國的全球的數位平台掌控了通路，發展中國家將更淪為受宰制的地位，因為它們成為用戶原始資料的無償提供者，但同時必須支付運用這些客戶資料開發出來的智慧裝置或程式軟體(2019, pp. 76-78)。

即便物換星移，但站在網路衝鋒陷陣的浪頭上，「數位殖民主義」重現了 1980 年代直播衛星時期的「電子殖民主義」說法，只是這次的輸家不僅是南方國家，而是捐輸了大量資料的全球數位子民。我們也正面臨一個資訊流通不變的議題，即「帝國」現象的翻新，即便內涵與過往我們對這個字眼的認知已全然改變。史巴克斯 (Sparks, 2022) 主張，當前的國際體系中，不再只有單一中心，而是若干大小強弱不一的國家相互競爭、衝突。但不變的是，競爭的戲碼，仍是強國爭奪對弱小、欠發達國家的控制權，其背後既有經濟考量，也涉及地緣戰略。今天建立帝國主義理論，應該與這些現實經驗契合。帝國的維度，取決於國家的在場，而不是相關文化產品的性質。真正值得探索的，是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流通中，國家權力和文化權力如何交織為用 (2022, 頁 264-267)。當前網路資料流通所驅動的數位經濟裡，或許交織為用的，更應加上透過對於通路與基礎設施的布建所掌握的科技權力。而這些交織為用的勢力，如何在全球的資訊流通版圖裡，影響各個不同的國家或社會，成了亟待更多在地狀況的綜合分析的歷史節點。

## 陸、結論

在《再商榷》一書的結論章節，李金銓曾經針對國家的傳播政策自主，提出以下的看法：

第三世界各國都應力求獨立，權衡內在的情況與外在的壓力，謀求最有創造性的制宜方案。當務之急是制定明確的傳播目標，並依目標做出關鍵選擇。它們要不就滿足全球資訊流通的現狀，要不就不甘

區於現狀，且尋求解方以彌補缺憾（Lee, 1980, p.183）。<sup>1</sup>

在歷經四十年後，對照目前世界多數國家面對的資訊流通現狀，國家面對的似乎已不再能夠是二選一的選擇題。隨著電腦資訊與網路平台科技的擴張，以極短的時間造成人類各個層面生活的驟變，今天資訊的流入與流出為國家帶來的，不再僅是思想或意識上的影響，或者世界觀的提昇或改造，而是實際生活或工作型態上的轉變。資訊流通所連結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較 1970 年代時複雜許多。當全球資訊流通的現狀，恆常處於浮動的狀態，滿足現況的除了是掌握資本與科技優勢的強國，對於其他多數國家談何容易！

但浮動變化中仍有不變之處，即便「第三世界」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獨立於第一、二世界的指涉已成為歷史名詞，但七 0 年代的時空裡，第三世界國家曾經經歷過的種種發展的問題與依附的狀況，並未從當前的世界裡消失。在 1970 年代，當國際傳播的學術與政治罕見地產生交集，而有重建傳播與資訊新秩序的訴求時，李金銓便提醒了各國自主制定傳播目標、政策的重要性。資訊自由流通或者抗拒媒介帝國，不應是傳播政策內涵的二擇一選項，各國應該衡量內外情勢、歷史與現況，在國家傳播政策上務實地走自己的路。李金銓對於媒介帝國主義的診斷，以及以折衷、務實的理論態度，對位於今日的全球的政治經濟局勢，成了一種具啟示的預言。

---

<sup>1</sup> 引文的翻譯，參考中文版傳播帝國主義，頁 74；因中文版做了一些文義上的調整，所以本段引文的後半部份仍為筆者翻譯自英文版文句。

## 參考書目

- 王志弘、王淑燕、莊雅仲、許富基、游常山譯（1999）。《東方主義》。台北：立緒。（原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NY: Vintage）
- 李金銓編著（2022）。《「國際傳播」國際化》。台北：聯經。
- 李金銓（2019）。《傳播縱橫》。台北：聯經。
- 李金銓（1987）。《傳播帝國主義》。台北：久大。
- 柯裕棻（2012）。〈電視事業發展初期的社會條件與消費狀況〉。《中華傳播學刊》，22: 3-18。
- 程宗明（2002年11月）。〈對制度改革的回顧與前瞻：四十年的荒原曠野的呼聲〉，「台灣電視四十週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論文。台灣，台北。
- 唐士哲、魏鈞（2022）。《國際傳播：全球視野與地方策略》（修訂二版）。台北：三民。
- 弗朗茲·法農著；陳瑞樺譯（2007）。《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原文：Fanon, F. [1971].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Editions Du Seuil.）
- 科林·斯帕克斯（Sparks, C.）（2022/2015）。〈重啟國際傳播「帝國」的維度〉。收錄於李金銓編著，《「國際傳播」國際化》，頁 245-276。台北：聯經。
- 劉文玲譯（2014）。《媒介學引論》。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原作：Debray, R. [2000]. *Introduction à la médiologie*. Paris, FR: PUF.）
- Avila R (2020, September). Against Data Colonialism. In Muldoon, J. and Stronge, W. (eds.), *Platforming Equality: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pp. 47-57). Autonomy Research Ltd, Crookham Village.
- Bhabha, H.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Carey, J.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ouldry, N., & Mejias, A. U. (2018). Data colonialism: Rethinking big data's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4), 336-349.
- Crofts, S.(2000). Concepts of national cinema. In J. Hill & P. C. Gibson (eds.), *World cinema: Critical approaches* (pp. 385–394).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melink, C. J. (1997).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lobal market and morality. In A. Mohammadi (e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pp. 92-118). London, UK: Sage.
- Katz, E., & Wedell, G. (1977). *Broadcasting in the third world: Promise and*

- performance*. Cambridge,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C. C. (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Beverly Hills: Sage.
- Martin-Barbero, J. (1987).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hegemony*. London, UK: Sage.
- Nandy, A. (2009).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groponte, N. (1995). *Being digital*. New York, UK: Vintage.
- Nye, J. S. & Owens, W. A. (Mar./April, 1996).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72(2), 20-36.
- Ohmae, K. (1995).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UK: Free Press.
- Price, M. E. (2002). *Media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S: The MIT Press.
- Quijano, A. (2007). Coloniality and modernity/rationality. *Cultural Studies* 21(2-3), 168-178.
- Said, E. W.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NY: Vintage.
- Schiller, H. I. (1976).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West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s Press.
- Seib, P. (2005). Hegemonic no more: Western media, the rise of Al-Jazeera, and the influence of diverse voi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7(4): 601-615.
- Spivak, G. (1988). *In other word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Thussu, D. K. (2016). Contra-flow in global media: An Asian perspective. *Media Asia*, 33(3-4): 123-129.
- Thussu, D. K. (2007). Mapping global media flow and contra-flow. In D. K. Thussu (ed.), *Media on the move: Global flow and contra-flow* (pp. 11-32). London, UK: Routledge.
- UNCTAD (2019).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 Value creation and captur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9.II.D.17. New York and Geneva.
- United Nations (1948).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On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A Contrapuntal Rereading Chin-Chuan Lee's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Shih-che Tang

In 1980, Chin-Chuan Lee published his first book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ation of Television Culture*. In the wake of the debate between the liberal-pluralist's rhetoric of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the Neo-Marxist assertion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Lee proposed a middle way solution, unveiling the fallacies of both perspectives while seeking for a proper synthesis of their benefits. He suggests that the media imperialism thesis be empirically built upon verifiable indicators. And a creative synthesis of policies weighing internal dynamics against external constraints, convention with the status-quo, is key for the Third-World nations to control their own media destin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Lee's discussion of information flow and complexity. By way of contrapuntal reading created by Edward Said, the article reviews Lee's argument, raised forty years ago, against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global information flows. It argues that Lee's initial refusal to "take side" theoretically and his recognition of case complexity has, to a great extent, cast light on the status quo of information dis/orders.

**Keywords:** Chin-Chuan Lee, communication policy studies, contrapuntal reading,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media imperialism, national sovereignty

---

\*Shih-che Tang is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shihjet@gmail.com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六期  
2022 年 12 月

## 文人與侍從： 李金銓的新聞史研究

黃順星\*

### 本文引用格式

黃順星（2022）。〈文人與侍從：李金銓的新聞史研究〉，《傳播、文化與政治》，16:25-52

---

投稿日期：2022 年 8 月 28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10 月 15 日。

\* 作者黃順星為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舍我研究中心研究員，e-mail: frankhuangtw@gmail.com。

## 《摘要》

李金銓近年以文人論政作為詮釋中國新聞史的核心概念，固然精確掌握民國時期知識份子的時代精神與集體心態，難免過於強調主體行動力並且過度浪漫化民國時期的辦報條件與環境。而李金銓早期以侍從報業體制解釋臺灣媒介從威權轉型到民主的過程，則提供從結構層面出發的歷史分析視野。透過李金銓著作的耙梳，本文認為對行動者的關注，始終是李金銓的關懷所在。侍從報業體制雖然偏向結構層面的解釋，但李金銓已注意到知識份子在第三世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也成為近期李金銓投注心力於民國文人論政的研究主題。雖然李金銓未提出明確的歷史論斷，但從他對文化物質主義的詮釋中可以發現融合結構與行動二元論的折衷研究取向。

**關鍵詞：**侍從報業、文人論政、另類媒介、媒介體制、新聞專業

## 壹、李金銓的歷史關懷

2002 年李金銓教授任職香港城市大學後，分別於 2007 與 2009 年，召開兩屆「中國近現代報刊的自由理念與實踐」研討會。會中所發表的論文，於 2008、2013 年集結出版為：《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與《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兩本論文集甫一出版，引起華文學界的熱烈反應。一方面，所輯論文一反堆積材料、流水帳式的主流中國新聞史書寫方式（李金銓，2019a，頁 566），強調以問題意識主導的社會科學、思想史研究（尤其是探究自由主義對民國報人與報刊實踐的影響）；另一方面，劍指海德堡漢家學們硬將公共領域、全球化等概念，強行套入民國報業的分析及文本解讀，忽略民國報業的產業現實與讀者的多元面貌（李金銓，2013a，頁 25）。

李金銓自謙兩場研討會與主編論文集，僅是搭建平台促使新聞史與史學界相互交流。但在兩本論文中，李金銓親自執筆或與人合著，都展現其所欲的新聞史研究該當如何的企圖。在〈記者與時代相遇：以蕭乾、陸鏗、劉賓雁為個案〉（李金銓，2013b）一文，即開宗明義地陳述該文的問題意識：

提出記者與時代的命題，其實就是要回答社會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原動體」(agency)和「結構」(structure)之間是如何交涉(negotiate)的？就組織內部關係來看，記者是原動體，報館是結構；就組織外部關係來看，報館是原動體，權力中心是結構。簡單說，國共政權如何制約報館的運作，而報紙能發揮多大的能動性？報館如何制約記者的運作，而記者又能有多少作為？反過來說，記者對於報館的角色和時代的脈絡起什麼作用？（李金銓，2013b，頁 403-404）。

作為社會學基本問題的「結構與行動」<sup>1</sup>處理的是如何「證成人作為行動

---

<sup>1</sup> agent/agency，亦可譯為「施為／施為者」，臺灣社會學界多以「行動／行動者」翻譯，故以「行動／行動者」代之。

主體的自主與主願能動性」(葉啟政, 2000, 頁 336)。根據 Anthony Giddens (1984, p.25) 的結構化理論: 結構與行動並非彼此獨立的二元論, 而是互相影響的二元性。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徵既是社會實踐的媒介也是成果, 結構並非外在於個人, 而是作為記憶痕跡而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結構在此意義上是內在於人, 不應將結構等同於限制, 結構固然限制行動者但也使行動者得以行動。

「結構與行動」究竟是獨立二分或一體兩面, 並非李金銓在意之處, 而是透過新聞人物的個案研究探討: 「個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夠發揮什麼專業能動性? 這個能動性的邊界伸展到哪裡為止? 記者和報館在歷史上又扮演什麼角色?」(李金銓, 2013b, 頁 405) 正是對個人能動性的鮮明關切, 構成《文人論政》與《報人報國》兩本論文集所以卓然獨立於眾多新聞史論著的基礎, 因為:

中國向有「立言」的傳統, 1905 年廢除科舉制度以後, 知識人企圖通過報刊重新進入政治中心, 想要對政治有所影響, 這便造就了「文人論政」的傳統與風氣, 論政的主題自然牽涉到民族存亡和救亡圖存, 這是他們精神世界最基本的底色(李金銓, 2019b, 頁 553)。

救亡圖存, 作為民國時期知識份子所以投身政治、社會改造乃至步上革命的原始動機乃至「時代精神」, 殆無疑義。但對個別報人的強調, 不免過度浪漫化個別報人對國家命運的影響, 而這樣的新聞史論述也可能淪為 Hanno Hardt (1995) 所批判的少數權勢者的權力傳記。但若不以近期李金銓對民國報業的研究為限, 將時間往前推進, 早年李金銓對台灣媒介環境的批判性研究, 則提供另一種截然不同, 從結構層面出發的歷史分析視野。或許由於興趣轉移或歷史檔案文獻取得困難, 李金銓始終未能將兩種分析途徑予以整合, 並發展出完整的新聞史論述。本文即以此出發, 嘗試將侍從報業與文人論政整合為詮釋臺灣與中國新聞史的分析架構。首先論述李金銓對臺灣報業侍從體制的分析, 其次梳理李金銓對文人論政傳統的理解, 最後說明究竟李金銓如何看待這兩種分別從結構與行動出發的分析視角, 以及李金銓可

能的詮釋。

## 貳、發展傳播與侍從報業

1993年首先以英語發表（Lee, 1993），之後收錄於《超越西方霸權》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台灣報業與民主變革的崎嶇故事〉，是「以歷史眼光來詮釋台灣爭取新聞自由的軌跡，特別關注政論雜誌以小制大。逐漸對抗、顛覆國家嚴控的大媒介（報紙和電視台），突圍其所建立的言論羅網。」（李金銓，2004a，頁 135）同書所收錄的另一篇論文：〈國家控制，科技顛覆，文化自主：台灣有線電視政治〉，則論述台灣解除報禁後，黨國體制「繼續壟斷廣電媒介，不肯開放給公民社會公平競爭，因此又衍生了另一場節外生枝的有線電視鬥爭。」（李金銓，2004b，頁 185）若將這兩篇論文予以串連，所分析的是自 197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中期，臺灣媒介的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轉型過程：

台灣從威權統治到形式民主的崎嶇路上，威權政體前後三次遭遇媒介游擊戰的反叛：首先是黨外政論雜誌（1976-1986），其後是統稱為第四台的有線頻道（1990-1993），以及後來的地下無線電臺（1992-1995）。主流媒介與黨國威權政體建立侍從結構，把意理霸權自然化，使嚴密的社會控制轉為看似天經地義的共識。而游擊媒介處於社會邊緣，資源貧乏，成本低，規模小，科技條件粗糙，卻和黨國審查制度及主流媒介纏鬥，挑戰其意理霸權（李金銓，2004b，頁 200-201）。

### 一、侍從報業體制

根據 Eisenstadt & Roniger（1984, p.48-49）的界定，所謂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或侍從主義（clientelism）具有下列特徵：1.恩庇侍

從關係通常是特殊主義與擴散性的；2.保護主與侍從的互動是基於各類資源交換，一方提供工具、經濟與政治資源，另一方提供互惠、團結與忠誠；3.資源交換是包裹交易（package-deal），無法分割交換；4.恩庇侍從關係建立在無條件的付出與長時間的信任；5.恩庇侍從關係具有強烈的責任、義務；6.恩庇侍從關係的建立並非基於法律與契約而是根據雙方的非正式理解，且通常與官方法律對立；7.原則上恩庇侍從關係是志願性的；8.恩庇侍從關係是由個人之間或個人網路間的垂直連結所構成，通常導致對水平連結的團體組織或團結造成傷害；9.保護主與侍從間的權力存在強烈的不平等與差異。

就臺灣而言，以侍從主義作為分析架構，主要起自吳乃德（Wu, 1987）的貢獻。吳乃德認為國民黨政權來台後，一方面希望穩定政權，抑制反對運動；另一方面又企圖以地方選舉，取得統治正當性。於是採用「中央—地方分隔的雙重菁英結構」，分別以「官僚侍從主義」與「選舉侍從主義」，在中央與地方進行權威性的資源分配而穩定統治（王金壽、翁立紘，2019）。此後，侍從主義成為解釋臺灣地方政治、派系變化的主導分析架構。儘管王金壽指出，國民黨的侍從主義能夠順利運作是基於：臺灣不存在反對黨、黨內沒有派系競爭、可控制的司法、全面滲透的情治機關與受限制的媒體自由（王金壽、翁立紘，2019，頁 129）。但在李金銓於 1993 年發表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前，臺灣新聞傳播學界從未有學者以侍從主義的角度分析臺灣媒介變遷。之後，林麗雲（2000）大量運用國民黨黨史會、文工會的檔案文獻，以歷史途徑考掘戒嚴威權統治時期臺灣報業體制的挑戰與轉型後，侍從主義成為現今理解臺灣媒介體制的重要座標。

Hallin & Papathanassopoulos（2002, p.184）認為，以侍從主義分析媒介體制的長處在於得以超越自由主義與批判政治經濟學的二分法。因為對自由主義而言，媒介體制的民主化就是如何排除國家干預的問題；對批判政治經濟學來說，主要具焦於私人資本對媒介機構的影響。但政治與經濟體制絕非分離且獨立發展，侍從主義對資源權力持有者之間不平等交換的關注，適足以填補空缺。因此，在 Hallin & Maccini（2004）於《比較媒介體制》區分的三種媒介體制中，就強調因各國政治文化與歷史背景的差異，使得媒介體制

將因傾向於法理型權威或侍從主義（傳統型權威）而有不同的發展。在前者，公共媒介機構相對獨立於政府、政黨與特定政治人物的影響，也由於對正式程序、資訊公開及公眾近用的要求，成為新聞專業得以充分發展的條件。相對地，在侍從主義主導的國家中，無論公私媒介都被高度的工具化，例如公共媒介的人事任命主要根據政治忠誠而非專業能力；私營媒介的經營者往往具有政治連結，不但藉此獲得政府契約或廣電執照，媒介更成為經營者與政治社會菁英談判交易，乃至介入政治、獲取權力的工具。同時，由於侍從主義的權力交換、協商是由上而下的垂直交換，容易破壞社會既有的水平連結，新聞專業的發展程度也相對低落。

約略在 Hallin 做上述主張的同時，李金銓在〈媒介政治經濟學的悖論：中港台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比較兩種媒介政治經濟學取徑的異同時，就指出必須關注國家的角色：

激進派學者始終未曾嚴肅分析過「專制政體」……。我敢斷言，開發滯後的國家由專制政權全面支配政經和文化資源，不僅掌握關鍵的新聞喉舌，建立整套新聞檢查和政治高壓的制度，並收編私有媒介到侍從關係去（李金銓，2004c，頁 29）。

李金銓認為同樣處在右翼資本主義威權政體統治下的臺灣與南韓，都在 1980 年代前後爆發血腥鎮壓群眾的重大政治事件，兩國也因而開啟前仆後繼的民主化運動，但激進派學者對此一現象與民主轉型卻無法提供有力的解釋。因為激進派學者對「國家角色的解釋往往失之片面，而且頂多一筆帶過」（李金銓，2004c，頁 28）。李金銓（2004b）認為戒嚴時期黨國體制，與其他發展遲滯的第三世界國家雷同，是處在「官僚威權政體」（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regime）的統治下，以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的方式協調經濟發展，無法以私人與跨國資本對經濟政策的介入與控制視之。反映在媒介政策上就是：

使用收編政策，既鎮壓又籠絡。台灣和南韓的新聞界是輔助政府

和依賴政府的言論工具，而非嚴格意義的喉舌；他們在政治上縱然服從政府，在非政治領域卻保留活動的空間（李金銓，2004a，頁 138）。

1987 年 4 月，在臺灣即將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前夕，李金銓於《文星》雜誌為文呼籲，即便開放報禁意味報業市場得以自由競爭，但若無公平的競爭環境，自由競爭只怕淪為報團整併壟斷市場的藉口。文中首先批評因為報禁政策，不但阻礙有意辦報者無法辦報，更因報紙登記證奇貨可居而洛陽紙貴，甚至一賣再賣、不斷轉手的怪異現象。導致在報禁開放前：「兩大報系寡頭壟斷了七成的市場，老闆俱是國民黨的中常委，取得權力核心圈的發言權。孰因孰果，耐人尋味。」（李金銓，1987a，頁 153）。到了 1993 年的 *Sparking a fire* 中，將這種「耐人尋味」的報業體制，視為侍從關係的展現：

兩家民營報紙逐步收購報紙登記證，漸漸建立報系，掌握了台灣報紙發行總量和廣告收入的 2/3。這種寡頭壟斷的結構是在 1970 年代形成的，報紙與國家建立了政治學家所說的侍從關係，政府給兩個報系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以換取他們的效忠。兩報系發行人均被吸納入國民黨中央常會（李金銓，2004a，頁 138）。

於是，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及〈國家控制，科技顛覆，文化自主〉這兩篇向西方學界介紹臺灣如何爭取新聞言論自由的論文中，李金銓就以侍從主義作為臺灣報業體制的結構，說明戒嚴時期臺灣的媒介體制：一方面，黨國體制挹注大量資金補助黨公營媒體，形成龐大的官方宣傳機制；另一方面以由上而下的垂直利益分配與特許，使兩間民營報社逐步整併擴大形成報團。透過這樣的方式，黨國體制不但收編媒介輿論機構，更形成龐大的宣傳教化網路，灌輸黨國意識型態，穩固統治。但這看似穩固的侍從報業體制，何以產生變化？

## 二、大 / 小媒介的辯證

在《大眾傳播理論》（李金銓，1982，頁 102）論述傳播科技與現代化發展時，李金銓提醒讀者注意，1950、60 年代如 Schramm、Lerner 等人將現代傳播技術，視為第三世界朝現代化發展的關鍵，但這些以美國為主的現代化理論學者，所期盼引進的是第三世界國家在財政上難以負擔且技術複雜的「大媒介」。相反地，價廉物美的「小媒介」，則能因地、因時制宜，反而更適合第三世界國家靈活使用。在創新傳布的初期階段，大眾傳播媒介的確能夠擴大認知效果，但越到後期人際傳播反而更具說服力。第三世界國家資源有限，傳統人際關係根深蒂固，應當靈活運用，新／舊、大／小媒介，不應有所偏廢。

但在之後李金銓論述大／小媒介時，除了考量第三世界的發展困境外，更納入新聞媒介的公信力問題。在《新聞的媒介，媒介的新聞》這本時論集中，李金銓（1987b，頁 XI）認為：「新聞媒介的第一性到底得反映權力結構的基本利益與觀點，但它的第二性又必須在體制內發揮自主性與制衡的力量。」<sup>2</sup>所謂第一性指的是媒介始終屬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環，第二性則是媒介以新聞專業發揮相對自主的力量而與國家相抗衡。媒介的這兩種特性，反映在社會中所存在性質不一的大／小媒介：

主流媒介假如反映社會衝突，主要是因為權力結構內部爆發鬥爭；除非主流媒介受到另類媒介嚴重的挑戰，主流媒介通常不會主動回應邊緣化的聲音……。被壓迫的或邊緣化的聲音無法攀上主流媒介發言，只好退而以小媒介、地下媒介和另類媒介來替代。擴而言之，大媒介通常代表主流的意見，與既有秩序結合；小媒介支援抗議團體，在社會邊緣促進變革（李金銓，2004b，頁 187）。

<sup>2</sup> 李金銓（1987c，頁 10）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大致已掙脫政治勢力的直接控制，媒介內容製作的過程在第一性雖仍以權力中心馬首是瞻，在第二性則形成多元社會的一般制衡力量；西方媒介主要的威脅來自資本的集中壟斷。若以 Bourdieu（林志明譯，2002）的場域（field）概念理解，作為次場域的新聞場域，始終受制於外在的權力場域；但新聞場域又以自律與他律的程度，佔據場域內的不同位置而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

李金銓所以做出不同於主流現代化理論的主張，乃是接觸 Herbert I. Schiller 著作後的反思。Schiller 認為「媒介不但不能促進第三世界的發展，而且根本就是西方（美國）帝國主義的延伸。」（李金銓，1987d，頁 139）。被視為有助培養移情、同理現代化人格的傳播新科技，「是美國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上層階級合夥用來控制第三世界的手段，傳播科技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利益的表徵。」（李金銓，1982，頁 94-95）無論現代化理論或新左派如何看待媒介在傳播與發展中的功能與角色，李金銓（1987d）認為兩派理論都有所不足。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把國家當作自足的分析單位，忽略國際政治複雜的權力結構；新左派以國際資本主義為分析單位，對內著重階級分析，對外延伸為「中心／邊陲」的依賴關係，孰輕孰重，爭論不休。因此在面對第三世界是否應接納傳播新科技，如何避免為傳播帝國主義所宰制時，李金銓採取的是多元的文化解釋。

Schiller 主張，第三世界若要擺脫傳播／文化帝國主義的支配，唯有全面自全球資本主義制度撤出。但李金銓（2019d，頁 123）認為，擺脫文化帝國主義不意味著文化獨立，關鍵是如何理解、梳理帝國主義的「文化後果」：媒介內容、媒介制度、科技轉移，以及最廣義的「生活方式」。文化後果具有多重結構，涵蓋各種關係及其互動，必須不斷接受鬥爭和挑戰，這些要素如何有機的安排與分析，是必須詳細探討的。

在〈電視文化何處去？處在大陸政治與海洋經濟的夾縫中〉（李金銓，1987e），即以臺灣的電視文化為例，說明儘管在經濟上臺灣是高度對外依賴，但在電視節目的產製上卻有著極高的自製率，避免了普遍存在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依賴困境。究其因在於黨國體制存留的大中國意識形態，因而對「文化侵略」的戒慎恐懼。除了透過《廣播電視法》限制外國節目上限為 30%，更不斷減少母語方言節目的播出時間，形成內在殖民。另一方面在臺灣官資商營的電視體制下，以商業利潤為導向的三家無線電視台，除了以最低標準的文化品味，粗製濫造大量庸俗化節目迎合市場外，更在新聞報導的立場上與由政府控制的官股立場一致：

電視已成為統治意理機器，也成為政治運動的眾矢之的。上自主

權結構的壟斷，下至新聞政策的操縱，電視不能以公正公平的立場呈現旺盛的民間社會，總是以有色眼鏡看臺灣意識。以簡單的意識教條醜化扭曲民間社會素樸的意願，只能使兩結<sup>3</sup>矛盾愈陷愈深，兩極化的趨勢愈演愈烈。整個新聞媒介倚重倚輕，斷章取義，採信片面之詞，導致公信的低落（李金銓，1987e，頁 206）。

1986 年年底，被列為黑名單，不許入境的許信良闖關返台，爆發警民激烈衝突的機場事件。三家無線電視台及黨公營報社，皆以民眾攻擊警察的片面陳述與畫面報導事件。所幸《自立晚報》的記者及利用輕便的 ENG、大量紀錄解嚴前臺灣社會運動的「綠色小組」在場，呈現與主流媒介完全不同的事件始末。《自立晚報》的版面、「綠色小組」的畫面，迅速在黨外參選人的競選總部間公開播放流傳。如同 1980 年的選舉，選民以選票還給美麗島受刑人公道；1986 年的選舉，選民同樣以選票給予剛創黨的民進黨立足之地。這樣的結果，對處在侍從報業體制下的新聞界來說，訝異的不僅是《自立晚報》與綠色小組《機場事件》錄影帶的暢銷，還有讀者對主流報業公信力的不信任與挑戰。

### 三、游擊媒介的興衰

由於黨國體制對大媒介的迷信，加上官僚威權國家「容許媒介在非政治領域爭取較大的自主空間，但對任何威脅政權的力量必無情鎮壓。」（李金銓，2004b，頁 186）雖然臺灣於 1988 年開放報紙登記，但廣電資源依舊由黨國體制牢牢掌握，不肯釋出。但早在 1970 年代起，即有部分業者在收訊不佳地區，利用既有社區共同天線，結合錄放影機、同軸電纜等簡單技術，經營起實為有線電視的「第四台」生意時，當局採取的是睜隻眼、閉隻眼的消極取締工作。

但至 1980 年代中期，美國政府對臺灣當局要求美國著作物享有同等國

---

<sup>3</sup> 此處指的是「中國結」與「臺灣結」，即統獨爭論。

民待遇，並在 1992 年揚言祭出「301 條款」制裁侵權行為後，臺灣行政當局方啟動《著作權法》修法及《有線電視法》立法工作。此舉嚴重影響既有第四台業者的生計，部分與民進黨理念契合的業者，與民進黨政治人物結合，以「民主台」的名義，對抗當時仍被黨國體制所壟斷的三家無線電視台（馮建三，1995）。

另一方面，在電視新聞報導上，反對黨不但無法獲得公平客觀的報導，甚至連購買時段播放競選廣告也不可得。先是 1989 年尤清於台北縣長選舉時，以偷渡走私而得的發射機播送電視訊號；後有知名台語廣播主持人吳樂天於 1992 年 1 月對華視晚間新聞，進行訊號遮蔽干擾的蓋台行動（翁秀琪，1993）。1992 年張俊宏於立法委員選舉期間，架設「全民廣播電臺」公開播送廣播訊號後，此後數年間地下電台成為反對黨宣傳理念、政治動員的利器。

論述臺灣這三波媒介游擊戰的起落時，李金銓一方面透過媒介技術，解釋大媒介如何藉侍從主義壟斷媒介市場，進而維持意識形態霸權；另一方面指出當局輕忽小媒介相對簡易的技術及低廉的成本，使小媒介所傳播的內容得以如火燎原，撼動政權。例如馮建三（1995，頁 154）即指出地下電台驚人的政治動員力量，在於「解決了印刷媒體（雜誌）的發行問題，亦無須聽眾額外花費就能夠接收其廣播內容。」黃順星（2022）以近期開放的政治檔案說明，儘管查禁比例極高，但當年黨外雜誌所採用的備胎登記、異地印刷等策略，不但技術上可行且機動性高，在成本上也足堪因應。

除了媒介技術上的便利與彈性，使游擊媒介所傳播的內容得以躲避新聞審查外。李金銓更將閱聽人對資訊的渴求及新聞公信力的高下，視為游擊媒介所以衝擊主流媒介，乃至引發後續政治變革的原因：

媒介為社會公信之所寄，如果它蒙蔽真理的追求，則社會溝通必須找新的出路，所以必然會衍生一些不正常的小道消息（耳語、傳單、黑函）。小道消息靈活機動，就地取材，雖然質地粗糙，在社會變局中卻往往發揮決定性的作用。何梅尼當年取得政權，係以傳單和錄音帶逼使伊朗廢王手裡強大的傳播機器全面癱瘓。

總之，媒介公信不伸張，社會是非無由建立，小道消息也會跟著猖獗氾濫（李金銓，1987c，頁 10-11）。

「大媒介通常代表主流的意見，與既有秩序結合；小媒介挑戰主流媒介所界定的支配性現實，整個言論的光譜得以擴張，最後連主流媒介都得跟著擴大言論範圍。」（李金銓，2004b，頁 187）但「諷刺的是激進媒介可能是民主化的第一個犧牲者：民主化解開了主流聲音的禁忌，天下沒有獨裁政權要抗爭，人們對政黨政治轉趨淡漠，甚至覺得民主力量阻礙他們世俗的追求，激進媒介完成年歷史使命遂退出舞台。」（2004d，頁 288）。

在李金銓寫作時，受限於檔案開放程度及白恐陰影仍未遠離，僅能以《自由中國》、《公論報》、《文星》、《大學》等游擊媒介的多舛命運，說明言論內容一旦違逆保護主，甚至結合、組織群眾後即遭封閉、主事者身陷囹圄。但根據近年的研究可以看出，黨國體制所新聞專業人士的鎮壓，實際上遍及黨公營報社，且不限於宣揚反對運動的游擊媒介。

例如在楊秀菁（2016）的研究中就指出，戰後初期由臺灣省政府掌握的第一大報：《臺灣新生報》，是如何透過歷次的人事改組，成為服膺黨中央的宣傳機關，而喪失原先在報業市場中的領先地位。陳百齡（2019）則是把梳已開放的政治檔案後發現，在 1949~1972 年間有 16 位《臺灣新生報》的員工，被以匪諜罪嫌重刑處置。而且，言論獲罪者不限於基層員工，1970 年代的李荊蓀，被捕時是《大華晚報》董事長，早年曾任《中央日報》總編輯、中廣副總經理的高層人士。顯然公營報社及其成員，不因獻出忠誠而免於監控考核，甚至成為殺雞儆猴、以儆效尤的對象。

## 參、文人論政與新聞專業

李金銓對「大／小媒介」的關注，出自對現代化理論的反思，可能與他出身自第三世界國家的背景相關，亦即必須思考臺灣如何在尋求政治、經濟

發展之際，又不落入文化殖民或文化保守主義的窘境。李金銓（1982，頁 297-299）指出第三世界追尋國家發展時，勢必面對幾種弔詭：（一）如何在穩定與動力、均衡與變遷、保護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允執厥中；（二）專制性控制媒介與國家發展的目標如何獲得協調；（三）知識份子如何做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媒人，並從世界文化擷取精華，豐富本國文化？如何充任文化先鋒而不墮落為獨裁政權的御用幫兇；（四）第三世界能夠抗拒現代傳播科技多久？

學者論述現代化發展或第三世界國家如何擺脫依賴困境時，多從國際政經局勢著手，少有論者將知識份子的角色納入考慮，甚至將知識份子視為中介「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本土」文化的重要關鍵。對人、行動者的關注，在《大眾傳播理論》中特闢兩章專論「守門人」的角色即可見端倪。書中引介「中立者」與「鼓吹者」兩種新聞專業意識形態時，更將「鼓吹者」的新聞專業意識形態比附為中國新聞記者的實踐：

中國人認為記者的行業「為民喉舌、為民耳目」，精神上與這種意理頗為接近。在專制時代，新聞記者希望站在老百姓這邊，反抗帝制的剝削與侵凌。我國在文人辦報時期，有些知識份子在反抗軍閥胡作非為，其風骨為後世寫下了光輝的史頁（李金銓，1982，頁 46）。

## 一、文人論政的特徵

中國文人論政的傳統，通常認為起自 1874 年王韜於香港創辦《循環日報》，之後由梁啟超、革命黨人的報刊繼承。民國成立後，以胡適為核心所創辦的《努力週報》、《獨立評論》，及 1941 年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頒贈最佳報紙的《大公報》為文人論政的第二次高峰。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第三勢力人士如：徐鑄成的《文匯報》、儲安平《觀察》雜誌，呼籲國共停止內戰，鼓吹憲政民主法治則為第三次高峰。文人論政的傳統，在 1949 年後於中國灰飛煙滅，雖有雷震、殷海光等人的《自由中國》於臺灣隔海延續，但至 1960 年也告中斷（黃順星，2009）。

驅動文人論政、文人辦報的關鍵，是中國近代以來與西方世界接觸後的回應：「百餘年以降，中國報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圖存』，其三部曲是啟蒙、革命和追求國家現代化。這些角色結合了中國士大夫傳統及現代知識份子精神。」（李金銓，2008a，頁1）「莫不希望建立現代的『道統』，促進和監督權力中心的『政統』，以追求國家的現代化為目標。」（李金銓，2008a，頁27）。將救亡圖存視為文人論政的核心，也存在於其他學者的論述，例如王洪鈞（1998：48）認為：「大體是指著一些高級知識份子，在國家戰亂頻仍，憂患迭生之際，以獨立之思考，超然的地位，大公的精神，創辦報刊，造成輿論，以匡政治，而濟民窮之謂。」賴光臨（1998：234）也持相近觀點：「所謂士人，是指具博學宏識的造詣，抱匡時濟世的襟懷的知識份子。由這批士人所辦之報，是為士人報業。」為何20世紀初的中國文人、知識份子有如此強烈經世救國的企圖？李金銓認為（2004e，頁63-64）：

儒家把知識份子理想化，認為他們應該秉持良心，以天下為己任，以言論報國，自然而然利用報紙鼓吹改革和現代化……。文人論政充滿了追求國家現代化的焦灼，強調國家意識形態，揉合西方自由主義，謀求救亡圖存之道。從清末洋務運動開始，文人論政莫不以趕上歐美為主旋律。

分析近代中國新聞媒介的演變時，李金銓（2004e）將文人論政視為「儒家自由主義模式」，而與「毛澤東模式」及「共產資本主義模式」兩種模式區隔。黃宗智（Huang, 1972）將文人論政的代表者：梁啟超，視為「儒家自由主義者」，李金銓沿襲這樣的立論，並比較受專業主義影響下的西方新聞實踐間的異同。就言論自主性而言，西方專業主義相信經濟獨立才是擺脫黨派勢力影響的專業自主基礎；文人辦報則相信言論的獨立來自知識份子的良心。就角色認定而言，西方專業主義以專業人士自許並與讀者受眾平等；文人辦報，則自視為啟蒙大眾的文化菁英，以指導影響輿論為期許。雖然梁啟超深諳英美報紙的影響力，相信報紙啟迪民智的潛能，但遊歷歐美後對西方民主深感失望，轉而提倡開明專制。真正貫徹自由主義，並將文人論政模式

實踐為民國報業典範的是張季鸞主持下的《大公報》。

《大公報》獲頒密蘇里大學「最佳外國報紙」時，張季鸞（1979，頁 582-583）在〈本報同仁的聲明〉一文中，指出中國報業的特色正在文人論政：

中國報有一點與各國不同。就是各國的報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中國報原則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而我們同仁都是職業報人，毫無政治上、事業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權、不求財，並且不求名。我們以為不求權、不求財，是士人常行，容易辦，不求名卻不容易。因為辦報都希望人愛讀，讀者越多越喜歡，名聲越大越高興，而危機也就在這裡。因為一個報人若只求賣虛名、得喝采，有時要犯嚴重錯誤，甚至貽禍國家。

李金銓（2004e，頁 67-69）認為《大公報》，具有四個特徵：1. 《大公報》強調「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自詡為文人論政、言論報國的工具；2. 《大公報》的新聞理念貌似西方新聞專業主義，但其專業準則係立基於儒家知識份子的道德責任，對市場的作用多持疑慮；3. 《大公報》比過去乃至同時代的報紙同業更重視新聞報導；4. 《大公報》和其他自由派知識份子，展現強烈的國家主義傾向。

從張季鸞的聲明及李金銓的歸納可以看出，《大公報》或儒家自由主義的新聞模式，是由一群懷抱傳統士人經世治國的知識份子，經營著必須仰賴大眾消費認可的現代新聞事業。雖然以近似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則，維繫日常新聞工作，但究其根本仍是基於儒家重義輕利、公而忘私的教條。不但以菁英讀者為主要受眾，也連帶否定市場自由經濟機制所可能帶來以讀者大眾為基礎的新聞出版自由，也忽略西方新聞專業主義背後的基本預設。

## 二、文人論政的根基

李金銓（2019c）以美國為例說明新聞專業興起的歷史脈絡，首先是市場經濟勃興、中產階級抬頭等因素，促成事實與意見分離的客觀報導，其次是美國進步運動的遺緒。美國媒介專業意識形態背後蘊藏一組恆久價值，如種族中心主義、利他性民主、負責任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等，都是進步運動的產物。倘若社會缺乏基本共識，恆久價值不斷受到挑戰，新聞專業也將無從落實。正如 Jean K. Chalaby（1996）的觀察，當下主流的新聞概念與論述，是 19 世紀中後期在英美兩地發展過程中，逐漸產生關於新聞為何，與何謂新聞專業的論述。新聞才成為顯著不同的文本，並發展出獨有的新聞論述、規範與價值。目前習以為常、以事實為導向的現代新聞於此時現身，也才逐漸與文學和政治場域產生區隔。

正由於市場經濟的發達，以及交通運輸與傳播技術的進步普及，使報業成為大量生產的文化產物。為求利潤極大化，現代新聞專業所標榜的客觀中立準則，才逐漸落實而奉為圭臬，新聞記者也才成為西方從事新聞事業者的身份認同。Jams W. Carey（1997）更指出，現代社會出現在訊息來源與閱聽人間，專責傳遞的專業傳播者（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但記者與公關行銷人員的差別在於記者必須獨立、不偏頗地在訊息來源與閱聽受眾間運作，這種專業傳播者的獨立性也就體現為新聞業之於社會的公共性，並且以新聞專業意識形態確保。

清末中國自西方所引進的報紙、新聞事業，對中國來說是純然的新事物，固然有傳遞訊息的功能，但普及西學新知才是報人心之所繫。而且西方新聞業初期的新聞記者多出自社會底層，中國卻不然。許紀霖（2008，頁 7）觀察到：「隨著新式的學堂、傳媒和社團的出現，出現了一個『知識人社會』……。其職業是多元的：教師、編輯、記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李金銓也不將「報人」侷限在供職於報紙、媒介機構的個人，而是泛指從事報業相關的人士：

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文士、學者、報人往往是角色交叉混雜，文士、學者在報刊論政或兼職，報人在大學教書，都非常普遍，不像現在西方專業化報刊的角色那樣涇渭分明……。直到《申報》中期、《大

公報》以及《世界日報》，雖然開始了報人職業化的勢頭，加強新聞採訪面，但言論始終是擺在第一位階，報人首先追求的還是言論「一言九鼎」，主筆地位始終高於記者（李金銓，2013a，頁 1-2）。

主筆高於記者，評論重於新聞的狀況，也曾出現在英美早期重視黨派言論而非新聞編採的黨派報時期。無論是英國的基進報刊或美國的黨派報，新聞從業人員的身分認同是政論家（publicist）而非記者（journalist），這些人從不標榜客觀公正，更在意說服大眾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Schudson, 2003）。但當英美報業經歷便士報革命後，廣告成為報紙主要收入來源，報紙即以平民大眾為主要受眾。為爭取更多的讀者、更多的廣告，在新聞寫作上以兩面併陳、客觀中立的報導方式避免顯著的政治立場。而且西方新聞事業的新聞評論者，不介入所評論的人事物中，也不期待當權者是否採納，出言批評純以理性批判論述於公共領域中發揮監督功能。

李金銓（1982）將新聞記者角色類型中的鼓吹者，類比為中國新聞記者的實踐。鼓吹者的專業意識型態，希望記者積極參與實際政治，鼓吹特定理想或目的，以便負起對社會的責任，不以純粹做個旁觀者而滿足。相對地，中立者的角色重視專業技術，強調事實與意見分離的客觀報導，記者的職責在於反映現實，做冷眼旁觀的紀錄者。英美報業在客觀報導的興起與制度化後，使作為專業傳播者的記者，更傾向於中立者的立場。這與為帝王師、為國士的文人論政的期許，完全不同。

就文人論政的產業化程度而言，民初報人成舍我（1973，頁 2）回憶 1924 年創辦報紙時的報業狀況：「文人辦報時期，既然沒有大資本，人事方面自然也極其精簡，一個人要做幾個人的工作，以《世界晚報》來說，總共就只有三個人。」聲譽正隆的《大公報》當然不可能如此精簡人事，但其所遍布的新聞網仍不足以覆蓋廣大的中國。類似地，林語堂諷刺上海最老的《申報》和銷路最好的《新聞報》，一個編得很爛，一個根本沒編。陳榮袞發表於《知新報》上的〈論報章宜改用淺說〉，批評當時的報紙「不刻圖像、不加句讀，行數太長而不分數格，門類太簡而不多標題。」陳榮袞所提雖然都是枝微末節的問題，但都造成作者與讀者溝通的障礙。「文人辦報也許能寫出一流的

文字，卻疏於編輯學這門學問。編輯學看似形而下，實際上卻是將報紙的主體由作者轉移到讀者之關鍵環節。」（余杰，2009，頁 417）

從新聞事業內部的發展來看，無論就新聞從業者的身份認同與專業實踐理念，或者從產業化、專業化的程度來看，民國時期的文人論政遠遠落後於西方報業。而從影響新聞事業的外部因素來看，儒家自由主義者「普遍有國族傾向，深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以致把自由民主當成救國圖存、強兵富國的工具，而非終極價值。」（李金銓，2008a，頁 10）因此當中國面臨內戰或外敵侵略時，知識份子紛紛拋棄自由民主的信念支持專制獨裁，更甚者投入新聞檢查工作，更使需要充分新聞自由的新聞專業無立足之地。

中國自由主義何以早夭殞落，李金銓（2004e，頁 72-73）認為：1.中國從未經歷資本主義的萌芽發展，中產階級不夠厚實，民主政治缺乏堅實的經濟基礎；2.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人單勢薄，缺乏組織，如烏合之眾；3.徒有抽象理念而無具體的主張與運動策略，政治訴求與平民大眾脫節；4.文人諍諫傳統缺乏法律制度保障；5.中國文人缺乏西方知識份子之獨立精神，始終期待成為國士或為當權者垂青。由此觀之，文人論政在中國所以灰飛煙滅，固然與外在政權遞嬗與政治壓迫有關，但內在問題仍在於儒家自由主義的新聞模式，無法順利接軌英美的新聞專業主義。

### 三、專制威權政體下的文人

1949 年後的中國新聞界，在毛澤東黨性高於一切的新聞政策下，滯留中國的報人，不是背棄新聞專業理念，就是徒留遺憾的離世。流亡來台的雷震，原與國民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終因不滿蔣介石以反共復國之名，行獨裁專制之實而與之決裂，但也付出《自由中國》停刊、繫獄十年的下場。極權政權與威權政權終究有別，前者企圖掌控社會生活所有層面，後者嚴控政治意識形態領域事物，市民生活領域只要不威脅統治基礎即放任發展。但這些非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的事項，也絕非完全開放，而是以原始的侍從主義從事資源交換與支持。

對侍從主義的關注，主要來自人類學與比較政治領域的學者，對二戰後

第三世界國家在去殖民化過程中，如何打破傳統權威的研究興趣。侍從主義被視為分配社會資源的特殊方式，由控制資源者即保護者輸送給侍從者以交換各種形式的服從與忠誠（Roudakova, 2008, pp.48-49）。國民黨在臺灣維繫長期威權統治的基礎就在以侍從主義的資源分配，籠絡中央官僚與地方派系。而侍從主義能夠順利運作則基於：臺灣不存在反對黨、黨內沒有派系競爭、可控制的司法、全面滲透的情治機關與受限制的媒體自由。當臺灣解嚴、政治民主化後，國民黨繼續維持侍從主義的交換成本過高而衰退。

就臺灣的侍從報業體制而言，國民黨政權以報禁與控制廣電資源使得媒介成為稀有資源，一方面以國家預算大量補貼黨公營報社，一方面以特權交換的方式使經營民營報社有成者，得以收購整併經營不善的報社形成報團，兩者形成龐大的官方宣傳網路，鞏固統治意識形態。但新聞管制與言論控制，終究存在細縫與不滿，無法在主流媒介發聲的個人或團體，起而以成本低廉、技術簡單的小媒介暗地倡議。

從德國的 Hans Ensenberger 到拉美的 Paulo Freire，都深切體認到：社會的主流媒介通常跟國家權力結構合流，以中產階級為訴求對象；而抗議團體位居社會弱勢，資源匱乏，必須時刻躲藏當局的迫害，故只能利用小媒介搞邊緣戰鬥。Downing 聲稱激進媒介製造反霸權的論述，劃破沈默，抵抗謊言，提供真實，給人們一種新的方法質疑霸權。這個論斷代表另一種美化弱勢團體的左派浪漫情懷。其實，弱勢團體使用小媒介，往往是接觸不到主流媒介，為情勢所逼，別無其他途徑，迫不得已罷了（李金銓，2008b，頁 396-397）。

左派學者是否過度浪漫化弱勢團體使用小媒介進行反霸權論述，容或有討論空間，但小媒介揭穿謊言、提供真相的成就則無庸質疑。所謂真相，無須上升至另類世界觀或階級視野，單單小媒介傳播為官方所禁止的新聞資訊，就足以威脅統治意識形態。臺灣反對運動與另類、游擊媒介的經驗，提供李金銓反駁激進派政治經濟學認為自由多元主義過度重視國家與媒介的關係，而忽略私有化對媒介生產的影響。因為無論在極權或威權體制下，國

家總是掌握社會資源分配的最後仲裁者。

而且，在臺灣反對人士對抗侍從報業的經驗中，看到的不僅是反對人士應時、應地制宜的選用小媒介從事資訊傳播與組織動員工作，小媒介的成功也在於所傳送的新聞內容，不斷地衝擊主流媒介的新聞公信力。侍從報業體制下的新聞媒介固然得服膺黨國意識型態，但新聞媒介也不能以充當傳聲筒存活，新聞媒介還必須以新聞專業面對市場受眾。在這個層面上也替新聞的專業自主留下些許生存空間，畢竟報紙所販賣的是事實真相，報紙內容若與真實生活經驗脫節甚多，不但銷售不佳，新聞公信力勢必屢遭挑戰，終究為市場讀者淘汰。

論述亞洲媒介與民主化的時候，李金銓（2004d，頁 287）認為：「市場力量是正面的，讓政府以外的其他聲音聽得到。市場競爭促進媒介多元和專業主義，開創意識形態的空間，抗衡赤裸裸的獨裁政權。」這番論斷，是受到臺灣與南韓從威權轉型民主體制過程中，媒介所發揮的積極效果所得到的啟發。1992 年鄧小平南巡後重啟改革開放，傳播媒介也是其中一環。

自由主義經過幾十年的打壓，畢竟猶如一盞幽暗的燈火，只要條件許可，環境改變，它總會死灰復燃……。在九十年代市場自由化的場域下，以殘缺的媒介專業主義面目復活。它經過黨的話語武裝和包裝，既滿足記者個人的英雄浪漫情懷，又促進媒介的市場利益，一舉兩得（李金銓，2004e，頁 86）。

2000 年前後有胡舒立創辦《財經雜誌》，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新聞調查》，以及《南方週末》等媒介，將共產黨的新聞宣傳路線，融合市場與新聞專業主義邏輯的方式，以「異地監督」等陽奉陰違的抵抗策略，創造言論空間。此時中國民間正興起懷舊的民國熱，欣羨民國時期自由多元的文化，廈門大學謝泳教授對民國知識份子、文人論政的專書與專欄，以及由李金銓所編著的《文人論政》等，都試圖在逐漸市場化、統制弱化的中國威權體制下召喚曾有的傳統。但當習近平繼任並將實現中國夢定調為總體發展路線，有限短暫的言論空間逐步壓縮。2013 年初《南方週末》以〈中國夢，憲

政夢》為題刊出的新年獻詞，遭官方宣傳機構的事先審查刪改，《南方週末》編採人員雖在社群媒介揭露原委，但仍遭禁言。2016 年習近平發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談話，僅存些微的新聞專業空間不復存。

當前中國新聞從業者的「弱者的抵抗」，類似 1980 年代臺灣主流報社記者不滿編輯政策，私下以匿名、筆名的方式供稿給黨外雜誌；或將敏感文字與議題刊登於報系另創刊物（《時報雜誌》、《中國論壇》）或海外版上。康寧祥的《八十年代》出版四冊《自由中國》選集，讓被禁絕的文字重新問世；《自立晚報》、《夏潮》、《臺灣文藝》則以策劃專題、出版專書等方式，帶領讀者回顧被掩蓋的殖民地知識份子反抗史。這些遊走邊緣的挑戰行為，當然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乃，不但查禁書刊行動日益激烈，連同在北美發行的美洲《中國時報》，也以外匯管制的方式令其資金週轉受挫而停刊。

李金銓指出文人論政的缺憾之一是知識份子缺乏與大眾的連結，言論倡議無法轉化為實際的改革行動。因此一旦知識份子嘗試與大眾結合、付諸行動時鎮壓隨至。《自由中國》如此，《美麗島》亦然，但 1980 年代臺灣的社會情勢已截然不同。累積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成果於此時爆發，同時滋養出龐大的中產階級，黨外人士雖然屢挫屢敗，仍持續透過黨外雜誌宣傳理念與組織動員，加上美國以人權外交之名頻繁施壓，終而促成解嚴與解除報禁。

## 肆、結語

李金銓在學術生涯早期論述傳播與發展時，已經注意到：「知識份子如何做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媒人？如何充任文化先鋒而不墮落為獨裁政權的御用幫兇。」在引介守門人研究時，主張鼓吹者的新聞專業意識形態近似中國文人將「為民喉舌、為民耳目」視為現代報紙的功能，而文人辦報時期對抗專制政權的事蹟，更是歷史上顯目的一頁。但璀璨耀眼的文人論政為何難以持續？一方面，中國的法制與經濟落後，且缺乏數量足夠的中產階級支持；另一方面，文人論政單打獨鬥，未曾思考與平民大眾結合，而且始終期待當權者的垂青，缺乏知識份子真正之獨立精神，一但為當權者所不容，隨

遭撲滅，難以延續。

臺灣與中國兩地的不同發展，說明國家仍是分析專制威權政體的關鍵。李金銓（2004a，頁 159-160）認為中共把民間社會政治化，鉅細靡遺地干預民間生活的所有層面；國民黨則把民間社會非政治化，鼓勵民間遠離政治，致力於經濟發展。起初以追求經濟繁榮需要政治安定為由，說服大眾接受公民自由的限制，但「經濟富裕最終會促使公民社會成長，要求相對獨立的報業和更多的政治參與。」臺灣爭取新聞自由的歷程符合上述論述，但也如李金銓與其他許多論者所指出的，解除報禁、開放廣電媒介的自由化政策，不意味著新聞自由的實現，此後面對的是更複雜、彈性化的全球資本邏輯。

臺灣自 1988 年開放報禁，1996 年電信事業民營化後，不分媒介型態，出現大規模的整併潮。相較報禁時期，《聯合》、《中時》兩大侍從報業集團累積數十年心力，方從報紙、印刷本業，逐步擴大到行銷、零售通路的整合；1990 年代後臺灣的媒介整併風潮不但迅猛，更延伸至通訊基礎設施的跨媒介壟斷。表面上是本土財團與國際資本的競合，但若逐一深入分析個案，仍可見地方派系對系統業者的影響力，迫使國際資本讓步以頻道代理商為中介而參與其中。另一方面因收視習慣轉變，導致傳統媒介營收日益下滑的困境中，媒介經營者若非承接政府部門的宣傳採購案，就是大量置入商品以營生。倘若真有不計盈虧的媒介，所圖者乃是以媒介影響力交換當權者的青睞，以謀其他經濟領域的特許。換言之，解禁後臺灣的媒介環境，依舊高度的工具化，成為當權者與媒介經營者談判交易的籌碼，侍從主義仍是分析當前臺灣政媒關係不可或缺的視角。

公民社會與市場，是李金銓論述文人論政能否過渡為現代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關鍵。李金銓在許多段落中提醒，不應將民國時期的文人論政浪漫化，因為文人論政是民國新聞報業在尚未透過市場取得自主性的社會結構下，將西方新聞專業比附為傳統中國知識份子實踐的論述。文人論政的知識份子單打獨鬥地向權勢者建言，而非凝聚成集體力量以公民社會中的獨立專業群體，對政治體制形成制度性的監督與批判力量。同樣地，李金銓也認為不應高估充滿傳奇色彩的黨外雜誌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因為若非結合臺灣公民社會的組織化集體行動，黨外雜誌等另類、游擊媒介將是狗吠火車。

倘若文人論政是值得追憶的傳統，就不應只是對個別新聞英雄人物的推崇與緬懷，而應將其視為本地文化在特定時期中，對新聞專業、新聞倫理所萌生的在地化實踐與想像。同時也不應將文人論政的理念，成為訴諸於培養新聞從業者之獨立人格與批判精神的道德呼籲：「單單以個別工作者道德自律為對象的訴求，在政經結構束縛下難達成效。受到政經力量壓制，再進步的專業規範詞彙，往往也成為壓迫公民傳播權的手段。」（劉昌德，2007，頁 140）例如，在當前臺灣輿論極端對立及假新聞橫行的情境下，若新聞媒介食古不化地堅持兩面併陳的客觀新聞理念，不但無法扮演提供社會完整圖像、辨明真假的「專業傳播者」的角色，新聞只會加深對立分化的社會裂痕。

侍從主義的幽靈依舊盤旋在中國與臺灣的天空之上，在中國轉換為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在臺灣則披上新自由主義的外衣，繼續放任權貴階級在新聞媒介領域中尋租。如此一來，新聞專業人員的勞動條件只會不斷惡化，不但無法產製完善的內容，也弱化公民社會對新聞報業的需求。新聞史研究的意義應在於指認出被視為落伍過時的殘餘結構，是如何綿延並持續影響至今；同時在主導結構的限制下，行動者如何遭遇結構、又如何創造改變結構的機遇。正如李金銓（2019d，頁 124）對 Raymond Williams 文化物質主義的詮釋，認為基礎結構並非決定（determine）而是中介（mediate）了上層建築的形構。這些過程極其複雜，在在需要細緻的歷史分析而澄清當下新聞專業實踐的困境。

## 參考書目

- 王金壽、翁立紘（2019）。〈追求地方政治研究的新典範〉，《臺灣民主季刊》，16: 127-140。
- 王洪鈞（1998）。〈綜論〉，王洪鈞編，《新聞理論的中國歷史觀》，頁 1-74，臺北市：遠流。
- 成舍我（1973）。〈新聞老兵六十年〉，《新聞學報》，頁 1-5。臺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編採學會。
- 余杰（2009）。《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份子的心靈史》。臺北：聯經。
- 李金銓（1982）。《大眾傳播理論》。臺北：三民。
- 李金銓（1987a）。〈沒有公平環境，怎麼自由競爭？——解禁後報業壟斷的規範〉，李金銓著，《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頁 151-165。臺北：圓神。
- 李金銓（1987b）。〈代序〉，李金銓著，《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頁 III-XVI。臺北：圓神。
- 李金銓（1987c）。〈熱線與冷語—溝通·傳播·民意〉，李金銓著，《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頁 3-11。臺北：圓神。
- 李金銓（1987d）。〈國際傳播的挑戰—現代化乎？依賴乎？〉，李金銓著，《傳播帝國主義》，頁 135-151。臺北：久大。
- 李金銓（1987e）。〈電視文化何處去？處在大陸政治與海洋經濟的夾縫中〉，李金銓著，《傳播帝國主義》，頁 179-210。臺北：久大。
- 李金銓（2004a）。〈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台灣報業與民主變革的崎嶇故事〉，李金銓著，《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頁 135-163。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金銓（2004b）。〈國家控制，科技顛覆，文化自主：台灣有線電視政治〉，李金銓著，《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頁 185-204。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金銓（2004c）。〈媒介政治經濟學的悖論：中港台傳媒與民主變革的交光互影〉，李金銓著，《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頁 25-43。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金銓（2004d）。〈超越東方主義話語：薩伊德、亞洲媒介、民主化〉，李金銓著，《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頁 277-29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金銓（2004e）。〈從儒家自由主義到共產資本主義〉，李金銓著，《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頁 62-93。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金銓 (2008a)。〈近代中國的文人論政〉，李金銓編，《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頁 1-32。臺北：政大出版社。
- 李金銓 (2008b)。〈自由化，而非全面民主化：台灣的游擊媒介與政治運動〉，李金銓編，《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頁 395-412。臺北：政大出版社。
- 李金銓 (2013a)。〈報人情懷與國家想像〉，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頁 1-4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李金銓 (2013b)。〈記者與時代相遇：以蕭乾、陸鏗、劉賓雁為個案〉，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頁 403-46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李金銓 (2019a)。〈我這代臺灣學人對於歷史多少是有興趣的〉，李金銓著，《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頁 561-571。臺北：聯經。
- 李金銓 (2019b)。〈民國知識人辦報以圖重返政治中心〉，李金銓著，《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頁 551-560。臺北：聯經。
- 李金銓 (2019c)。〈論《大公報》和張季鸞的文人論政〉，李金銓著，《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頁 437-445。臺北：聯經。
- 李金銓 (2019d)。〈國際傳播的國際化〉，李金銓著，《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頁 109-130。臺北：聯經。
- 林志明譯 (2002)。《布赫迪厄論電視》。臺北：麥田。(原書 Bourdieu, P. [1996]. *Sur la television suivi de L'Emprise du journalisme*. Paris: Liber-Raisons d'Agir.)
- 林麗雲 (2000)。〈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張笠雲編，《文化產業：文化生產的結構分析》，頁 89-148。臺北：遠流。
- 翁秀琪 (1993)。〈臺灣的地下媒體〉，鄭瑞城等合著，《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頁 441-496。臺北：澄社。
- 張季鸞 (1979)。《季鸞文存》。臺北：臺灣新生報社。
- 許紀霖 (2008)。〈近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許紀霖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頁 1-1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陳百齡 (2019)。〈報業政治獵巫：1950-80 年代《臺灣新生報》政治案件〉，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管理組編，《未完結的戰爭：戰後東亞人權問題》，頁 51-10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 馮建三 (1995)。《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學：析論 1990 年代台灣廣電媒體的若干變遷》，頁 123-173。臺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 黃順星 (2009)。〈模糊的文人、相異的實踐〉，《新聞學研究》，100: 297-306。
- 黃順星 (2022)。〈進行一場游擊戰：政治檔案中的黨外雜誌〉，《新聞學研究》，151: 43-110。

- 楊秀菁 (2016)。〈戰後初期《臺灣新生報》的發展與挑戰 (1945-1972)〉，  
《傳播研究與實踐》，6(2): 55-86。
- 葉啟政 (2000)。《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臺北市：三民。
- 劉昌德 (2007)。〈媒體倫理的政治經濟學：國家、資本與新聞專業規範的  
流變〉，《中華傳播學刊》，16: 111-153。
- 賴光臨 (1998)。〈中國士人報業的特質與精神〉，王洪鈞編，《新聞理論  
的中國歷史觀》，頁 233-272，臺北市：遠流。
- Carey, J. W. (1997).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 In E. S. Munson and C. A. Warren (Eds.), *J. Carey: A  
critical reader* (pp. 128-143).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alaby, J. K. (1996). Journalism as an Anglo-American invention: A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and Anglo-American journalism,  
1830s-1920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3), 303-326.
- Eisenstadt, S. N., & Roniger, L. (1984). *Patrons, clients and friend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trust in socie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UK: Polity.
- Hallin, D. C., & Maccini, P.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 D. C., & Papathanassopoulos, S. (2002). Political clientelism and the  
media: South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4, 175-195.
- Hardt, H. (1995). Without the rank and file: Journalism history, media workers,  
and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 In H. Hardt & B. Brennen (Eds.).  
*Newsworkers: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rank and file* (pp.1-29).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uang, P. (1972).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Lee, C. C. (1993).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Monographs*, 138, 1-37.
- Roudakova, N. (2008). Media-political clientelism: Lessons from anthropolog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0(1), 41-59.
-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New York, NY: Norton.
- Wu, Nai-the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ted States.

## Intellectuals and Clientelism: C. C. Lee's Journalism History Studies

Shun-Shing Huang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 C. Lee has used the literati cum political commentators to discuss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Although he has accurately grasped the spirit of the epoch, it is inevitable overemphasize the power of agent and romanticize pres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n the early days, C. C. Lee explain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media system, providing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Meanwhile he has noticed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third world, and it has become the subject of C. C. Lee recent research on literati cum political commentato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lthough C. C. Lee did not put forward a clear historical judgment, but from his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we can find an eclectic research orientation that integrates the dualism of structure and agent.

**Keywords:** patron-client press, literati cum political commentators, alternative media, media system,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

\* Shun-Shing Huang is Research Fellow at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Shun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frankhuangtw@gmail.com.

## 《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的美麗意外： 只有中道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

陳志賢\*

### 本文引用格式

陳志賢（2022）。〈《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的美麗意外：只有中道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傳播、文化與政治》，16:53-86。

---

投稿日期：2022 年 7 月 31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10 月 30 日。

\* 作者陳志賢為高雄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教授，e-mail: viking@nkust.edu.tw。

## 《摘要》

約四十年前，李金銓老師的一本傳播理論教科書意外地點燃台灣傳播學界師生對左派觀點的興趣，開啟往後台灣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此書有關傳播帝國主義的左右兩派理論反覆辯證，在那時極端右傾的政治氣氛與學界環境中，彷彿打開一扇往左看的窗。李老師博學多聞，著作等身，《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只是他豐富學術生涯的一個起點。如果這個起點是台灣傳播學界向左看的契機，也許值得順著他的眼光繼續探索左派在其視野中的可能與不可能。本文將回顧李老師在傳播研究上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聚焦於他對馬克思主義、國家與階級、數位科技與平台、媒體專業主義與勞動的看法和評價，最後班門弄斧地提出仍未獲其青睞的政治經濟結構問題與值得關注的研究取向。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國家、階級、新聞專業主義

不少傳播學界的師生是因為 1981 年政大新研所出版的《大眾傳播學》，或 1983 年三民書局出版的《大眾傳播理論》，而認識長年任教國外的李金銓老師。在當時資訊相對匱乏的環境下，上一本拓荒且影響力十足的理論中文教科書（徐佳士，1966）已經沿用十多年了，施蘭姆（Wilbur Schramm）以現代化理論為依託的英文著作仍舊被奉為經典，這本書的出現不僅拉近了台灣與美國主流傳播研究典範的距離，還在解嚴前夕蠢蠢欲動的八十年代，透過對媒介帝國主義的引介與批判，而「偷渡夾帶」了彼時被禁言或被扭曲汙名化的馬克思主義與依賴理論，讓井底之蛙如我者意識到，原來費心苦讀擁抱的現代化理論早已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連串的「國際資訊與傳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NWICO）爭辯中遭到圍剿。拉美國家戮力探尋經濟發展遲滯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根源，並質疑傳播媒體所扮演的美國資本主義全球擴張馬前卒，似乎也喚醒許多深受三民主義與國父思想反共親美課程洗腦者，逐漸認知到左派思想不是如制式應考答案那般陳舊不堪，它可以反用來看穿當年黨國體制、並提供另類觀點與解方。一本教科書意外地點燃台灣傳播學界師生對左派觀點的興趣，開啟往後台灣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李老師也很清楚這本教科書的學術價值雖然不如他的專門著作，卻在兩岸三地知者最眾、對青年學子影響力最廣（李金銓，2019，頁 591）。除了升學考試必讀與文采流暢之外，此書精彩之處其實不在爬梳傳播理論流派的本體，而是出格地融入作者有關傳播帝國主義的博士論文研究，廣泛蒐集的實證資料與反覆辯駁左右兩派的理論釐清，為本該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教科書添上貼近在地呼吸的血肉精神。在長夜將盡的八十年代初讀此書或將驚艷於作者一視同仁地介紹左右學派觀點，既不偏好主張資訊自由流通的自由派，也不菲薄控訴媒介帝國主義的激進派，嘗試結合營造「自由而公平」的國際資訊新秩序（Lee, 1980）。也許作者無心，也許點評不見得人人同意，也許以台灣為傳播帝國主義「例外」的研究宣稱有所爭議，但是在那時候極端右傾的政治氣氛與學界環境中，如此的做法等於是為左派觀點平反，打開一扇往左看的窗。有多少學子因此而好奇地啃讀《思與言》學術期刊上譯介的 Andre G. Frank 和 Fernando H. Cardoso 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

與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 (world system theory)，更在往後的幾年內陸續捧讀關懷社會底層的《人間》雜誌與引進各式左派新思潮的《當代》雜誌？

對戒嚴時期的讀者這是特殊的閱讀經驗，對解嚴後脫離該時空脈絡的讀者則需要不同的解讀角度。在新世紀回望上一世紀八十年代的台灣，或許更能清楚看到那刻急於借左派啟蒙、勤於以社運建構足以對抗國家機器的公民社會，往往低估晚期資本主義的變形再生能力、高估反對陣營面對利益與權力的免疫力。媒體改革儘管開始注意到經營與所有權等政經結構問題，侷限在優先打破黨國體制的執念，促成力主鬆綁的自由派與批判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左派之間的奇妙合作，也誘使問題的對策一度簡化為黨政軍退出媒體。

實際上，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未能深化為對商業媒體產權的規範，也一直無法落實為壯大公共媒體的強力後援，其中一個原因即是它的遲到與早退。台灣傳播學界於八十年代初期終於迎來姍姍來遲、意外現身的左派觀點，它卻又匆匆地在解嚴後的九十年代淹沒於目不暇給的各式舶來解構、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中。甚至在台灣所謂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常指稱的是往文化研究傾斜、「均服膺廣義的新馬克斯主義社會觀」的批判性政治經濟學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CPEC)，分類時也常將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批判理論等同共置 (馮建三，2003，頁 106、110)。套句通俗的話說，左派觀點中的政治經濟學派，特別是被誤解為經濟化約論的老馬克斯主義取向，在台灣還沒真正走紅就已經過時了。

歐美的新馬克斯主義與文化研究包含許多對舊左派的反省與批判，尤其點出過度關心物質條件與勞動生產等下層結構、忽略文化的相對自主性等論述盲點，自有其矯枉必須過正的理論脈絡。然而台灣傳播研究的語境迥異於歐美，長期缺乏看穿資本積累邏輯硬道理的政治經濟結構分析，立足未穩，何來矯枉過正之需？尚未完全瞭解媒體產業結構，就已經夸夸其言地讚頌閱聽人能動性，甚至率爾否認政治經濟分析必要性者所在多有。如果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出現左派與自由派聯合對抗黨國體制的偶然合作，新世紀或許也將看到某些新左派與新右派在賦權閱聽人/消費者與支持認同政治上奇特的匯流。

相較而言，四十年前李老師就已將重結構的文化帝國主義與偏個別選擇的資訊自由流通兩說「視為互濟的悖論(paradox)，而不是水火不容的異端」，進而以比較性的個案分析，具體羅列條件的異同與影響選擇的差異（李金銓，2019，頁 48）。而且他也發現：「在批判學派的馬克思主義陣營裡面，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學者追求的旨趣、關懷和取向截然不同，顯然有物質基礎的差異。」（李金銓，2019，頁 117）學術並非跟風追流行的買辦，不同的歷史脈絡有不同的處境與掙扎，研究者介入也當有不一樣的輕重緩急與偏頗取捨。第一世界的左派學者也許不會關心文化生產的國際分工體系，僅專注於其國內的文化政治與詮釋鬥爭，但是第三世界的左派卻很難有餘裕不去面對跨國而來的政軍工複合體。問題是，冷戰時期反共的氛圍中，源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格外、難以或不可能進入台灣的學術傳承」（馮建三，2003，頁 106）。除了媒改社與傳學鬥成員的論述，遲到又早退的老左派導致台灣的傳播研究沒有太多的結構分析，多數人尚未詳細踏查文化帝國主義的單行道，就飛奔擁抱全球化的文化高速公路。

弔詭的是，《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完筆於英美新右派崛起之際，正反辯證、注重各自社會條件與文化後果、追求中層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的持平再商榷會不會也無意間地加速老左派整體結構分析的謝幕？無心插柳地為世紀末歌詠權力去中心化、有為者亦若是的全球化理論鋪路？或者反而被所謂的中國或非西方傳播模式挪用為對抗美式文化的論述基石？李老師念茲在茲的是「如何保證我們的分析關照全面(holistic)，又不陷入全稱命題(totalistic)的泥淖」（李金銓，2019，頁 122），反抗西方霸權的同時，「也痛絕文化民族主義的閉門造車」（李金銓，2022，頁 347）。他也以具體的研究展示如何留意同與異、常與變交織的社會現象，並優雅地走理論鋼索，跨越宏觀與微觀、結構與能動、絕對與相對等二元對立的學術陷阱。

李老師博學多聞，著作等身，《媒介帝國主義再商榷》只是他豐富學術生涯的一個起點。如果這個起點可能意外點燃台灣傳播學界向左看的契機，也許值得順著他的眼光繼續探索左派在其視野中的可能與不可能。不揣淺陋，本文將儘量回顧李老師在傳播研究上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聚焦於他對馬克思主義、國家與階級、數位科技與平台、媒體專業主義與勞動的看法和評

價，最後班門弄斧地提出或許仍未獲其青睞的政治經濟結構問題與值得關注的研究取向。

## 壹、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

不清楚赴美留學之前李老師是否接觸過學術性的馬克思主義，根據他的學術生涯五十年自述，首次出現的左派影響是念博士班時讀了 C. Wright Mills 之《社會學的想像力》，啟發他關懷公共議題與具備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由於博士論文所需，他開始接觸 Herbert I. Schiller 之類的美國左派政治經濟分析，再擴及拉美激進學者的依賴理論（李金銓，2019，頁 583-584）。在美教學初期，英國文化研究已經出現於授課內容，但是被譽為「沒有他，就沒有傳播政治經濟學」（Wasko, Mosco, & Pendakur, 1993, p.10）的 Dallas Smythe 卻少見其談論，而同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開創者的 H. Schiller 更被貶為僵化教條（李金銓，1981，頁 303）。台灣由於馮建三（1992）的引介，對此一老左派取向並不陌生，有趣的是，一方面中國竟然晚至新世紀初才等到郭鎮之的相關撰文介紹，而且迄今「進行系統研究的文獻極少」（陳世華，2017，頁 70）。而另一方面，在 1970 年代依附美日、自製率卻很高的台灣電視產業，一度被李老師視為媒介帝國主義的否證，1990 年代以後國外影視大舉入侵，昔日的例外反而成為支持左派批判的例證（敦誠，1992；馮建三，2003）。

雖然常提及傳播政治經濟學，李老師評論左派內部路線時，似乎較偏向新馬克斯主義的文化研究取向，而非他一再批評過於經濟決定論的老馬派（Murdock & Golding, 1977; Golding & Murdock, 1991）。他主張經濟和政治並不完全對應，經濟也只是文化力量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李金銓，2019，頁 123）。因此，相對於政治經濟學派堅持上層建築「說到最後」（in the last instance）是被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強」決定論，他較接受只「說到最前」（in the first instance）、僅設限加壓、沒有最後保證（without final guarantee）的「弱」經濟決定論（Hall, 1983; Miliband, 1977; 李金銓，2019，頁 124）。

而如此的偏好又反映在他區分「經濟的政治經濟學」(economic political economy)與「政治的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political economy)：前者採由上至下的分析方式，批判資本主義媒體市場體制，強調不大刀闊斧進行結構改變，不處理資源不均、資本集中、與過度商業化的問題，便無法建置理想的媒體系統；後者則是由下而上的取向，優先排除國家壓迫的政治力干擾，制度化保障媒體工作者的勞動自主與個人自由，再由其逐漸摸索適合的媒體生態模樣(Lee, 2000a, p.571)。儘管李老師一貫主張平等與自由並重，沒有最後保證(without final guarantee)的「弱」經濟決定論導致他重後者而輕前者，畢竟從他看來，經濟結構改變無法保證民主性媒體的運作，但是免於國家暴力卻肯定多少能讓媒體專業的火苗存活。基於中、港、台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轉型時遭逢的實際困難，他建議先提倡市場自由化，並以政治改革保障消極自由，確立此基礎再追求物質條件的公平性、培育積極自由。換句話說，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是李老師構連左右兩派的黏著劑，不過它只是工具罷了。不同於Wallerstein(1999, p.99)援引自由主義以補充結構批判、企圖促成屬於左派「具公平性的自由」(egaliberty)，李老師選擇利用淡化結構影響的政治經濟分析，藉以強化自由主義的民主深度。

對左派欲迎還拒的戒慎態度特別表現在他一篇直接談論社會理論如何解放賦權中國新聞業的論文(Lee, 2000a)。李老師分別闡述自由多元主義、1980年代中國改革的老左派、與1990後的激進批判新左派等三大理論的利弊得失，發現它們皆同意中國黨國體制民主化的重要性，主要差別在於對經濟自由化所扮演角色的認知不同：自由多元主義相信遵從市場機制能確保新聞業的消極自由，新左派卻不滿文化的庸俗與異化、反對媒體商業化、另尋社會主義的新聞模式，改革的老左派則選擇性引用馬恩列毛思想，希望在國家必要時可以介入矯正市場的情況下，某些程度內接受反映民意、不盲目屈從黨意的新聞自由。

不知為何，批判勞動剝削、商品拜物化、與產業集中的政治經濟分析在老左派的討論中缺席了，而且儘管這篇論文主旨是探討社會理論的解放潛力(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social theory)，文章的評比與結論卻是以當時落實接納的現況為依據：老左派因路線鬥爭被打壓，隨天安門鎮壓而沒落，

新左派反對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工業，呼籲將媒體視為對抗意識形態宰制的鬥爭場域，反倒正對黨國官僚的胃口，可能無限上綱地引狼入室、以浪漫且抽象化的人民為名，讓國家與民族主義借屍還魂，合理化干預媒體的暴行。至於自由多元主義的成敗也全繫於黨國的容忍度，所謂具備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給予若干的新聞自由，也透過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收編不少市場勢力，更因缺乏新聞專業義理，而使得辛苦得來的新聞自由容易被濫用或操控。如此具體脈絡化的分析固然不打高空，但只著眼當下的興衰起落，會不會抹殺理論另類構連改變契機的潛力？或可能憑添難以改變的悲觀色彩？

其次，乍看「務實」的分析也透露了論文避開左派的立場，雖然三項社會理論迄今都無助於理想中國新聞業的建立，李老師卻認為中國自文化大革命以來重平等而輕自由，黨機器持續發展龐大、滲透各層級的宣傳工具，不接觸都不行，因此反駁趙月枝對新聞市場化出現資訊不均的憂慮（Zhao, 1998）。他直言與其錦上添花期待黨國再多出手保障積極自由，還不如為苦於無法免於國家干預的消極自由與新聞自由雪中送炭（Lee, 2000a, p.563）。此言用心良苦，他也清楚中共對新聞業的控制不會鬆手，實際做不到還是忍不住說。他也意識到中共不再視國家與市場為互相對立的概念，宏觀調控將市場納入黨國體制，在黨政軍工媒綜合體中市場審查與自我審查都令新聞自由、甚至所謂的公民社會變得微妙弔詭，專業主義不是媒體人說了算，但是仍然忍不住再三呼籲。只是如此不信東風喚不回的苦心並未同等付諸於新舊左派想做卻達不到的理想上，三項社會理論皆有實然的悲哀，僅有自由多元主義獲得李老師應然的青睞。即使如此，他在二十一世紀初期觀察到的三項中國新聞自主跡象：國家權力節制並容許新聞專業獨立性、似左實右精神分裂的編採手法與行銷實驗、自唯命是從的黨國喉舌轉為利益交換的公關機構（Lee, 2000a, pp.561-562），或者三種香港報業因應政治審查與自我審查的「策略儀式」（*strategical rituals*）：拼貼並置、編輯分工、與中性報導（Lee, 2000b），是否仍能在大權集中、清朗打假、高揭共同富裕中國夢、習近平統治下的當今中國持續茁壯？

嚴格來說，這篇論文少談新舊左派的社會理論，多半談的是環境侷限下

中國左派的實際妥協與折衝，陣營的路線鬥爭遠多於哲學論證的思辨。而中國左派與西方學術理論的左派之間有不小的距離，口頭（不得不）宣稱的左派又常與實際的主張作為有頗大的落差，中國一些所謂的左派在二十一世紀裡幾乎成了保守主義與親近當權的同義詞：反西化、反普世價值、推崇 Carl Schmitt 的國家主權、主張走中國自己的路（張泰蘇，2019，頁 238-239），甚至被形容為藉民族主義以維護黨國利益的「愛國賊」（馬得勇、張曙霞，2014，頁 88-90），和台灣一般理解的站在權力對立面、批判現況之左派似有天淵之別。李老師只以綁手綁腳、「實際存在於中國的左派」來驗證其解放潛力，並未援引西方學術界的馬克思主義商品與勞動觀點處理媒體集中、資本積累、貧富不均等中國走資後的現象。不只老左派政治經濟學分析無端缺席，標榜閱聽人能動性與消費民主的後現代主義更被簡單幾句話而嗤之以鼻（Lee, 2000a, p.570），這形成一個耐人尋味的理論觀點選擇：強調「說到最前」的「弱」經濟決定論認為閱聽人與消費者受限於一定的物質條件，而沒有最後保證的「弱」經濟決定論卻凸顯新聞記者或文人論政辦報相對自主性與發展專業主義的可能。厚此而薄彼，不相信主動閱聽人但相信專業報人，不喜歡結構決定論但對政壇商場的操縱扭曲、爾虞我詐如數家珍。拒絕左派大論述的李老師曾自承，「從未忘情於新聞」、偏愛「在『學術界』看『新聞圈』」（李金銓，2019，頁 459），難怪他的政治經濟分析充滿許多新聞人與金錢、權力周旋迂迴的精采軼事與多樣演繹，理論觀點偏好上，其實韋伯比馬克思更得他的心。

## 貳、隱為背景的國家與階級

從李老師的觀點看來，經濟下層結構只是設定物質條件的限制，文化與傳播發展保有相對開放自主性，因此他較在意媒體具體產製過程中人與事/勢的碰撞相遇與歷史夾縫中介入權力結構的各種姿態：可能因緣際會，可能因勢利導，也可能身不由己（李金銓，2019，頁 432）。這觀點看似 Stuart Hall 之類的新馬文化研究，由上至下從結構限制看其中的能動性，實際上較接近

韋伯式強調脈絡瞭解 (verstehen)，由小見大從行動與行為洞悉制度與社會結構。例如在中國報人研究中 (李金銓, 2008 & 2013)，他透過一手文獻與生命史賦予左中右派報人不同行動 (act) 瞭解式的意義，將之轉化為懸掛在意義之網上的「行為」(action)，再循著歷史累積的軌跡彰顯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d) 的行為，以韋伯式理想類型 (ideal-types) 分類制度行為，形成社會結構比較的基礎 (Weber, 1978)。他的分析中，歷史深描 (thick description) 比抽象命題推演多得多，因此所謂的政治經濟結構分析打散滲透至報人與媒體於歷史轉折點進退取捨時感受的可能與不可能，沒有身外強加的冷冰冰機制邏輯，只有身處其中的猶豫與抉擇、偶然與必然、機會與侷限。

也因為如此，李老師很少進行缺乏行動者的結構分析，鮮少真空抽離地研究國家與社會的形構與角色。一方面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目前「還無法全面瞭解中國記者的出身、意識、階級和社會流動這些基本問題」(李金銓, 2019, 頁 413)，另一方面則是他反對將結構抽象化，寧願採取韋伯方法論的路徑，所以國家與社會的結構影響只有在與人交會時，才會展現力量與模樣。韋伯與馬克斯觀點孰優孰劣，見仁見智，不過賦予行動意義、促成制度化的個人，一直是鑲嵌於特定的權力脈絡中，某些傑出報人報國之際固然透露了政經結構的作用力，卻只是折射某部分的面向，文人與報人自有其階級、性別、與族群等侷限，他們看到、感受與展現的結構不見得相仿於其他人，有時當局者迷，反而凸顯出因結構位置而產生的盲點。當然更多的異質個案累積、增加脈絡性與條件性可能讓結構的複雜面貌逐漸清晰，但是大方向的結構投影與繪製，或許更有助於行動者的定位、校正、搜尋他者、想像另類關係模式與改變契機。

雖然多次推崇 Cardoso 的依賴理論動態分析拉美國家、在地資本、與跨國資本之合縱連橫，李老師卻不太直接談論階級關係與國家角色。他討論的政治經濟學主要是如 James Curran 和 Myung-Jin Park (2000) 般泛指社會關係裡的權力、控制與全球/在地影響 (Lee, 2001a)，而不是直探表層底下獨立外在的資本邏輯、階級鬥爭或國家機器的治理管制戰略，於他的論著中，階級通常僅是新聞工作者的身分背景描述 (如: 李金銓, 2013)、媒體關注

的不同對象（如：Lee, 2003）、或者西方媒體霸權有待超越的侷限（如：Lee, 2015），而所謂的國家則往往於政權交替（Lee, 2000a）、民主化轉型（Lee, 1993, 2001a）、或既有體制內的政治路線傾軋時（李金銓，2008 & 2013），才容易辨識與現身。他經常援引 Edward Said 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批評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概念帶有西方偏見，忽略跨國差異，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威權的脈絡（Lee, 2001a & 2001b）。因此，他熟悉階級與國家理論，卻不愛套用。儘管缺乏嚴謹的階級與國家角色分析，政治經濟學的敏感度豐富了他的批判性自由主義，從而反對媒體中心主義與媒介決定論，苦心呼籲將媒體的反抗或馴服皆安置於內外政經勢力競逐的權力場域中，以獲得更具社會學觀點的脈絡理解（楊冰柯，2015）。

一篇探討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媒體與國家、資本關係的論文是少數的例外（Lee, 2000c），李老師借用政治學界的侍從體制（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分析黨國對媒體有時高壓強制、有時懷柔收編的雙手策略，於非關政治的內容產製上容許有限的表達自由，但要求政治表達的忠誠，利用商業利益換取媒體的馴服，故彼時的媒體既身受其害，又為虎作倀。他明確指稱解嚴是國民黨從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走向軟性威權的轉型，以前政權壟斷大量的國家資本，並扶持效忠於它的私人資本，解嚴後逐漸只能利誘民營媒體，無法威脅支使，市場競爭的影響力開始多過於政治干預。而另兩篇論及當代中國傳媒如何於政經雙重壓力下運作的研究中，他則名之為「黨與市場的統合主義」（party-market corporatism），以黨國體制與資本主義市場的相對強弱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又區分為上海式的侍從主義關係、廣州式之政治管理的市場化、北京式之市場的政治吸納等三種模式（Lee, He, & Huang, 2006, 2007）。不管是台灣或中國的模式，歷史的描述仍多於結構的分析，李老師並未進一步挖掘統合主義轉型的階級/族群組合變化、資本競合與官僚特許的新管制問題、以及限制性公民參與的合法性霸權建構等問題，更未就台海兩岸不同程度的經濟自由化後，資本主義媒體生產體制、勞動條件、與勞資關係多置一詞。國家與階級在李老師的研究裡，多半是解釋媒體處境的自變項，而非有待深究的依變項。

雖然早期馬克思主義低估國家理論，傾向將國家視為統治階級的工具，

用以維護資本積累、克服經濟危機、與掌控階級鬥爭，Georg Lukács 與法蘭克福學派諸君已經逐漸擔憂國家角色的物化 (reification)，害怕它反客為主，由手段變成目的，一如德國法西斯政權原本是壟斷資本企圖極大化剩餘價值剝削的理性化工具，到頭來卻養出極權的巨靈怪獸 (Clarke, 1991)。Louis Althusser (1971) 則更進一步強調武力壓制與意識形態操弄的國家機器 (the repressive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並指出國家機器與物質條件下層結構既相連又分離的多元決定 (over-determination) 結構型態，除了保護社會關係的再生產，也致力於自身運作邏輯的再生產。1970 年代歐美資本主義社會面臨利潤率下降等經濟危機，國家必須同時因應勞工抗拒剝削與公民要求自由平等保障之資本積累與合法性雙重危機，又迫使左派學者重新檢視國家的功能以及親左政權入主的可能與限制 (Habermas, 1975)。為延緩經濟危機而尋求全球市場，以增加各式各樣資本主義空間 (如:國際分工生產鏈、投機的土地與房地產、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文化藝術創意領域)，來克服無法更為加速的資本積累時間 (Harvey, 1989)，則讓布爾喬亞國家不得不以民族國家形式進行新型態帝國主義擴張，帶頭幫資本在新的空間攫取原始積累機會，並建立有利於資本跨國流通的法律制度，但也激起其他地區民族國家形式的反撲 (O'Kane, 2014)。

左派認為國家與階級一直在危機中相生相剋，政治與經濟根本沒有清楚分界線，其中的霸權構連與結構性緊張關係較少在李老師的研究中彰顯。中國的統治階級屬性並不清楚，口頭上尊工農階級，實則走資，勒控資本階級時，常又祭出民族主義，甚至展露「為人民服務」(for the people) 的開明專制父權式威權，地區之間則因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而有不同的主導階級與階級組合所形成的不同霸權集團 (hegemonic bloc)。廣州、上海、與北京三種統合主義模式，李老師認為是政經勢力較勁議價的結果，從 Antonio Gramsci (1971) 的觀點看來，這只是「運動戰」(war of maneuver) 正面出擊的表面短暫結果，並非「陣地戰」(war of position) 挑戰國家「塹壕」後面已經像「永久性防禦工事」般屹立著的市民社會。這三都市的媒體頂多只是趁勢見縫，利用相對優勢的籌碼，讓國家默許某些新聞報導，但是對國家權力核心真正所在的市民社會，以及其中領導同盟與統治敵對的霸權構連，

卻未見提出新的「共識」或「常識」進行長期霸權挑戰。市場導向的自由主義式媒體固然難免衝撞國家的決策，然而對孕育它們茁壯、讓它們賺錢的市民社會「共識」或「常識」往往媚俗袒護的很。**Gramsci** 直言批評，國家與社會分離或對抗是自由主義者一廂情願的天真幻想，一個強大穩固的政權決不會只用國家機器強制服從，統治的重兵其實早佈署在市民社會的日常生活裡。欲奪國家者必先奪市民社會，**Gramsci** 如是說。媒體的政治經濟分析因此不等於政治分析加經濟分析，也不能只著眼於商業性媒體以市場對抗國家，以免因小失大，忽略市場或市民社會本身的政治性與霸權建構。

### 參、黨與平台的統合主義

自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共產中國很諷刺地將大批農民工送入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鏈的工廠剝削中，加入 **WTO** 後更是變本加厲地以出口導向的世界工廠自居。原擬保障勞工權益的勞動合同法，由於跨國企業的遊說與撤資威脅，最後通過的版本刪除解雇超過五十人須徵求工會同意的規定，也放鬆對長期受雇勞工提供正式契約的要求（**Cheng, 2007**）。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增加工作機會的重要性遠大於勞動正義，其中勞工需求量最大的莫過於資訊傳播科技產業（**ICT**），因此這些以外資或合資為主的跨國企業降低勞動成本的聲音總是特別入耳，連廣州將最低工資調到全中國最高，也不到平均市民收入的三成（**Mo & Liao, 2011**）。官方宣稱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學者卻認為它其實是有別於西方「自由菁英資本主義」的另一變生體：「政治/威權資本主義」，兩者都汲汲於追求利潤與資本積累，差異只在於民主或效率、法治或人治/黨治的傾向強弱而已，資本主義於是變成當前世界唯一的政治經濟體制（**Milanovic, 2019 / 陳松筠、孔令新譯, 2020**）！從這觀點看，中美競爭實際上是兩種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因此馬克思主義左派觀點不只適合批判歐美，也如迴力鏢一樣，同樣適合回頭嚴格檢視走資的中國。

中國版的新自由主義國際分工出口模式經過 2008 金融危機的震撼，暴

露它過度倚賴外在市場的脆弱與不穩定性，國際需求疲軟加上中國土地成本高漲與勞工跳樓抗議的壓力，逼得中國尋求新的經濟策略。一方面將沿海出口模式轉到內陸二三線都市，吸引農民就近上工，既解決地區發展不均的問題，又繼續滿足跨國企業對低廉生產條件的需求；另一方面則鼓勵製造業出走的沿海都會改發展創意與數位科技產業，不僅創造更好的工作機會，還有助中國產業升級與文化輸出。晚近川普與習近平之間的中美貿易戰，更讓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定調經濟雙迴圈戰略，強化內需市場、自給自足，擴大外銷出口、從中國製造升級為中國智造/創造，內迴圈減少中國對世界的依賴，外迴圈則加深世界對中國的依賴，內外相輔相成，而電信與數位科技是當中的制高點（何丹、徐鑫，2021）。為避免歐美資本主義社會面臨的資本積累與合法性雙重危機，中國打算運用雙迴圈宏觀調控形成資本積累與合法性的雙重保證，傳播產業正是成敗的關鍵。

在後 2008 時代，數位傳播被視為中國經濟再結構的主要槓桿，排除外來競爭的巨大內需市場圈養出足以與矽谷匹敵的平台巨獸，努力提高研發能力，掌握關鍵技術，更是希望後發先至，超車歐美，搶佔未來發展先機，於可能改組的國際新分工秩序中奪得優勢主導位置，建立所謂的「具中國特色的數位資本主義」（cyber-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ussu, 2018）。中國全國人大於 2016 通過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將數位創意列為五項「十兆級」新興支柱產業之一，目標除了擴張中國文化與媒體的軟實力與鼓勵科技創新，更企圖利用中國強大的數位科技生態系統（ecosystem），轉守為攻，以基礎建設相關的技術規格與平台網絡優勢，控制全球科技與文化的發展。換句話說，透過黨國的決策、投資、指揮、與誘導，科技發明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幫助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躍入虛實整合的平台經濟與演算法世界，並主導帶動科技採用與文化消費（Flew, Ren, & Wang, 2019）。如此「網路加文化」（Internet Plus Culture）的數位科技生態系統是中國新的霸權「共識」或「常識」建構，企圖讓政治經濟力量隱形退居二線，彷彿一切的資訊連結、排序、與過濾是純粹技術運作的結果。長久處於單一生態系統，演算法甚至能使人們潛移默化地順著「媒介化」（mediatization）邏輯建立自我認同、社群關係、與世界觀。屆時，國家的

鷹爪就不只是公安與網軍而已，自動自發的小粉紅在線上線下之市民社會為統治階級興風作浪，才是統治意志利用新科技打贏「陣地戰」的關鍵。橫眉冷對國家、卻俯身屈就市場的自由派媒體恐怕搞錯了戰場。

李老師偏好從人看事物，較少聽他談論科技對人與歷史發揮的作用，如果「黨與市場的統合主義」慢慢轉成「黨與平台的統合主義」(party-platform corporatism)，統治的政治經濟協商競合就可能蛻變為科技的文化治理，在符合黨國意志或黨國扶持的平台生態系統中，政權合法性與營運生意經交融、互為表裡，國家與市場的潛在緊張關係是否將被「河蟹」成有志一同的訂閱數與聲量追逐？打賞帶貨爭搏眼球的網紅、大V、與網路創業者是否將取代憂心忡忡戮力報國的文人、報人、與數位行動主義者？中國打造的跨國平台（如抖音）與全球行動通訊基礎設施（如華為的5G技術）能否視為傳播帝國主義的反轉？看似去政治性的數據演算會不會成為邊緣化異議者最狀似無辜的幫兇？也許，對「黨與平台的統合主義」而言，資料即訊息(Data is message)，李老師關懷的論述與框架，不論是多元或單一、對立或協商，在平台的演算下，大塊文章或新聞報導皆消逝於虛擬的虛空中(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the air.)，拆解為1與0的連結選擇以及排列組合。

歐威爾式反烏托邦穩固之前，中國仍不放心完全放手讓數據說話，因而「黨與市場的統合主義」分析目前依然大有可為。2018取消任期限期之後，習近平開始抓緊意識形態的控制，影視、新聞、出版的管制整合於黨的宣傳體制，強化大外宣，並且公開宣稱，文化產業只能姓文，不能姓錢。騰訊集團立即呼應黨的指示，下架只顧打造IP賺錢的「泛娛樂」(Pan-entertainment)概念，改升級為「新文創」(Neo-culture creativity)戰略構思，管束線上內容符合黨國規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接連發起的清朗運動，連政治性低的電玩、動漫、直播、視頻與群聊論壇都管，大力整肅娛樂圈與飯圈。支持者認為不必被高流量牽著鼻子走，內容創作可以回歸文化品質，而反對方則擔心所謂的文化價值，其實是言論思想審查與意識形態控制的代名詞(Flew, Ren, & Wang, 2019)。

中國不只謹慎馴服商業市場，令經濟為政治服務，還小心翼翼嘗試將創意產業關進利潤的囹圄，誘使創意唯經濟是從，能賺錢的才是好創意。從

工具論出發，中國只想要創意帶來的產業好處，拒絕隨創意而來的民主多元要求（Keane, 2013）。相較於創意產業一詞，中國官方更偏愛文化產業的名稱，特別是走資較慢、偏重內需、強調政治維穩的內陸地區又比沿海資本發達的都市更重文化而輕創意，這當然與文化的保守性與創意的出格不受拘束有關，也多少因為這些地區產業結構仍仰賴第一、二級產業，推動文化產業的政治目的大於經濟需求。而且黨國鍾愛科技獨角獸的創新遠勝於藝術家桀傲不馴的創意，因此前者歸商務部或工業與信息化部管轄輔導，後者則屬文化與旅遊部與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統籌審查（O'Connor & Gu, 2019）。一放一收，兼顧市場獲利與思想規訓，形成具中國色彩的文創產業，即使是採用創意產業的沿海都市，賣力追求的也多是去掉政治稜角、無傷大雅卻能賺滿荷包的創意。只是不管名稱是文化、創意、或創新產業，內容工作者與使用者、甚至高科技業者都得如履薄冰、拿捏分寸，深怕不知何時與為何踩到紅線。

更棘手的問題是，未來「黨與平台的統合主義」是否可能透過複雜如黑箱般的科技生態系統中介運作，預設黨國理念與利益於基礎設施、硬體標準規格、零件設計組裝配置、軟體程式編碼、演算法撰寫、與參數設定之中，化干預操弄於無形，將可見的一時打壓轉為難辨的長期涵化，無須勞駕黨國老大哥出手，異議雜音「自然」地被消失封鎖、被不推播連結、被隔於同溫層之外，即使偶爾不小心露出滲入，也難逃假訊息的標籤，甚至根本難以獲得久處其中的網民青睞與認同？李老師心繫免於國家干預的消極自由與新聞自由，背後的假設是多元的媒體能幫助獨立自主的個人做出最佳或最資訊充分的決策，但是在平台生態系統裡，主體是鑲嵌於資料運算網絡之間的終端機主體（terminal subjectivity; Lazzarato, 2014），數位科技的中介取代國家或帝國的直接干預，所謂獨立於國家與市場之外的公共領域終究淪為人工智慧建構的資訊節點罷了。或者更諷刺地說，是人與科技物共謀妨礙了消極自由與新聞自由。媒體的接觸與個人的選擇都是基礎建設中介的結果與回饋的再強化（Hesmondhalgh, 2022），如此環境下，或許解藥不是意見自由市場或媒體專業主義，而是數位匿名（anonymity）、漫遊（flâneur）、與介入軟硬體、重寫演算法的參數政治（parametric politics）（Zehle & Rossiter, 2016）。

## 肆、專業主義掩蓋下缺席的勞動分析

李老師著作最精采者當屬民國初年的新聞史爬梳，見微知著，藉由報人的言行與進退，投影出報界、知識界和政界錯綜複雜關係，甚至勾勒中國何去何從的軌跡。雖舞劍於現代中國報業發展，實則意在中國大歷史的轉折，有識者讚之為「中國現代史的另一種讀法」（李公明，2008年12月28日）。他也自我期許結合內證（文本理路）與外證（語境與脈絡的聯繫），「小心翼翼，步步為營，從種種直接和間接證據旁敲側擊，還原歷史，真實呈現人與事在歷史場景下交織演出的一場戲」，並奉勸「學子切勿一下子就跳到『史論』，史實貧瘠，贅論滿篇，事情沒有搞清楚就『微言大義』起來了」（李金銓，2019，頁341）。

捨近求遠、放言泛論一向是李老師諄諄告誡期期以為不可之惡，可惜我不懂新聞史，因此改由另一基本踏實的面向切入，選擇具體的傳播勞動分析，討論他最掛心的當代中國媒體工作者與專業主義。

改革開放前，中國媒體一直以黨國喉舌自居，預算與人事也都由黨控管。直到1980年代以後，廣告逐漸成為主要收入來源，媒體的運作越來越像商業機構，雖然仍維持政治路線的忠誠，日常的組織與營運早已涵蓋許多營利分支事業。後2008在強化內需市場的氛圍下，媒體更肩負起創造消費社會、鼓勵都會新興中產階級追求生活風格（而非政治民主）的戰略使命。國家與市場的齊力支持幫助媒體躍升為中國第四大產業，僅次於製造業、觀光業、與電子資訊業，中國也在2013一舉躍升為世界第二大廣告市場（Hong & Wang, 2016）。

錢景改造了中國媒體的風景，迎合大眾需求、提供速食訊息和八卦娛樂的晚報、周刊、與都會報紙，為媒體集團賺進大把鈔票，晉升為市場要角，原本重心所在的全國性黨營報紙，轉型為產官學菁英取向的小眾型「質報」。前者無所不用其極追求利潤，不務本業地將內容生產買賣擴及非新聞或類新聞領域，後者則更堅定地向中央看齊，以領導輿論風向自豪。改變中被犧牲的是為弱勢族群發聲的地方性與草根性媒體，在前述所謂質報與量報的夾殺

下，廣告與訂閱收入銳減，官方補助又不足，加上城鄉差距惡化、人力往都市外流，掏空這些媒體生存的基礎，少數倖存者也得面臨低薪與低迷的工作前景，連報導內容都難以避免去鄉村化(*de-ruralization*)的同質庸俗傾向(Liu, 2012)。

媒體積極推動內外雙迴圈戰略、塑造偉大中國夢，除了犧牲農民工與少數民族等弱勢群體，一般媒體工作者其實也很難享受「共同富裕」的好處。上世紀末的媒體慷慨榮景讓位給新世紀錙銖必較、嚴格控管成本的資本殺戮戰場，所謂的彈性化(*flexibility*)變成殆危不定的存在(*precarity*)，新聞工作者不僅多半低薪、多工、長工時，專職的工作還經常被非典型雇傭、甚至無薪的實習生所取代。新聞職場兩極化，少數明星記者與名嘴名利雙收，其他絕大多數從業人員薪資收入停滯，卻必須面對「共同富裕」帶來的房價與生活消費水準高漲(Hong & Wang, 2016)。中國崛起了，出名的文人報人媒體人隨之飛黃騰達，一般新聞工作者的社會經濟地位反而往下沉淪，這讓她/他們情何以堪？

即使有媒體既不畏政商權貴打壓，又不屈從流行媚俗，敢於引領輿論、監督當權，例如被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推崇的《南方周末》，對它們孤軍奮鬥的讚美更證明了常態下的市場導向媒體是完全另一個樣貌。由例外彰顯規則，李老師寄予厚望的市場自由化，迄今實踐的結果似乎尋租(*rent-seeking*)遠多於批判，每出現一則《南方周末》敢說真話的報導，同一傳媒集團內就有更多的《二十一世紀網》收賄醜聞。事實上，商業操作的媒體偏愛與權力共生，疏於挑戰既得利益。李老師談論近代中國文人辦報的階級性，指涉的是媒體定位與報導取向，不是媒體工作者切身的勞動條件與生產關係，因此讀者可以看到張季鸞「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原則的知識人良心，卻難以瞭解《大公報》旗下記者在「文人論政的企業」裡如何享有薪資福利、參與決策、或掌握工作自主性(李金銓, 2019, 頁 437-445)。以當下中國情況觀之，被迫譁眾忙於博取眼球青睞，卻自身難得溫飽的新聞工作者，如何奢望其展現知識份子風骨？如果報人報國折射出彼時文人的理想、分歧、與失落，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精神分裂則透露了現今餬口飯吃的新聞勞工無法掌握生產工具與合理分享利潤之悲哀。

《大公報》在李老師心中是「近代中國報業史上『文人論政』的最高峰」（李金銓，2019，頁 437），衍生的理想新聞專業內容是為國為民、事實不容歪曲，專業態度是不恃不求、說大人則藐之。典型在夙昔，左派政治經濟學者雖心嚮往之，更關心《大公報》第一線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好奇文人論政背後倚賴的新聞資訊是如何蒐集與生產，辦報的文人對待內部底層校對排版印刷派報者是否一如對外般的公正公平公開。根據 Marx 對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批判，或許不該目眩於《大公報》生產出的文本論述商品，而忽略這些商品背後真正價值來源的新聞勞動，文人論政是表面，新聞人做工才是底蘊。文人執筆褒貶春秋之際，如何為（或不為）五斗米折腰？怎樣佈建新聞網與維持採訪關係？容不容許員工異議、組織工會、參與工運？如何擔心（或不擔心）下筆得罪內部或外部的高層？階級、性別、與族群的背景又如何影響媒體的運作與內容？自由主義所謂的新聞專業可能不只是一套「客觀的策略性儀式」（strategic ritual of objectivity; Tuchman, 1978），也是許多有意或無意的特權累積。

更有甚者，依李老師的看法，西方的媒介專業主義兩大歷史動力，十九世紀初的市場經濟與二十世紀初的進步扒糞運動，近代中國都不具備，因此《大公報》的新聞專業是以儒家為體、西方自由主義為用的「儒家自由主義」，強調良心、氣節、報恩、重義輕利（李金銓，2019，頁 439），而四不原則源於儒家道德觀，與西方的媒介專業主義「互相發明，接近之，甚至超越之」（李金銓，2019，頁 442）。實際體用結合運作的細節與問題不得而知，不過，西方的媒介專業主義是社會結構矛盾硬道理逼出來的，《大公報》的新聞專業卻是「憑良心說話」存乎一心。何況君臣父子之差序格局與非禮勿言的禮法規矩似乎與西方自由主義的個人競爭與言論自由相扞格，報社內外容許或視為理所當然的特權恐怕只會更多。辦報者自勉「不想賺太多錢，怕受到金錢的汙染」當然值得「大書特書」（李金銓，2019，頁 441），但是放在今日激烈競爭的媒體市場，不進則退、贏者全拿的殘酷壓力下，就顯得太過迂闊了。

受限於時代與社會的發展，高層知識人所辦的《大公報》難免與當時廣大的鄉村農民與工人等勞動階級脫節，即使有此自覺，《大公報》還是只能

從特定的結構位置認知世界、說他們認為的真話。儘管如此，後見之明不足以抹殺《大公報》的歷史貢獻。李老師就認為「文人論政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新聞專業化是不可逆轉的道路」，而保持儒家精神的媒介專業主義正可以補西洋同輩之不足（李金銓，2019，頁 445）。相較於左派改變結構的論調，李老師相信媒介專業主義雖不完美，仍是當前眾多批評陣營都能接受的底線，只是原本利用事實意見分離與客觀平衡報導等技術，監督資本主義社會的媒介專業主義，卻反而被資本主義運用來掩飾或合理化既有優勢（李金銓，2019，頁 64-71）。李老師身為批判性自由主義者，提醒第三世界不必將媒介專業主義「定於西方一尊」，他因此殷切盼望儒家「優秀的精神素質——以天下為己任、言論獨立、良心泰然」，能夠幫助媒介專業主義擴大格局、反敗為勝，重建「負責任的資本主義」（李金銓，2019，頁 66,70, 445）。

「以天下為己任」的文人胸懷固然偉大，捨我其誰的傳統儒家文人自信或傲慢，在當今歌頌業餘鄉民的數位年代裡倒有些格格不入。後真相的虛無主義與懷疑論使得媒介專業主義的信任度降到歷史低點，李老師的解方卻不是往左轉，尋求更基進多元的民主參與，反倒往傳統裡鑽，寄望高風亮節的道德菁英。只是知識份子追求的真話與良心，於其他人的眼耳中可能是假信息與陰謀，為人民服務（for the people）的無私奉獻恐怕會換得強加價值觀、自以為是的奚落。更危險的是，隨著中國崛起而從心性儒學轉型再生的政治儒學，宣稱理想的天下是「體現禮樂精神、王道理想、大一統智慧、三世學說以及天子一爵等儒家思想的政治體制」（蔣慶，2003，頁 126），甚至批評普世價值，要將自由民主人權還給西方，改由政治儒家制定新的普世價值，「以夏變夷」，中國的價值就成了天下的價值（葛兆光，2021，頁 194-196）。如此奪權侵略式的新儒家天下觀，搭配內外迴圈戰略與「黨與平台的統合主義」，中國不光企圖建立入吾彀中的經濟與傳播生態系統，最終還嚮往遠近大小若一、萬民仰望、萬邦朝聖、由中國主導的「天下與王道」（梁治平，2021）。二十一世紀還憧憬張季鸞與《大公報》如李老師者，肯定會失望於如此的發展，擔憂此般變質的儒家精神，不是救渡奄奄一息的媒介專業主義，而是臨危補刀、葬送新聞自由的未來。

## 伍、如果從左派重新再商榷

James Curran (1991) 認為媒體與民主的自由派概念 (liberal conceptions) 已與當代現實多所脫節，應該準備為其送葬 (a decent funeral)，儘管承認自由主義問題重重，李老師仍反對 Curran 的悲觀，他始終堅持啟蒙精神的傳統，希望能彰顯中道的開明自由派特色，相信只要威權政權持續肆虐，自由主義的傳播概念就大有可為 (Lee, 2001a, p.3)。壯哉斯言，不過，對抗威權、捍衛傳播自由的並非是自由主義者的專利，歷史唯物論批判媒體產權集中與傳播的生產條件控制，同樣抗拒市場與國家的宰制壓迫 (Macnair, 2009)。左派不一定是教條式決定論者，也不全然都愛天花亂墜的大論述，一樣可以進行中層分析，彰顯資本主義的矛盾與多種可能後果 (Meehan & Wasko, 2013)。

在李老師眼中，也許馬克思主義難脫決定論的僵化，然而崇尚辯證法與整體觀的左派只是偏好從經濟切入，探討勞動過程內外相關的具體影響因素，多元決定的特質並不預設所有傳播工作者會有一致的遭遇、認知、感受、行動與結果，反而凸顯傳播勞動過程中利用、協商、抗拒、或改變自我認同的諸多樣貌。自由主義者往往誤將「制約」(conditioned) 解釋為「決定」，令馬克思主義與政治經濟分析不白地蒙上機械化約論的罵名 (馮建三, 2003; Murdock & Golding, 1979)。鑑於自由主義鮮少質疑個人主體性的社會建構與權力運作，普遍忽視勞動經驗、性別權力關係、與多種認同交織，本文最後嘗試順著李老師的美麗意外，進一步再往左看，援引當代勞動過程理論作為概念架構以分析傳播中物質條件與文化意識的相互影響，探究左派走中道、做中層分析的光景與啟示。以下由鉅觀到微觀，試著鋪陳不同於李老師的左派理論概念與「非決定論」分析的可能性。

傳播產業的勞動現場有各自不同的技術、工具、控制、組織等組合而成的生產體制 (production regime)，這些生產體制交叉運用不同程度的「同意」與「強迫」力量，驅使人們做工。Marx 的政治經濟批判只揭發鉅觀結構邏輯下的「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production)，忽略微觀勞動現場形成

之「生產時的關係」(relations in production)，可能低估結構限制中的能動力，而勞動過程理論(labor process theory, LPT)就是企圖弭補此疏漏的中型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嘗試。

Harry Braveman (1974) 在《勞動與壟斷資本》一書中重新詮釋 Marx 的勞動價值理論，指出資本家想從生產取得剩餘價值，必須控制勞動過程，特別是設法克服專業工匠的抵抗並擴大產業後備軍，因此壟斷資本經由佔有現代科技與生產流程設計，而將工匠「去技術化」(de-skilling)，也區隔出構思勞心的管理階層與執行勞力的工人階層，再由前者實際掌控後者在生產過程中的每一步驟，兩者的關係遂從合作轉為從屬、對立。原子化的勞工難以認識集體的處境，勞工內部甚至分裂、無法團結抗爭，自動化科技更加深工人的劣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過程得以循環順暢。

勞動過程的控制是否真幫了資本積累的大忙？回顧歷史，面對資方繁瑣的科學管理，工人與工會的抗爭實則層出不窮，勞工還傳閱泰勒主義(Taylorism)流派管理相關文章以求知己知彼、思考反制措施。當勞工身後拿碼表監督的員工開始被毆打驅離時，資本家為了資本積累無礙，不得不發展柔性的控制技術，也被迫在勞動過程做出妥協，以「製造甘願」(manufacturing consent)的工廠霸權(factory hegemony)取代高壓強迫的市場專政(market despotism)(張晉芬，2011)。

Braveman 開啟了勞動過程的研究，生產控制轉變的爭辯則在 1980 年代形成第二波的理论建構，隨後因解構、後現代等思潮影響，勞動過程理論出現典範的挑戰與反省，加入身體、情緒、認同、空間、流動等議題與分析面向。當代的勞動過程理論不僅認為資本積累結構下的勞動過程擁有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可以緩衝調適結構與能動性之間的緊張矛盾，幫助「掩飾與取得剩餘價值」，還主張勞動現場形成之「生產時的關係」雖受結構性「生產關係」的限制，卻可能因具體時空而新生的(emergent)經驗，回饋引發「生產關係」的改變(Burawoy, 1979; Thompson & Smith, 2010)。例如：大眾傳媒體中階主管會因勞動現場與第一線媒體工作者的實際關係，決定採取資方/統治者或勞方/被統治者的立場身份；自媒體或社群媒體的工作者也會因現場協做或群眾參與，而改變他與其他工作者的部分「生產關

係」。另外，政府的管制措施、資源分配的政治介入、不同媒體部門之間的生產政治鬥爭、勞動自主性的多寡、與工會參與經營決策的深淺都可能影響「生產關係」。勞動過程理論源於馬克斯主義，原本只是補其不足，採納多元決定論後，如今已自成一家之言。

勞動過程理論流派雖多，但是核心概念不變，都是衍生自資本積累邏輯下勞動力轉化為勞動的不確定性與危機管理，主要論點有四（Thompson & Vincent, 2010, 48）：

（一）利用勞動產生剩餘價值是資本積累的關鍵，因此勞動現場的勞資關係是分析焦點。

（二）雖非完全的經濟決定論，資本家仍受資本積累邏輯的結構限制，影響資本家組織、授權、獎懲勞工的意願與能力。

（三）有時單憑市場機制無法順利轉化勞動力為勞動，因此資本家必須利用許多控制手段以系統地管理勞動的不確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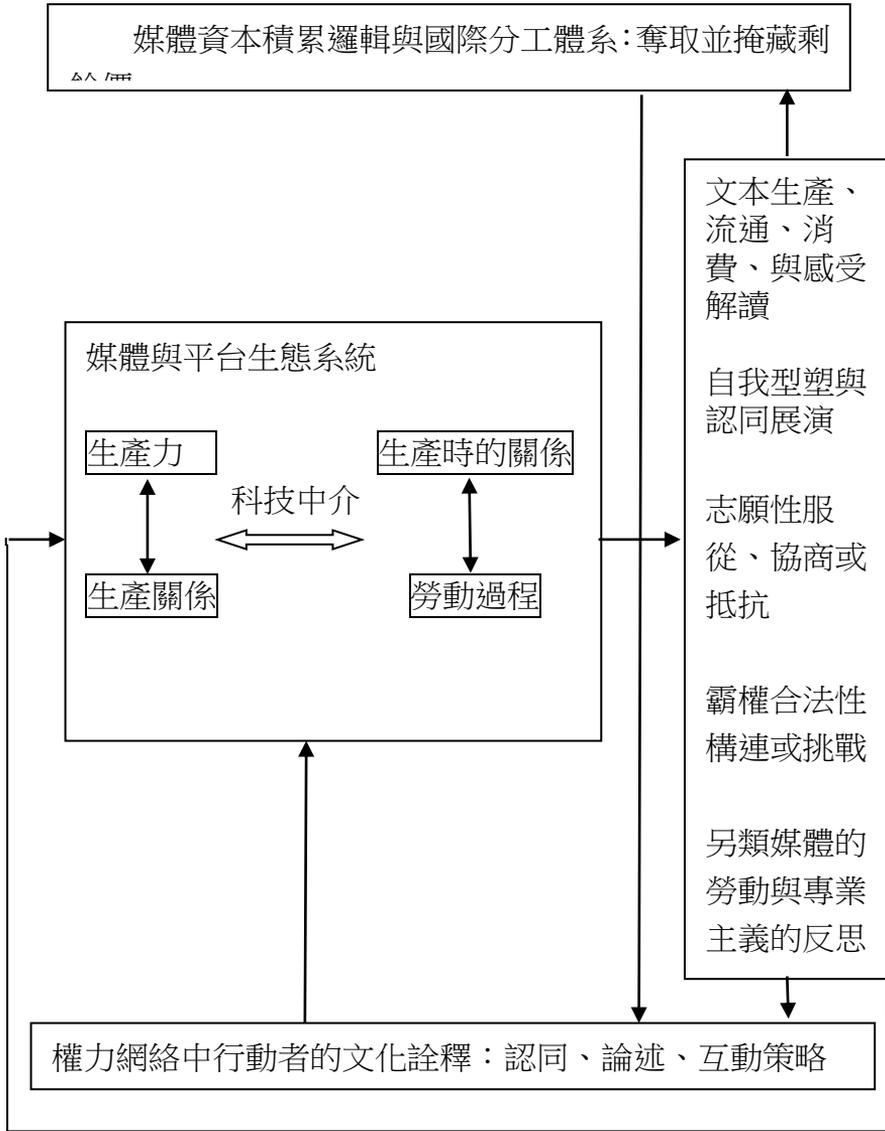
（四）剝削與控制勢必造成勞資衝突，為了順利奪取剩餘價值，資本家有時也要依勞動現場需要而妥協、合作、讓步、轉進。

回應解構、後現代與新經濟等論述，當代的勞動過程理論更注意勞動的各種彈性變形，也更細緻地處理流動場域與多重認同之間的勞動控制與抵抗。可惜台灣勞動過程研究很少觸及傳播領域，多環繞在 Michael Burawoy 的論述上分析製造業與服務業，呼應或質疑生產體制的安排與勞工「志願性服從」的機制（柯志明，1993；謝國雄，1990, 1997, 2013）。

當代勞動過程理論聚焦於勞動現場各式各樣的階級鬥爭形式，也正視抗拒、收編、甘願、壓迫等鬥爭結果，拒絕傳統馬克斯主義階級鬥爭的必然性與單一性，但也反對後現代主義有關階級鬥爭沒落、意識型態終結的天真宣言。目的是發掘正式制度下隱藏的非正式關係與衝突，藉此描繪與比較不同場域的實際勞資競合樣貌，並分析性別、族群、國家等與階級相關、交錯的影響，提供未來團結、動員勞動階級、建立正義社會的基礎。綜合言之，圖一是初步建議的分析架構。

如今資本積累戰場已經從工廠職場擴張到身體、情感、私領域、親密關係、與數位溝通層面，一方面原本互相分享與自我表達的線上行動被商品化為可交易買賣的勞動力，而且一如女性家務勞動，這些新戰場的勞動幫助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卻被視而不見與低估（陳志賢，2017，2018）；另一方面，這些商品化與勞動力轉為勞動的過程常常破綻百出、啟人疑竇，無法完全掩飾剩餘價值奪取的冷酷無情，反而引發反感、掀起抗拒（Skeggs, 2010）。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新經濟的核心不再是具體的勞動（embodied labor），而是不具體的情感（disembodied affect），私密身體情感交流互動屬於道德經濟範疇，不合乎資本積累運作邏輯。情感的投資、維持、擴張、實現、與認可自有一套規則，不同於資本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想像，這套另類規則已經在一些文化場域中實踐，更在網路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身上體現（Arvidsson & Colleoni, 2012）。因此，傳播工作者的勞動過程分析不能只批判資本主義的剝削，也要探索另類勞動、互動、與認同的限制與可能（Fuchs & Mosco, 2012）。

圖一：媒體產業勞動過程之分析架構



除了勞動過程中勞資互動的行動中介外，資本積累的结构樣貌還必須透過結構中行為者的文化詮釋方能具體展現（謝國雄，2013）。Braverman自限在客觀勞動條件的分析引發隨後勞動過程理論圈是否該彌補主觀條件

的爭議，雖然勞工在勞動現場的怠工摸魚、自創工作方法、與情況的自主裁量判斷都已經展現主觀因素的作用，真正重視認同，視之為規範控制策略，主要是源於 Michael Foucault 與英國 Manchester School 勞動社會學相關研究的影響 (Marks & Thompson, 2010)。分析勞動現場中認同建構與歸因的各種方式，有助於瞭解勞動過程的文化與經濟特徵，更能深入探究結構限制與改變的可能。

利益與認同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在各勞動現場以不同的方式糾結交錯，有時和諧一致，有時矛盾衝突，有時優先順序明確，有時互相建構影響。勞動階級由身處的利益位置發展認同，也常透過認同的眼光以定義自身的利益，Marx 認為價值由勞動決定，但是什麼是勞動還是得依賴文化詮釋，只有綜合利益與認同才能瞭解勞動現場的行為與互動 (Marks & Thompson, 2010)。勞動過程理論衍生的認同分析因此是社會性與物質性的觀點，視認同為爭取、挪用象徵性資源的一項工作 (identity work)，而非心理主觀的抽象狀態。

受 Foucault (1977, 1978, 1980) 影響，勞動過程理論也認為，認同是多元、流動的戰場，是論述規訓與自我反身 (reflexive) 思考詮釋的拔河角力結果。不管是宣揚人力資本投資的新自由主義或是高唱新中國夢的愛國主義，統治階級常以某一認同加諸勞工身上，遮掩剩餘價值的萃取，以避開勞資對立。有些媒體工作者擁抱勞動體制，以「認份」或「男尊女卑」來解釋利潤分配不公與職場歧視，或以「顧全大局」合理化新聞專業的妥協棄守。但是其他人仍可能在結構矛盾、制度破綻、多樣主體位置的縫隙中察覺、看穿勞動剝削與政治宰制，甚至透過工會、社運、另類媒體等建構對抗性或協商性認同論述。媒體工作者的認同包含複雜的象徵性與物質性資源，反映個人生命史、集體經驗、與反身性付測計算，與勞動過程既相關又獨立，分析媒體的勞動與互動，不能忽略其中的行動者如何看自己、說自己，更不能不注意認同的自我敘述與再現對勞動與互動的影響。

認同是一項工作、一個戰場，意味著個人必須持續主動經營、做出因應現實資源的抉擇。儘管認同可以是多元流動的，某些時空與行動現場條件限制下，行動者會反身性地思考如何在公眾之前呈現自我的認同較為適合。

當代勞動過程理論援引 Erving Goffman (1959) 有關自我呈現的印象管理論 (impression management)，將勞動現場當成「前台」(the front)，具體分析勞動者經常扮演的角色與戲碼，如何演給自己看、演給其他勞動者看、也演給資本家與者看。透過這些表演，演出者與觀看者一起定義所面臨的情境 (defining the situation)，也經由情境定義的破壞與糾正恢復，勞動現場的遊戲規則再次獲得確認。不按劇本演出或隨意即興表演，輕則尷尬、丟臉，重則接受責備、懲罰，甚至隔離、排除。勞動現場「前台」的意外反而透露政經關係不對等的常態 (Ashforth & Kreiner, 1999)。

認同是自我與社會結構之間聯繫的橋樑，也是自我與社會結構之間關係的敘說、再現，在傳播工作者的勞動與互動中，認同展演既是手段、亦是目的，既是前台、亦是後台，既是自我抵抗結構的基地、亦是結構馴服自我的利器。當前勞動過程的控制逐漸由舊有強調企業文化、組織認同的規範控制，轉向鼓勵差異、歡樂、自我的新規範控制 (neo-normative control) (Boltanski & Chiapello, 2017)。與其強制要求來自各地、背景各異的彈性組合勞力變成標準化的媒體人，當代的資本控制利用勞動者職場外既有的價值、特色與認同，順勢利導使其配合組織目標，自動、甘願地完成勞動要求。以往被視為後台的情緒、慾望、身體、性、親密關係、生活形態等因素，總遭排擠壓抑以免阻礙前台工作，如今媒體與平台管理者張臂擁抱傳播工作者個人特質，引誘她/他們以「做自己」(be yourself) 的方式快樂自由地勞動，資方袖手旁觀、等待收割成果，成本更低，生產力卻更高，勞資皆大歡喜 (Sturdy, Fleming, & Delbridge, 2010)。勞動現場的舊規範控制只明白規訓勞動者的前台表演，而新媒體情境的規範控制將不知不覺地延伸包含前台與後台，傳播者全身上下裡外皆投入工作成了新世紀資本積累的福音。

新自由主義經濟下傳播產業要求工作者一人多工，動員自己的社交網絡找新商機與協力完工，運用數位社群平台進行互動以表演自己與推銷作品。傳播工作者從事的不只是生產傳播商品的勞動，還有無數衍生勞動，包含：分享勞動、情緒勞動、身體美貌勞動、自我形塑勞動等等，為了累積自身的象徵性資本，甘願、甚至樂在其中地工作。

傳播工作並非純然人與事/勢的交會與選擇，而是鑲嵌在資本主義、父

權體制、政治意識形態中不斷更新改變生產力的過程，即使如此，結果仍非事先命定，需取決於媒體生產時的控制、抵抗、與甘願，交換時的社群共識、互信、與操弄，互動時的認同、論述、與戲碼。以上不自量力的野人獻曝，僅是嘗試再往左看，尋找可能走中道的左派觀點。博學的李老師長期耕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然走出一條屬於他的傳播研究途徑。典範在前，崇敬之餘更形汗顏。相較而言，台灣左派的傳播政治經濟分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基礎的工作要做，而這些知識雛形的萌芽或多或少都要感謝四十年前他帶來的美麗意外。回顧李老師的所來徑，期盼與他甜蜜交會的左派，也能學習他務實勿虛、兼容並蓄的治學態度。

## 參考書目

- 李公明（2008年12月28日）。〈文人論政 – 中國現代史的另一種讀法〉。  
《時代週報》（廣州）。
- 李金銓（1981）。《大眾傳播理論》。台北：三民。
- 李金銓主編（2008）。《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台北：政大出版社。
- 李金銓主編（2013）。《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李金銓（2019）。《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台北：聯經。
- 李金銓（2022）。〈在地經驗，全球視野：國際傳播的文化性〉。李金銓編著，《「國際傳播」國際化》。台北：聯經。
- 何丹、徐鑫（2021）。《中國基本盤：雙迴圈下的經濟新空間》。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
- 柯志明（1993）。《台灣都市小型製造業的創業、經營與生產組織：以五分埔成衣製造業為例》。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徐佳士（1966）。《大眾傳播理論》。台北：正中出版。
- 馬得勇、張曙霞（2014）。〈中國網民的「左」與「右」〉。《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42: 86-103。
- 陳世華（2017）。《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陳志賢（2017）。〈新盲點辯論與賽伯人商品生產：數位使用者的勞動、剝削與抵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3: 65-129。
- 陳志賢（2018）。〈數位媒體與社群平台使用者之勞動分析〉。《資訊社會研究》，35: 13-50。
- 梁治平（2021）。〈想像「天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陳宜中編，《大國的想望：天下主義、強國主義及其他》（頁77-184）。台北：聯經。
- 張晉芬（2011）。《勞動社會學》。台北：政大出版社。
- 張泰蘇（2019）。〈比較法在現代中國的發展〉。《法治史研究》，36: 213-248。
- 敦誠（1992）。〈再思考“傳播帝國主義再思考”〉。《當代》，78: 98-121。
- 馮建三（1992）。《資訊、錢、權：媒體文化的政經研究》。台北：時報。
- 馮建三（2003）。〈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的發展〉。《新聞學研究》，75: 103-140。
- 葛兆光（2021）。〈異想天開：近年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陳宜中編，《大國的想望：天下主義、強國主義及其他》（頁185-228）。台北：聯經。

- 楊冰柯 (2015)。〈評李金銓《超越西方霸權》〉。《新聞研究導刊》，6(7): 183。
- 蔣慶 (2003)。《政治儒學》。北京：三聯書店。
- 謝國雄 (1990)。〈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 11-54。
- 謝國雄 (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謝國雄 (2013)。《港都百工：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Milanovic, B. (2019 / 陳松筠、孔令新譯, 2020)。《只有資本主義的世界》。台北：商周。[ *Capitalism, alone: 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rvidsson, A. & Colleoni, E. (2012). *Value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on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Society*, 28(3), 135-150.
- Ashforth, B. & Kreiner, G. (1999). How can you do it? Dirty work and the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a positive ident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2), 413-434.
- Boltanski, L. & Chiapello, E. (2017).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Braveman, H.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urawoy, M.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ng, Y. (2007). Labor contract law: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China Labor*, 7, 6-9.
- Clarke, S. (1991). The state debate. In S. Clarke (Ed.), *The state debate* (pp. 1-6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Curran, J. (1991). Mass media and democracy: A reappraisal.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 82-117). London: Arnold.
- Curran, J. & Park, M. J. (eds.) (2000).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UK: Routledge.
- Flew, T., Ren, X., & Wang, Y. (2019).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hina: The digital turn. In S. Cunningham and T. Flew (Eds.), *A research agenda for creative industries* (pp. 164-178).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Y: Pantheon Books.
-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ume 1*. Random

- House, Inc..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By C. Gordon ) Brighton: Harvester.
- Fuchs, C. & Mosco, V. (2012). Introduction. In C. Fuchs & V. Mosco (Eds.), *Marx is back: The importance of Marxist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oday* (pp. 127-140). TripleC: 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http://www.triple-c.at>) 10(2), 127-632.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Golding, P., & Murdock, G. (1991). Culture,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Mass media and society*, 2(1), 15-32.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N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Habermas, J. (1975). *Legitimation crisis*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Hall, S. (1983). For a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 *Australian Left Review*, 1(84), 38-43.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s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esmondhalgh, D. (2022). The infrastructural turn in media and internet research. In P. McDonald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 industries* (pp. 132-142). London, UK: Routledge.
- Hong, Y., & Wang, W. (2016). Embracing communication: China's post-2008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labor. In R. Maxwell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pp. 107-118 ). London, UK: Routledge.
- Keane, M. (2013).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hina*.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Lazzarato, M. (2014). *Signs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translated by Joshua David Jordan). Los Angeles: Semiotext(e).
- Lee, C. C. (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Lee, C. C. (1993). "Spark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38, 1-38.
- Lee, C. C. (2000a). China's journalism: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social theory. *Journalism Studies*, 1(4), 559-575.
- Lee, C. C. (2000b).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Lee, C. C. (2000c). State, capital, and media: The case of Taiwan. In J. Curran and M. J. Park, (eds.),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pp. 124-138).

- London, UK: Routledge.
- Lee, C. C. (2001a).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media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 *Javnost-the Public*, 8 (4), 81-102.
- Lee, C. C. (2001b). Beyond orientalist discourses: Media and democracy in Asia. *Javnost-The Public*, 8 (2), 7-20.
- Lee, C. C. (2003). The global and the national of the Chinese media.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1-31.
- Lee, C. C. (2015).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ee, C. C., He, Z., & Huang, Y. (2006). 'Chinese Party Publicity Inc.' conglomerated: the case of the Shenzhen press group.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8(4), 581-602.
- Lee, C. C., He, Z., & Huang, Y. (2007). Party-market corporatism, clientelism, and media in Shanghai.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2(3), 21-42.
- Liu, Z. X. (2012).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rural broadcasting content in China. *Youth Journalist*, 30, 25-28.
- Macnair, M. (2009). Marxism and freedom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37(4), 565-577.
- Marks, A. & Thompson, P. (2010). Beyond the blank slate: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at work. In P. Thompson & C. Smith (eds.), *Working life: Renewing labor process analysis* (pp. 316-33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eehan, E. R., & Wasko, J. (2013). In defence of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Javnost-the public*, 20(1), 39-53.
- Miliband, R. (1977). *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 R., & Liao, J. (2011). Wage increase: Requiremen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China Labor*, 7, 7.
- Murdock, G., & Golding, P. (1977).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J. Curran, M. Gurevitch, & J. Woollacott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pp. 12-43). London: Sage.
- Golding, P., & Murdock, G. (1979). Ideolog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 In M. Barrett, P. Corrigan, A. Kuhn, & J. Wolff (Eds.), *Ideology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pp. 198-224). London, UK: Croom Helm.
- O'Connor, J., & Gu, X. (2019). Creative milieu in China: 'Disjunctur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L. Lim and H. K. Lee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Asia* (pp. 177-192). New York, NY: Routledge.
- O'Kane, C. (2014). State violence, state control: Marxist state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iewpoint Magazine*, 1(4), 72-98.
- Skeggs, B. (2010). The value of relationships: Affective scenes and emotional performances. *Feminist legal studies*, 18(1), 29-51.
- Sturdy, A., Fleming, P. & Delbridge, R. (2010). Normative control and beyond in

-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 P. Thompson & C. Smith (eds.), *Working life: Renewing labor process analysis* (pp. 113-135).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Thompson, P. & Smith, C. (2010). Debating labor process theory and sociology of work. In P. Thompson & C. Smith (eds.), *Working life: Renewing labor process analysis* (pp. 11-28).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Thompson, P. & Vincent, S. (2010). Labor process theory and critical realism. In P. Thompson & C. Smith (eds.), *Working life: Renewing labor process analysis* (pp. 47-69).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Thussu, D. (2018).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a: The global context. In D. Thussu, H. de Burgh and A. Shi (Eds.), *China's media go global* (pp. 17-33). London, UK: Routledge.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Wallerstein, I. M. (1999).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Wasko, J., Mosco, V., & Pendakur, M. (Eds.) (1993). *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 Essays honoring Dallas W. Smythe*. Westport, CT: Praeger.
- Weber, M. (1978).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oration. In W. G. Runciman (Ed.),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pp. 111-131).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ehle, S., & Rossiter, N. (2016). Mediations of labor: Algorithmic architectures, logistical media, and the rise of black box politics. In R. Maxwell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pp. 40-50).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The beautiful accident of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Marxism walking the middle way without guarantee

Chih-hsien Chen

### ABSTRACT

The interest in the leftist approaches withi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aiwan was sparked accidentally by Professor Chin-chuan Lee’s publication of a textbook o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forty years ago. Since then, this textbook had fermented analyses of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debates around media imperialism between the Left and the Right illustrated in his book were so rare to be seen in the atmosphere of anti-communism of the early 1980s that such a simple textbook had turned out to be a precious window to the view of the Left. For an erudite scholar like Professor Lee, this textbook as well as his PhD thesis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are nothing but a beginning of a productive career. However, given that there was only negative image of Marxism before, it may be worth following Professor Lee’s vision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into the possibilities and impossibilities of the Left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paper thus reexamines the rol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Professor Le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with the focus upon his evaluation of Marxism, state-and-class relationship,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platforms, media labor and professionalism. In addition to that, taking the risk of attempting too much, some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theoretical potentials revealed by the Left but downplayed by him are tentatively highlighted.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Marxism, the state, class, media professionalism

---

\* Chih-hsien Chen,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viking@nkust.edu.tw

## 台灣解嚴前後之傳媒盛事的觀察者： 李金銓為言論事的驚異奇航之旅（1982-1999）

程宗明\*

### 本文引用格式

程宗明（2022）。〈台灣解嚴前後之傳媒盛事的觀察者：李金銓為言論事的驚異奇航之旅（1982-1999）〉，《傳播、文化與政治》，16:87-113。

---

投稿日期：2022 年 7 月 31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11 月 2 日。

本文曾發表於 2022 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專題線上座談(2-3A)：李金銓與西方傳播理論的引進與在地化，6 月 18-19 日。

\* 作者為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研究員，e-mail: RND6156@pts.org.tw。

## 《摘要》

本文以親身觀察，論述台灣出生的領導性華人傳播學者李金銓之影響力。時間剛好扣合李氏本人論說，進入台灣校園的起點。就是 1982 年其著作《大眾傳播學》被台灣出版機構所刊行，同時列入大學教科書。以該年入學之大一生而論，因必修的體驗，產生驚異奇航的教育過程。此雖為早熟的研讀，但對台灣民主抗爭逐漸高漲的局勢來說，該書反而在各種不同學以致用的環境，散布出難以言喻的影響力。

李氏的時代之眼，又為台灣解嚴前後發展留存強大紀錄，衝撞此一時代框架。經過一番沉潛，以中英文論述，以台灣為例，作為東亞傳播民主化過程一個重要個案，分別從報業與雜誌、小眾傳播錄影帶、第四台與有線衛星電視、及公共電視，表達他自博士論文寫作以來，關心台灣傳播問題之時潮下的淑世心聲。

**關鍵詞：**傳播理論、解嚴、有線電視、公共電視

## 壹、時代的揭幕

1983年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外銷出口的導向，成功數年後，遇上經濟的低迷，又遭逢勞基法立法通過，當時的景氣令人灰心，但是還不至於絕望。此外，台灣面對黨外政治勢力之崛起，現有國民黨威權政府仍執著於意識形態的治國建構，在政治立場上堅稱萬山不容一溪奔流，只見對峙態勢逐步高升，難測未來的對抗局勢是否會一發不可收拾。

作為一個以自由主義為核心價值的新聞學系教育，如何與這種號稱「自由中國」又管制新聞與思想自由的校園，來取得價值平衡，這真是一個極為受震盪的局面，隨著時日發展，逐漸衝撞。當時，置身於大學教育的氛圍中，成長主要分成兩大走向：「認真讀書，加入黨國，平步青雲」；另一種就是「逸樂導向、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保證財富人生」。取其外一條路而行者，幾乎在人生的福華與校園的嘉許預期下，都陷入一種不確定的狀態。與理工、哲學、文藝、與體育科系比較，大眾傳播類同於政治學之鬻官論世一般，隨時可以質問統治當局帶給國度如何的遠景，而且是一種隨學研日深、越得晉升批判之準度。

1982年至1983年間，台灣的傳播教育已經形成「九校聯誼」之規模，排除了南部，充分展現威權時代國民黨政府的資源配置思維，不會注重「南北平衡」而複製內在依附發展 (dependent development)，讓台北的國立大學，特別是政治大學新聞學系之資源，放射狀地提供資源給私校的大眾傳播學系體系，當時以剛成立的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就是一個顯著的個案。

延續既有模式，當年政大老師輸出的核心課程，均會使用在黨國體制中可被見容的美國行為主義 (behaviourism) 與行政學派 (administrative school) 為宗旨的各種改寫或翻譯的傳播理論文獻，舉例來說：李茂政之《傳播學》、鄭貞銘之《傳播原理》、祝基滢的《大眾傳播學》及祝振華翻譯《大眾傳播學》(以上僅是幾個範例，當然源生來看，都難超越徐佳士所著《大眾傳播理論》)。

本文作者，在這個歷史時刻，十分特別的際遇，與學者李金銓學思產生對話之關係。1983 年入學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由於前任教師潘家慶，因不能認同大一學生研習理論基礎課程而請辭，於是系方臨時聘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的講師羅超華（刻在新聞局服務），擔任執教者。羅超華以研究所的歷練為準（羅本身為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畢業），選擇了當時李瞻主編的政大新聞叢書出版的系列，推薦了李金銓的《大眾傳播理論》作為大一教科書，這今日來看實在為一個大膽的實驗教法，對於無尚社會科學基礎與程度的私校大一新鮮人，是一種文化衝擊 (cultural shock) 的效果。本文，由此出發。

圖一：1983 年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原理》課綱

課程綱要	
大眾傳播學	傳學一甲
第一講 緒論	以大眾傳播學的問題
第二講 傳播的秩序	以傳播過程的學衍與之
第三講 傳播的結構與功能	以大眾傳播與傳播
第四講 傳播者	
第五講 受傳者	
第六講 傳播過程	
第七講 大眾傳播的效果	
參考書目：(中文部分)	
一	大眾傳播理論 徐保堉 台灣商務印書館
二	大眾傳播學(公共媒介) 李金銓 政大新聞學系印行
✓ 三	傳播·信息與人 余英時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四	大眾傳播學 魏思賢著 台灣商務印書館
五	大眾傳播學 李茂波著 時報文化出版
六	大眾傳播的未來 徐保堉編譯 新華書局出版
✓ 七	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 潘世榮著
英文部分	
1.	Men, Messages,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 by: Wilbur Schramm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2.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by Wilbur Schramm and Donald P. Roberts 71/Revised Ed.
✓ 3.	Foundations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by Kenneth K. Sereno & C. David Mortense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4.	Mass Media Systems & Effects by W. Phillips Davison, James Boylan & Frederick T.C.Yu 1976, Praeger Publishers, Inc.

## 貳、從主流論述的場域開打

在仍強烈馴化的 1980 年代左右，一般高中的教育鮮少給予社會組批判的思考空間，但是校園卻容有一群比較異議的份子，會去閱讀魯迅、巴金、胡適、殷海光等論著，不過以當時大學聯考分四組而論，這類人也多追尋丁組的法政而去，能留在乙組文史類之青年甚少。因此，這本傳播學理論的新取向，如何刻印在一群白紙的「白色恐怖」影響下的世代，其實很值得存疑。

那個時代，初接觸到《大眾傳播理論》一書，可謂天書般的騰空之作。的確，當下閱讀應該就是一種中文的思想遊記，多半墜入玄虛之中，但是好如「長尾」理論的意義，每每在日後不同學期有來自其中印象下的回響。

這本書引述進入一個時代的背景，就是傳播理論是美國的，而且引領我到一個很不熟悉的世代，似乎黯淡中經濟大恐慌、歐洲的反猶太移民浪潮、羅斯福新政的翻轉，這個一組三元素的拼貼，認識到傳播理論開山的四大始祖。但是第五大才是更決定性，就是宣偉伯 (Wilbur Schramm)，當時我也唸過台灣其他論著，應該被稱為施蘭姆，兩者都是相當陌生的翻譯名詞。直到三年後，讀了 Todd Gitlin 的名作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這些人的故事才躍然紙上，這就是李金銓本書之後效的寫照典型。

不過這本書，相當訝異的從一開場，就把目光移到「傳播者」自身的研究，第二章概論「守門人」的專業意理，就不斷進入眼簾，好像對我們一種新聞魂的招喚，從此對於記者的憧憬多了一份自負。同時，在這番的討論中核心的議題，就是「中立者」與「鼓吹者」兩者身分，從這裡揭開「客觀理性」與「介入改變」兩種專業意理的長期辯論，特別是往後數年，在校外風起雲湧的民主爭取，而校內各種刊物實習發聲的串連下，成為最實際的激辯立論所在。

另外一個專有名詞為「新聞室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in newsroom)，裝備一種對未來的職場處境的抽離眼光，可以處於其中，又騰乎其上的參與式研究觀點 (participatory approach)。這方面的論述，也在同期政大《新聞學人》與政治作戰學校的黃新生論著中持續出版與討論。

接續的內容以傳播組織、體系、傳播科技革命一系列展開，本書在這裡對於傳播的理念探討，鎖定機制與系統 (institution and system) 觀點作為發揚，實屬少見。但是，這方面討論，其實是本國忽略了社會、經濟、經營、技術等角度考察的結果，換句話說，李文的超眼光與其說標新立異，倒不如說幫台灣井底開天窗，更進一步說這些都屬於政治性 (politics) 與政治化 (politicization) 的社會建構指標，探討此類話題，其實也非威權當局所好與所支持，李氏在香港的居住隔離事實，還是有一種大膽論述之意圖。

李氏的教科書在當時大專院校使用同時，與其在他領域發表論著可收相得益彰的效果，舉例而言，1984 年 1 月 6 日，聯合副刊推出居安思危十日談系列，第七帖就是請李金銓對談〈當前大眾傳播的危機〉。這篇文章，用較短篇幅，濃縮了傳播理論前五章與後三章之精義，保留第六章受眾效果而未論。

圖二：傳播理論出版後在聯合報的首次受訪



他先舉出，台灣在現實上即將面臨的傳播科技挑戰，含有線電視（驟生機，拖延十年）、錄影機（無懼關稅而普及）、電腦（五年後突然猛進發展）、小眾媒體（五年後突破性擴張境界）。同一脈絡而論，他認為傳播科技的本質

雖為中立，但是因為使用者的私心，所以創造出的問題比解決問題還多，李氏論點就是科技進步的黑暗面，必須高度警覺，不能一廂情願擁抱之。

此外，他繼續表達傳播權的控制 (control) 問題更須關注，引述 Herbert I. Schiller 的研究觀點，所謂 500 家大公司 “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 壟斷了資訊的生產與分配，警示大家必須對於「資訊世紀」概念作條件性考察與接納。話鋒一轉，李金銓在訪問的最後，回到電視問題。他雖說沒有長期在國內，但是仍以制度面考察為衡，說出幾句核心診斷：

- (一) 缺乏電視的主張
- (二) 形成最可議的寡頭壟斷 (三台)
- (三) 內容脫離現實、蒙蔽人生、標榜浮華奢靡
- (四) BBC 為榜樣很理想，基於文化背景差異不容易在台灣實行，不知香港電台 (RTHK) 作法不落俗套可否參照

這一篇文章，幾乎就是他的理論書的濃縮精華，而且最後這四點建議，幾乎等同對「威權政權的電視政策」之宣戰。這裡可以看出，當年發表報紙文章的社會化作用，比較快速與精準。另外，海外身分比較可以提出政策建言，而不被安全單位 (警備總部) 所騷擾。李氏對三台的批評，等同「操作型定義」當時黨外雜誌對於台灣電視的批判，所謂營造「逸樂取向」的愚民策略。如果這是在課堂上，進行實地講授的言論，難保不受到學校人二部門的約談。

撇開政治性的意義詮釋，李氏著作在第十二至十四章的最終教導上，的確有開天闢地的國內教學效果。以「帝國主義」這詞，最具破壞力。的確這三章雖然談著一個「國家發展」的恆常三十年的研究辯論，但是前者四字最為吸睛，甚少出現在偏右意識形態的保守學府殿堂之上，相關內容，所引發的重大思想衝擊之先聲 (早先於其他基礎社會科學之教育)，有以下數項：

- (一) 中心與邊陲 (出自華倫斯坦學說，屬於社會學領域)
- (二) 第三世界 (屬於國際關係領域)

- (三) 文化侵略 (美日影響的攻防, 左右兩派各自逢源之理論)
- (四) 移情能力 (empathy, 心理學)
- (五) 完形心理學 (社會整體大於個體的總和, 心理學)
- (六) 資訊自由暢通 (Transborder Data Flow, TDF 之研究熱潮)
- (七) 產品生命循環 (product life cycle, 研究所之國際經濟發展的相對利益之說)
- (八) 軍事—工業結合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近代地緣外交與政治經濟批判)

李氏在這本教科書的最後, 安排了「政策」一章, 顯然寄寓學生研習之終, 能爬升到「規劃」面 (design) 的高度, 他以第三世界弔詭為結語, 似乎不比一般逐漸興盛的政治運動來得直接, 如推翻國民黨專政、追尋台灣文化主體性、回到本土在地研究典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等, 但是指出知識分子的關鍵角色、傳播科技的辯證演進、動員群眾對民主參與之間的矛盾, 論者似乎期待一場政策運動, 相形之下就是一種溫和漸進的改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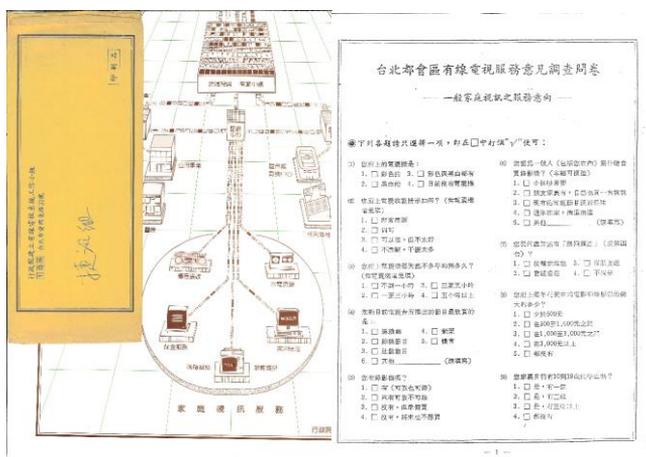
究竟, 這種溫和改良 (incrementalism) 建言, 在當時抗爭將雲湧前夕, 視為「狗吠火車頭」的痴人夢囈, 還是一種「積極的反叛」但必須逃躲「威權」的鎖定追殺的遁術, 在當時應該看法頗為兩極。不過, 李氏在此「匠心獨具」提出, 台灣電視問題應該只保存一家「公共電視公司」, 下設商業與文教兩台, 做良性與互補競爭合作, 這種建議, 似乎有一點跡象, 直指 2000 年後改革趨勢的必須選項之雛形。

這一場思想生動的一學年課程 (大眾傳播原理), 也促興了兩次觀察台灣傳播動態的現場, 一個為選舉的心理動力模式的考察, 全班以「1983 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為例, 直接至政見發表會現場觀察與訪問, 了解人際傳播 (政見發表會、政見單張) 與大眾傳播 (報紙) 在勸服上的效果比較; 這次除了黨外勢力逐漸成長與曝光度, 選後國民黨在台北市大獲七席全勝 “7up”, 而黨外因為「雞兔同籠」的內鬨, 導致只有一人 (江鵬堅) 選上, 成為一個選舉歷史的著名事件。

另一次場域觀察, 則是 1984 年春, 拜訪傳播機構。經選定以「有線電

視與今日社會」為題，做文獻分析的報告，該作業並且要求配合主題執行一次小型問卷調查 (survey)；經過討論與研析，決定前往位於交通部電信總局在愛國東路之辦公室，與「建立有線電視系統工作小組」接洽，並索取他們設計的調查問卷「台北都會區有線電視服務意見調查」。攜回後，從同學的家戶與親戚中做立意抽樣調查。這次經驗更為寶貴，以當時政治氣候來論，大學生與官方機構之往來甚有門檻。結果，難得之交會，因該小組為行政院政務委員費驊直接督導成立，納編在電信總局的專業技術團隊下，態度開明與進取，促使學生與該小組往來獲得善意回應，很快就取得基本資料與問卷，這是原理課程實現了一次歷史上難得之研究興趣交會。從李氏大眾傳播專書的教育下，顯然「心理動態模式」藉由政治選舉傳播的測試，形成一個恆常的辯論議題，直到解嚴前達到高潮；另一方面，李氏說法中的傳播科技與社會政策之建構，引導掌握到「有線電視」這個關鍵，它承載了解嚴前必須開放或政治反對勢力巧妙挪用的社會資源，也就是產官學的焦點，讓大一新生快速地與當前傳播力目光結合，進入有線電視彰顯台灣在地傳播生態的管窺，這應是早讀李金銓之書，意外地大幅進步論政能力之所在。

圖三：有線電視系統工作小組是課堂作業接觸的第一個政府傳播單位



## 參、海外學術建言的脈絡衝撞本地政治門事件

帶著《大眾傳播理論》所內化的一些角度與未能深切理解的觀點，持續接受傳播科系的進階教育。李金銓在後續三年，仍是不能在台灣課堂上見到與親炙的老師，但是著作論說的流傳，更大開展。

1986 年李金銓回到台灣，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副教授，不同於很多早期留美的博士人才，都盡皆入了「政治大學」，他的落點很有策略的高度。簡言之，當年國內是否有真有學術自由，其實仍是一個問號？言論的紅線處，似乎可以畫出但也無從保證不挪移。之前，社會科學部門有政治領域的黃爾璇、心理學領域的蔡式淵被趕出學術圈，而經濟與報業實務領域的陳玉璽，經年無法回國任教。當然，如果參加了黨外政治運動的學者，必然無法論足於專任教職。早已有成的國立大學教授，雖可涉獵黨外政治，但是要去大學做演講活動上，仍受百般刁難（如李鴻禧）。這都屬學術界的「政治門」事件。

圖四：聯合報所附照片以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屋宇為背景



對於李金銓的位置而言，短期內不用操煩以上安全顧慮。似乎，於此他也逐步自然地介入了政治的議論，成了傳播事件的主要評論者之一。這時李氏自嘲，為南港看台灣的時代。但是反過來看，李氏加入了這場戰局，對於台灣的傳播學子來說，更為一種矚目的介入性因子 (intervening factor)。從1980年以來，在傳播問題論壇上，也不乏有自由派人士，站在國際水平或者美國觀點下，提出對政府應有的「建言」，但識趣地並未直指「認同」危機之層次，包含台灣關押與監控為數甚多政治犯、台灣打壓所有本土文化的意識發揚、以及對於中國大陸的反攻復國之荒謬性。李氏言論，如果快速回應以上範圍，安全體制的圍剿至少要做出戰事，甚至危及國內的教職。

李金銓如何迴避以上致命的襲擊，但是仍衷於原本在教科書中的意旨之傳揚，很有觀察價值。李氏在自己著作《政治的新聞 新聞的政治》曾有回顧剖析，他認為這一年當中 (1986-87)，分成三個階段參與了政治評論。第一階段談論了台灣大學的「大新事件」；第二階段談論「選舉期間媒體公信力」；第三階段談論「報禁與開放」。本文認為，第二階段的李氏言論，最為時代衝撞留下關鍵軌跡。

圖五：桃園中正機場事件後慎重地指出當時媒體的問題



正如他本人在〈是重建媒介公信的時候了——為迎接民主政治進一言〉

這篇文章的提議（發表於中國時報 1986 年 12 月 25 日行憲日特刊），等同他對於實體政治的積極參與之指標。這篇文章，以大媒體的公信力衰減為題，將 1986 年底增額立委與國代選舉時期中發生的「中正機場」事件，列入檢討。這次事件，幾乎是 1978 年「美麗島」事件的翻版，就是事後應該有集中火力鋪天蓋地的「暴民、滋擾、打警察」媒體報導，導致政治反對運作再一次全面敗退。但是劇本未如這樣編寫，其中有「自立晚報」現場完全不同的報導，還有 ENG 綠色小組場拍畫面，在各「為民服務中心」日以繼夜公開播送，讓人民知道了與主流媒體完全不同的「事實」。而且法務部調查員陶秀洪案演出，更是讓電視媒體公信力完全破滅。

圖六：自立晚報在機場事件一戰成名後緊接著請專家評論



李金銓在此一事件之後，出現在幾個關鍵發言場合。除了前者中國時報的專文，將此一事件列入關鍵的大小媒體抗爭事證，且還需要釐清真相之後續；另外在 12 月 19 日一場自立晚報邀約的「新聞報導公正性／客觀性之探討」座談會上，李首先表示機場事件各種媒體偏執一辭，電視新聞處理更是失職；第三是於一個月後的《中國論壇》登場，本期以主題〈民主要向下紮

根)邀稿談媒體的信度,李在話題與迴響之設計中於二月登場,補充之前潘家慶與林東泰的評論意見。他的想法有幾處對「強化主流媒體」的駁論:

(一) 必須先提出關照事件的具體狀況,否則談論守門行為、組織運作與媒體環境之分析將會虛空化;

(二) 自立晚報的不同報導觀點,為何賣出高達四十萬份,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問題應該已經凸顯出來;

(三) 評論對此次主流媒體刻意掩飾憲警打人之事,並無不妥,反而是要求評論者一定也要批評群眾破壞警車,才是無由之對等強求。

圖七：在《中國論壇》的媒體與選舉問題專輯中發表關鍵性的評論



第四處,就是有社會主義色彩的《人間》雜誌,於1987年1月號的專刊〈大眾傳播的龜裂〉中,以媒體反叛為名,訪問各界評論者,李再次以學術界與專業界身分受訪。他強調小眾媒體出現的價值與象徵意義,是一個社會共識的架構崩解的表徵,所以事後定要再形成一個以人基本價值為本的共識基礎,才能使民主健康前行。

圖八：在替代性媒體《人間》發表看法實屬少見



這些立論，今日來看可能無甚「新奇與反動」之處，但是以當年媒體學術當道為「國民黨威權」所掌握，李以中研院的研究員身分，又是「傳播理論」的教育者，頻頻對台灣反對政治運動給予新定位，以及肯定媒體反叛的時代意義，又出現在異議性媒體，殊為先行者（政大人中也屬少見）。

不過，又非只有努力在政治評論層次，同一時間，1987年5月，將近中研院客座滿一年前，李金銓發表另一篇雜誌評論，名為〈傳播理論與新聞實務之間〉於《中國論壇》之上。這篇文章頗有「紅海洄瀾」之勢，釐清我們一些對於傳播學術的想像。文章中一系列的探討，其實回應了當時傳播教育浮現的一些爭議，如：

- (一) 傳播學的獨立性
- (二) 傳播效果致力於內心機制的解構
- (三) 傳播教育的超然性
- (四) 傳播學者能夠理解大傳媒體實務嗎
- (五) 傳播學本土化的中國或西方取向

簡單說，李文對於前三者給予否定的論證，但是更貼切地說，應該是「批判性的解讀」。第四點，則是大為鼓勵傳播學者，無須自囿於媒體實務人揶揄，深入地理解 (verstehen) 才是解明的答案。李的解析，直指很多傳播名著的作者，都受個人成長背景影響了切入的角度，這種從人的生命史角度看見「學術的脈動」，在那個時候十分罕見與傳神。第五點，似乎就是回應台灣當代的學術悸動。

當年無論是「中國文化的民主實驗場」、「社會科學本土化」等這種「中研院」的語言，的確也是至高層級的討論目標。其實落實中國化同時，還有本土化的挑戰 (indigenous)，而當代了解台灣社會行為論者，是否都由實證資料基底，演繹到西方理論架構做了一個他類模式 (alternative)，結果更被學術自主性所嘲諷，這些都是一時之間難以掙脫的議論 (exogenous vs. endogenous)。李的文章，提出這些至為關鍵的議題，隨手也提供了局內人與外人的世界，以及陳寅恪的治學之道，一時之間，突然讓讀者嚮往傳播知識論的博大精深。這真是，當年一個期待轉變的傳播思維指引。與其說，李老師有先知先見，不如說他跟許多認真耕耘傳播研究思維在地化的我們，共享語言、共筆發揚。

而緊跟著五個月後，另外一篇〈電視文化何處去？處在中國結與臺灣結的夾縫中〉，也在同一處發表。當時解嚴後的台灣，所獲致的自由出版，已經開始將集中火力，對準電視媒體開始批判，這算是一個「結構化」的序曲。與其說作者認為出自原本 1980 年的博士論文改寫，倒不如說結構依舊但是內體更新。這篇文章確認「官控商營」的電視弊病化的制度，也以少見的依附性發展為台灣電視經濟行為詮釋（同一期還有黃新生的博士論文也這樣匡列）。

對於很多當時已有的電視批評文獻，李金銓將其放在中國與台灣兩種結叢 (complex) 來透視，可算一種基底 (radical) 的批判。對於當時，身處於青年階段的傳播世代，這個架構很傳神，因為我們眼見兩種新血脈進入三家電視台：第一種「外省人、國語優勢、官方意識形態傳承」；第二種「本省人、地方仕紳、大中華涵化的順從」，他們象徵的構成，顯然讓電視公司架構出在台灣仍有延伸力的霸權鐵掌。

李金銓很直接地，從理念與文獻詮釋下，將電視由一種外來自由經貿櫥窗的特權茁壯，居然可以任憑錙銖計較的唯利是圖劣質，屹立不敗之生態描摹出來。不受號稱以儒家孔孟學說五千年的中華政權份子之挾制，屢番「國有化」意圖都無法達成，反而常以感官與逸樂聲色的提供，滿足很多意淫的統治知識階級，談笑之間任理想灰飛煙滅，持續惡質輸血電視腫瘤生長下去。

李金銓還還原一個更特殊的電視面貌，就是並非理性地尋求「經濟最大化」。如果以語言與文化鄰近性而言，節目應該採取更多台語與日本戲劇播出為取向。然而，居然持續壓抑台語節目，並且限縮外語節目進口（日語根本不准）。其實，從經濟而論，還是合理化（程宗明，1999），只是一種內在殖民的次系統繁衍在台灣，也就是創生更多忠誠份子的「傳播公司」家族，以外包外製方式，讓電視公司坐擁地租，這是電視公司職員的更大「合理化經濟效益」，而政府只圖換取他們死忠支持政權就好。李文是一種結構化語言，為台灣電視產業定命，館藏在介乎學術與政治評論之間的文化性雜誌（cultural journal）論述下，成為典範。

李金銓在這篇論著中，並未提到如何從根本改變台灣商業主導電視體制，直等到 1992 年澄社發起的「解構廣電媒體」計畫進行到研究高峰之後，他開始撰寫〈台灣的廣播電視藍圖〉結論文。李氏言論在公共電視提議上，向來著眼大方向，而非小細節；管制在政治力的節制，而非群眾運動與監督團體。過去，李文對於公共電視的憧憬，多半建立在英國、日本與荷蘭，鄰近的參照國家選擇加拿大而非美國。在這個結論中，他很簡明扼要提出籌畫「公共電視」的要件：

- （一）廣電資源規劃應孕育公共廣電的發展
- （二）培養社會多元社團的代表性
- （三）維繫以人的基本價值認同的共識，讓公共與商業制度在其中合理併行
- （四）建立媒體工會制度，特別是保障新聞工作者的獨立專業自主
- （五）不受行政機關任何任命的拘束，安排在國會規範下的直接監督

以上言簡意賅，為李金銓對於「公共電視」最大篇幅的立論，從今天來

看，(2) (4) (5) 三項都如其理路，持續深化落實。但是遭逢網路媒體興起，何者是公共電視媒體的公共資源，此一定義目前急速地變遷中，所謂寬頻將取代頻譜；而維繫台灣整體人口的基本認同，更為艱辛挑戰，這一部分正是李金銓於 1990 年將研究轉移至兩岸三地的新聞媒體研究一樣重要，究竟在目前地緣政治動盪下，公共電視當協助全國人民建構如何保台民主的共識，仍有待被震盪，並期許有新生命共同體之建立。

## 肆、沉澱台灣之本土發展·春蠶吐絲「台灣模式」於全球社會

1987 年中以後，台灣邁入解嚴，媒體發展產生極大成長，也因民主開放，新興媒體陸續準備申請合法經營，連同報禁之遲來開放，呈現媒體市場爆炸之五花八門景象。隨著中研院客座之結束，但是這個身分的意義似乎並無結束，持續在台灣各種報刊雜誌投稿與邀稿後出文，而且領域擴大，從媒體到兩岸生態、中港媒體與政治皆有之。本文第三部分，要指出經過深入觀察體驗，逐漸沉澱出對於台灣這波民主化的媒體運動之思想，李金銓精心為台灣留下紀錄，而且在世界舞台上發表，致力使台灣成為第三世界依附發展下的一個獨特案例。這個行動，對於台灣傳研學界立足於國際學術圈之舞台，極為重要。

這個第一次解嚴前後的媒體歷史發展之回顧，投稿在著名的期刊書“Journalism Monographs”(1993 年 138 期，AEJMC 出版)，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台灣報業與民主變革的崎嶇故事〉(Sparking a Fire) 為名。論者以為，此為定位台灣黨外雜誌歷史的學術之作，而且是以全球觀眾為對象。

如這個特殊歷史議題所限，李金銓在開章之處，闡述台灣發展難有奠基之作 (groundwork)，使得在地經驗之收整，欠缺次級抽象化衍之文獻探討可對照。他指出，這樣台灣時期研究之引領，如同博蘭尼 (Michael Polanyi) 所言，希望靠賴一種「默會知識」架構之指引，奠基在眾多各式各樣的中文記載文獻 (回憶錄、訪談、新聞資料)，另外還有透過訪談新聞記者與政策管理執行單位，得來必須化名的綜合說法。他還使用了「黨政軍」三合一的台灣

著名統治結構，以英文所謂 *triple allianc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來描繪。

之後，精彩的台灣言論抗爭歷史英文的回顧，就展現在眼前：有自由中國的櫥窗與封鏡、出版法修正案的緊箍咒、李萬居《公論報》被傾覆、聯合中時崛起與迅速收編、文星雜誌的蕭牆內抗鬥與整肅、白色恐怖極盛中陳映真、崔小萍、李荊蓀陸續施報復予監禁。一路的打擊自由言論抗爭，鋪了蔣經國的登機之路，即至掌握權力，短暫給予《大學雜誌》一個新時代的封官授勳，之後瓦解內部來收攏自由，卻意外導出黨外勢力的先鋒。自此，黨外雜誌時代啟動了。

李文從此開始由學術論述方式，第一次為此一媒體定位，始自 1976 年的《台灣政論》，不同於前代自由主義志士爭取，該雜誌首次點出台灣化的本土運動，爭取政權合法性危機的詮釋位置。並且，雜誌出版與政治選舉貼近，亦步亦趨地發展壯大。另以《美麗島》雜誌社為例，本身也是一個政黨動員的機關。

雖然美麗島事件暫時止息第一股反對力量，但是黨外雜誌的興起，讓爭取言論與政治自由的觀眾，擴展到知識分子以外的中產階級與草根民眾，同時也使主流報業不可導報的資訊，流轉到這些雜誌有了替代性出版的意義，更形成不可取代之市場，即或政府警備總部努力查扣，也不能止息。

在八零年代的黨外雜誌市場，雖有《八十年代》作為領頭，但是過度導向議會路線，亦使陣營內部產生激辯，另外生成群眾路線的雜誌，強調「雞兔同籠」的荒謬，要求更激進的行動路線。

值此挑戰，蔣經國的黨羽王昇成立劉少康辦公室，意欲更集中火力打擊民主抗爭，結果於「陶百川圍剿」事件踢鐵板，被自由主義的報業反擊，但是集結力量再圍剿也使余紀忠的《美洲中國時報》櫟羽而歸。但是少康辦公室接連出錯，造就十信事件、劉宜良槍殺案、逮捕李亞頻報老闆案，都激怒美國勢力，導致辦公室瓦解。蔣經國認識到回歸民主的必要，決定解嚴與解除報禁。1988 年逝世之後，台灣的確展開新頁，黨外雜誌的追求目標雖達成，但是不擇手段的報導出招，導致公信力下降，也因著開放逐漸喪失影響力，被新起的報刊集結到各種社會支持力，而逐漸沒落，恢復主流媒體的政治傳

播功能，終被取代。

李文最後以四項主旨討論，來定位這段台灣言論爭取史。很值得延續辯證思考：

（一）小眾媒體與社會運動—對比第三世界的游擊隊媒體或者激進媒體，台灣黨外雜誌能否作為一種替代性媒體制度，最後是促成民主的勝利成功，還是自身羶色腥的政治報導作為退場？而綠色小組的 ENG 節目，是否為第二階段的主流廣電媒體抗爭的替代性主體？

（二）公共空間爭奪競爭的主體—中國共產黨以全盤政治化各領域，來操控人民，且動員人民積極政治演練；國民黨以促使人民對政治冷感，投注心力聚斂經濟財富為交換，換得自身政治威權二十年之穩固，但是至終經濟發展下滴中產階級之成功，締造了政治變遷的動員嗎？

（三）國民黨統治下的主流媒體內在矛盾—主流報紙媒體中時與聯合，長期的養士與作家團隊，建立了知識與自由主義對威權政權的促興與監督。甚至主流報紙的報導與黨外雜誌之間有共生的供應關係 (symbiosis)。從歷史觀點來看，李老師似乎更是一個見證人，甚或參與者，在這個角度上，仍有相當空間可發揮嗎？

（四）市場控制之外還有的挑戰—雖說政治審查退位，經濟的報團力量將成為下一個挑戰，如首都早報與自立晚報都凋零下去。但是整體傳播生態內外的改變，引來「國家認同與主權」的衝擊，來自日本與中國媒體的影響力，似乎更值得重視嗎？本文作者也認為，增加公共電視媒體的出現，似乎有帶來本土的文化觀與外來相抗衡嗎？

順著第二階段言論自由之爭取，所謂打破廣電媒體之壟斷，也是台灣自 1980 年媒體發展中一個延長賽局。然李老師也沒有缺席，早在 1999 年發表於 NHK 文研的廣電研究論文，七年前也如前文發表時期，寫出了有線電視的本土發展定位。這篇由韓國資深傳播學者康賢斗 (Hyeon-Dew Kang) 所徵集，收錄到《東北亞的國際新秩序與傳播政策》專書中之文章，以〈顛覆電視台的控制—台灣的有線電視與國家〉為名。

表面上來看，解嚴後的報業開放市場，快速集團化排除了新進者，因此民主抗爭勢力轉向小眾媒體或區域性有線廣播電視，為一合理走向。然而，一時政治熱情（包含立法院辯論、政治演講、抗爭現場紀錄長期播放），但缺乏其他類型節目投資經營，終究導致收視疲勞，民主電視網的概念十分虛空，而被其他地下電視台文化所吞噬。然而，VCR的小眾攝影紀錄的「綠色小組」紀錄，也未能有效發展出商業發行，跟民主電視台之合作也不永續。李文凸顯出更大的本地廣電產業脈絡問題，就是在解嚴後，並未即時轉型國有至公共廣電制度（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導致國民黨威權不散，持續掌握寡占電視事業；而反對勢力，以為奠基中產階級經濟，就能經營對抗之替代性有線電視產業（其實是需要自然獨佔的投資規模），終至失敗，只能極化反對意識形態，而淪為政治性的言論機器。

圖九：韓國學者康賢斗整合的文集（左）；日本 NHK Studies of Broadcasting（右，本冊十分珍貴，因為台灣沒有一個圖書館有此館藏）



李金銓於 1999 年再次將上文擴張篇幅，把有線電視合法化過程的內外因環境再一次定位，這次發表在 NHK 文研的英文刊物——“Studies of

Broadcasting”(此處也是 E. Noelle Neumann 發表著名的沉默螺旋論文之處，有很高學術價值)。首先，他增加了理論架構，定位國民黨的國家機器，歷史以來用威權—商業—科層文官架構來運轉 (authoritarian commercial-bureaucratic state)。這種政治抓權，卻在經濟事務聚斂錢財上放權 (甚至放任)，這其實也說明了，國民黨政府能在解嚴後仍然維持威權統治達十五年之久的依據，但是也使台灣媒體民主化變質了。

以有線電視來論，其合法化的要脅得逞，即在於不挑戰政權，而盡力先播無授權的國外衛星頻道與電影節目，同時競逐原來無線電視的觀眾，從此逐漸坐大。然而，李文充分顯示了國民黨新聞局，無能力主導傳播政策，對於非法有線電視一籌莫展，更無法抵擋美國 301 報復法案的要求，只得快速通過合法化流程，導致有線電視所有權集中化，並以低價串聯成賣方托拉斯。本文最後，提出三大問題探討，牽引出深度的傳播政策質問：

(一) 國民黨為何容忍地下有線電視之經營長達十五年？李文在此正式引述馮建三的文化賄賂一說 (cultural bribery theory)；但話鋒轉向認定，關鍵還是在於該產業無意挑戰國民黨威權所致。但是台灣社會聲色犬馬之影視放任，仍是國家統治中的罕見之例，國民黨縱容逸樂取向，仍是有跡可循，急需給予以理論化 (如紓解論 Theory of catharsis)，可乎？

(二) 大眾媒體與小眾媒體之互動。有線電視從小眾起家，無政治影響力，國家無意國有化，地方性濃厚。但是合法化所有系統後，因缺乏管制，導致逐漸蠶食，依照經濟規模導引，集中化成大媒體。但是真的沒有國家的規劃嗎？本文論者認為這裡需要回顧 1984 年時期，行政院成立有線電視工作小組的殞落有關 (何貽謀，2002)。當時因著政務委員費驊的意外過世後，小組失去主導權，未讓電信事業接掌有線電視網路，而失去走向標準規模，產業的合理性介入失去槓桿，如此滋使地下有線電視猖獗，導引至與財團結合，共謀瓜分市場的腐化結局。

(三) 有線衛星產業發展，帶來如何全球化與地方民主的影響？可見自 1990 年以後，地方有線與衛星下鍊業者合作，引進諸多海外影視頻道，以及部分國內衛星頻道製作的政論節目，的確開闊視野，引入言論多元的氛圍。

然而這只是曇花一現的效果，之後未有要求有線電視投資顯著性節目生產，長久接受外銷的美日韓文化節目，以及低成本的談話節目，似乎都拉低了電視產業鏈的產值，打壓了媒體工作者的經濟獲利，弱化了產製能力，與觀眾一同弱智，這樣的全球化低階演出，似乎更糟地重演「老三台」的淪亡立場？結果，有何全球與本土文化的辯證發展？

上文最後，引述加拿大名言“the most wired nation” (Murphy, 1983)，但是指出當地有線電視也最疏通了美國文化君臨該國的困境。李的評論，在這裡似乎出現了博士論文第四章的加拿大影子，但是缺乏一個與台灣的比對。加拿大有線網路畢竟是 economic nationalism 國族主義下之產物 (Lorimer & McNulty, 1992)，如其 Rogers Cable 仍是一個正牌有分殊化的媒體集團，非台灣者為黑道地下經濟的本質不辨，誣稱自己是最待價而估之 Pledge Fund 之眼中肥羊，此二境界仍是不能類比。從加拿大邊陲眼光，我有一點異議。但不減這 1999 年的力作，妥為台灣 90 年代解嚴後極盛興的影視文化作註。

## 伍、結論：弱連結創生影響力

本文至此，歸結出對於李金銓為言論世、更新教學的台灣現場，從 1980-1990 兩個十年的言論軌跡中，力圖整理出一個次級詮釋之立論。最終，本文想推演的考察結論，以回溯到關鍵的養成階段，就是他在高等教育時期接觸到的影響人物，在他們所言所論中，找出並投射出後來類似的社會變遷脈絡，做本文次級詮釋架構。

李金銓自述，他根據實徵資料發言，卻不被實證主義同流 (empiricism)，他考察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立，卻不稱自己為政治經濟主義者 (political economist)，這種入乎其內，卻也能出乎其上，頗具替代性 (alternative) 與力道 (robust) 之中庸性 (eclecticism) 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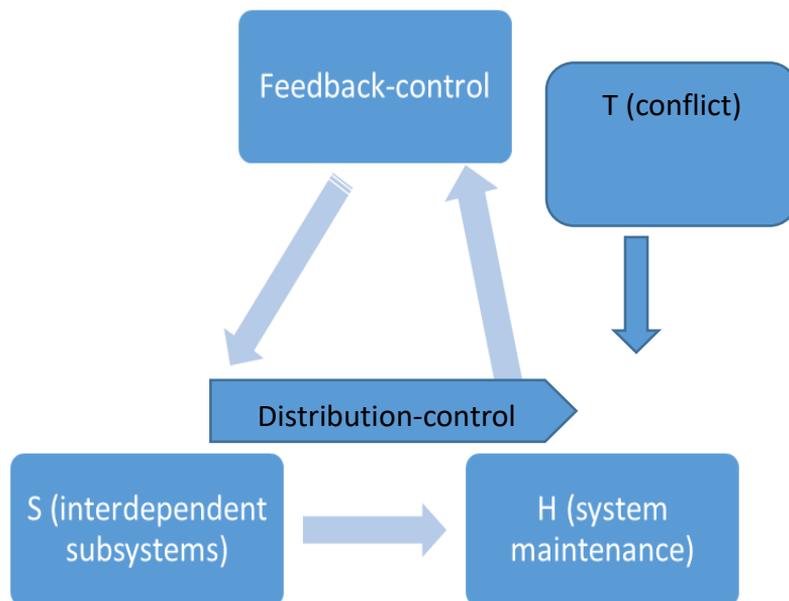
本文不禁想起李的業師，F. Gerald Kline (當年為密西根大學大眾傳播與研究跨系際聯合博士學位之主持人)。在一些關鍵的回憶中，都曾屢次提到 Gerald Kline 對他畢生成就的影響。而且就密大這個標準實證主義的傳播研

究（心理動力效果論之大本營），為何能出老師這種獨特風格與本土實證的批判研究文獻呢？的確，Gerald Kline 的包容與真知灼見，引導老師往自己生命相關的議題前進，並且大膽採用國家發展與帝國主義的論證，將台灣與加拿大兩個邊陲案例納入，成就一個對恆久辯論議題的駁證（rebuttal and refinement）。

在此我嘗試從 Gerald Kline 在當年學術觀察與論證中，找尋一些線索，作為這個當年「李金銓現象」之次級演繹概念，成為指導架構。這裡不得不提，當年（1972）那個驚人的出版：Current Perspectiv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ume 1, Sage Annual Review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這本通冊第一篇，就是 Professor Kline 的論著“Theory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在這篇開山之論中，Kline 引述了大傳效果研究的簡史，發現心理動力模式討論不斷纏鬥，各學派互有勝負；但是，近期的衝擊，來自歐陸的 Jeremy Tunstall 及 James Halloran 的說法，帶來二個值得注意的寫照：（一）歷史性研究與描述性的議論，以學理方式導引出新聞學的高等教育進入職場的應用；（二）較具先進之論，為博士論文先鋒之作，使用社會科學研究工具，發現新聞與傳播現象，運作在媒體結構與閱聽人特質上，造成的新風貌。

然後他以近期積累的新研究，重新為美國主流的傳播思維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描摹一個動態圖譜，值得在此一展：

圖十：社會結構功能觀點的系統變遷架構



傳統以來，結構功能主義者認為，以上”S“(社會次系統)To” H”(系統維運) 是一個常存均衡狀態，讓戰後美國主流社會穩定前進，但是這是一個靜態的過去；越多證據顯示，以媒體的分殊化地成長力，逐漸掌握了 **feedback-control** 功能，導致次系統變遷，而同質性較高的次系統，會以分配性控制程序 (**distribution-control**)，進一步深化系統的維運。但是這只是一個理型，媒體未必佔據在衝突發起角色，導引此一循環辯證。

當媒體資源被壟斷時，更多的衝突因子，會由替代性的 **agent**，如 **radical media** 或高度分殊化建構的媒體制度，來啟動重新的系統維運。為了衝破中央集權化的宰制，新媒體科技，無論透過經濟特性、大型社會動員、或者是管制重新分配，都能將微小單位資訊，填充給社會分殊化發展作動能。其實這種行動者，可能也擬似正式的在地媒介物，如透過意見領袖、有影響力的發言者、及聯絡處的信差 (**liaison person**) 而完成。

另外一個層次之觀察 (出自同書作者 **Peter Clarke**)，將上圖 H 作為體勢

平衡 Homeostasis 的依變項，而 T 就是一種壓力，破壞原本的均衡互賴變項 (subsystems) 進入一個新的體勢平衡。這種運動動向上，壓力狀態下的行動者，產生兩種關鍵行為，分別是資訊的搜尋 (information-seeking，有目的的行為)，或者比較靜態的資訊分享 (information-sharing，兩造於均等機率近用資訊)。進一步來論，衝突份子處於一個異質性 (heterogeneity) 高的環境，會更運用媒體達成資訊搜尋的積極目的，同時也以更大量的回饋給次系統，造成原本體勢平衡之變異，產生新的包容性平衡，或超越原本的異質性的內在衝突度。

最後，功能論期待異質性的消弭，雖然可以同化體系中的新成員，但是過度單方面期許的均衡狀態，只會帶來更衝突的取向，營造了社會變遷的新說法。

F. Gerald Kline 的理解，認為 70 年代起結構功能論的社會架構，也需接納社會新發言成員，容許衝突攪動，更新系統維運。這時要有 liaison person，立於關鍵位置，有新科技或表現形式在手，突破同質性的壟斷結構，發展動能，影響均衡狀態，達成下一階段的待變結構體。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為處於壓力承載者或觀察者位置立論。該者，如果處於一個非同質的結構中，會更大量透過媒體，找尋變遷機會的資訊，消弭原本型態的表象，再次建構一個真有包容度的狀態，雖說是很功能主義的說法，但是也是社會穩定發展的一種期許理型。

兩種層次的抽衍後的模式說法，概略地匡視本文研究對象 (李金銓與其學說)，在解嚴前後對台灣社會帶來之衝擊與再建構；也描摹了本文作者以觀察行動之方案，在積極與研究對象之資訊互動後，進入社會，尋求機會，消弭或解謎威權媒體文化之表象，期許建構一種更有容納能力的民主傳播新局。

本文無意對號入座，但本於解釋此一傳奇的李金銓學說，緣身於這個關鍵發展的台灣時代，此事應然有領導性傳播理論作階段性的投射與觀察類比，願以這樣收尾，有一點為驚異奇航之旅，帶來風平浪靜地回眸之廣度與高度。

## 參考書目

- 何貽謀 (2002)。《台灣電視風雲錄》。台北：台灣商務。
- 程宗明 (1999)。〈「黨政軍退出三台」之後—從批判政治經濟學思考無線電視制度的改造〉，《廣播與電視》，13: 87-122。
- Kline, F. G. (1972). Theory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Kline, F.G. and Tichenor, Philip J. (ed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17-40).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orimer, R., & McNulty, J. (1992). *Mass communication in Canada, Toronto, Ontario* (2nd).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 Murphy, B. (1983). *The World Wired up-Unscrambling the new communications puzzle*. London, UK: Routledge.

**An Eyewitness on the Critical Juncture of Taiwan Mass  
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regarding the writings of Dr. Chin-Chuan Lee around the lift of  
Martial Law (1982-1999)**

Hamilton Ch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onal encounter, this article structured a criticism on the media study by Chin-Chuan Lee following his theoretical landmark publication and its proliferations from his visiting scholarship in Taiwan. The influence of his book on communication theory should not be refrained from the teaching and study on campus. During 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ovement nationwide, this lecture and other articles illuminated a new-born generation for engaging the politics and reform of Taiwan communication system. Aftermath, three critical reviews on the resistance and revolt against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are addressed into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 of communications study. His contribution into Taiwan media history is clearly categorized into publishing several topics, including press, political magazine, underground cable, satellite TV, video recording cassette, and public television.

**Keywords:** cable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lift of Martial Law,  
public television

---

\*Hamilton Cheng, Research Fellow, Taiwan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email: RND6156@pts.org.tw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六期  
2022 年 12 月

## 傳播、民主與媒體環境的期待： 從李金銓〈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談起

管中祥\*

### 本文引用格式

管中祥（2022）。〈傳播、民主與媒體環境的期待從李金銓「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談起〉，《傳播、文化與政治》，16:115-138

---

投稿日期：2022 年 7 月 31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11 月 1 日。

\* 作者管中祥為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暨傳播學系教授，e-mail: [benlakuang@gmail.com](mailto:benlakuang@gmail.com)

## 《摘要》

本文將以李金銓〈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一文為起點，擴及其在 1987 年出版的《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吞吞吐吐的文章：新聞圈與學術圈》、《傳播帝國主義》三本著作，以及 1993 年李金銓表於澄社出版的《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中的總結文章〈台灣廣播電視藍圖〉，了解李金銓對「傳播」的基本界定與主張，並在這樣的基礎上，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有什麼關連？黨國體制對新聞自由及民主政治造成什麼樣的傷害？媒體開放又該如何規範？

雖然這些論述大多是李金銓在報禁開放前的著作，他並不樂觀地認為開放報禁之後，媒體操控問題就會從此消失，相反的，他更提醒，除了政治勢力，資本集團是另一個壟斷勢力，若沒有適度的規範，言論一樣會遭到壟斷，因此，除了新聞教育、媒體自律，更重要的是，政府要透過法規，保障市場結構的多元性，維護不同社群的媒體近用權。

**關鍵詞：**言論自由、媒體政策、報禁

李金銓教授的著作《大眾傳播理論》是我輩傳播科系學生進入傳播領域必讀之經典，其中有關傳播與國家發展、現代化主義與依賴理論、傳播與文化帝國主義等篇章，更是許多人認識政治經濟學的起點。

這些篇章有別於傳統的行政主義與實証研究，不僅帶領我們從權力、全球的角度認識傳播，也開啟了左翼社會學的視野，進而從批判理論的角度闡切龐大傳播系統中的大大小小權力機制，以及其中的動態關係。

不過，李金銓並不是待在象牙塔鑽研學術研究或者課堂教授知識的學者，在威權時代，更是少數勇於為文批評時政的傳播學者。在其出版的《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1987）、《吞吞吐吐的文章：新聞圈與學術圈》（1987），甚至是較具學術味，探討國際傳播與跨國資本宰制的《傳播帝國主義》（1987）等書，皆有不少針對當時台灣政治現象與媒體問題的評述，當然還有其它評論散見國內外報刊。

這三本著作出版於解除戒嚴那年，報禁尚未開放，書中的論著多在 1987 年之前發表於台灣、香港、海外等地的報章雜誌。書中不但諸多對時政的批評與建言，更多的篇幅是在批判黨國體制對媒體的控制，主張解除報禁維護言論與新聞自由，強調新聞自由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並提出媒體開放後的看法。如果李金銓當時是記者，他不僅會遵循應有的客觀性意理，也會是「鼓吹者」，挑戰權威，倡議民主。

李金銓成長的年代，媒體與傳播教育是掌握在黨國體制之手，對媒體的控制和在中國時期一樣，一方面透過暴力的機制限制言論，另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宣傳通道，主要的作法包括（鄭瑞城，1988，頁 39-40）：透過的法令與政策明白的賦予大眾傳播媒體特定的任務和目標；其次，國家機器對於媒介內容實施檢查制度，同時對於媒介表現所給予懲處交由行政機關來認定，而非司法機關；另外，軍事單位亦介入大眾傳播媒介的運作，除了投入媒介經營外，媒介內容的檢查工作亦交付軍事單位，如警備總部執行。

國民黨在台灣對新聞教育的培養／控制一樣不遺餘力，首先是在台創建正規新聞教育的是政工幹校。國民黨遷台初期，痛感過去新聞宣傳的失敗，必須從頭訓練青年新聞人才。一方面提供軍中與報界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則為反共復國儲備編採人員，造就下一代的反共報人。因此，民國四十年政

工幹校成立之後，決定首先創設新聞組。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特別支持軍中的新聞教育工作，創設新聞組也是他的重要指示（謝然之，1982，頁 17）。

而中央政治學校（政治大學前身）新聞系的設立，便是要培訓為黨、為國所用的新聞人才。政大新聞系早期的系主任中，部分由國民黨第四組（文工會）及《中央日報》調任，部分則是來自行政系統政府官員。中央黨校新聞系也在民國四十三年復系，謝然之在擬定復系的教育宗旨上便指出，「政大新聞系在中國新聞教育史上，曾經有著優良的傳統…我們信仰三民主義，忠愛民族國家…」，這樣的宣示一方面是要承接過去的光榮傳統，另一方面必須配合世界新聞教育發展的趨勢，尤其是要適應我國特殊的國情與國家非常的處境（謝然之，1982，頁 27）。換句話說，在威權國家機器優於一切社會力量的時代，新聞科系的設立與建制，便在「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操作員」的架構下發展（管中祥、魏玟，2001，頁 47）。

在黨國體制嚴密的控制下，政治行動者與知識分子仍接續發行黨外雜誌作為異議的出口，解嚴前夕的部分報刊有時也會出現異議之聲，文人論政的傳統找到了些許的發聲的空間。雖然不少大學教授、知識份子報刊上為文批評時政，但在相對保守的傳學院中李金銓是其中的少數。除了是因為他的勇氣與使命，也和其學術訓練及對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的理念堅持有關。李金銓在《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的序文中便提到（李金銓，1987a，頁 XV）：

爭取新聞自由是一種止於至善的精神，也是一種無止境的過程。  
新聞愈自由，政治愈民主；政治愈民主，新聞也愈自由。我不敢說本書有何價值，但只要能充當新聞自由的踏腳石，於願足以。

論述、寫作是李金銓鼓吹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他在同一篇序文中也引用 Raymond. Williams 所言：鮮活的霸權恆是一個過程…它必須不斷地被更新、再生產、保衛與修正。同時，它也不斷地受到它本以外的壓力所抗拒、限制、改變和挑戰（李金銓，1987a，頁 3）。事實上，社會總是

充滿各種矛盾與衝突，有權力的地方必然有「反權力」（conterpower）。所謂的「反權力」就是社會行動者為了展現自己的價值觀與利益，而挑戰社會制度中既有權力的能力（Castells, 2015）。所有制度體系都會反應出權力關係，也會反映出這些權力關係在無盡的衝突及協商的歷程中所產生的限制。無論是國家或是其它管理人民生活的機構，其構成方式都取決於權力與反權力之間不斷의交互作用。對李金銓來說，民主是一個過程，不是一種成品或靜止狀況；是不斷追求的過程，不是一種「發現」，是要去爭取，要去追求，在李金銓的諸多論著中便是展現這樣的精神，並且鼓勵知識分子應該要有所行動。

1980年代，台灣社運動風起雲湧，民間社會躁動不安，雖然強控制的黨國系統逐漸鬆動，但威權的幽靈仍有可能隨時再起，上述李金銓三本著作在此時出版，更有其重要意義。本文將以李金銓〈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一文為起點，擴及其在1987年出版的《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吞吞吐吐的文章：新聞圈與學術圈》、《傳播帝國主義》三本著作，以及1993年李金銓表於澄社出版的《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中的總結文章〈台灣廣播電視藍圖〉，了解李金銓對「傳播」的基本界定與主張，並在這樣的基礎上，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有什麼關連？黨國體制對新聞自由及民主政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民間社會如何回應黨國的媒介體制？媒體開放後又該如何規範？新聞教育又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 壹、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

台灣戒嚴長達三十八年，不過，「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國際冷戰局勢雖然日漸緩解，但台灣在國際的地位卻日日敗退，另一方面，台灣民眾對自由民主的期待日漸高升，反對運動力度日更日益加大，原有的黨國機器面臨統治的正當性危機。1987年於7月15日，中華民國正式解除戒嚴令。

雖然強控力體制宣告鬆綁，但限制言論與新聞自由的「報禁」仍未解除，李金銓在戒嚴令正式宣佈解除之前，於1987年1月1日在《遠見雜誌》發

表〈報禁的回顧與展望〉（收錄《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書中，後更名為〈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一文提及，政府願意宣佈解除戒嚴，向回歸憲政邁出第一步，作為長治久安的打算值得喝采，但他也指出，戒嚴是國家緊急權的一種，其功用有如服猛烈無比的特效藥，雖可救成痼，但萬不可常吃久吃，否則必傷致命（李金銓，1987a，頁 87）。

文章一開始，李金銓便指明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條明白保障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目的在於保障人民言論出版自由與基本人權，但在〈出版法施行細則〉等行政規範卻對言論自由嚴重傷害，他引用時任立委的成舍我質詢指出，「以一份由行政官署制定的細則，許多地方，多與母法（出版法）的立法原則衝突。痛快的說，簡直是違憲。」（李金銓，1987a，頁 88）。

李金銓認為當時的台灣報禁是沒有法律根據的，而〈出版法施行細則〉授權各省市府不須經司法程序便能以行政命令直接限制及妨害人民的出版自由，更為憲法所不許。他同時指出，以「節約（紙張）」為理由實施報禁，不僅違法，而且不合社會現實（李金銓，1987a，頁 90）。因此，不論是就法論法，或是回到社會現實，報禁應隨著解嚴而開放，沒有存在的必要，才能回歸民主憲政。不過，報紙、媒體在民主社會，或是國家發展中有什麼重要呢？李金銓節錄了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也是報人的嚴復及梁啟超的說法。

嚴復在〈國聞報緣起〉文中提到他辦報的動機是「通上下之情」與「通中外之故」，而梁啟超在《時務報》時寫的〈論報館有益於國是〉一文提到「覘國之強弱，則在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地天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李金銓，1987a，頁 94）嚴復及梁啟超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報業在現代國家重要的角色--訊息的溝通者，不僅要「上」、「下」溝通，也要溝通「內」、「外」，而這也是李金銓認為傳媒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角色。事實上，威權體制不僅權力由上而下，訊息也是由上而下，從溝通的角度來看，存在著不對等的關係，民眾的聲音無法自由表達、無法納入決策系統，自然也無法成為民主與自由的社會。

進一步來看，民主與自由是相輔相成、一體兩面，而民主是保障自由、體現自由的重要條件。李金銓在〈開創新聞自由的新局〉文章中指出，現代社會不能沒有新聞媒介，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更是近世紀人類爭取自由譜曲的中心旨趣。回到個人自由與個人權益之間具有辯證關係，沒聽說在那個新聞充分自由的社會裡個人權益是不被保障的，也沒聽說那一個不保障私人權益的社會有充足新聞自由（李金銓，1987a，頁 123-125）。

對李金銓來說，這樣的法令不僅違反憲法對人權的保障，也是違反人類追求自由的基本價值，因為自由是基本人權，也是不可打折的終極價值，而言論自由更是人類自由中最中心的表現（李金銓，1987a，頁 176）。從歷史的發展來看，言論自由隨著時代變化有兩方面意義，消極的意義是要免於國家統治權的干預與壓制；而積極的意則是以自由討論為手段，目的在取得真理與最良善的結論，並能符合個人及社會福祉（李金銓，1987a，頁 95）。

換句話說，民主社會中新聞媒體不單只是扮演監督角色的第四權，也是人民與政府溝通的中介，不過，更根本的對人權的基本保障，是話語權、傳播權的展現，不但是免於極權壓迫的民主展現，更是不同立場與價值的對話，以及人類追求民主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具體實現，而當媒體及言論得以自由，也意味著真理得以論辯，社會有機會更好，而人民與媒體也有權力監督政治體制，民主才能落實。

不過，在主張報禁開放的同時，李金銓並非完成認同自由市場的說法，他強調國家需要某種程度的介入管制。

他指出，從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來看，一但開放報禁，即可能出現「大吃小」的壟斷局面，當時台灣的大資本及跨國企業雖未成形，李金銓便主張應該及早以周密立法限制「托拉斯」，保障競爭管道通暢與公平，例如，把反托拉斯精神明白注入〈公平交易法〉中，嚴格執行（李金銓，1987a，頁 113）。李金銓主張的是結構管制，要制定反壟斷法限制所有權規模，但他也強調對發言權的保障（李金銓，1987a，頁 140）。

即使如此，李金銓也在 1987 年 2 月在「自立晚報」發表的〈四十年來未有之變局〉一文中仍提醒，別期望解除報禁可以解決一切難題。解除報禁是邁向民主憲政的一大步，但爭取新聞自由是不可須臾或忘的過程，不以報禁

的解除為終結。因為即使開放報禁，也只能局部解決報業主權自由化競爭的問題，剩下的相關問題則是：那些人可以攀登媒介資源發言？目前只是「有權的」和「有錢的」，以及少數媒介認可的專家學者享有這種權利；一般被遺忘的沈默大眾根本無緣。因此，媒介不但必須強調加強內部民主化，開放讀者投書，進行自我批判與提升，更應該接受社會民眾和各種中介團體之監督（李金銓，1987a，頁 116-117）。

李金銓的〈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及相關論著，從傳播、媒體的基本特質，及其在民主社會的角色與功能，以及台灣政治的發展等面向提出解除報禁的必要性，不過，李金銓雖然提出解除報禁的主張，但並不會樂觀的認為社會就會因此變得美好，相反的，國家在其中仍要扮演一定的結構管制角色，保障言論的多元，另一方面，即使報禁開放，台灣的廣電媒體仍受黨國體制控制，其後的論著也會對此提出分析、批判與建言。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討論李金銓對「傳播」的理念，以及藝媒體開放後的媒體環境的有什麼樣的期待？

## 貳、傳播、媒體在民主社會的角色

在〈論解除報禁有益於國事〉一文中提到嚴復與梁啟超辦報的理由，作為其論述開放報禁的重要基礎（李金銓，1987a，頁 94）。

嚴復在 1897 創辦《國聞報》，除了是維新派重要的言論渠道，他在〈國聞報緣起〉一文中也提到成立該報的目的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為一國自立之國，則以通下情為要義；塞其下情，則有利而不知興，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國必弱。」這樣的想法，也和梁啟超提出《實務報》要「去塞求通」的創刊目的不謀而合。梁啟超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指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無耳目、無喉舌，是曰廢疾」。如果無法通達，那麼就會「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梁啟超所謂的「耳目喉舌」是說強調是報紙的功

能於促成上下溝通，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同時也能協助人們理解國內外的訊息，倘若無法如此，國家也難以強盛。

對嚴復、梁啟超等維新派來說，辦報的目的是要進行政治改革，尋求國家的富強，但同時也將辦報視為知識分子的意見出口，但同時也將其視為為民權與民主的體現。

不過，「去塞求通」要去除的不單是只是政治體制訊息流通的障礙，以求上下通達，回到「Communication」的意義來，更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是意見表達的基本能力，與民間社會多元意見與價值的展現，與尋求共識的歷程。

李金銓認為，若只將「傳播」的概念認為是「媒介」，很容易讓人以為媒體只是單向的傳達訊息，相反的，「溝通」，就非常符合 Communication 的原始意義，也就是彼此共同「分享」經驗、情感與意義，而溝通要有「對話」，不僅要能「接上頭」（dialogue），不能各說各話，同時也要能講「對話」，和對方能產生共鳴（李金銓，1987a，頁5）。

既然傳播是一種「溝通」，那麼雙方是否能站在對等的位置便顯得格外重要，傳播的參與者是否具有發聲、表意的權利與能力必要的前提，亦即，當傳播參與者站在一個平等的溝通基礎上，才有進一步達成有效的溝通。

社會本來就是多元，不同的背景的群體對同一件事本來就有不同的觀點與立場，溝通過程中有所衝突亦是某必然現象，如果迴避爭議或壓抑異議，不是逃避問題，就是另一種威權主義。事實上，報紙競爭的自由化與社會多元力量互為表裡，社會力量越多元，制衡功能越強，各種不同的聲音也越能反應在媒介上面。對李金銓而言，民主政治就是民意政治，而民意即是公共意見或輿論。媒體是溝通社會上下的紐帶，讓不同利益、背景、觀點的人異中求同，人人暢所欲言，彼此以理性的態度相互溝通，凝聚公共意見或輿論。

不過，如同 Habermas 所言，溝通本身也存在著某些「規範性」的條件才能達到有效的溝通，李金銓也同樣提醒，社會溝通與多元存在著辯證關係：一方面多元團體及社群有解釋「真理」的權利，有暢所欲言、免於恐怖和免於蒙蔽真相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對社會的基本價值（自由、平等、愛、

公道)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上下溝通,務求多元媒介建基在於價值共識之上(李金銓,1987a,頁116)。

過去,人與人間透過面對面溝通,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理解,但隨著媒介的日新月異,以及媒介訊息生產的組織化與集中化,原有面對面分享經驗的口頭文化逐漸式微,起而代之的是傳播媒介大單向地灌輸、擴散資訊,即使社群媒體出現人際互動回到以往的雙向互動,但其帶起的同溫層、網軍等民粹式的溝通未來必能促成彼此更多理解。簡單說,現代社會人際的關係與互動不若以往鄉民社會互動頻繁,傳統面對面口語表達、分享資訊的型態,隨著日益分殊的人我關係而越來越低,反倒需要透過媒介使用才能進行溝通行動及建構社會意義。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媒體的使用延伸了語言的功能與特質,溝通的形式與工具逐漸從單純的面對面的語言表達轉向中介性的媒體使用(Stevenson, 1995)。

除了媒介形式的轉變導致「平等溝通」更為困難外,另一方面,因著傳播媒介迅速資本化,只有「有錢的」和「有權的」,以及媒介認可的少數專家學者才能攀登媒介去發言。但媒介又演成牟利的工具,內容全面庸俗化,受眾只是推銷消費品的對象,民眾的發言管道越來越窄,媒介壟斷越來越集中,以致與溝通的民主理想背道而馳(李金銓,1987a,頁7-8)。換句話說,理想上,傳播是在平等前提下的對話過程,但現實上往往因結構性的權力差異使得溝通遭到扭曲,溝通的兩造無法在對等的條件下進行互動。特別是現今大眾傳播媒體發達,傳播媒介逐漸取代人們面對面的互動,成為溝通的中介,然而,政經力量對媒體公共領域的扭曲卻也更為嚴重(管中祥,2002)。

李金銓直指新聞自由的威脅來自兩大來源:一是政治的箝制,一是資本壟斷(李金銓,1987a,頁7-8)。即使台灣自從媒體朝向自由化的解禁方向,但媒體集中度卻也越來越高,甚至少數媒體集團已壟斷媒體產業,經營者考量的是如何獲利,而非多元意見與文化的形成。媒介工業已逐漸地被大規模的集團所控制,這些集團依據自己的利益和策略形塑媒介的產製方向,傳播與資訊體系日趨市場導向,愈來愈多的文化生產操控在大企業的手中,不僅產生了社會資訊不平等的現象,媒介私有化的結果,也窄化甚至縮緊了多元意見的出口。

對李金銓來說，民意政治的基石是理性溝通。大家必須暢所欲言，有免於支配、恐怖的自由，因此，媒介必須開放，一方面打破壟斷局面，一方面反應社會上多采多姿的意見，讓人知道真相、免於蒙蔽，以及有表達心聲的權利。不過，威權時期的黨國體制，不但使媒體發揮第四權的功能，同時也蒙蔽真相，讓人民無法表達心聲。

### 參、黨國控制下的媒體問題與另類出口

從台灣的媒體控制史來看，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約有十二家的報紙因該事件倒閉或宣佈停刊，致使報業市場驟然萎縮（祝萍、陳國祥，1987，頁35），再加上黨營及國營媒體大舉在台創刊或復刊，迅速佔領了報紙市場的主導地位，自此，台灣的大眾媒體成為威權控制的次系統（廖素霞，1994，頁52）。黨國不但透過報禁，及如出版法、廣電法、懲治叛亂條例在內的各種法令規章，限制媒體的發展，同時扮演媒體規範者與推動者的雙重角色。一方面管制言論、規範媒體內容，另一方面，推行各種獎勵措施使其順從政府意志，更甚者，結合（國民）黨、政、軍三者力量，直接介入媒體經營或控制資本及人事決策權（王振寰，1993，頁474-435），形成所謂的「官控商營」模式。因此，國民黨統治期間，除了透過「壓制型國家機器」掌控國家政經優勢，另一方面則是掌握媒體、教育機構等「意識型態國家機器」，傳輸既定的意識型態，以維持統治的基礎。

李金銓《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最後一章〈台灣的廣播電視藍圖〉一文中總結了台灣黨國時期的大眾媒體政策，他指出有四點值得注意之處（李金銓，1993，頁524-527）：

第一，國家機器對大眾媒體的控制主要是依賴黨政軍的三頭馬車，而國家機器的目的是要讓台灣民間社會無法團結，澆息民眾的政治熱情，並將人民的意向引往到經濟領域發展。

第二，「槍桿子」與「筆桿子」並用，一方面用軍警特打壓異己，

一方面用媒體塑造特定的世界觀，而媒體既被納入國家意理機器的一部分，也與政權的命運共生共榮，便會以效忠政權換取重大的政經利益。國民黨在台實施雙元權力結構，中央層級透過「侍從結構」由外省菁英直接控制，地方層級由派系間控制，而媒體屬中央層級的一環，也由親近黨國結構的外省籍菁英主導。

第三，媒體的控制有層級的差別，對廣電媒體的控制較為嚴格，印刷媒體相對寬鬆。

第四，台灣廣電特權是惡質國家資本主義的典型，但報紙則是官民資本平分秋色，黨政軍經營的報刊佔一半的家數，不過，私人資本的兩大報，卻囊括市場的三分之二。

李金銓認為，在蔣介石心中將大眾媒體視為國民革命的喉舌，他的態度是一貫的，抗戰時如此，剿共時如此，來台後亦加如此，例如，1964年蔣介石對第二次新聞工作會談人員致詞時，即要求新聞界以「國家、主義、責任」作為自己良知良能的標準。李金銓指出，蔣介石與蔣經國都是威權主義，只是「剛性」與「柔性」的差別，但雖剛柔互異，威權則無二致。在威權主義者心中只有上對下的灌輸與控制，以及下對上的服從，而無上下溝通的觀念。（李金銓，1993，頁 523-524）。這樣的批評，也說明了李金銓何以會引用梁啟等人「去塞求通」理念，作為主張解除報禁的理由，一貫地展現新聞自由、建全的溝通（傳播）體制在民主社會的重要性。

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李金銓指出，光開報館、建電台，未必可以貢獻現代化；要緊的媒介內容由誰控制？內容和國家發展有沒有密切聯繫？證據顯示，第三世界的媒介通常是達當權者意志的應聲工具，是維護既得利益，很少鼓吹社會改革（李金銓，1987c，頁 169）。但當時仍被視為「第三世界國家」台灣，控制媒體的體制又有什麼特殊性？

台灣的電視結合了黨政軍體系和私人商業勢力，是典型的「官僚商業結合體」，具體而微地彰顯了台灣若干產業的關係與形態，也包辦了權力、財富和是非（李金銓，1987c，頁 187）。

李金銓指出，「官控商營」的雙元形態讓資本與黨國相互合作，不僅掌握權力，控制了資本，商業導向的營運方式強調市場、娛樂，滿足閱聽眾的感官，不但缺少媒體應該有的批判精神，也讓黨國意識型態在娛樂的掩護下，大舉灌輸，界定社會的主流價值。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強調大中國主義的黨國意識，與此同時，更透過法規壓抑台灣的本土語言與本土文化，鞏固優勢階級的眼界與世界觀，無疑是讓「大中國意識」成為主宰。

李金銓將這樣的現象置於當時台灣社會重要的「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論辯中。他說，台灣的「身份認同政治，一直以「本省人」和「外省人」為分水嶺，他們講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歷史記憶。其後幾十年，省籍衝突為黨外對抗國民黨提供活力，也導致雙方尖酸偏頗的言行。省籍鴻溝不只表現在政治領域，也橫跨到文學領域（李金銓，2022，頁 323）。

日治時代，有關台灣的主權定位及台灣意識的討論已陸續出現，不過，1977-1978 年間，葉石濤、陳映真等人圍繞著「臺灣文學」所進行的鄉土文學論戰更為促發了「臺灣意識」、「中國意識」辯論。隨著黨外運動及異議雜誌的出現，「參戰」者越來越多，逐漸帶起了知識分子圈有關「臺灣結」、「中國結」的論戰。當時，這些發生在黨外雜誌上的中國結、台灣結論戰，是在國民黨統治下首次在意見領域討論「中國」、「台灣」的意涵與定位，也公開地就國/省（地方）基本區隔進行辯論。論戰中的台灣意識論者破天荒地挑戰了這個基本區隔，而這個挑戰也象徵著國民黨政權下的國族認同符號系統已經正式地進入了轉型期，象徵著正統中國論受到了台灣意識者的根本挑戰（池煥德 1997，76）。

雖然，知識界對「中國結」與「台灣結」討論十分火熱，但傳播學界在此方面的討論卻相對少見，然而，李金銓不但分析「中國結」與「台灣結」的糾葛與矛盾是如何展現在媒體政策上，甚至直接批判中國意識成了剝削體制。

中國意識變成一種剝削、支配與威脅，媒體成為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上自主權結構的壟斷，下至新聞政策的操縱，電視不能以公平公正的立場呈現旺盛的民間社會，總是以有色的眼鏡看待台灣意識

（李金銓，1987c，頁 202）。

這樣的說法在當時社會看似即將開放，國家權力卻可能隨時緊縮的解嚴前夕，其實十分「大膽」，但李金銓仍在〈電視文化何處去——處在大陸政治與海洋經濟的夾縫中〉，用三十頁篇幅論述他的看法，不僅進行「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辯證，更分析了中國意識是如何限制民主與多元文化。

他在文中綜觀「中國結」與「台灣結」的矛盾指出，歷史上的糾纏固然錯綜複雜，其表現方式也不一樣，主要還是台灣的政經分裂人格長期扭曲了文化面目，只是其中一環而已，過分膨脹的「中國結」肆無忌憚地壓抑素樸的「台灣結」。這樣的文化扭曲不只在文學論戰，更深深展現在民主政治上。李金銓接著說，這兩個結的矛盾基本上是「民主」的問題，也就是社會資源如何再分配的問題。「中國結」與「台灣結」原本是濡沫關係，變質為剝削關係，戒嚴體制更主宰、獨佔一切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活，凡追求真相、反應現實與思想的心靈活動，往往反被醜化成破壞團結的分歧份子（李金銓，1987c）。李金銓討論的不只是省籍對立或國家認同的問題，他直指這些差異展現出權力的壓迫，一種外來權力結構對台灣百年生成的政治權力進行的壓迫，即使兩者之間原本是存在著共存、共好、相濡以沫的可能。

這種權力關係的壓迫也反應在傳媒對公共事的報導，李金銓以「中正機場事件」為例指出中國意識如何傷害民主與多元、打壓本土政治與論述，他說先不論該事件的是非得失，但媒介蒙蔽真相，小道消息猖獗，對支配性的意理霸權反而會產生不可預期的反效果。

1986 年，民進黨成立，前桃園縣長許信良計劃跟建黨委員會回到台灣，但其中有多名成員是海外「黑名單」無法入境，11 月 14 日上午，數百位支持前往接機，與警方發生衝突。11 月 30 日，許信良、謝聰敏等人再度闖關被阻，民進黨發動了約一千餘位支持者至桃園機場聲援，遭警方以噴水車噴射加入紅色色料驅離群眾，並標記抗議群眾的身份，群眾也以石塊反擊，雙方衝突不斷，僵持了十個小時。不過，當時三家電視台報導此事件時，大量呈現民眾扔擲石頭的画面，並將抗議者稱為暴民，主流媒體的片面報導讓民眾無法窺知事件的全貌及背後因素，相反的，當時的另類媒體「綠色小組」

卻拍下第一手畫面，透過各樣的管道傳達有別於主流媒體的內容，和《自立晚報》聯手顛覆了大眾傳播媒體的說法。

事實上，在看似嚴密的控制機制限制下，與黨國機器相異的聲音並非沒有出口，隨著台灣內部一連串政治改革運動的發展，連帶的作為反對意見發聲管道的媒介因應而生，進而形成媒體與政治反對運動相互支援的現象，而異議的政論報刊便在執政者對政治性集會結社以及大眾傳播的嚴厲控制的氛圍中，成了政治異議分子宣傳政見、糾集民意、組織動員的唯一機關（李旺台，1993，頁 28），不但政治運動走向雜誌化，雜誌也充滿著政治的色彩。例如，「中國民主黨」的新黨運動中，有《自由中國》雜誌作為言論的中心；《大學》集團的分知識分子政治革新運動，本身就是以《大學》雜誌為基地，並為台灣的政治運動儲備及集結人才；而七〇年代興起的黨外運動中，也有《台灣政論》、《八十年代》、《美麗島》雜誌，以及其後各種五花八門的週刊鼓吹諸如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等政治改革（李筱峰，1987，頁 271）。

政論雜誌成了社會上異見的水龍頭，儼然是政治反抗中心，最後衝破官方意識型態的堤壩。他們擴張了言論自由，甚至促進了主流報紙的報導，逐漸挑戰牢不可破的國家意識型態，人們在社會混亂的時刻倚重他們來摸索真相（李金銓，2022，頁 306）。

在黨外雜誌之後，另類錄影帶、第四台、地下電台等另類電子媒體逐步興起。另類電子媒體成本低廉、移動方便、操作簡單與互動性高，傳播的速度更快、範圍更廣，也讓流通更為便利，於是，逐步取代了傳統印刷媒體，成為另一種「小媒介」。

1970 年代，傳播學界將媒介區分為「大媒介」與「小媒介」，自由派學者如 Lerner 等人強調「大媒介」是「移情（心理）能力奇妙的擴散者」，因此主張用大媒介為心理觸媒，擴大人們的視野，增強改變現狀的企圖心，從而促進國家發展現代化，「大媒介」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要協助國家發展。不過，這樣的說法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李金銓引用左翼學者 Enzensberger（1977）、Freire（1970）等人的說法指出，社會的主流媒介通

常跟國家權力結構合流，以中產階級為訴對象；而抗議團體位居社會弱勢，資源匱乏，必須時刻躲藏當局的破害，只能利用小媒介從事邊緣戰鬥（李金銓，2022，頁 352-353）。

李金銓也以 Tunstall（1977）、Scharmn（1977）等人的研究闡明，「大媒介」的功能在於強固現狀，並因為它對資金內容的大量需求，無形中製造媒介對國家機器的依賴；反而「小媒介」所需資金少，機動性強，容易在位置開拓變革，故成為社會運動反抗國家言支配言論的重鎮（李金銓，2022，頁 306）。

這裡「小媒介」指的就是另類媒體或替代性媒介，李金銓在「是該重建媒介公信的時候了」一文中指出，傳播研究常發現「大媒介」（亦即主流媒體）缺乏公信，則「小媒介」必應用而生。當時的國民黨全面控制了大媒介，惟因小媒介的銷路有限，當局估計政論雜誌無力威協及統治政治權威，遂未把它劃歸報禁範圍。政治異見者無法接觸黨國控制的大媒介，退而求其次，利用邊緣的政論雜誌鼓吹他們的言論（李金銓，2022，頁 306）。他以「中正機場事件」為例，主流媒體的報導使得媒介的公信受到挑戰，故「小媒介」的流行是遲早的事（李金銓，1987a，頁 179-180），李金銓不僅批評當時主流媒體對社會運動的扭曲報導，並強調另類媒體在民主政治，以及媒體失衡的社會中將扮演的角色。

## 肆、大學與新聞教育

言論自由的限制與突破不僅發生傳媒市場，在同屬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大學校園，也發生言論的控制與衝突。

1980 年代的大學校園雖已成立不少異議性學生社團，透過發行刊物倡議理念，批判時政與校務，但刊物的發行需通過層層的審查機制，大學校園內的教官、訓導處，甚至設有學生黨部嵌制學生的言論與思考，校內發行的刊物也需經過校方行政體系的審核。當時校園內的學生刊物不能自主發行，學生的言論自由及辦報自由受到限制，大學裡的異議社團或學生也發行地下刊

物，透過「小媒介」的非正式管道傳達自由思想或表達對時局的不滿，因為這些不容於當局或校方的異議言論若想循正常管道進行公開討論，便會受到校方的打壓。

李金銓對言論自由的關注，不只是主張開放報禁，或對黨國體制的批判，針對當時的大學對言論自由限制他也提出諸多批評。1986年10月，李金銓在《自立晚報》發表「校園言論自由的一課」，聲援當時台大的異議性學生社團「大學新聞社」。起因是「大學新聞社」有三篇文章未事先送審被勒停止活動一年，三位負責人分別被記過處分，台大十二個社團發表聯合宣言聲援。

他在書中舉例，1983年美國明年蘇達大學也曾發生學生刊物《明尼蘇達日報》被校方嵌制言論，該報因而控告校方，獲全體新聞系教授支持，最後校方敗訴，並撥款一百萬美元成立「第一修正案基金」，而這筆經費只能用來作為維護言論自由的活動（李金銓，1987a，頁208）。李金銓以此強調大學自主的重要性，除了關注校園言論自由遭到侵害，也重新檢討校園的審稿制，希望校園刊物也能向新聞局登記為法人。

校園刊物的審查不僅是對言論自由及大學自主的限制，也透露出大學行政體制的家父長心態。李金銓批評當時大學的校園審查制度，只是墨守成規，並且不把大學生當作完整的成人看待。他說，何以大學生不能坦蕩蕩為自己的言行在法律前面負責，而必須接受「大人的保護」？有趣的是，李金銓話鋒一轉，將批判的焦點轉移到大學的新聞教育，他直言：

為什麼在大學新聞系的課堂內講的是「新聞自由」的大道理，課堂外做是「小心一點」那一套？（李金銓，1987a，頁214）

李金銓一方面批評大學校園的審稿制度，抹煞了大學校的寬容與批判精神，不僅與一般官僚組織無異，也會影響真理的追求；另一方面他也批評大學新聞教育的弔詭及偽善，雖然在教室裡強調新聞自由，但現實中卻充滿各種有形無形的限制。

這樣的偽善也發在戒嚴時代的台灣，大學在行政、黨務、軍事體系聯合

監控下運作，但另一方面，也同時在大學的傳播院校中為黨培養文宣人才，突顯了新聞教育的荒謬性，在大學課堂上對新聞自由侃侃而談，在真實社會中，卻對新聞自由處處限制。在新聞教育中，強調新聞媒體是民主社會的第四階級，然而，這種自由主義報業的邏輯與當下的威權體制相互矛盾。

從台灣的歷史發展來看，新聞傳播相關科系有著特殊的位置，除了回應外在社會的變化與需求，發展初期深受黨國體制的影響（管中祥、魏鈞，2001，頁 47）。在威權國家機器優於一切社會力量的時代，新聞科系的設立與建制，就是在「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操作員」的架構下發展的（管中祥、魏鈞，2001，頁 47）。而這樣的結構也使得台灣當時的新聞科系一方面在教室裡大談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但校園內卻充滿層層的審查機制，新聞科系學生也只能在荒謬中學習生存或尋求突圍。

李金銓在多篇文章點出大學教育的諸多問題，但他仍強調大學是學術的殿堂，社會的良心，不可輕言撤退寸土。他更指出大學是民主的搖籃，大學生在校內一定要接受民主的洗禮，養成講真話就事論事的習慣，大學也是追求真理的社群，儘管大家對真理的理解不同，但每一份子的發言權都應該獲得適當的尊重與保護，這樣才能維持系統的動態平衡（李金銓，1987a，頁 219）。李金銓以他在明尼蘇達大學任教的經驗為例，說明什麼是校園民主。他指出，有次明大新聞系主任出缺，除向全國徵才，也組成九人遴選委員會，一位是外教教授，還有兩位是大學生及研究生代表，其餘是該系教授，兼顧級職及性別，並有同等的發言權與投票權，過程公開透明。對比現今台灣大學科系系主任的產生，部分是校方指派，或是由系所教師選舉再由校方同意的作法，依舊缺乏學生民主參與的過程。

有趣的是，威權時期的大學教育不但受到黨國體制的影響，也強調實用主義，李金銓也對針對大學教育過於強調與現實的接軌的傾向提出批評。李金銓明白表示，大學追求的是知識的獨立性，不必時時與社會的職業求黏得太緊（李金銓，1987b，頁 101）。他反對將大學當作社會的「加油站」，亦即，社會要什麼，大學就給什麼，他說，新聞界實務對大學的期望很簡單—要有立即可用的人才，最好一出校門就能派得上用場，但他認為，這種以「就業」、「實務」為導向的想法十足表現出「反智」精神，不惜以市場動向干

擾大理想，相反的，大學在關鍵處應該頂住社會壓力，不能自棄立場（李金銓，1987c，頁 247）。

1980 年代中後期，黨國體制逐漸鬆動，媒體環境也逐漸鬆綁，日漸走向私有化，傳播科系也慢慢脫離黨國的使命，從國家意識型態機器的訓練操作員，逐漸為轉成商營媒體機構及其它企業培養預備軍，越來越多傳播系所的設立，其中不少強調實用取向、與業界接軌，讓傳播教育陷入實用主義的牢籠（管中祥、魏鈞，2001，頁 47）。這個現象在近年來的傳播科系，甚至整個大學裡更為嚴重，教育部鼓勵產學合作，重視學生的就業比例，並以此作為評鑑大學的標準，因而大學越偏向培養學生成為業界最愛用的「即戰力」，大量開設實用性的科系，強調可以應用的課程。相對來看，李金銓在 1987 年發表的文字預先回應與提醒的現實趨向，顯得格外珍貴。

至於新聞教育應該教什麼？李金銓在 1981 年發表於香港《明報》的文章〈米蘇里的教訓〉中批評美國新聞教課程愈分愈細、愈枝節、愈技術化，反而把文史哲的修養拋諸腦後，加上社會學的訓練不足，新聞科系學生的發展受到限制（李金銓，1987b，頁 107）。因此他強調，新聞教育除了技巧與學識，培養通觀通識，發展獨立思考和創造應變能力外（李金銓，1987b，頁 103），李金銓更引用成舍我的發言，強調新聞記者的「人格」更是新聞媒體能否發揮功能重要期待。所謂的人格是指「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為新聞事業著迷的人多是特立獨行之士，以強烈的是非心參與社會、改造社會，但他也建議要回到中國記者群裡努力「再發現」頂天立地的人格典型，以嚴謹的學術、深刻的文藝，還其真面目，不矯飾，不八股，需要了解更梁啟超、張季鸞和陶百川，並不斷刷新其時代的意義（李金銓，1987c，頁 247）。

## 伍、結論：回到制度

1980 年代，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前夕，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學院知識份子為文論政，甚至走上街頭。雖然政治環境看似即將開放，但黨國

的幽靈仍在上空環繞，肅殺之氣並未真正消失。傳播學者李金銓並非上街抗爭的行動者，而是在政治氣氛低壓的年代在報章媒體上、在公共論壇上評論時政，他批判的不只是媒體亂象，更是背後操控媒體的黨國體制，甚至直指以「中國結」形成的戒嚴體制，掌控了台灣整體的政治與生活，壓抑、剝削了多元文化與言論自由。

李金銓倡議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同時，也分析了台灣政治勢力對傳媒的影響，他指出，台灣從 1949 到 1986 戒嚴期間，媒介受制於寡頭結構的政治生態。國家政權及少數菁英結成侍從結構，寡頭統治源自於政治壟斷，而非靠資本在「自由」市場的累積與競爭。

解除戒嚴，新聞檢查告終，媒體也逐步開放，台灣新聞自由名列亞洲前茅，言論也比過去更為自由、蓬勃，但媒體卻仍未能成為社會有效溝通的公共領域，「有錢的」和「有權的」仍舊是主要的媒體擁有者，台灣完成了有缺陷的民主轉型，媒介一如在其它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可以批判執政當局及其領導人，但私有大財團控制媒介所有權，公共電視邊緣化（李金銓，2022，頁 73）。李金銓指出，台灣的媒介在右翼資本主義專制政權統治下爭取新聞自由，然而，受壓制的市場能量解放之後，卻反過來壓抑財力較弱的新生聲音，嚴重背離民主的理想。台灣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機器與資本相互滲透，關係愈形錯綜複雜（李金銓，2022，頁 65）。

回顧李金銓過去的論著，可以發現李金銓以言論自由為核心價值，以此批判當時的媒體環境，並對未來提出期待。他認為，言論自由是人類自由中最中心的表現，這不是作為人的基本要件與期待，也是民主社會的重要條件，社會民主才能使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得到保障，而有了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社會才會更加民主，這也是李金銓主張解除報禁的重要原因。

不過，一如李金銓所指出的「台灣的媒介在右翼資本主義專制政權統治下爭取新聞自由」，民間的媒體改革力量，卻曾出現短暫的「左」、「右」路線之間。在 1995 年，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時，即有偏向自由市場的「自由化」，主張以自由競爭、股權大眾化解決媒體壟斷的問題，以及，偏向左翼主要國家介入的結構管制「公共化」兩種主張，但最終仍向解決市場管制的方向邁進。雖然部分學者及媒體改革團體至今一再強調建立公廣集團，透過

稅制徵收補貼小眾及文化媒體，但效果仍然十分有限，即使藍綠政府表面上都認同公共媒體的重要性，但資源配置仍屬邊緣。

簡單說，控制台灣媒體的力量從「有權的」轉為「有錢的」，而「有錢的」仍然與「有權的」勢力緊密結盟，媒體的問題仍然存在。有趣的是，李金銓三十多年前提出的回應媒體壟斷策略仍十分具參考性，他一方面強調「小媒介」的重要，指出「小媒介」是異議聲音的出口，甚至可能是改變社會的力量，例如，近二十年來，台灣的另類媒體、獨立媒體仍不斷出現、挺立，越來越受到認同並成為重要的資料訊來源；另一方面，李金銓也不斷強調，在媒介政策要解除管制的同時，仍認為國家要適當的管制，防止媒體壟斷、建造公共媒體、保障媒體工作者勞動權益，而這也是台灣媒體改革團體不斷呼求的主張。

換句話說，雖然本文討論的論述大多是李金銓在報禁開放前的著作，但他並不樂觀地認為開放報禁之後，媒體操控問題就會從此消失，相反的，他早已提醒，除了政治勢力，資本集團是另一個壟斷勢力，若沒有適度的規範，言論一樣會遭到壟斷，因此，除了新聞教育、媒體自律，更重要的是，政府要透過法規，保障市場結構的多元性，維護不同社群的媒體近用權。政府的角色一在維護競爭管道的通暢，一在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前者是針對所有權，後者針對發言權（李金銓，1987a，頁 140）。他在《解構廣電媒體》的總結中提出政府在媒體市場中的角色，他強調健全的傳播政策必須體現民主精神，落實新聞自由，而媒體受公眾信託，必須是以受到社會力量的監督。他在傳播政策上提出以下建議（李金銓，1993，頁 530-531）：

第一，政府應該制訂並執行公平合理的遊戲規則，維持自由競爭的管道，以求取市場和社會價值之間的平衡，而壟斷結構無疑自由競爭的敵人。政府要管的是架構不是實際內容與和具體經營。

第二，政府必須體認媒體資源為社會公有，在傳播政策上達成「公共服務」的目的。因此，在結構上促進媒體反應各種社會、經濟、文化團體的多元利益與觀點，並更要以公權力扶持弱團體，使他們在媒體上能充分發言。

第三，文化立法必須堅持人文理想，毋使媒介全然物化或異化，  
這樣媒體才能幫助擴充公共領域，建建立上下溝通，形成社會共識。

在制度之外，在報禁開放前，李金銓就強調媒介應強化其內在的民主化，以專業精神對抗媒介組織的權威結構，並受到獨立新聞工會的保障（李金銓，1987b，頁 113）。提出透過工會保障新聞從業者的自主權，工會若充分落實，或能成為與資方談判的強大力量，新聞工作人員若無能以工會集體力量爭取新聞自由和工作自主權，則不可能真正為公眾所有，也將維繫反民主的威權政治傳統（李金銓，1993，頁 540）。

即使在媒介開放近三十五年的今天來看，上述的主張仍然是重要且必要的。對李金銓來說，媒介是社會公器，屬於社會公產，新聞自由不只是老闆的自由，也是新聞專業工作者的自由，更是草根聲音的自由（李金銓，1987a，頁 140）。這樣的觀念李金銓從一而終，在不同的文章中反覆出現。「自由、平等、公道」的基本價值貫穿到《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一書及相關的著作中，這也是李金銓在新聞媒體與環境的基本理念，他在《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代序」提到「自由、平等、公道」是「參與民主」的基本精神，涵蓋了三個相輔相成的層面。首先，「新聞自由不止是報業經營者的自由」：必須制定反壟斷法，以營造自由競爭的公平環境；其次，「新聞自由也是報業經營者的自由」，必須刷新法律意義，健全工會組織，以保障記者編輯的權益及採訪報導自主權；最後則強調「新聞自由更是社會全民的自由」：社會大眾有知道真相、不被蒙閉真本、不被歪曲形像，以及免於恐懼、暢所欲言的權利。

李金銓以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辦報理念及傳播基本的理論概念--溝通為基礎，主張要開放媒體，政府要適度管制，才能保障言論、追求真理、實踐民主，他提出的政策建言，三十多年來，屢屢出現在各樣的媒體改革論述中，至今仍是當代社會重要的提醒。

## 參考書目

- 王震寰（1993）。〈廣播電視媒體的控制權〉，鄭瑞城（編）（1993），《解構廣電媒體》，頁 414-435。台北：澄社。
- 李筱峰（1987）。《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 李旺台（1993）。《台灣反對勢力——一九七六——一九八六》。高雄：五千年出版社。
- 李金銓（1987a）。《新聞的政治，政治的新聞》。台北：圓神。
- 李金銓（1987b）。《吞吞吐吐的文章：新聞圈與學術圈》。台北：久大文化。
- 李金銓（1987c）。《傳播帝國主義》。台北：久大文化。
- 李金銓（1993）。〈台灣的廣播電視藍圖〉，鄭瑞城（編）（1993），《解構廣電媒體》，頁 519-550。台北：澄社。
- 李金銓（2022）。《新聞自由的幽靈》。台北：時報。
- 池煥德（1997）。《台灣：一個符號鬥爭的場域：以台灣結／中國結論戰為例》。東海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國祥、祝萍（1987）。《台灣報業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
- 廖素霞（1994）。《台灣社會運動與另類錄影帶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管中祥（2002）。〈從 Habermas 的溝通觀再思考媒體傳播過程的權力意義〉，《中華傳播學刊》，2: 185-220。
- 管中祥、魏鈞（2001）。〈「傳播學生鬥陣」與媒體運動--社會、媒體與「傳播學生鬥陣」〉，《當代》，162: 46-57。
- 謝然之（1982）。〈台灣新聞報佇立開拓—從復興崗經木柵到華崗的創建歷程〉，《新聞教育與我》。台北：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
- 鄭瑞城（1988）。《透視傳播媒體》。台北：天下。
- Stevenson N.(1995). *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social the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London, UK:Sage

## **Communication, Democracy and the Expectations for Media System- an Analysis of Chin-Chuan Lee’s “On the National Benefits of Lifting the Press Ban”**

Chung-Shiang Kua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Chin-Chuan Lee’s essay “On the National Benefits of Lifting the Press Ban” to understand his definition and proposi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on this basi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democracy? What negative impact does the single-party system have on them? How should media be regulated when communication rights could be exercised freely?

Although Lee had written most of these arguments during the martial law period, he did not think media manipulation would disappear with the lifting of the press ban. On the contrary, he reminded people that as political power is not only the cause of media monopoly but also commercial interference, we need proper regulations to protect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a result, in addition to media education and media self-regulation,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on protecting various market structures and the rights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to access media are more important.

**Keywords:** freedom of speech, media policy, press ban

---

\* Chung-Shiang Kuang is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benlakuang@gmail.com](mailto:benlakuang@gmail.com)

## 臺灣報紙受平台科技影響： 新聞與民主的警訊

林照真\*

### 本文引用格式

林照真（2022）。〈臺灣報紙受平台科技影響：新聞與民主的警訊〉，《傳播、文化與政治》，16:139-163。

---

投稿日期：2022 年 6 月 5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8 月 1 日。

\* 林照真為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e-mail:carolinelin@ntu.edu.tw

## 《摘要》

跨國平台挾強大的網路科技能力，成為主要的廣告獲利者。傳統媒體中，以報紙影響最為嚴重。為釐清國內報紙新聞受到科技平台影響情形，本論文針對國內三家綜合性報紙《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進行資料搜集與訪談，提出初步的研究發現。本論文指出：一、原本扮演臺灣新聞主要提供者的傳統報紙，出現地方新聞人力、國際外派新聞人力嚴重衰退現象，影響國內言論市場的多元性。二、臺灣報紙數位廣告成長 616%，傳統紙版廣告則衰退九成以上，廣告收益已難維持優質內容。三、臺灣報紙網路新聞半數以上（52%-58%）流量，來自 Google 和 Facebook 平台導流，可見報紙對平台的依賴。本論文期望政府與民眾都能關注報紙沒落的現象，並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以挽救臺灣的新聞與民主。

**關鍵詞：**平台、民主、新聞、報紙、谷歌、臉書

## 壹、緣起

在傳統新聞時代，印刷版的報紙媒體具有極高的特殊性。首先，平面報紙是新聞記者人數最多的媒體，所有記者透過中央與地方不同層級，進行採訪路線分配，以便掌握國內各地新聞。在大眾生活中，閱讀平面報紙一度是基層民眾與社會精英共同的愛好，也因此增加報紙影響力。

由於報紙媒體聘僱最多的記者，始終在新聞傳播中扮演領導角色。每日固定出刊的早報或晚報，都是電視與雜誌等其他媒體必須參考的新聞素材。傳統報紙並且聘僱國際特派記者，分別派駐全球重要城市。兩岸經貿互動密切，報紙記者也經常前往大陸。此外，也有記者帶著特定任務從臺灣出發，到全球各處進行專題報導，這些都是報紙留給讀者的記憶。

自《蘋果日報》於 2003 年進入臺灣後，臺灣長期維持日報四足鼎立的局面。包括《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一直維持發行量與廣告的激烈競爭，報紙內部以「流血競爭」來比喻情況，晚報首先受到衝擊。《自立晚報》（2001 年），《中時晚報》（2005 年）陸續停刊後，最後一家晚報《聯合晚報》聲明：「受到讀者閱讀習慣改變、數位媒體發展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響，決定終止發行。」（李伊晴，2020 年 6 月 1 日）國內的晚報市場完全結束。

日報方面，在臺灣四家綜合性報紙中，《中國時報》於 2008 年易主；《蘋果日報》則於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響營運，報社進行縮編（葉冠好，2020 年 6 月 19 日）；接著在 2021 年 5 月宣布停止平面報紙出刊。《蘋果日報》說明停刊的原因包括：「網路發展徹底改變讀者閱讀習慣，數位洪流超乎想像，尤其是 Google（谷陪歌）、Facebook（臉書；現改名為 Meta）等數位平台的壟斷，造成廣告資源大量流失，對紙媒不啻是沈痛打擊。」（台灣蘋果日報，2021 年 5 月 18 日）。

目前，臺灣除《經濟日報》、《工商時報》外，僅存《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三家綜合性報紙，均在艱苦中經營。

其實，報紙經營受到電視等其他媒體影響，導致廣告下跌，實為市場常

態；卻不像平台影響如此巨大，連生存命脈都受到威脅。數據顯示，網路廣告的興起與印刷廣告的暴跌近乎對稱，等於數位廣告殺死了平面廣告。又，網路廣告空間無限、整體刊登價格更為便宜（Filloux, 2020, December 7）。全球媒體都注意到新聞記者遭大量解聘、新聞工作減少的現象。

有關平台宰制廣告市場現象，「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ACCC）公布《數位平台調查報告》（ACCC, July 26, 2019），報告內容特別關注搜尋引擎、社群媒體平台（social media platform）和其他的內容集結平台（content aggregation platform）在媒體與廣告市場的競爭情形，最主要關注對象即為谷歌和臉書。報告中並且提及澳洲傳統媒體處於競爭劣勢，媒體與平台之間的資訊和權力均不對等。在 2006-2016 間，澳洲新聞相關工作少了 9%；傳統紙媒更少了 26%。傳統平面媒體人數卻少了 20%。同時，自 2008-2018 間，澳洲有 106 家地方性報紙關門，與地方政府相關的公共新聞沒有人報導，地方法院、醫療、科學新聞等，報導幅度都最是令人滿意下滑趨勢（江雅綺，2021 年 2 月 22 日）。

在平台大量掠奪廣告費、導致各國新聞媒體發展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危及民主時，臉書和谷歌同意各自用三億美金來支持全球新聞，卻引來不少質疑。有些批評認為這些經費是用來進行公關，或是作為反壟斷的法律訴訟費，只是偶然的慈悲。谷歌說他們花了近兩億以提升質感新聞；臉書則說這三億已經用完，其中半數是用在地方新聞上（Coster, 2021, Jun 10）。此外，谷歌也針對地方新聞受平台影響情形，提出具體說法。谷歌說明鼓勵地方新聞（Cox, 2022, February 9）。2022 年 4 月 7 日，谷歌並和斯洛伐克五家媒體簽了 Google News Showcase（Kulich, 2022, April 7）。

在平台影響媒體發展的討論中，地方媒體受到的影響又比都會型報紙來得嚴重，也因此平台在討論補償等協助方案時，均以地方新聞為優先。基於其他國家的地方新聞受平台影響的嚴重後果，本論文於是展開國內三家主要日報的研究。不同的是，臺灣雖也有部分地方型媒體，長期來則是由大型國內報紙（部分來自電視新聞）發展地方新聞。

本論文關心報紙受平台影響問題，並先以地方記者和廣告發行的相關問題，進行初步探討，並採用深度訪談進行研究。

## 貳、理論文獻

### 一、平台崛起

目前各國在討論媒體問題時，都會先討論平台崛起的相關現象，也因此須先認識平台。平台包括：（一）硬體的分層結構；（二）為了內容的支援；（三）財務交易的調節結構；且多數平台同時具有兩種以上的類型（Steinberg, 2019, p. 7）。舉例來說，Uber 或 Airbnb 為服務平台和搜尋者連結並提供服務，亞馬遜為物品平台則和賣家連結；臉書和谷歌則為資訊平台，和人群、廣告主、其他資訊連結（Culpepper & Thelen, 2020, p. 289），並慢慢建立以廣告為主的商桌模式。

換言之，平台是科技演化的延續，主要目的為數位科技的資本化使用。（Mihailidis, 2019, p. 342）。數位平台可分為五種類型（typology）：（一）通達資訊的平台（access to information）；（二）可獲得個人資料與內容的通路，如社群網絡；（三）可藉由第三方獲得貨品與服務（如網路市場：亞馬遜書店、eBay 等）；（四）可獲得勞動力、知識能力的通路（如 TaskRabbit, Upwork）；（五）可獲得金錢、資本的群眾募資網站（Strowel& Vergote, 2019, pp. 10-11）。其中，和新聞產業、媒體市場最為相關的則是第一類和第二類，谷歌和臉書尤其受人注目和議論。

媒體市場中，傳統印刷媒體除了面臨網路新媒體強烈衝擊外，更主要的勁敵為爭奪廣告收益的平台業者。和媒體不同的是，平台並未直接生產內容，他們只提供通路（access）。在通路模型中，通路比所有權（ownership）更是個混淆不清的用語（buzzword）（Strowel& Vergote, 2019, p. 9）。遵循平台運作原理，平台因此創造獨特的平台經濟，也更加商品化和控制資本所得。平台權力愈大時，獲利也愈多（Mihailidis, 2019, p. 343）。如今，網路平台化（platformization of the web）已引發全球學界關注（Steinberg, 2019, p. 22）。平台很快確定以數位廣告為主要獲利模式，卻不願被當成傳統媒體（Gillespie, 2010, p. 359）看待，也因此，平台的問責與該承擔的義務，一直

與獲利不成正比。

1990 年代或是更早之前，新聞產業間進行新聞競爭，宣稱「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約是 2005 年左右，情況出現改變，注意力開始轉至平台上，要靠平台傳遞來整合內容生產，內容不再是王。如今，蘋果(Apple)、谷歌、亞馬遜(Amazon)、Netflix 等公司，都已陸續宣告「平台為王」(platform is king)，並在封閉的平台系統內傳遞內容(Steinberg, 2019, pp. 69-70)。

在《平台資本主義》(Platform Capitalism)一書中，便指出平台為獲得資本，有四個基本特徵：(一) 扮演跨媒體(intermediary)的數位基礎建設，由平台促使不同的團體與個人互動，並把消費者和使用者的資料提供給廣告主。(二) 平台體現網絡效益，可協助團體發展成更大基礎的規模，並且可以掌握潛在的群眾。(三) 平台採用補貼政策(subsidization)，免費提供特定的產品質與服務，幫助使用者擴大規模。(四) 平台強調即時的使用者參與，並會不斷透過技術提煉提供更多引人注目的資訊以交換注意力，並讓既有的使用者持續帶進新的使用者一同進入此生態系統(Srnicek, 2017, p. 43)。

由於平台的方便性，導致消費者養成依賴性，進而在平台形成的虛擬社區中交友與分享情感(Culpepper & Thelen, 2020)。以 YouTube 為例來說，YouTube 是個集結影音內容的平台，而不是內容提供者，它是形上生意(meta-business)，是靠原始生產者提供資訊以獲利的商業模式。同時，YouTube 也不是真正做影音生意，它主要建構一個方便與穩定的平台，進行網路分享的生意(Burgess & Green, 2009, p. 4)。同樣的模式也可用來說明臉書、谷歌等大型社群平台。

從經濟層面而言，當代資本主義出現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公司手中，這類公司大部分未滿 25 年，擁有的權力和過去已經完全不同，但政治科學研究卻追不上它們轉換的過程。平台公司有著不同於傳統商業的賺錢模式，並創造大量的數據資料，足以進行市場交易(Culpepper & Thelen, 2020, p. 289)。科技並且幫助平台公司削減勞力成本與避開管制措施(Rahman & Thelen, 2019, p. 183)。

以臉書來說，臉書獲利的想法，就是把人們日常的社會關係，進行財務

評價，和傳統需要生產商品的邏輯正好相反（Arvidsson, 2016）。因此，臉書選擇的標準自然和傳統編輯不同（DeVito, 2016）。同時，數位網路允許潛在的廣告主可以直接接觸到閱聽人，以致網路廣告集中在谷歌、臉書等少數科技巨人身上（Brake, 2017, pp. 25-26）。科技幫助使用者輕鬆且免費使用平台，接著平台公司便從使用者身上獲利。使用者只要他們在網路或手機上活動，科技平台提供搜尋引擎、地圖、部落格、影音串流等節目，因為可與使用者互動者，就可以獲得有關使用者的資料與數據（Simpson, 2016, p. 155）。

換言之，平台嘗試建立一個科技可以進行判斷的標準，並發明名詞讓使用者想像。隨著平台逐漸發展成數位壟斷經濟時，已引起政府憂心。現在美國國會，就連共和黨都認同平台經濟已造成過於龐大的數位壟斷（digital monopolies），政府必須介入（Picard, 2020, p. 125）。我國立法院委員也已多次提出質詢，要求關注平台影響媒體的現象（林育瑄，2021年4月14日）

## 二、平台販賣使用者數據

目前出版商最大的疑惑是，為什麼數位收入明顯比報紙少那麼多？因此，我們必須探究，是什麼機制使某些隱藏的資訊，可以被帶到使用者眼前（Schou & Farkas, 2016）？最主要原因在於數位廣告中介（intermedianies）、數位廣告成本較低導致（Dwyer & Martin, 2019, p. 289）。其中關鍵的原因，即在於平台具有掌握使用者資料的高超能力。平台愈能鎖定使用者，就可以持續追蹤使用者更多的數據（Pariser, 2011）。

平台採取不同於傳統媒體的商業模式，提供廣告業者前所未見的服務，並因此成為最大獲利者。以臉書來說，臉書能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和收益，是因為臉書創造衍生物的社會邏輯（social logic of the derivative），指的就是演算法（Arvidsson, 2016）。演算法是一套規則去了解所有行為的結果，因此包含處理資料、計算行為表現或自動做決定（decision-making）的過程。社群媒體的演算法會考量什麼是影響民眾更有力的價值，然後在分析使用者各種資料時，就把這個價值的優先性設定先於其他價值（Bossio, 2017, p. 92）。

演算法的意涵比「軟體」更廣，指的是奠基於特定算法的製碼過程。平台還能掌握有關使用者個人的地區、連結、分享與觀看等。臉書也會了解使用者多常與朋友、粉絲頁或公眾人物互動，他們有多少個讚、分享與評論。動態牆還可以讓使用者沒看到的貼文，在其他與這貼文互動後，再次出現在你的動態牆上。臉書就是要完成它的「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做法就是讓你一直參與其中。臉書的研究者也發現，在短短幾個小時的時間裡，臉書可以從數以百萬計、甚至更多的使用者中得到資訊，並且可以測量文字與分享連結的影響力(O'Neil, 2016, p. 180)。不只臉書，谷歌、蘋果、微軟(Microsoft)、亞馬遜與手機供應商等有很多公司，都擁有很多和人有關的大數據，以達到賺錢的目的。

谷歌跟臉書的大量數據有兩個用途。對使用者來說，這些資料是提供個人化相關新聞與結果的重要參考。對廣告主來說，這個數據是發現可能買主的關鍵。平台可以使用這些個人化的數據，賺到廣告主的金錢(Pariser, 2011, p. 40)。谷歌和臉書都是藉著目標行銷(target marketing)的機會，去證明網路平台具有廣告主需要的數據潛能。這時的資料指的就是把網路上的個人特徵(personal characteristics)轉變成消費者資訊(consumer information)。也就是說，公司販售的資料可以是常態取樣而來，也可能是透過困難的預測取得非常態的資料。不同的資料，自然會有不同的售價標準(Simpson, 2016, p. 157)。

包括谷歌、臉書、蘋果還有微軟，都在進行一項競爭，就是盡可能去了解使用者。使用者可以得到免費的服務，代價就是付出關於使用者個人的所有資訊(Pariser, 2011, p. 6)。Gmail 跟臉書都是很有用的免費工具，他們也同樣是一種萃取引擎(Extraction engine)，我們在其中倒入很多我們生活中的細節。蘋果手機知道使用者今天去了哪裡，讀了什麼。當使用者在網路上的時間越多時，又會有一些特定公司像是 BlueKau 或是 Acxiom，可以導出具有高利潤的個人資訊。

社群平台藉著網路行為搜集得來的數據，進而創造使用者類目，用的就是數據監控(dataveillance)(Cohen, 2018, p. 140)。所謂的行為市場(behavior market)，每一個個人創造的點擊(click signal)都是商品(commodity)(Pariser,

2011, p. 7)。平台並不生產內容，而是生產單一的閱聽人商品，就直接賣給廣告主。在真實世界裡，谷歌絕對有能力就各種議題進行資訊控制，像是決定網路搜尋的先後順序，以便提高某些競爭者的經濟利益。這時，進行點閱的使用者，自然是跟著這個商業步驟的資訊再現，最先看到的，必然是已經付費的廣告主（Noble, 2018, p. 24）。

谷歌、臉書創造大數據等衍生物而帶來財富；相較下，新聞媒體則是奉行媒體經濟學的「雙元產品市場」（dual product market），指的是媒體須同時面對兩個消費者，並且賣兩個產品給兩名完全不同的買主；即他們賣內容給消費者，同時把消費者賣給廣告主（Croteau & Hoynes, 2006, p. 28）。媒體之所以可以獲得廣告支持，是因為媒體把通往觀眾的通路賣給了廣告主（Picard, 1989, p. 18）。從「媒體雙元市場」觀點來看，媒體生產內容就是為了吸引廣告主需要的消費者。媒體和廣告兩個產業，則在同一場域中互惠與交易。

然而，這個經濟觀點使商業媒體受到極大的批判。商業性質的大眾媒體，依廣告主需要的人口特性設立內容；傳統媒體創造「閱聽人商品」（audience commodity）（Smyth, 1977）。媒體並不是為閱聽人帶來獲得廣告主支持的新聞與各種特寫故事；相反地，商業媒體挾帶新聞、特寫與娛樂，目的是為廣告主掌握閱聽人（McQueen, 1977；轉引自 Smythe, 1978, p. 124）。政經學派嚴厲批評媒體，媒體生產內容不是為服務閱聽眾，只是想把閱聽眾賣給廣告主。因此，媒體內容成為吸引消費者的「免費的午餐」（Meehan, 1984, p. 219）。閱聽人勞動是為大眾媒體，節目是他們的薪水；如果沒有節目，他們是不會看電視的。他們勞動不是為廣告主，但閱聽人勞動卻成了「閱聽人商品」的一部分（Jhally, 1982, pp. 207-208）。媒體當權時代，廣告主必須依靠媒體才能接觸到使用者。

到了網路時代，谷歌和臉書等平台已經不再奉行雙元市場原則，卻出現更多的市場競爭不透明等問題。平台讓廣告主可以直接接觸到使用者，不再需要透過新聞內容，商業模式和傳統媒體全然不同（Brake, 2017, pp. 25-26）。臉書扮演的是科技公司的角色，它的工作是透過大數據的分析，行銷廣告主需要的客戶資料。由於谷歌和臉書創造了有關閱聽人商品的各式數據，再利

用演算法直接提供給需要的廣告主購買，實為不同於傳統媒體的商業模式。

## 參、研究方法

為掌握國內報紙發展的相關情形，本論文先擬好題綱，再和三家媒體主管約好時間面談，並且取得研究所需的相關數據。為避免研究為媒體帶來困擾，本論文採匿名制，並儘可能避免可識別的報紙特徵。研究問卷如下：

### 一、有關地方新聞（1996 年至今）：

（1）請以數量說明：請問地方新聞消失的情形；如報紙地方版面減少的數量；地方中心裁撤過程；地方記者減少人數。

（2）請以文字描述說明：請問地方新聞消失對地方人才培育的影響；有哪幾類的地方新聞消失不見？地方新聞消失對社會的影響。

### 二、有關國際新聞的採訪報導（1996 年至今）：

（1）請以數量說明：請問國際新聞以翻譯取代國際特派員的情形；目前國際特派員人數；國內採訪組出國製作專題經費、人力減少情形。

（2）請以文字描述說明：請問特派員減少，對報社新聞品質的影響為何；請說明國內記者出國製作專題減少，對新聞品質的影響。

### 三、有關報紙廣告（1996 年至今）：

（1）請以數量說明：請問報紙（印刷平面）廣告金額的變化；請問報紙數位廣告收入變化；分類廣告消失的影響。

（2）請以文字描述說明：請問報紙版面中，有哪些主要類型的廣告消失？請問報紙消失的分類廣告是否出面在報紙的網路廣告中？

#### 四、有關谷歌（Google）：

（1）請以數量說明：請問谷歌的流量帶動重要新聞出現的具體情形（如買關鍵字）；請問谷歌流量是否和營收一定成正比。

（2）請以文字描述說明：請問重要的新聞卻無谷歌流量，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請問為什麼谷歌流量未必能帶來廣告營收。

#### 五、有關臉書（Facebook）：

（1）請以數量說明：請問臉書的流量帶動重要新聞出現的具體情形（如買臉書流量）；請問流量是否和營收一定成正比。

（2）請以文字描述說明：請問重要的新聞在臉書卻無流量，會出現什麼樣的後果；請問為什麼臉書流量未必能帶來廣告營收。

本論文並與三家報社、合計共九名編輯部、廣告部主管進行深度訪談。訪談時間如下：

表一：受訪者人員與名單

報紙名稱	訪談對象	訪談時間
聯合報	編輯部、廣告部主管	2021年12月29日
自由時報	編輯部、廣告部主管	2022年1月20日
中國時報	編輯部主管	2022年1月26日

本論文與媒體主管進行訪談的同時、或是之後，取得與訪談內容有關的資料，由於各報提供的資料形式不一，有的年份也不夠完整。本論文儘可能整合三家報紙資料進行研究，

#### 肆、研究發現

## 一、地方新聞人力嚴重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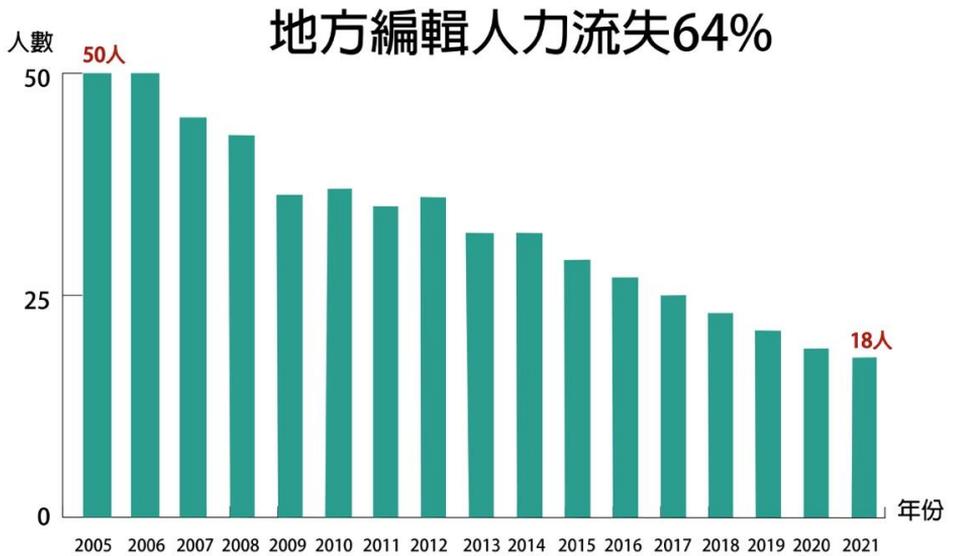
綜合三家報紙提供之地方新聞人力數字可發現，在報紙面臨收入不敷成本時，地方新聞編輯與記者經常成為裁員對象。由於地方新聞關注臺灣不同縣市報導，地方新聞人力減少也不易查覺，更顯示地方新聞衰退的嚴重現象。

1996 年時，國內每家報紙地方編輯與新聞記者約有 300 餘人，三家報社合計地方編輯與記者人力約為一千人。兩年後，根據一家報社 1998 年《同仁通訊錄》可知，當年該報社全台外勤地方記者總數為 221 人，北、中、南三個地方中心內勤編輯為 78 人，兩者合計為 299 人，隱約已有若干消退跡象出現。

由於三家報社提供的資料年份不一，也有遺漏，檢視 2003 年的資料後，已可看出地方新聞嚴重衰退。一家報社從 1996 年尚有三百餘名地方記者與編輯；2003 年時，地方編輯與新聞記者合計已銳減為 180 人。兩年後、2005 年地方編輯與記者又減為 174 人。

雖然三家報社地方記者人數不一，卻同樣呈現大幅衰退的現象。就個別報社來看，報社 A 提供的資料中，2005 年的編輯與記者人數合計還有 226 人，人力減少超過 25%。若單獨以編輯人數來看，2005 年時，地方新聞編輯人員為 50 人，之後人數一直遞減，2021 年時僅剩 18 名編輯人員。地方編輯人員人數縮減 32 人，縮減比率為 64%，亦即流失 64% 的編輯人員（圖一）。

圖一：A 報社編輯人力分布圖（2005-2021）



報社 A 的地方新聞記者在 2005 年時，全台地方記者人數為 176 人。17 年來不斷減少，2021 年僅剩 104 人。工作人力少了 72 人，縮減比率為 41%，亦即流失超過四成的地方記者。如果將編輯與記者合起來計算，2005 年時，地方記者與編輯共 226 人，2021 年時合計 122 人，流失共 104 人，比率為 46%（圖二）。

圖二：A 報社記者人力分布圖（2005-2021）



報社 B 提供的資料指出，1996 年時，地方編輯與新聞記者合計共 300 餘人。2003 年時，地方編輯與新聞記者合計已銳減為 180 人。至 2005 年仍可維持 174 人，但到 2018 年僅剩 128 人，2020 年更減為 110 人。共計流失至少 190 名、63% 地方記者與編輯人員。

報社 C 單以地方記者計算，1998 年的地方記者人數約為 221 人，2022 年的地方記者人數為 78 人。流失記者人數達 143 人，流失率為 65%，等於目前僅維持 1/3 的地方記者人數。

綜合三家報紙提供的數字，可約略估算，臺灣地方記者與編輯的流失情形嚴重。報紙進行數位轉型期間，地方新聞記者與編輯成為裁員的主要對象，編輯與記者人數減少半數以上，地方新聞元氣大傷。

圖三：三家報社地方編輯人力變化趨勢圖（1996-2021）



合計三家報社至 2021 年，地方新聞中心編輯與記者人力共銳減 62%，嚴重影響地方新聞的品質與數量（圖三）。

回想國內報紙在 1996 年數位轉型前，因有一定的地方編輯與記者人力，每天出版至少 30 個屬於地方新聞的版面。原有的地方版以縣（包括臺北市政）為單位，一個縣至少一個版。從臺北縣、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高雄、屏東、臺東、花蓮等，就連澎湖、金門等離島都有地方記者。地方記者從社會基層挖掘重要新聞，只要議題夠重要，就會放在全國版。更多的地方版面，則可呈現地方人物、地方誌以及地方民眾關心的村里大小事。

這些地方版又可透過「換版」運作，讓在地讀者可以同時看到其他縣市的地方新聞報導。一時間，全國都可以感受到，臺灣的地方社會力旺盛，民間充滿活力。

遺憾的是，數位轉型、報社財務惡化後，目前地方新聞版面能併則併。個別報社最多僅存 11 個地方版，有的報紙每天只有 7 個地方版，地方新聞版面已經減少 20 個以上。

一名報社編輯很感慨地說，在報社轉型、廣告資源大量流失時，報紙只要想要降低成本，第一個考慮的都是從地方版與地方人力著手。地方新聞編輯採訪人力，已經一年比一年少。

地方新聞人力不足造成臺灣民間新聞消失的嚴重後果，地方文史工作者、地方環保新聞等地方要聞，已經很難像傳統紙本時代進行報導。也有地方新聞主管說，在地方新聞受到報社重視時，除了縣市單位外，記者可以報導鄉、鎮、村、里等基層的地方新聞。以桃園來說，龜山鄉、復興鄉、楊梅鎮都可以是報導重點。又或者報導到宜蘭時，也會提到頭城、員山、壯圍、五結、大同、南澳等。如今這些地方新聞現在都要放棄，各地特殊的地名很難在報紙上出現，也已經看不到「記者/楊梅報導」、「記者/員山報導」；都是「記者/桃園報導」「記者/宜蘭報導」了。

同時，現在的原住民新聞更少了。一名報社主管說，以前報社有錢，可以讓記者去做關懷原住民、關懷弱勢的報導。現在報社自己就是弱勢，地方記者已經無法照顧了。

國內的地方新聞版面減少後，造成新聞大量集中於縣府新聞的結果。縣市首長成為報導重點，記者根本無法照顧鄉、鎮、村、市地方自治層級、地方文史哲，偏遠的原住民聚落等，都已無暇照顧。地方新聞失去多樣性，內容也漸漸缺乏趣味，無法從報紙版面中看到地方活力。一家地方新聞主管就說，臺灣的地方新聞已經公報化，影響實在太大。

地方記者人力不足，也會影響地方選舉相關報導，對地方民主有很大影響。就以 2018 年和 2022 年的地方新聞人力來看，2022 年地方報導人力，預估又將比 2018 下降，報導人力將更加吃緊，已經對臺灣的地方民主造成極大影響。

## 二、國際駐外記者僅零星存在

國內報紙除了地方新聞人力萎縮外，另一個受到嚴重影響的即為報社駐外記者。臺灣報紙原本駐外人員包括華府、東京、倫敦、柏林、巴黎、曼谷、首爾、香港、里約（巴西首都）等大餘個國際城市。目前臺灣報紙因為財務

吃緊，駐外記者幾乎成為新聞學的歷史名詞。

本論文訪談後得知，早期國內傳統報社聘請十餘個駐外記者，均屬常見；現在駐外特派員只有零星存在。一家報社僅保留一名華府記者；一家報社僅剩日本東京記者；一家報社則有十餘名的駐外記者，現在則是連一個駐外記者都沒了。

表二：目前三家報社駐外記者人數

	報社 A	報社 B	報社 C
駐外特派員人數	1	1	0

資料來源：各報社提供數據

三家報紙雖然仍然訂有通訊社外電，可以報導國際新聞，但沒有自己的駐外記者，就難有長期的國際觀察報導。除此之外，國內記者出國採訪，也因經費緊縮，情況不如早期。一家報社主管說，過去每年都有「臺灣要加入 WHO」的宣達團，遠赴瑞士 WHO 大會前抗議，以表達臺灣希望加入國際衛生組織的立場。

這家報社主管表示，雖然 WHO 能採訪的素材並不多，報社以往都還是會派記者前去採訪。現今，已有五年沒有派記者前去採訪了。

### 三、廣告大幅下跌，數位廣告轉移至兩大平台，報紙難生存

為了因應數位轉型，三家報社只能另新增數位新聞網，用另一種思惟來經營新聞網站，內容不同於傳統新聞的嚴格把關，目的在於增加網路新聞的流量，以賺取廣告費。「沒有流量，就沒有廣告。」報社主管說，這是傳統報紙的體會。目的就是希望能在報紙廣告收入外，新增數位廣告收入。

從報社提供的資料可知，必須承認，數位時代來臨後，兩大平台協助臺灣報紙從百萬讀者的傳統報紙規模，一躍為「年點閱」超過 25 億、甚至 30 億次網頁瀏覽的數位媒體，合計有 52%-58% 的流量是來自 Google 和 Facebook 的導流，其中谷歌的比重更高於臉書。

一家報社資料顯示，一年中有約 38.2% 的使用者是因谷歌導流，臉書則是 14.34%。若以不重複的使用者計算，谷歌導流的使用者佔 44.53%，臉書則為 10.66%。除其他導流外，直接造訪新聞網站的僅 21.36%。

另一家報社用流量前十名的新聞和流量後十名的新聞進行統計比較，發現谷歌的佔比分別為 31%、43%；臉書則為 27%、15%，可見這兩大平台的演算法，各有不同的新聞選擇標準。除其他來源的導流外，直接造訪該新聞台網站的比率僅為 12%-17%。

由上述資料可知，媒體近六成的使用者，是因谷歌和臉書來增加流量，由此可知，報紙的新聞網站對平台已有相當高的依賴性。報紙的數位新聞網順應不同平台的演算法則，目的在於增加自己的流量，並因此提高自己的數位廣告收入。根據一家報社的資料顯示，報紙的數位廣告則是成長 616%，由此可窺見臺灣報紙大致的廣告收入結構。然而，數位廣告版位販售金額極低，並無法彌補傳統廣告的流失。

從營收數據來看，臺灣報紙經歷數位轉型，報紙生存的難題因此形成。一名報社主管說，就廣告收入來看，1996 年時，臺灣廣告約 460 億（新台幣），報紙媒體的廣告量約達 110 億。2020 年時，臺灣的廣告量約是 600 億，卻大量轉到數位廣告（482.56 億），臺灣報紙廣告收入合計只剩 11 億。2021 年媒體調查，報紙的收入已經跌破 11 億了，只能用「雪崩」來形成報紙的現況。

如今，三家報紙也努力爭取數位廣告，卻發現兩大平台公司谷歌和臉書分食數位廣告，目前臺灣沒有任何機構，可以提出兩大跨國平台數位廣告的具體佔比，一般估計平台約佔數位廣告的八成左右。

然而，數位廣告牽涉複雜的程序購買，不論是英國、澳洲的數位報告，都指出程序化購買過程與定價不透明的問題。數位廣告機制除造成平台壟斷、媒體無法議價的問題外，更主要原因是因為谷歌和臉書在未對新聞內容進行付費的情況下，大量使用報紙新聞內容，藉此獲得大量使用者數據資料，再使用這些數據獲得廣告收益。

媒體數位轉型後，大量新聞網路化，又以報紙受到的衝擊最大。在谷歌推出搜尋引擎、臉書建立社群媒體後，民眾開始上網搜尋新聞、或是上臉書

閱讀朋友推薦的新聞。這兩個平台為了留住使用者，以便藉此收集使用者更多的個人資料，然後賣給廣告主，最常見的做法就是大量使用新聞。

谷歌和臉書有一個共同的邏輯，就是使用媒體的標題供使用者搜尋與閱讀，報紙的標題因此受到平台無償使用。又或者，報紙媒體的照片遭縮小為姆指大小，配合標題供搜尋與分享，這樣的商業行為完全不須付費給提供內容的媒體。也因此，報導新聞數量最多的報紙，在媒體中受害最深。

換言之，谷歌和臉書兩大跨國平台從未聘請任何一個記者來往產內容，卻是目前臺灣民眾最主要的新聞來源。他們不但未曾因為使用媒體內容而付費，還能因為平台的導流作用，與報紙等媒體分潤。

一家報社的內部資料指出，在 2013 年以前，實體報紙的廣告年收入超過二十億，數位化後開始減少收入，2015 年僅剩 14 億，數位廣告卻只增加 0.8 億。2018 年實體廣告只剩 8 億，比 2013 年前損失 12 億以上，數位廣告卻只增加 2.5 億。到 2021 年時，數位廣告增加到 3.2 億，實體報紙廣告卻只剩 3.5 億了。

表三：國內報紙廣告與數位廣告消長現況（以一家報社為例）

年份	印刷報紙廣告收入	數位廣告收入	合計
2013	20 億以上	0	20 億以上
2014	18 億	0	18 億
2015	14 億	0.8 億	14.8 億
2016	12 億	1.3 億	13.3 億
2017	9.8 億	1.8 億	11.6 億
2018	8 億	2.5 億	10.5 億
2019	6.5 億	3 億	9.5 億
2020	4.5 億	3 億	7.5 億
2021	3.5 億	3.2 億	6.7 億

資料來源：報社提供

有報社指出，報紙廣告從 2006 年到 2021 年平均衰退 86%。其中，房產業從 2006 年到 2021 年衰退 96%；汽車業同期間同樣衰退 96%；金融業衰退 93%；3C 家電業衰退 92%；文教唱片業衰退 88%。

網路流量很像傳統報紙發行的概念，最主要目的其實在於獲得使用者資料。谷歌自 2000 年開始進行關鍵字廣告，2006 年關鍵字結合人口學資料，2009 年結合個人興趣，2011 年結合地區，這些資料成為廣告主歌頌的「精準廣告」。

臉書社群媒體強調實名制，透過使用者註冊、設備和地區細節配對，結合觀看和分享的數據，再結合其他內容關鍵字，便可自動化為程式，這些資料可以確認使用者和他們的研究背景，另外也有軟體來解析數據，都可提供給廣告主。廣告主更相信谷歌和臉書的廣告力量，報紙等新聞媒體幾乎失去民眾的關注。

由於這樣，報紙即使努力進行數位轉型，仍無法有效增加報紙收入。廣告大量衰竭後，報紙已無法扮演聘請最多記者、提供多元新聞的傳統新聞使命。如此一來，不但臺灣的新聞發展受到影響，國內辛苦建立的民主基礎，也可能因為缺少記者的報導，形成資訊傳達失能而出現警訊。

如今，全球的廣告市場因此向谷歌和臉書大量傾斜，媒體成為主要受害者。為了避免新聞民主基礎動搖，歐盟、澳洲等國家先後立法保護新聞媒體，再與平台展開協商。臺灣必須邁出第一步，協助媒體在法律基礎上，得以要求平台為使用的新聞內容，付出合理的費用。

## 伍、結論

本論文以國內報紙地方記者、國際特派記者消退、廣告經費嚴重下滑等情形。在這樣的前提下，新聞媒體對平台的依賴卻愈來愈深，說明平台和新聞媒體產業間的複雜關係。

然而，本論文之所以關注這個議題，並非因為報紙產業的利益受損，而是如果臺灣失去報紙媒體，臺灣很可能將失去提供重要訊息與公共言論的空

間，將造成民主社會新聞自由、民主監督的功能失調。

傳統媒體的邏輯和社群媒體不同。傳統媒體為了大眾能接受，以中立（neutral）為主要目標。大眾媒體在強調獨立與客觀的前提下形塑真實，並且因為群眾不在新聞現場，而取得報導者的發言位置，並被當成公共領域（van Dijck, & Poell, 2013, pp. 3-5）。這樣的新聞媒體，一直是以生產有品質的內容為主要目標，也形塑長期來「內容為王」的商業模式。媒體多元性（media diversity）是民主社會對媒體角色的想像，同時，媒體也必須反映異質社會的需求（Helberger, 2018, p. 155）。媒體和多元、民主參與兩個概念緊密相連，也說明媒體在社會立足的必要性。

當然，本論文也了解，國內新聞媒體之所以失去競爭優勢，未必都與平台有關。新聞媒體追求網路流量，造成內容淺碟化、政治極化；更有若干傳統新聞媒體使用未經查證的平台內容，導致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界線模糊。

讓人憂心的是，新聞媒體因為生存困難，已經失去產製優良品質的動力。在尚未找到更好的商業模式時，對臺灣的民主和社會成長，不可能沒有影響。現在已有研究指出，社群平台演算法與數據已經改變政治市場，甚至改變了民主（Hughes, 2018, p. 87），這才是值得眾人關心的。也因此，不能讓平台形成言論宰制的後果，傳統媒體為大眾提供優質的新聞內容，還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澳洲政府立法起頭後，國內相關政府機構亦應正視平台對臺灣新聞媒體的嚴重影響，進而協助新聞機構和平台對等協商與議價，新聞媒體同時積極尋找可以生存的商業模式；此外，平台在臺灣市場取得如此多的廣告資源，更應該為臺灣這塊土地盡力。臺灣社會大眾也可要求平台贊助公共新聞報導，因為這類報導民眾未必點閱、卻是民主需要的新聞內容。如此，應可協助重要的新聞產業得以復甦。

## 參考書目

- 台灣蘋果日報 (2021 年 5 月 18 日)。〈《台灣蘋果日報》給讀者的一封信：忍痛決定本月 18 日起停刊〉，《蘋果新聞網》。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property/20210514/C7SRK6HJQZGZJEJAAGHZMAF6JY/>
- 江雅綺 (2021 年 2 月 22 日)。〈「新聞有價」之戰，臉書祭封殺、Google 為何願意對澳洲讓步〉，《報導者》。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why-google-caved-to-australia-news-media-bargaining-code>
- 李伊晴 (2020 年 6 月 1 日)。〈台灣最後一份晚報掰掰！創刊 32 年 聯合晚報明起停刊〉，《今周刊》。取自：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732/post/202006010008>
- 林育瑄 (2021 年 4 月 14 日)。〈公平會：媒體議價法牽涉廣泛 需跨部會討論〉，《中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104140187.aspx>
- 葉冠妤 (2020 年 6 月 19 日)。〈紙媒撐不住·蘋果日報將裁員 員工爆：至少砍 70 到 100 人〉，《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4646958>
- ACCC(2020).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 Australian Competition & Consumer Commiss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ccc.gov.au/focus-areas/digital-platforms/news-media-bargaining-code>
- Arvidsson, A.(2016). Facebook and finance: On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derivativ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3(6), 3–23.
- Bossio, D.(2017). Big data, algorithms and the metrics of social media news. *Journalism and Social Media*.89-109  
DOI 10.1007/978-3-319-65472-0\_5
- Brake, D.R.(2017). The invisible hand of unaccountable algorithm: How Google , Facebook and other tech companies are changing journalism. In J. Tong and S.H.Lo(Eds.),*Digital technology and journalism* (pp.25-46).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Burgess, J.& Green, J.(2009). *YouTube: 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Cambridge, UK: Polity.
- Cohen, J.N.(2018).Exploring echo-systems: How algorithms shape immersive media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10 (2), 139-151.

- Coster, H.(2021, Jun 10).Google, Facebook pledged millions for local news. Was it enough? *Reuter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media-telecom/google-facebook-pledged->
- Cox, A.( 2022, February 9).Dive deeper into local news with News Showcase.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google/products/news/local-news-showcase-product-updates/>
- Croteau, D., & Hoynes, W. (2006). *The business of media: Corporate media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Culpepper, P.D. & Thelen, K.(2020). Are we all amazon primed? Consumers and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 powe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3(2), 288-318.
- DeVito, M.A.(2016).From editors to algorithms: A values-based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story selection in the Facebook news feed. *Digital Journalism*, 5(6), 753-773.
- Dwyer, T., & Martin, F.(2019).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in a sharing ecology. In F.Maryin., & T. Dwyer (Eds.), *Sharing news online: Commendary cultures and social media news ecologies*(pp. 285-304). ebook. Palgrave Macmillan.
- Filloux, F.(2020, December 7 ).Did Google and Facebook kill the media revenue model? Monday Note. Retrieved from <https://mondaynote.com/did-google-and-facebook-kill-the-media-revenue-model-7aa86c425c4a>
- Gillespie, T.(2010).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12(3) , 347-364.
- Helberger, N.(2018). Challenging diversity-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a new conception of media diversity. In M. Moore & A.D. Tambini(Eds.), *Digital dominance:The power of Google, Amazon , Facebook and Apple* (pp.153-175). London,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ghes, A.(2018).Market driven political advertising: Social, digital and mobile marketing, (eBook),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Jhally, S. (1982). Probing the blindspot: The audience commodit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6(1-2), 204-210.
- Kulich, R.(2022). News showcase is launching in Slovakia..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google/around-the-globe/google-europe/news-showcase-launching-slovakia/>
- McQueen, H. (1977). *Australia’s media monopolies*. Melbourne, Australia: Widescope
- Meehan, E. R. (1984). Rating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A third answer to the commodity question.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 216-225.
- Mihailidis, P.( 2019). Normalizing fake news in an age of platform. In M. Zimdars & K. Mcleod(Eds.), *Fake news: Understanding media and misin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pp.341-349). London, UK: The MIT

- Press.
- Noble, S.U.(2018). *Algorithms oppression: How search engines reinforce racism*.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O'Neil,C.(2016).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New York, NY: Crown Publishing Group.
- Pariser, E.(2011).*The filter bubble: How the new personalized web is changing what we read and how we think*. New York, NY : Penguin Books.
- Picard, R. G. (1989). *Media economics: Concepts and iss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Picard, V. (2020).Confronting the misinformation society: Facebook 's"fake news" is a symptom of unaccountable monopoly power. In M.Zimdars & K. Mcleod(Eds.), *Fake news: Understanding media and misin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pp.123-132). London, UK: The MIT Press.
- Rahman, K.S. & Thelen, K.(2019).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business mode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Politics & Society*, 47(2), 177-204.
- Schou, J.& Farkas, J.(2016). Algorithms, interfa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Interrogating the epistemological challenges of Facebook. *KOME*, 4 (1), p.36-49.
- Simpson, D.(Ed.).(2016). *The use of big data: Benefits, risks, and differential pricing issues*. New York, NY : Nova Publishers.
- Smythe, D.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 1-27.
- Smythe, D. W. (1978).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2), 120-129.
- Srnicek, N.(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Steinberg, M.(2019). *The platform economy: How Japan transformed the consumer internet*.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trowel,A., & Vergote, W.(2019).Digital platforms: To regulate or not to regulate? Message to regulators: get the economics right first, then focus on the right regulation. In B. Devolder (Ed.),*The platform economy : unravelling the legal status of online intermediaries*(pp.3-30).Cambridge, UK: Intersentia.
- van Dijck, J., & Poell, T. (2013).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logic.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1), 2-14.

## **Negative Impact from Platforms on Print Newspaper: The Alert for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Chao Chen Lin

### **ABSTRACT**

Due to the power of online technology, the cross-nations-platforms have the benefits of advertisings. The legacy media, especially newspapers were affected most.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 this paper interviewed three main newspapers to figure out the adverse impact from the platforms. This article found: first, the local journalists and foreign corresponds of newspapers have decreased seriously, the freedom of market place is hurt. Second, the online advertising developed 616%, the print advertising declined over 90%. The low income for newspapers is hard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reporting. Third, More Than half ( 52%-58%) traffic of online news websites are from Google and Facebook. The dependency on platform is obvious in the business of newspapers. This paper argues the serious problems in the decline of newspapers for Taiwa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to concern and adopt some ways to save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Keywords:** platforms, democracy, journalism, newspaper, Google , Facebook

---

\* Chao Chen, Li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傳播 文化 與政治 · 第十六期  
2022 年 12 月

## 當代公共知識分子： 杭士基（Chomsky）座談會

與談人（依發言順序）：

馮建三 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李泳泉 台北藝術大學兼任教授

李行德 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榮譽教授、通識教育部主任

傅大為 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榮譽教授

汪宏倫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主持人：

郭力昕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兼任教授

### 本文引用格式

傅大為、馮建三、李泳泉、李行德、汪宏倫（與談）、郭力昕（主持）（2022）。

〈當代公共知識分子：杭士基(Chomsky)座談會〉，《傳播、文化與政治》，16:165-224。

---

投稿日期：2022 年 10 月 10 日；通過日期：2022 年 11 月 10 日。

## 杭士基座談會緣起

傅大為

這個座談會緣起於我的科技部的專書寫作計畫，研究基進知識分子的行動軌跡，以杭士基、傅科二人為主。它有經費舉辦一兩個小型的座談會，分別討論杭士基與傅科二人。今年春末，我與平日常討論杭士基與媒體的郭力昕與馮建三聯絡，希望能夠一起籌辦一個半公開的杭士基座談會。後來我們分別推了兩三位引言人，一共五位，並請政大傳播學院院長郭力昕為座談會的主持人。同時我們引言人等也分別邀了一些有興趣的朋友來參加座談會的自由討論。結果大家討論的十分熱烈，部分也是因為在今年二月俄烏戰爭以來，杭士基多年來對國際政治與美國世界霸權的分析，更形重要。後來這個座談會文字的出版聯繫，要感謝馮建三的居中聯絡。而座談會逐字稿的完成與校定，乃至多方聯絡，要特別感謝我的計畫助理王珮瑩與吳奕臻。

**郭力昕：**基進知識份子的行動典範，今日也許比任何時代都更需要我們瞭解與參照。在學術量化生產與評鑑機制規訓著這個世代的學者、嚴重失去成為公共知識份子/基進行動者之氣力與熱情的時代，深入討論杭士基、傅科或薩伊德這樣的典範，也許是重新凝聚行動之決心與勇氣的必要工作。

傅大為教授研究杭士基與傅科的專書計畫，邀馮建三與我為此計畫之杭士基研討會推薦引言人選。建三除了推薦人選，也能貢獻杭士基對美國／西方主流媒體與政治的意見；我的主要貢獻是推薦了熟悉杭士基語言學專業成就及其政治評論寫作的語言學家、也是我的大學老師李行德教授，參與此研討會。大為特別邀我主持此次會議，讓皮毛地瞭解杭士基的我十分心虛，只能勉力擔任一個串場的角色。

我是政大廣電系兼任教授郭力昕。今天謝謝大家上線，共襄傅大為老師此研究計畫中的研討座談活動。我很快地介紹幾位今天的引言人。今天的引言順序是先由馮建三老師開始。馮建三是政大新聞系教授，研究領域是媒體的政治經濟學、電影政策，以至於拉丁美洲政治歷史研究。他也是台灣公共媒體政策的重要推手，以及台灣媒體改造運動的先驅和精神領袖。馮建三會介紹英文出版品回應《製造共識》這本書 34 年來的種種。

接下來是李泳泉老師。他從世新大學退休，目前是台北藝術大學兼任教師。他是紀錄片的資深研究者與創作者。李泳泉會以《製造共識》這一本書為借鏡來看台灣的媒體。

第三位講者是李行德教授，他是香港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的榮譽教授，目前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部主任。他的學術領域在語言與認知，語言獲得或者是語言可習性的問題。特別提一下：2010 年杭士基訪問台北跟北京進行演講時，兩地使用的介紹杭士基的手冊是由李行德組稿；手冊裡關於杭士基談知識分子責任，或者是批判主流媒體的這些相關文章，也是由他挑選。在 2019 年，行德就香港政治反對運動的一些問題，曾與杭士基有過幾次電郵的交流。李行德今天將談杭士基論知識分子之責任這個題目。

第四位引言人是傅大為教授，他是陽明交大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榮譽教授。1990 年傅大為出版了《基進筆記》以及接續的《知識與權力的空間》等書，超過 30 年前就提出基進這個詞，並討論知識分子的責任。傅大為的研

究領域是科學史、科學哲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性別與醫療，甚至台灣近代文化史等等。傅大為今天要談杭士基談大學及其時代功能。

最後一位引言人是社會學家汪宏倫教授。汪宏倫是中研院社會所的研究員，他的研究領域是文化社會學、歷史社會學和社會理論。他的研究成果現在主要集中在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研究，以及戰爭與和平，或和解的社會學。汪宏倫要從社會學視角管窺杭士基的公共論述。

現在請馮建三先開始發言 10 分鐘。

**馮建三：**謝謝大為推動，讓我有機會與動力，尋找並整理資料，準備這次引言。購入赫曼（Edward Herman）與杭士基合著的《製造共識》英文本將近 30 年，卻至最近兩年多，我才認真閱讀、細作筆記。該書的 1988、2002 與 2008 年版本，正文相同，2002 年新添兩位作者的導論，經驗材料增加至 1999 年，2008 年再由赫曼另撰「跋文」檢視美英入侵伊拉克後至 2008 年 7 月的媒介表現。北京大學中譯版在 2011 年問世，去年底是台北的野人文化譯本，都用 2002 年版。

這本經典著作有理論、有個案研究。理論是「宣傳模式」（Propaganda Model, PM），它說，生活在美國的人，通過「五個過濾器」得知外界事務：媒介的產權及其利潤導向、以廣告作為主要財源、大眾傳媒新聞的消息來源、重炮抨擊，以及，反共意識形態。這五個「製造共識」的元素，先前的論者都已個別提及，但合併觀察，並以豐富個案論證，應該首見於本書。對於美國人來說，本書用以檢視模式者，都是海外事件與新聞，但杭士基主張，PM 不僅適用於國際新聞的分析，用在自由體制的國內要聞，同樣可信，後文將再舉例。

五個過濾器當中，前三個容易理解，「重炮抨擊」則指當新聞不利於權勢集團之時，後者會通過智庫、遊說、捐款、投書、活動或法律訴訟……等等手段，淡化或反擊該類新聞。因此，煙草商曾經散播消息，說科學研究指抽煙致癌並非定論；石化產業用力資助智庫，表示暖化是否為真、是否肇因於排碳，科學界還有爭論……等等。「反共意識」在「蘇東波」（「蘇聯與東歐非共化」）之後，變裝繼續存在，從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一直到反恐、

專制與威權國家的威脅……等等，都是製造敵人的新訴求。

《製造共識》出版當年，《紐約時報》的書評說：「通過極為細緻的…系列個案研究…本書比對原始資料，提出令人信服的指控，認為新聞媒體掩飾過失也在欺瞞…」，但兩位作者「有時言過其實，減弱了論點」的說服力。《洛杉磯時報》則說，該書「最有價值的部分來自各個案研究，單就這些部分來說，各大新聞及公共事務學院所要培養的未來海外特派員及國際版編輯，應該都將這部作品列為必讀」。

次（1989）年，美國的學院新聞旗艦刊物 *Journalism Quarterly* 只有第一句「這是一本重要的學術作品」是好話，其他則數落方法，暗指不客觀。同年，英國的傳播政治經濟學代表刊物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評論五本著作，認為該書「高度是決定性觀點」、「認定菁英的內部爭論是枝微末節」，沒有分析經濟的動態過程對傳媒的作用。因此，PM 模式「可以當作起點，但沒有必然要…是結論」。

美國傳播領域的旗艦季刊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在 1990 年刊登 4 頁書評說本書「很多材料具有說服力，有些會有爭論，另有些讓人質疑」，但作者「沉溺在…刺耳的道德宣告，只能破壞作者在很多讀者心中的公信力。」該文擔心，兩位作者的寫作風格使然，最能從該書受益的學生與新聞人，可能為之卻步；「不過，主流社會科學若就此…將這本書當作稻草人來摧毀，指這就是左派傳媒批評，那麼，這就很不幸。整體說來，本書的各論點與發現，值得所有研究大眾傳媒與政治的學者認真對待，雖要批判觀之。」

毫無保留而完全讚賞《製造共識》的兩篇書評，都不在新聞傳播領域。《當代社會學》說，該書以政治經濟學解釋大眾傳播，「這是定本」、「新聞與傳播及社會學，還有政治科系，探究政府與企業財團與傳媒的複雜關係，都應該必讀」。《當代亞洲》盛讚「這是一本高度可讀，引人入勝的書，手法與研究無懈可擊…這份豐盛的成就，是兩位學者在過去三十年來的洶湧年代，所有相關作品的綜合。」

書出四年，書評 10 篇，3 篇報章，7 篇學術。2 篇完全讚賞，肯定多於負評 2 篇，徹底負評 1 篇，負評多於肯定 4 篇，正反各半亦有 1 篇。有人認為《製造共識》的 PM 模式遭致「邊緣化、冷淡對待」，特別是最可能，

或最應該將該書列為教材的（英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反而指其機械化等等。

這裡，有兩類問題需要討論。（一）負面評價的理由，能站得住腳嗎？（二）十篇評論是否仍然是邊緣化？這得看比較的標準，也要用時間檢驗。

時間所限，無法申述負評是否成立，僅須強調，細心的讀者應該可以發現（特別是最後一章），兩位作者對於認真的記者、另類媒體與公共媒介，是有肯定，即便對其侷限，心知肚明。赫曼與杭士基無不勤奮，要指他們無視於群眾的反抗潛能與行動之重要性，就太奇怪了。《製造共識》提及但沒有就此特別著墨，是書的性質所限制。

第二類問題，何以直至 2010 年，都有《製造共識》的支持者蒐集證據，打抱不平，抨擊（傳播及人文社會）學界沒有更多、更有效地推廣該書的證據與論點，甚至將該書邊緣化、「打入冷宮」？

兩個可能的答案。一個是支持者拉高標準。第二個是，支持者認為《製造共識》即便已經處理了傳統與批判理論的差別、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分野，結構限制與人之動因等等問題，但如同兩位作者的預期、也如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預期：「批判理論…與流行的思考習慣逆向而行…也就讓人覺得它有偏見也不公正」，於是接納既少也慢。

這兩個答案是否讓人滿意，是一回事。但隨時間推移，另一個看法會是，《製造共識》得到了愈來愈多的支持，杭士基最慢在本世紀第一年或上世紀末，在回答提問的時候，就有這樣的表述：「累計至現在，已經有其他人以很多類似材料，數以千頁計，通過圖書或論文確認了 PM 模式。我甘冒風險這樣說：PM 是社會科學得到最多確認的論證之一。」這是真的，不是杭士基的夫子自道。

非正式的統計，從 2002 至 2021 年，不含引述，而是討論 PM 模式或涉及《製造共識》一書的期刊文章最少應該有 30 餘篇（甚至有一篇來自商學院，要「解釋品牌說服與製造消費者共識……」！）。另有電視頻道在該書出版 25 年與 30 年，製作了三支回顧與推廣的影片。從 2013 至 2021 年，至少又有四本書，從其書名，可以推知這些作者是向赫曼與杭士基致敬，是在肯定《製造共識》的分析架構，它固然需要更新與調整，但價值長青。四本

書依序是《在二十一世紀重啟赫曼與杭士基的宣傳模式》(2013)、《今日宣傳模式：篩選意識與注意力》(2018)、《資訊時代的宣傳：仍然製造共識》(2019)，以及，《瞭解二十一世紀的傳媒宣傳：再訪與修正製造共識》(2021)。美國政治學者狄瑪吉歐(Anthony DiMaggio)從2008至2020年出版的五本書，書名雖然無法看出，但以美國國內議題為主的經驗研究與論證，大量引述(158次)也支持兩人著作的論點，尚未列入前述計算。最後，查詢 google scholar，在新聞傳播領域引述較多的十一本圖書，《製造共識》高居第一(查詢日期：2022年6月21日)：

Manufacturing consent\*得到 11221 次引述，後十名依序是\_\_\_\_\_

Comparing media systems\*：9125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8245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565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4414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2551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2340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2184

Digital capitalism：2005

Researching communications：1778

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the mass media：445

\*指在台灣有中文譯本。

這個愈來愈多支持的意義，怎麼理解？

是現實不變或變本加厲，使得當年對美國一時一地的檢視與反省及批評，擴及於更多地方更多議題，從而是一種無法讓人欣慰的發展，如同有犯罪才有警察，犯罪多警察多，警察不會欣喜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比喻不妥，先請見諒)。或者，不宜這樣看待，這是顯示日積月累，知識與洞見從來沒有不見天日，並且愈來愈普及，早就從邊緣突破，已經進入更多領域，得到更有效的推廣學習，有益人心，從而是糾正世道的重要環節，逐漸打通？

在不同地方討論這個問題，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從而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在台灣，若是容許我以自己作為例子，則必須承認，儘管我如同很多人，知道也推崇並讀了杭士基與赫曼的著作，但必須反省，何以我只是蒐藏英文本三十年、中文簡體版十一年，卻直至五、六年前才開始列《製造共識》為參考？細讀該書也才僅是兩年多以前？直到去年底繁體中文版問世，今年才第一次將《製造共識》列為教科書。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我自己在這個領域教研三十年的人，這麼晚才以本書作為教科書？可能的原因還須檢討，但明確知道的是，促使我從聞其名、敬重其人、贊同其主張，但沒有更進一步探討杭士基與《製造共識》，再至近年來有了覺悟，以相對多一些的時間閱讀《製造共識》等著述，是因為兩岸關係的變化使然，使得杭士基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意見與他對傳媒的解剖，更加有必要推廣，增加學子與世人接觸的機會。

**郭力昕：**謝謝建三，每位引言人準備的內容很豐富，時間不夠的話可留到第二輪。接下來請李泳泉。

**李泳泉：**以「製造共識」為鏡，探看台灣媒體。很榮幸有機會在空中跟大家平起平坐。今天我要借鏡《製造共識》的理念，來探看台灣媒體的一些現象。基本上是屬於過去的，而且也算不上是我們最核心的問題，但我覺得還是有參考價值。

在《製造共識》中，Chomsky 用力解構、批判《紐約時報》。我們知道，很多知識份子都認為《紐約時報》是最具代表性或者最有公信力的媒體之一。如果連這樣的媒體，都還這樣不堪檢驗，是以，Chomsky 就很自然地希望大家能夠儘量將觸角延伸往另類媒體。在《製造共識》中，在電影和文章裡 Chomsky 都談到了，他做了一個比較：《紐約時報》在 1970 年代後半，對於赤棉和印尼分別在柬埔寨和東帝汶的大屠殺。事實上，媒體對這兩個事件的處理極為懸殊。Chomsky 用這個案例來探討其中的結構性影響機制，讓非常龐大複雜的課題，變成可以理解。依此類推，其他的媒體，甚至是非常軟性，看似無害的媒體，其實也都可以算是廣義的共犯。在當年美國創造了「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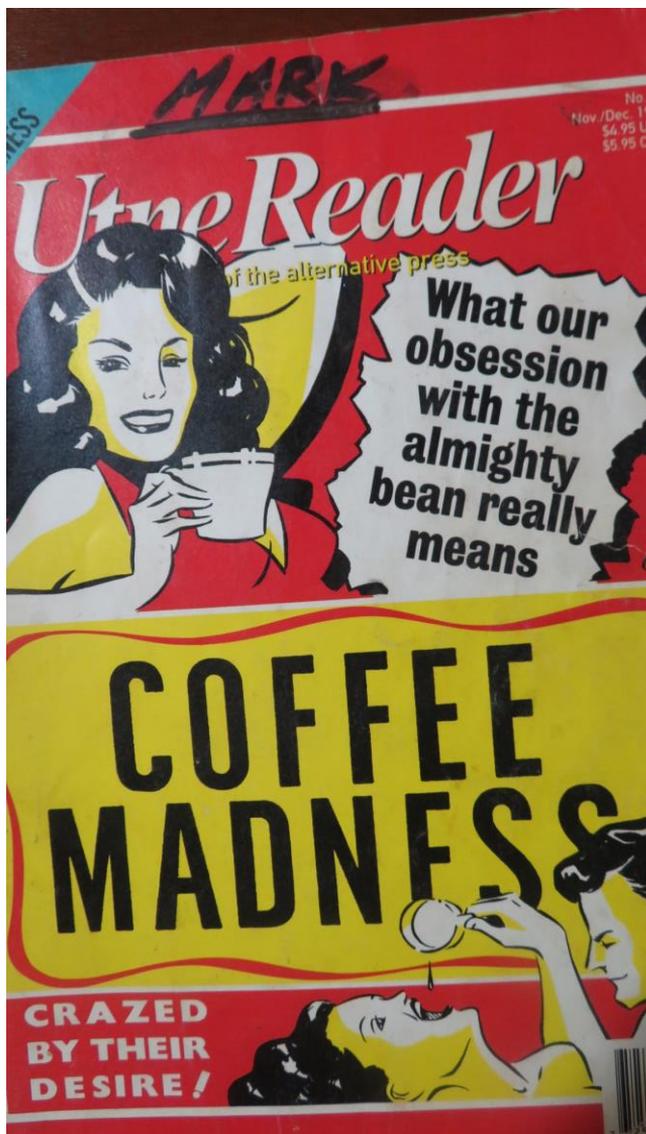
戮戰場」這樣的說法，指涉赤棉統治下的柬埔寨，同時也大推《殺戮戰場》這部電影。



《殺戮戰場》電影彰顯了美國記者的大愛，然後順勢轉移了美國轟炸所造成的傷害。1997年5月中文版《讀者文齋》登了這一篇〈殺戮戰場遺事〉，以非常溫馨感傷的調性，報導電影《殺戮戰場》中的狄潘本人，弔唁影片中飾演他的演員吳漢。用這樣的方式，非常軟性地，再度提醒我們那不堪回首的「殺戮戰場」。這只是眾多美國的「主流共識」，如何不著痕跡地滲透在各種媒體裡面的一個例子。

接下來我要借用 Chomsky 的比較方式，來談一個對照組：其一個 *Utne Reader* 這一份在美國發行的另類雜誌。1994年11-12月號，有一個專題企劃，叫做〈COFFEE MADNESS〉。這個單元對於咖啡發展的歷史、地理、社會文化、產業變遷、健康影響、生態衝擊、國際經濟鏈各方面的結構性的介紹和析論，非常具體清楚，文筆生猛活潑，搭配各種圖示邊欄，宏觀且有細節的舉例，那是一套非常容易進去整個結構性的題的介紹。其中所使用的各種標題，例如 *Muddy Waters*，又如以 *Coffee Time* 此一 title 來講述咖啡發展簡史，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則善用海明威的短篇小說的的題目，以星巴克為例，闡釋其空間所創造出來的氛圍，那種中產階級的沉味，這一些都是幽默雙關而且意有所指。他用這樣的方式，可以非常結構性地將咖啡議題的各個面向呈現出來。





反觀《誠品好讀》在 2003 年第 33 期有一個單元叫〈咖啡道 vs 茶功夫〉，關於茶跟咖啡的發展，這個單元是休閒的、旅遊的、消費的、文化的、布爾喬亞風的介紹，其作者群包括葉怡蘭、舒國治、韓良露等，以及對廣告名人許舜英等的訪談等等。總體上，整個單元就是優雅中產的散文風格。事實上，我們知道，「誠品」多少代表著國內知識菁英的品味，其去政治的慣性卻相當成熟、不著痕跡，反映出台灣長久的威權統治，導致很多人害怕涉入政治，怯於批判的、保守消極的文化。

1990 年代，台灣好不容易出現一份「另類週報」《破》。很多年下來，我的確從《破》上讀到一些在其他媒體不容易看到的好東西；可是，長期觀察下來，《破》的缺點卻還是遠遠超過它有限的優點。底下的這幾點是，我對《破》的一部分觀察。

《破》的最主要的缺點，第一個部分是重在表態。很多作者編輯要表示自己很左、很進步，卻常常顯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那種任性；可是在文章裡面，你會發現無心也無力求真，無法作理性的析論。在 2004 到 05 年之間，連續很多期《破》強力報導「搶救樂生運動」。事實上，這個課題是值得報導，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讀進去的話，發現其中充滿激情卻很少論理，幾乎一概都以「周肥」來稱呼當時的台北縣長周錫瑋等等。對於 2008 年開始的「野草莓運動」，表面上並不是非常盛大，可是它其實影響深遠，

包括「反國光石化」、「反迫遷運動」，甚至「太陽花運動」都受其影響；可是對於這個運動卻完全不置一詞。所以可以明顯看出其嚴重偏頗。另外，我們如果仔細看《破》的每一篇〈編輯手記〉。大部分都會接近「自嗨式的囁語」，輕佻而且不知所云。譬如，復刊第 767 號的〈編輯手記〉，我念一段：「……下半年搖搖晃晃不安，例行必須排予脊椎整建、失眠焦慮不留情地襲來。多數用鍵盤打字，不時落入困挫陷阱客氣禮貌催稿聯繫偶爾詞彙聯想而腳下急躁步顯露，不成優雅調度的媽媽桑送往迎來……」以上是 editorial 的一段，整篇都是這樣的寫法。

再者，在 2001 年評江文瑜的小說《山地門之女——台灣第一位女畫家陳進和她的女弟子》那篇書評〈誰眼底的陳進？〉中，作者寫道：「……江文瑜近年來的許多活動，都彰顯了她旗幟分明的政治立場，諸如她採訪並撰寫《阿媽的故事》、《消失中的台灣阿媽》……既談阿媽為何一定要『台灣』？如果我們只是要透過歷盡滄桑的老年女性見證歷史……並讓我們從他們生命中看似平凡卻動人的奮鬥中獲取養分，那麼是不是『台灣的』阿嬤有什麼關係？……江文瑜毫不帶批判或保留陳進對日本文化的熱愛，對櫻花精神的憧憬，卻忽略了同時有多少日本年輕人懷抱著這種櫻花般短暫美麗的精神屠殺、破壞、奔向死亡，又有多少台灣的年輕人死在幽暗的南洋雨林裡……」從這些部分，我們可以看出來，所謂書評，於此，顯然聚焦在書評者對原書作者的政治立場的反感，而不是對這本著作的檢視、導讀或批判。

這些部分，我們可以看出來，儘管《破》很努力的要走出一條獨立的、另類的路，但其問題事實上是非常非常之多。後來印行《破》報的世新大學，以年年虧損為由停辦。當然，台灣長久扭曲的媒體環境下，要辦一份進步的週報，委實非常不容易。我們期待它越來越好，可是它卻倏然消失了。就此觀之，台灣長久以來的威權統治與近 40 年的戒嚴，基本上造就了太多乖乖讀書，謹小慎微的學子。當我們終於爭取到民主自由，過去的高官還大言不慚：「沒有戒嚴，哪來自由民主？」「戒嚴只影響了不到 1%的人」等等。在這樣的環境裡，在長久的報禁底下，台灣的媒體多半淪為傳聲筒或者化妝師。台灣的媒體生態本來就很脆弱，近年來網絡媒體席捲而來，假消息更難杜絕，也難免充斥著非理性的謾罵與發洩，這部分當然令人擔憂……

最後的部分，我想提一下最近幾個月來最令人焦慮的俄烏戰爭；我一直覺得無法從平面、電子或網路媒體上，得到大致具體的圖像。所以想要請教各位，大家如何看待這場戰爭？或者大家認為 Chomsky 如何看待普丁？Chomsky 如何批判俄國？會不會如他批判美國那般嚴厲？

謝謝，我們先到這裡，謝謝。

**郭力昕：**謝謝泳泉。剛才馮建三針對《製造共識》一書過去以來各方的一些評價，跟它的影響，幫我們做勾勒。那麼李泳泉就通過《製造共識》裡面的媒體批判，檢視了台灣媒體的一些實務和文化現象。接下來換個方向，請李行德老師從 Chomsky 關切知識分子的責任談起。

**李行德：**首先謝謝大為老師邀請我參加這個研討會，非常感謝有機會向大家請教，也謝謝剛剛力昕老師的介紹。我說明一下，剛剛提到 2010 年 Chomsky 訪問臺北和北京，很高興那次負責統籌整個 Chomsky 台灣跟大陸訪問的黃正德老師今天也在場，我們那個時候主要是配合他的籌畫，做了一部分工作。

我想今天主要是一個讀書報告，〈知識分子的責任〉這篇文章以前看過兩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沒有看完，或只是看其中一部分。為什麼會這樣？待會我介紹了，大家會比較清楚。這次我是認真的讀了。這篇文章內容非常豐富，因為時間關係我就講 ppt 四個個部分前面兩個，有時間的話再談第三和第四部分。

首先介紹 Chomsky 關於知識分子責任的幾篇論述，這裡介紹三篇，當然最主要的是 1969 年的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我原來不知道有沒有中譯本，後來查了一下，202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 *The Essential Chomsky*，<sup>5</sup> Anthony Arno 編的，整本翻譯了，也翻譯了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是 1966 年初 Chomsky 在哈佛大學一個學生聚會上的講稿。最初刊登在一個學生刊物 *Mosaic*，接著 1967 年刊登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然後 1968 年收錄到 Theodore Roszak 主編的 *The dissenting academy* 一書，隨後 1969

---

<sup>5</sup> 諾姆·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68 [2021] 《喬姆斯基精粹》(美) 安東尼·阿諾夫 (Anthony Arno) 編；李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收進 Chomsky 自己的文集，*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這是一篇宏文，59 段都沒有空話，都有很多資訊。1969 年的版本 43 頁、42 個附註，英文本我算了一下 15,000 words，中譯本大概兩萬字。但是中譯本不完整，附註沒有翻出來，然後有一些敏感的地方，比如說裡面提到 Chinese totalitarianism 一詞，就省略了。譯文本身文字也不是太好，希望今後會有一個更好的版本。

然後另外一篇是他 2016 年在 *Who rules the world* 裡面的一篇文章，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redux。裡面談到，這也是他一貫的觀點，就是他注意到兩類知識分子。美國對敵對國跟受美國支配的國家裡面受迫害的分歧分子，是兩種渾然不同的態度，剛剛馮建三老師也提到。比如說 Chomsky 對哈維爾 (Václav Havel)、薩哈羅夫 (Andrei Sakharov) 等異見分子，其實並不是太瞧得起的，對他們評價不高。但是對於拉丁美洲那些受迫害的神父，他有非常高的評價。最後一篇是很短的 2 頁文字，介紹了他 1969 年〈責任〉一文的歷史背景。這是我發言的第 1 部分。

第 2 部分我詳細講這篇文章的特點，這是一篇不容易看懂的長文，如果對文中提到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不熟悉，讀起來會顯得沉悶。其中鏗鏘有力的文字，也只能在這種歷史背景底下才能更好的領會。他很精彩的一些論述，在相關歷史背景底下就顯得非常精闢。文章一開始講的，主要是兩部分的歷史事件，一個是 30 年代跟 40 年代的歷史大事件。Chomsky 對那些歷史事件不是一點點瞭解，而是有學者般的、專家式的深入瞭解。不單是這篇文章，比如他其他文章談西班牙內戰，對文獻的掌握是驚人的。提到的歷史事件包括經濟大蕭條、日本佔領東三省、義大利佔領埃塞俄比亞及西班牙內戰、蘇聯史達林的大清洗、納粹的罪行、美軍原子彈投廣島長崎等事件。他文章一開頭就說，你要想像我作為一個大學生，經歷了 1930、40 年代，那種對我的深刻影響。這就是前提。

第二部分歷史事件，都跟二戰後冷戰局面有關。他在文章裡面談到很多 1950、60 年代二戰後冷戰時期的歷史事件，比如古巴革命、美國企圖顛覆古巴革命政權的豬灣 (Bay of Pigs) 事件，美國 1965 年初對北越的空襲，美國想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展的骨牌理論，圍堵中國政策的論證，1962 年的中

印邊界武裝衝突等。這些你要看他的附註，比如說關於中印邊界衝突的附註，Chomsky 對事實的掌握是相當清晰的，以前沒看附注沒注意到。還有〈責任〉這篇文章的論述，是通過對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和社會科學權威的一系列批判來進行的。這些權威包括什麼人呢？都是當時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家，例如經濟學家 Thomas Schelling，他的 *Strategy of Conflict* (1960) 是很重要的著作。另外，Chomsky 談了很多 1966 年美國國會關於亞洲局勢聽證會裡面的記錄，他文章回應這些人的發言。因為 PowerPoint 大家都有，我就只略提幾點。

對他來講，知識分子的責任是什麼呢？當然第一就是道出真相、揭露謊言。另外，他覺得知識分子地位優越，所享受的資源和保護比一般老百姓多，因此比一般民眾承擔更大的責任。第三，知識分子對本國政府的對外侵略行為應該予以譴責、抵制，拒絕為共謀。這點實際上是很難做到的。

知識分子分兩類，一種就是基本上是向政府獻策的技術官僚和政策導向專家 (technocratic and policy-oriented intellectuals)，另外就是批判政府和權威、以價值為導向的知識份子 (value-oriented intellectuals)。Chomsky 在〈責任〉一文談到這兩類知識份子，但這些分類標籤在 2016 年關於知識份子責任的文章裡面，表述得更為清楚。前一類知識分子一般只談現實政治利益，談策略優劣，而不會挑戰政策背後的基本理念或原則；後一類知識分子，敢於挑戰政府政策背後的原則和基本假設，也敢於思考怎麼建立理想社會。他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扮演第二類角色。他還有一個觀點也是比較特別的，強調知識分子分析問題應該有歷史的角度。我的理解是，因為知識分子很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要揭露各種權威論述背後的真相，幫助群眾來消除意識形態的迷霧，這需要採用歷史的角度。好，我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郭力昕：**謝謝行德為我們扼要地整理幾篇有關知識份子責任的作品。李行德的投影片還有兩個部分，希望後半場還有時間，可以請他分享知識份子這個議題的其他內容。接下來我們請傅大為老師。

**傅大為：**我這題目 Chomsky 談大學及其時代功能，主要是來自於他在 1969

年的一篇文章 “Th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in a Time of Crisis”，就是〈危機時代的大學功能〉這篇文章。那個時代是越戰的高峰時代，Chomsky 那個時候也積極地參與各式各樣的反越戰等等之類的運動。美國各地都有很多的學生運動，但不止美國，法國、日本啊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這我想大家都知道過去那樣的一個時代。我當然也參考了其他幾篇文章。

杭士基 (Chomsky) 首先覺得，大學作為一個社會機構，在過去，其實大家都不太管它。在美國的話，當年大學這個名號其實只是關於足球、關於兄弟會等他們比較關心的一些東西，但是大家對大學這個東西，並不是很重視。主要是也許大學裡面有些有趣的老師、有趣的同學，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到了五、六零年代，五零年代麥加錫時代，他認為那時整個美國的社會是 depoliticize，就是去政治化，只有一種政治存在，其他都被排除掉。那麼同時呢，因為越戰還有冷戰的發展，使得說在那個時代裡面，大學變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intellectual center，也是一種 intellectual struggle，一種鬥爭的時代。很多的意識形態、很多的反抗，通常都在當年的大學產生的。我之所以要談這個問題，其實當然也是因為，我目前的研究是 Chomsky，他自己作為一個 intellectual，「如何是一個 radical intellectual」這個題目。所以我對於他前後時期裡的活動都會注意到，特別也是關於他在談這個六零年代的大學，那個時候也是他剛開始積極投入政治的時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談的那個大學，特別是我等一下要談到是關於大學裡面接受的，比如說當時美國的國防部，給予很多的 contract，我們叫作贊助計劃，要求很多大學裡面的教授來做國防部的武器，就引起了許多校園裡運動學生與其他教授的質疑，要求校方檢查校園武器化的歪風。這跟我自己過去做 STS 的一些研究很相關。

事實上，可以有很多相關聯的東西存在。所以這個部分，我會對那個時候 Chomsky 怎麼來談這個問題，有相當的興趣。因為我自己過去也做過一些研究來談這些贊助計畫，我們在科學史上很有名一個學者叫 Thomas Kuhn，他在 1970 年是在 Princeton 大學教書，當時就受命來檢查 Princeton 那個大學的贊助計畫。而 Chomsky 是在 1968、1969 年的時候，他是參與檢查 MIT 的

贊助計劃這一方面的東西。所以，對我來講這也可以做一些比較。

另外我也提一下，他講那個時代的大學，及其時代的功能，當然 Chomsky 主要談的是在 60 年代。但是其實呢，他在 21 世紀大概 2010 年的時候，在 2013、2014 那時候又重新開始再談大學。而且他用了一個比較聳動的一個題目叫做「大學的死亡」(“the death of university”)，但是他那個時候所碰到的問題，其實跟他在六零年代所講到問題其實有點類似。

也就是說，大學越來越像是一個公司，corporation，那這公司裡面，董事會具有非常主宰性的功能。在這個情況裡面，大學傳統的、作為一個知性發展功能，越來越少。所以，在 21 世紀的時候，我那時候想說其實在台灣很多地方，其實也是非常類似（公私立大學也類似，甚至影響到教育部的運作邏輯）。Chomsky 說董事會以這個 business model 來治理大學。大學的行政組織，變得非常肥大，裡面的人給非常多的錢。然後不斷地擴大大學裡面的兼任老師跟非專任老師。我們台灣有的時候說專案老師這樣的編制，造成學生、老師們的不安定感。

在美國有個更嚴重的問題，在台灣（也許我不知道）也許沒有像美國那麼嚴重。那就是學生貸款 (student debt)，學生貸款非常嚴重。美國很多很多學生會被這個貸款壓垮，而且貸款跟這一般資本家不一樣，資本家你生意做不下去，你可以宣告破產。可是，學生貸款不能宣布破產，它跟著你一生，當初學生運動時，美國政客就開始利用這種方式來箝制學生。這些東西在 21 世紀的時候更形嚴重，對美國大學進一步的發展造成很大很大的壓力！無論是教授跟學生，都受到這種箝制比以前要大很多，一直到最近拜登總統才開始來處理。

回到六零年代 Chomsky 談大學功能的時代，延續剛才行德老師談到 Chomsky 對很多的所謂的自由派的學者 (liberal scholarship)，做了很嚴厲的批評。他後來在一些另外的文章，如 “The Menace of Liberal Scholarship” (1969)，就是自由派學者的威脅，裡面又對當時更多的自由派學者言論做了批評。他說，在這些自由派的學者的眼中，大學只是為了製造新一代、新一群的，為權力跟國家服務的國家精英。

這些所謂的 new mandarin (新的國家學官)，對國內維護中上階級的既

有建制跟利益，對國際則遂行美國霸權的侵略暴行跟壓迫。當然因為時間關係，我們不必看這個細節，但是他的確把當時這個社會科學裡面的、許許多多的這種跟政府有關聯的、在政府裡面做事這些很多很多的 liberal scholar 一個一個批評，把他們的文章拿出來批判。

那 Chomsky 自己比較喜歡的大學理念是什麼東西呢？他主要是來自於他常引用的 Wilhelm von Humboldt，我們說「洪堡德」，18 世紀他對於大學的理念：

“Nothing other than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ose human beings who are moved by external leisure or internal pressure toward learning and research.”

Chomsky 也知道在經濟上，大學機構本身是寄生於社會對大學理念或價值或功能的支持。所以，大學無法只是一個理想型，它是個處於理想跟現實彼此不斷爭奪的場域跟機構。大學無可避免的會反映社會現實，所以我們當討論大學的時候，必須要放在大學如果「能夠改變社會」的脈絡來分析它，而不只是把大學自己變成一個很不錯的機構就好。

Chomsky 當年肯定美國的學生運動。他認為的確對大學機構產生了深刻的反省，但是結果是什麼？如果說這個反省只是改變大學的制度，甚至它的制度民主化，那他覺得這些是非常表面的。真正的重點應該是在課程的內容、師生的關聯，還有教學的實作等等。甚至，可以對現代工業社會的批評跟反省，這樣子才足夠。他特別評論了學生運動批判的重點之一，前面提到，就是對大學裡面，以理工科為主的，受政府及軍方委託贊助計劃的批判，並且要求那些計劃甚至是軍方的實驗室要離開大學。

但是，Chomsky 對此流行的看法，並不同意。後來有人（Chris Knight）發現他當年曾在 MIT 旁的軍火公司 MITRE 裡作顧問，MIT 也被廣泛認為是當年美國武器製造的大本營，而據說他則在其中努力反抗 MIT 對他的宰制與利用。但 Chomsky 說這是神話。說當年的 MIT 重視學術自由，它既不干涉製造武器的科學家，也不干涉 Chomsky 進行反越戰運動，更不強迫他用語言學專才來研發軍令的自動化翻譯，當年他工作的大實驗室（RLE）反而是反

越戰的聯絡中心。何況他作 MITRE 顧問並無做為，且很快就離開，專心反戰。總之，他一直對理工科學家，有比較同情的態度，對他們的知識尊敬也較高。認為他們的自主性也比較高，不易受到國防部贊助計劃的影響。反之，他對過去社會科學家的知識則諸多鄙夷，認為其毫無理論，其文字所顯示出的意識形態、可議之處極為明顯。社會科學家們對學生運動的批評，只是要維護自己在大學中的階層地位而已。

所以，真正大學的改變，是朝向改變社會的改變，不在於切斷與社會的關係。所以，是否把國防部的這些贊助計劃把它推到學校外面去？他甚至不認為，他認為其實那些東西可以留到學校裡面。留到學校裡面的話，比如說乾脆成立叫「死亡系」，把製造武器的那些科學家，通通放入到那個死亡系去。這樣子，大家都可以集中來監督，你把它推到學校外面去，大家反而不知道那些實驗室在幹什麼。

他說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改革大學行政制度，不在於攻擊校方的行政，而在於學生跟教授本身是否真的有意志來分析與思考改變社會，不要受主流獎勵的誘惑，不要怕被主流邊緣化的壓力，進而形成有效的政治。比如說科學家們可以聯合起來抗拒，不接受任何製造武器的計劃。那學生運動除了批評之外，應該增加自己的智能、知識跟理性，在知識視野中進行顛覆，進而發展出有效的政治，而非只是在校園中以挑釁為事。

所以大學應該是一個對所有理念跟理論保持中立跟交流的場地，叫 **free market of ideas**，應該要真正的保持中立跟不預設價值的提倡，包括如何支持越共進行游擊戰的研究、如何支持中南美洲反 CIA 顛覆的研究等等。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郭力昕**：謝謝大為。最後請汪宏倫老師。

**汪宏倫**：大家好。首先，十分感謝傅大為老師的邀請，讓我有機會來參加這個很有意思的座談會。剛才力昕老師介紹的時候提到，我的專業領域在社會學，過去做的研究跟民族主義、國家建構、戰爭暴力與現代性等等方面的議題有關，所以或多或少涉獵過 Chomsky 的一些政治評論。2010 年 Chomsky

第一次受邀到台灣來訪問，邀請單位之一是我所任職的中央研究院。當時院裡面要編一本專刊，需要有人寫一篇介紹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結果不知道為什麼，找到我的頭上來。我接下這個任務之後，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大量閱讀了他語言學以外的一些公共論述作品，後來寫了一篇〈值得從杭士基學習的十件事〉，登在專刊上，後來也在《自由副刊》發表。我還記得黃正德老師當時看了這篇文字非常高興，私下特別稱讚我了一番。沒想到十多年後，大為因為這篇文字找上了我，邀請我來參加這個座談。我想我就藉著這個機會跟杭士基「再續前緣」，談談我在十幾年前的文章裡面沒有談到的一些看法。

我把題目定為「從社會學的視角管窺杭士基的公共論述」，用「管窺」這個詞絕對不是自謙或誇張，而是因為 Chomsky 公共論述太多，涵蓋的議題太廣，我並沒有全部掌握。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他的守備範圍太廣了，從本壘到外野他都可以包辦。我沒有他那麼厲害，他所評論的事物，有很多是我沒有能力評論的，例如以巴問題、美國的外交政策與軍事行動等等。所以我只能從我的專業出發，就我比較熟悉的領域來談談我的看法。我的題目雖說是「社會學」，但有的時候我指的是比較廣義的社會科學。

我分成兩個部分來談，第一個部分是 Chomsky 本人如何看待社會科學，第二個部分是社會學／社會科學如何看待 Chomsky。

剛剛大為已經提到，Chomsky 對社會科學的評價不高，甚至很排斥。他認為社會科學不是真的科學，學院裡的社會科學很多都只是在為當權者服務，甚至製造出一些「偽專業」，藉由看起來艱深難懂的專業術語來排除大眾的參與，反而阻礙了公眾知的權利與思考探究的機會。他說的情形當然存在，我們很難否認，但並不是所有的社會科學都如他所說的那個樣子，他似乎有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味道。

以社會學為例，Chomsky 對社會學的印象似乎還停留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那是現代化理論與行為主義科學盛行的年代，很多建制化的社會科學主流還是很保守，所以他的批判與反感，我們不難理解。但是，自從 1970 年代以來，社會科學的發展不知道已經走到哪裡去了，不但很多左派理論與激進思潮被帶進學院，社會學自己內部也有很多自我反思與提升，研究視野

更是擴大許多，Chomsky 還在用當年的標準來批判社會科學，其實不太公允。例如他一直到最近還在說，現在的大學都沒有學科在教導學生如何批判地思考他所關注的那些問題，像是氣候變遷、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等等，他甚至還舉社會學為例，說社會學只關心貧民區的貧窮、失業與不平等問題，無法教導學生思考這些宏觀的問題。我想很多社會學家如果聽到他這麼說，可能很不服氣，覺得 Chomsky 也未免太看不起社會學家了。

好，在這裡，我們就碰觸到我想談的第二個部分，也就是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如何看待 Chomsky 的公共論述？Chomsky 的公共論述，數量已經多到遠遠超出他在語言學上面的論著，幾乎可以說是他的第二個專業。我剛說他的守備範圍非常廣，他對大學與建制學科的批評，我覺得有道理，也予以尊重，畢竟我們也都在大學裡面，也知道他所談的問題的確存在。但是，他所處理的很多現實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議題，例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美國霸權、帝國主義、恐怖主義、資本主義、國際秩序、戰爭與和平等問題，其實很多建制學科也都在研究，例如政治學、國際關係、社會學等。我就很好奇，這些學科的研究者如何看待 Chomsky 的這些評論或論述？

我稍微做了一點功課，以幾個主要的英文社會學期刊為範圍做了一些搜尋，結果發現，大部分的主流期刊，如果有引用到 Chomsky，大多是引用他在語言學、認知科學或人類心靈方面的作品，但除此之外，他有關公共議題的討論，其實非常少被引用或討論——當然，還是有一些比較左傾的學者會引用到他，但是比例非常非常低，也不是主流。我們大可以說，他的這些公共論述都不是學術著作，主要的受眾也不是學界，而是一般讀者。不過，他針對這些公共議題所生產出來的海量的論述，卻幾乎完全被學界忽視，這也有點令人好奇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就像我前面提到過的，全球化、美國霸權、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戰爭與國家暴力，這些問題在社會學界都有很多人研究，我隨便舉幾個大家比較常聽到的大咖學者，例如 Immanuel Wallerstein、Michael Mann、Charles Tilly，歐洲的 Anthony Giddens、Pierre Bourdieu 等，他們也都關心並且研究這些問題，但他們的著作幾乎不曾提到 Chomsky，而 Chomsky 當然也不會引用他們的著作，除了極為少數的例外。我曾經在 Wallerstein 的一兩篇著作裡面看到他提到 Chomsky 的名字，

Wallerstein 是知名的左派學者，但是他的提法是一種 Disapproving 的提法，顯然對 Chomsky 不以為然。幾年前我在美國 Boston 訪問的時候，也曾經在某些場合跟社會學者聊到這個問題，他們認為 Chomsky 的政治與社會評論不值得引用，甚至覺得引用他會貶低自己的學術作品的價值。所以，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 Chomsky，他所關心與評論的很多議題，其實有一大群專業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在做研究，但是他們彼此沒把對方放在眼裡，甚至都瞧不起對方。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個現象？

要理解這個現象，其實有一個線索，這是他自己提供的。Chomsky 在《語言與責任》的訪談裡面說，他在政治與社會評論方面講的東西其實都非常簡單，只要有足夠的資訊，運用我們的理性，保持開放的心靈，就可以做出這些分析與判斷。要了解並批評這些政治與社會問題，根本不需要什麼專業，也沒什麼深奧的學問可言；所謂的「深度」都是社會科學的學者專家所製造出來的幻象，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用來呼攏大眾，讓大眾覺得問題過於複雜，缺乏專業知識就無法參與。

我想 99% 以上的社會科學研究者，看到這樣的話，大概都會跳起來，因為 Chomsky 認為這些問題根本不需要專業的學者來研究。Chomsky 不但否定了他們的專業，而且還認為這些專業根本就不應該存在，他們的存在只是掩飾問題、模糊問題、甚至製造更多問題，包括欺瞞大眾等等。

由於 Chomsky 認為這些問題不需要專業，所以他的政治評論在某種意義下，反映的其實是一種「(非專業)素人的政治觀」，雖然他做了非常多功課，下了非常多努力與功夫蒐集大量的珍貴材料，但他所提出的評論意見，從他所瞧不起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來看，似乎少了一點什麼。我在這裡舉兩個例子。

第一，Chomsky 有一本書叫《海盜與皇帝》，他在很多地方都喜歡講這個故事：亞歷山大大帝抓到一個海盜，質問他說：「你怎麼膽敢在海上興風作浪？」海盜回答說：「那你又為什麼敢在海上興風作浪？我只有一艘小船，所以被稱為海盜，你有一支龐大的海軍，所以被稱為皇帝。」

Chomsky 的言下之意是說，美國扮演世界警察，正義使者，在全球打擊流氓國家與恐怖主義，但其實最大的流氓與恐怖主義國家，就是美國。其他國家因為不夠強大，所以被當成海盜，美國因為夠強夠大，所以就認為自己

是皇帝。他的公共評論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批評美國這個流氓國家，製造恐怖主義文化，就是要戳破這個皇帝的謊言。

他在很多地方都喜歡講這個故事，但我每次看到這個故事，就想到歷史社會學家 Charles Tilly。Tilly 曾經研究歐洲現代國家的興起過程，他形容現代國家是最大的流氓黑幫組織，國家不斷製造戰爭，壟斷暴力，然後恐嚇人民，跟人民收保護費（也就是徵稅），然後透過壟斷暴力與資本的累積，形成了現代國家的形態。國家是壟斷合法暴力的政治集團，這是從韋伯以來政治學與社會學對國家的基本理解與出發點。Chomsky 喜歡講「海盜與皇帝」的寓言，但這對研究國家的人來說其實是老生常談。當然，有的國家比較流氓，比較值得批評，這是另一回事。

另外一個例子是關於 Hypocrisy，偽善。Chomsky 花了很多力氣批評美國雙重標準、偽善，這些批評我都非常同意。但這同樣讓我想起政治學者 Steven Krasner 寫的一本分析主權的書，書名叫 Organized Hypocrisy，組織化的偽善。Krasner 的論點是說，其實整個主權的概念，包括國際體系的運作，本身就是一個有組織的偽善體系，Krasner 區分四種主權，分析這些偽善的體系如何運作，包括台灣的國家主權，也被他拿出來作為雖具西發利亞主權（Westphalian sovereignty）卻缺乏國際法理主權的偽善例子。我們身為台灣人，每年光是看 WHO、聯合國和一些國際組織怎麼對待台灣，我們就非常切身感受到國際體系有多麼偽善。當然，美國的偽善和國際體系的偽善是兩回事，但政治的運作中充滿了偽善，這並不是什麼太新奇的論點或發現。

我舉國家壟斷合法暴力，以及政治運作當中的組織化偽善的例子，並不是要正當化這些現象，也不是認為這些是合理應該接受的。暴力跟偽善應該被批判，有些國家特別暴力、特別偽善，需要監督與批評，這些我也都同意。但是，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我們總是希望理解這些被壟斷的暴力與偽善體系是如何形成、如何運作，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比較知道要如何解消這些現象。這些問題，其實社會科學界已經累積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掌握這些問題，但是 Chomsky 好像就是不把這些研究放在眼裡。他看不起社會科學，當然不是完全沒有理由，也有其時代背景。他經常自稱是無政府主義者，我不太清楚他的理想世界的藍圖是什麼，但是我們眼前的

事實就是，我們活在一個有國家、有政府的世界，國家的壟斷暴力與偽善當然非常值得批判，但是如何讓這個體系可以運作得好一點、減少一些不公不義的現象，好像不是光靠批評，或是揭露這些資訊就好。美國的流氓與偽善事蹟太多了，講都講不完，但你蒐集各種證據，一天到晚指責它很流氓、很偽善，好像也解決不了問題。當然，從喚醒公民意識來監督政府的角度來說，這樣做當然還是有意義，但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我們總希望能多一點，或是 *go beyond that*。

我說這些，並不是要全盤否定他在公共論述方面的努力。從公民社會或公民運動的角度來看，我還是非常肯定他長年來的努力，肯定他喚醒公民意識；對國家權力、暴力的行使的監督，對偽善不義的批評，都是必要的，他的付出也值得尊敬。這些讚美的話，我在十幾年前〈值得從杭士基學習的十件事〉裡面都已經說過了，所以我想這次應該換個角度，講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總結一句話來說，我總覺得他和社會科學界之間彼此相互輕忽，不把對方放在眼裡，是有點可惜、也有點遺憾的事情。我想我就先分享到這裡。

**李行德回應：**我想回應一下汪宏倫老師，您的觀點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說，Chomsky 好像對整個社會科學是非常蔑視的。我覺得他的問題，在於把社會科學的要求定的很高，要求像自然科學一樣。那當然社會科學達不到自然科學的標準，其中真的有規律性的東西不多。但是，社會科學豐富我們的知識面，它創造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概念，讓我們更好的理解這個世界，這些創新都是不簡單的。佛洛伊德也好、馬克思也好，Chomsky 都不屑一顧，覺得都不行。我最近讀 Chomsky 的一個發言記錄（*Understanding China- The indispensable Chomsky, 2002*），談馬克思，他覺得馬克思的理論他看不懂，完全沒有規律性。我覺得社會科學當然達不到他心目中的那種接近自然科學的規律性，但是社會科學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是相當巨大的。

**傅大為回應：**我也回應一下汪宏倫講的，因為之前我在 email 裡面有跟他稍微討論過一下。就我看過的 Chomsky 討論的所謂的社會科學，其實他大部分

講的是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據我所知他很少講到 Sociology，Anthropology 他也很少談到。那當然你把他看作是整個社會科學，他有的時候講話 sweeping 非常具涵蓋性，就是講整個社會科學。因為我自己做科技與社會研究，對自然科學我想比 Chomsky 要批判多了，所以他對於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這樣的區分，其實我的意見很多，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他真正的長處。他對於政治科學、政治學，做了很多批評。我們今天所舉的例子，比如說行德或者我所舉的例子，大部分都是六七零年代他所討論的東西。在七八零年代以後，他開始注重媒體，注重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中美洲、南美洲、東歐的一些國家，他花很多精力在那個上面。我覺得那是，起碼我自己個人過去沒有辦法涵蓋的這個領域。他對於拉丁美洲跟中美洲的這些政府或反抗人士的聯繫，還有到他們那邊去演講之多，簡直是令人驚訝。我們世界上一流的學者，很少人做到這樣的事情，那他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另外我舉個例子，這個話說起來其實可以很多。最近關於俄烏戰爭，有一些 alternative media 舉辦了一些座談會。座談會 Chomsky 是其中一個，可是另外有一堆這種比如說 *New Left review* 一大堆各式各各式各樣的，其他這些學者或者做運動的，大家都在一堂裡面討論，所以我大概並沒有覺得，他跟這些社會研究者好像會區別開。那你講的比如說 Immanuel Wallerstein, Charles Tilly, 這些人就我過去的理解，他們是做歐洲的歷史，那他們對當代，比如說拉丁美洲或者是當代二十世紀的，他們有多少研究？假如說他們對拉丁美洲有很多的研究，比如說智利的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暗殺事件前後等等之類，假如說他們有很多研究，那麼的確是可以跟 Chomsky 做很多的討論；但如果說他們沒有，他們只研究過去歷史的，比如說 18 世紀的法國大革命等等之類，那麼的確他們可能的交集就不多了。

最後，我想講一點 Chomsky 在社會科學上，我不覺得他是一個研究者，他是一個 public intellectual。他花很多的時間跟小學老師、不認識的陌生人寫 email。大致上寫 email 大家都可以跟他聯繫，都可以（跟他）討論。所以他是一個就是跟大眾聯繫在一起的一種人，跟一般的社會學的研究者是很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怎麼樣能夠連在一起，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謝謝。

**汪宏倫回應：**我簡單回應一下，其實我知道我剛剛說的東西會有一點 provocative，有些可能聽了可能會覺得不太舒服。因為大為把我放在最後一個，我就擔心自己的發言可能會造成有點所謂「反高潮」的味道效果。我 10 多年前那篇〈值得從杭士基學習的 10 件事〉，寫了非常多推崇他的話，所以我想這次我想換一個角度，講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就是說也就是我所讀到他比較不是那麼同意的地方東西。那希望大家不要覺得我好像是全盤在否定他，或對他很不敬，我沒有這樣的意思。關於剛剛行德老師提到的，他「不認為社會科學是科學」。這件事情，其實我想這真的就是牽涉牽扯到社會科學，或者是科學哲學裡面有非常多的討論，包括我想在場的傅大為老師也是這方面的專家。到底怎麼樣才算科學？這是這一個值得去 debate（的問題），但他直接就否定說社會科學是不值得存在的，或者它不是科學，我覺得這樣是有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味道。回到剛剛那個大為說的，沒有錯，你說 Charles Tilly、Immanuel Wallerstein 他們是研究歐洲史，但是比如說 Wallerstein 其實他後來研究的不只是歐洲史，而是世界史，談的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而且他後來其實也做了一些針對時事發表不少的評論。那我再舉一個（例子），Michael Mann—歷史社會學的（學者）—他做的是世界史，他的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從美索不達米亞的文明開始寫起，規模非常大。他寫過一本書—*Incoherent Empire*—，exactly 就是在批評 911 之後的美國。把他的這本書跟那個 Chomsky 的 *The Failed State* 這本書來做一個對比，兩本書都在批評眼前當下的美國，但他們批評視角是非常不一樣的。

我想我同意剛剛大為說 Chomsky 不是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關於社會學，我要再補充他到底怎麼看社會學。我特別去搜尋了一下，剛剛引的例子，說社會學者只在關心 Ghetto 裡面的 inequality 跟 poverty，這是他在最近的訪談裡面講的，我覺得很多社會學者一定看了絕對沒有辦法接受。然後我完全同意他不是一個（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而他是一個實踐者，一個公共知識分子，他很具有高度熱忱的、很誠心地的來 practice 實踐他相信的東西，這一點我完全沒有否認。我的意思是，他跟社會科學研究者之間彼此的忽視，或者彼此沒有對話，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馮建三回應：**宏倫剛剛所講，指社會學科有不少領域的人，儘管關注的主題相通，但彼此少有對話。這個情況在《製造共識》出版數年間，同樣存在於新聞與傳播領域。但本世紀以來，特別是最近 10 多年來，情況已經有了很大改變。除了引言稿所說，這裡再補充兩個例子。一是美國的 Robert McChesney 在 1995 年就曾訪問杭士基，提及他與記者的關係。杭士基說，他自己與不少記者的關係其實不錯，這些記者私下聯絡時，都表示同意他的分析，只是不太方便公開講述。杭士基的這個現身說法，顯然與不少批評者的認知不同，書評者指他傲慢、行文嚴厲，對記者不假詞色云云。因此，我自己的理解是，杭士基不是否定記者，是知道記者無法完全自主，不說確實是有不少記者即便自主，想法也經常受制於或服膺主流想法。但若找到努力的記者，應該還是不少。第二個是英國的 Colin Sparks，他與 McChesney 相同，都從基進傳播政治取向研究新聞傳播，差別可能是《製造共識》一出版，McChesney 還是從實務界轉入學院的資深博士生，但初讀的時候，他已經大為受用也認同該書的精神與內容。Sparks 則在 2007 年才撰長文給予該書及 PM 模式很大的肯定。然後，如同常見的行文，他也給予建議，期待後來者能夠檢視菁英的衝突所擠壓出來的求變動力，使納入從而讓 PM 模式的解釋更為全面。他的第二個建議也是集中在記者，希望為「專業義理」（professionalism）爭取空間，即便他知道客觀公正平衡經常成為化妝師或意識形態，但 Sparks 希望納入對記者的研究以使 PM 更有說服力，他認為或說希望，「大多數記者並無意與宣傳共謀，而是潛在的盟友，能夠為建立更好的世界，盡一份心力。」

## 【討論與回應】

**郭力昕：**有一些我們非常熟悉的、或者很資深的教授們在線上，另外也有一些傳播領域比較年輕一輩的學者。這些都是具批判性的精彩學者，非常歡迎。我想先問看看有沒有哪一位要回應剛才我們第一階段的發言？請朱元鴻老師。

朱元鴻：因為發言的時間滿短的，我大概有一個稍微長一點討論，是李行德討論的問題。另外就是對傅大為和汪宏倫，大概有比較短的 remark，我也可以變成等到第 2 或 3 次發言也可以。宏倫大概兩天前寄邀請給我，當時我沒有看得很清楚，我以為是你們把那位 93 歲的老先生請來了，所以說有一個跟他的座談會。我就發想，我關心的什麼問題，可能可以問的。

我想到的一個問題是，當前美國的知識分子，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都前所未有的分裂，Polarize，所以說我想請他評論這個現象，以及這個狀況的展望。結果，李行德寄來的那兩篇文章，我讀了以後發覺到，其實他間接的提供了這些問題許多很好的空間。建三一開始的時候介紹就講說，Chomsky 的貢獻其實在於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可能最有價值，我完全同意。我自己受惠的地方，大概就是在不同的場合裡面，能夠擷取或借用，引述他某個特殊觀點的脈絡之下的個案研究，這對我來講是滿有價值的。我讀的這兩篇，其實很有意思。他大概從一戰開始，還不是李行德剛講的是說到三、四十年代以後，事實上他談到這些知識分子的分化，是從一戰時候開始的。他分類，一種是為各自的 nation state 發言，另一種則不是 in line with the state，dissident 的發言。這些我讀來為什麼會覺得還滿爽的？讀 Chomsky 有一個作用，他的取材在歷史上的廣和細，很快地能夠把我們當前關注的問題，像我剛才想的這個問題，馬上提供了一個相對化的歷史文化脈絡，這對我來講很受用。

那關於傅大為，我一併提個比較短的 remark。傅大為他介紹到，特別是 the death of university 的時候，很多的批評，比方說 university 跟企業的相似性，以及對於成員的某些規制，特別是經濟上的規制。其實這些批評，我們非常熟悉的是對於 neoliberalism 的批評。當然我自己沒有讀到那些內容，比方說對於 liberal scholarship 的批評，其實是當前許多保守主義的批評重點。我後來看了一下他的這篇文章，是 2014 年。2014 年時，關於 neoliberal 的論述，已經完全展開，所以我不太清楚，他有用像 neoliberalism 這個標籤做批評嗎？還是他有獨立的脈絡？然後他對 liberal scholarship 的批評，跟最近這幾年湧現的一些批評差別在哪裡？我因為沒有讀到，我只是問一下大為。

最後一個 remark 是關於宏倫的。我覺得很有意思，宏倫剛剛提到了在社會科學或社會學裡面，左派學者對於 Chomsky，甚至對於引述 Chomsky，有

一些顧忌，覺得好像會減損了某些可尊敬度或可信度。聽到這個，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在英語世界裡面的左派是這樣，我自己是在 2006 年的時候，在法國巴黎參加一場 *Historical Denials* 的研討會，論文上面引用了 Chomsky 2003 年出版的新書，*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那本書是剛出版，特別討論到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爭，還有把它跟紐倫堡大審違反和平的動作相提並論。我引述這個不覺得有問題，但後來他們幫我把英文的論文翻譯成法文，在編輯出書的這個時候，我據說編輯裡面，其實有表達比較保留的意見，就是為什麼我在這邊引述 Chomsky？事實上他們這個脈絡，也是法國左派的這個脈絡，就像宏倫剛才講的那樣。其實我不知道細節，我不知道到底他們反感的是什麼，甚至於我曾猜想跟早期與 Foucault 的論辯有沒有關聯？我都不太知道。只是這個狀況相應於宏倫所提的，似乎確有這麼一回事。好了，謝謝，我的 3 個發言都交代完了。

**郭力昕：**謝謝元鴻。請 3 位元鴻回應的講者簡短一點的發言。等一下再請行德，把上半場沒有機會講到的一些觀點提出來。大為要回應嗎？

**傅大為：**我簡單說一下，剛才元鴻提到的 *the death of American university*，Chomsky 在很多地方都提到新自由主義，批評的很厲害。我知道批評新自由主義沒有什麼特別稀奇的，社會科學或者社會學，左派批評非常多。所以我的理解是 Chomsky 在這個地方，我想基本上是跟大家差不多，他也是反對這樣的東西，但是他批評的非常早，在 1960 年代。那另外補充一點，元鴻提到在法國的經驗，我想提一下，後來有一本法國人出的書叫 *Chomsky Notebook*，那個年份是到底是哪一年？應該是你講的那個後面發生，<sup>6</sup>他完全是在講法國跟 Chomsky 的關係。Chomsky 因為之前他支持一位法國納粹的否定者（denier）Robert Faurisson，Chomsky 根本沒有讀他的書，但是就願意支持他，（認為）他有言論自由。那位學者被法國趕出學院之外，Chomsky 認為這是不對的。所以，很多人看到 Chomsky 竟然寫這樣的東西，在法國引

---

<sup>6</sup> 編按：該書為 2010 年，由 Jean Bricmont & Julie Franck 所編，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起非常大的反感。之後，法國左派很多知識分子，對 Chomsky 沒有什麼好印象。那大概是我剛才講那個 *Chomsky Notebook* 那本書之後，法國人重新覺得 Chomsky 有些正面東西，也願意接受。所以 *Chomsky Notebook* 裡面，有提到很多過程，我建議也許可以參考，提供 Chomsky 在法國的脈絡，我就講到這邊。

**汪宏倫：**我也簡單回應一下，非常感謝元鴻抽出時間來參加，因為我是前兩天才把這個 link 寄給他，因為他說他的電腦有技術問題，我想他可能沒有空來，非常感謝他來，而且還提供回應意見。其實我對元鴻所提的法國例子，我第一個想到的，也是剛大為說的，他幫一個法國所謂的 holocaust denier R.Faurisson 背書，所以就引發不小的爭議。我想元鴻所提的這個法國的例子，其實也是更進一步去證明，Chomsky 在某些學界，除了英語學界，還包括法文學界裡面是有爭議或被排擠。我覺得有爭議是沒有關係，因為你針對那麼多的事情發表意見，要不犯錯、或者不去惹怒別人是不可可能的。但我覺得重點是在於，因為他對於社會科學有一點全盤否定的味道。我這一次是比較認真地去看他的這些關於社會科學的評論，我想任何一個從事社會科學、認真在做研究的人，看到他那樣的評論可能都不會覺得舒服。所以我還是回到剛剛講，這兩個東西其實有可以互補的地方，但是他們相互沒有把對方放在眼裡，我是覺得是滿可惜的。我就先補充到這裡。

**郭力昕：**好，謝謝。接下來我們請盧倩儀老師發言。

**盧倩儀：**我是中研院歐美所盧倩儀，我做的是氣候變遷跟新自由主義。我是政治學背景，我想我的意見跟幾位老師可能都有關係，所以我就一起（回應）。我倒不覺得 Chomsky 對社會科學本身批判或者是全盤否認，我不覺得。我覺得他的批評的點是現在主流，重點是「主流」，就是有一個安全的主流，比較靠中間那個主流，他對於那個「主流」有很大的意見。這個東西，就連回最開始馮老師講的那個宣傳或者是媒體。就好像在講《製造共識》的時候，有那個 flak，很像你要有一個規約、規制的力量，有胡蘿蔔跟棒子，那在現

在學術界、社會科學界，非常的明顯。包括剛剛我們幾次講到引用，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很重視 SSCI，Chomsky 有很多次都講到，如果你要在那個菁英知識人的主流，你就要有一個行為的樣子，或者表現你的樣子，可能穿某些衣服。那些對於主流知識階級所造成的「約束」，就如他多次提到當年的 Adam Smith 曾說：“as stupid and ignorant as it is possible for a human being to be”。反正他的意思就是主流的、學院派，然後你就有某種寫文章的引用誰不引用誰，引用誰可以多被引用等等。他的意思是說，我們都這麼乖乖牌，在學院裡頭都那麼乖乖牌，這個東西是失職。這就連到剛剛講知識份子的責任，他說若我們是知識份子，我們是有那個 privilege，是社會給了資源，我們是在某一個崗位上，是要幫這個社會去看危險的東西，去看事實或者去分析什麼。其實，現在的學院裡頭的學者，所謂的「學者」，特別是一些智庫，像新自由主義智庫，他的目的本來就不在那。現在的學者，主流的學者，我們都有一個評鑑、升等、引用、impact factor 這些胡蘿蔔跟棒子，都有一個那種安全的、隱而不宣的行為準則，那個東西很傷，我覺得他批評的是這個東西。

他在講政治學的時候，引用一個人叫做 Harold Lasswell，他被稱作現代政治學之父。那個人（Lasswell）事實上主張，政治學的角色應該是宣傳，他是一個良善的那種覺得政治學是要教育或是要宣傳，把人弄成什麼樣子。Chomsky 非常反對這個，因為 Harold Lasswell 把政治學等於是開了一個口，所以後來政治學非常的脆弱，對新自由主義的入侵非常的脆弱。從經濟學、涓滴經濟、新自由主義、新的古典經濟學這些，要入侵政治學非常簡單，就是（透過）量化，一大堆的模型，那樣的分析叫「科學」。這個東西的問題本來就很大，要操作非常的容易，那時候所有的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全部都得諾貝爾獎。諾貝爾獎本身就有問題，它也是規訓的一部分，胡蘿蔔棒子跟威權、權威的一部分。然後政治學就被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引導成非常機械式、非常量化，其實那些工具不是說完全不可以用，量化或者是科學什麼都 OK，可是問題是，那是一個工具。當你用那個工具的時候，好像你有鉗子、螺絲起子、鐵錘，你永遠都是只用那一個工具，那個其實是新自由主義他們要的。所以 Chomsky 他會覺得，social science，或是政

治學，反而把政治清洗掉了，把它清洗的很乾淨，一切都是專家來，一切都是專家，「我是專業的，然後我來分析給你聽。」

我覺得現在不管是在美國或在台灣的大學、學界，其實很明顯，新自由主義化各式各樣的 science，你看現在大學，而且不光是剛剛好像是傅老師講的那個私校的董事會的問題。就算沒有私校董事會，國立大學也是一樣，選校長要選什麼？要選會募款的。所以大學受制於大企業的現象太普遍了，整個社會的輿論就是大學教育出什麼樣的學生？好像永遠都是教育出企業可以用的學生。好像我們現在大學的角色，就是幫企業去訓練人才。這些其實都可以 fit 到《製造共識》那本書，雖然說《製造共識》那本書他講的是媒體，可是我覺得它是一個小的 cosmos，把媒體再放大，他可以用到教育，可以用到大學，可以用到整個社會。他就把學者或是知識分子原來的那個角色，讓大家乖乖的去做，就是去集你的點數、SSCI 你的 citation，你不要真正看到，不要那麼誠實去看事情，就好像記者要被訓練成不要是 Julian Assange 那個樣子。Julian Assange 的事情，有一個叫做 Assange defense 的 committee 中，Chomsky 是 cochair，他非常強烈的在挺 Assange 的新聞自由。在新聞，新聞傳播新自由主義，要記者不要像 Assange 那樣子；同樣的道理，新自由主義也希望社會學者不要像 Chomsky 那麼犀利那麼誠實，然後看到那麼醜惡的全都講出來，不要，大家乖一點，我覺得新自由主義這一套非常的成功。

**郭力昕：**好，謝謝盧老師的意見，有沒有哪位要立刻做回應，對剛才盧老師的一些觀點？大為拍手，我其實也是想要拍手。因為剛才盧老師講的這個東西，在我們傳播學界是非常清楚的。量化這個方法，這個工具本身不是罪惡，但他被專斷的認為變成是一個唯一的、正確的、絕對的一個方法，就壟斷了很多事情。我想我們線上許多傳媒學界，比較年輕的一些學者，應該是深有同感。有沒有其他的意見？我們繼續，請大家把握時間。

**張小虹：**我想提兩個問題，也就是兩個關鍵字。一個關鍵字是 public intellectual 的那個“public”。我為什麼會想要問這個字，是因為譬如我們面臨到全球新

冠疫情的時候，我們就會去看看，比如說 Judith Butler 怎麼說？Slavoj Zizek 怎麼說？阿岡本怎麼說？有一些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指標型的，所謂的 public intellectual，他們一定會說出一些對我們有啓發的話語。就好像俄烏戰爭的時候，我們會去看 Chomsky 怎麼說。我這邊的想要提的問題是，在一個所謂的後全球化的時代，所謂的 public intellectual，或是 global public intellectual 的那個 public 到底在哪裡？也就是說，Chomsky 有在反省，比如說 3、40 年前他講話的方式，以及他現在講話的方式（有所不同）。當然他還是有議題他一定會講，只是說那個的影響力，那個的 impact 到底在哪裡？這個部分，是我比較好奇的。也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看待，我們覺得具有代表性的這些 global public intellectual，他們在針對當下的世界議題發言的時候，到底他們的 impact 在哪裡？還是說時代已經變了，我們還是在用我們熟悉的那套方式，繼續去想像有一個 public 存在？

第二個問題是 American left 那個 “left”，所謂「左翼」的這個關鍵字。也就是說，我剛剛在聽的過程中，我覺得似乎我們不好好的去處理 Chomsky 左翼的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幾乎沒有辦法去瞭解到，他的世界藍圖到底是什麼。這位老先生為什麼汲汲營營的，比如說不斷的在跑拉（丁）美（洲），那個世界藍圖是什麼？大概是非常重要的，也必須被談出來。在談出來的同時，我覺得還要進一步去問的是，像剛剛大為講到，法國左派對 Chomsky 的一些反感，那法國左派跟美國左派，他們之間的差異性在哪裡？同時我們甚至要去問的，Chomsky 來台北、來北京，他也公開的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假的馬克思主義。他對於所謂的中國左派的一些看法，以及我們台灣左派的脈絡，怎麼能夠跟 Chomsky 的左派脈絡，產生一些對話？因為在剛剛的發言裡，我看到唯一被提出來的是《破》報，可是《破》報基本上是被評論的一文不值。所以我就比較好奇，左派的這個脈絡，有沒有辦法能夠被談得比較清楚？以致於大為日後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時候，畢竟我們是在台灣做 Chomsky（研究），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把台灣的左派脈絡談的比較清楚，以致於說我們不會認為這是一個老先生汲汲營營的，對所有的議題都在發牢騷，謝謝。

郭力昕：謝謝小虹兩個提問。第一個是 global public intellectual 的 public 在哪裡？impact 在什麼地方？行德要不要回應一下這個問題？

李行德：好的，或者我就趁這個機會說一下，2019 年我電郵請教 Chomsky 一些問題，引起我很多思考。Chomsky 是一個國際主義者，這是非常難得可貴的；但我總在想，就是說你對一個別的地方，不是很熟悉的，你去採取很強的一種立場，是不是合適？在互聯網時代，資訊發達、監控手段越來越多，國際地緣政治的意識形態、操弄方法越來越隱秘，那你怎麼能對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真相，獲得一個基本的認識？這個是一直我覺得很困惑的。剛剛馮建三老師也提到，conspiracy theory，社會科學一般覺得不應該用陰謀論；但 Chomsky 在很多訪談裡面都說，要研究權力怎能不研究它的動機？

我要舉一個例子，大家可能熟悉的 Gene Sharp 的一本書叫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Liberation*。Gene Sharp 是一個老右派，60 年代大家都不大知道他，但後來卻越來越有影響力，裡面的附錄有 200 個步驟教你怎麼去顛覆一個政權。他不是社會主義，完全是從右派的角度。顏色革命很多基本上那個套路，就是一步一步的去顛覆一個政權。我也請教過 Chomsky，你對顏色革命怎麼看？他沒有正面回答。2019 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開始的時候就有人引用 Chomsky 的話，說他支持該運動。那時我看的有點疑惑，就電郵請教他，Chomsky 說的確是他原意，沒有歪曲。後來他有一個譴責香港警方濫用暴力的（連署），Steven Pinker 也參加了。但是我的困惑是，從現在看，香港 2019 這個反修例運動，實際上是很複雜的，有各種各樣自發性的、地緣政治的力量，這是不爭的事實，這個社會運動的領袖，如黎智英這樣具爭議性的人物，去美國都是 Nancy Pelosi、Mike Pompeo 這些權貴接見的，跟美國的權力完全緊密配合，我就問 Chomsky，這不是跟你 Manufacturing Consent 完全相反嗎？你怎麼會支持這樣的一個運動？他說不大瞭解黎智英這個人。當然，國際左派也有另外一些看法，如前年去世原籍俄羅斯籍的記者 Andre Vltchek，他跟 Chomsky 有一本書叫 *On Western Terrorism*，他對香港 2019 年的社會運動則持另外一種比較複雜的觀點。

後來我也問起，如何看待香港反修例運動那種很極端的暴力行為，這點 Chomsky 講得很清楚，他反對極端的暴力行為，他說這些事就好像越戰時代那些搞炸彈的「氣象人」(Weatherman)，是送給極右派的最好的禮物。那時越南運動的中心人物跟他說，你千萬要教學生走溫和的、非暴力的和平路線，不然就只會把事情搞壞。對越南社會運動來講，他們行動所關注的是生命；對那些美國學生來講，只是讓自己心裡好過一點。Chomsky 這方面有很多深刻的思考。凡是群眾運動，我覺得他總的傾向支持群眾的，但也不一定詳細瞭解了當地的情況。但態度是開放的，你提供不同觀點的材料給他，他會看，也會很直率表達一些想法。我就補充到這裡，謝謝。

**郭力昕：**謝謝行德，小虹老師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Chomsky 左派的位置，是不是台灣的左派應該跟其他地區的左派做一些對照跟異同。這個部分建三要不要先回應看看？然後元鴻也可以。

**馮建三：**對於 global public，Chomsky 一定有一些粉絲、跟隨者。最近幾個月，他還是經常接受訪問，影音上傳後，大多數都有上萬人點擊，我的關心是，這一群人一直都存在，但會不會只是同溫層？同溫層是比較小、封閉些，但有沒另一種同溫層，有潛能往開放型發展？當然，若是後面這種，也許用同溫層命名，就不妥當。有些人批評杭士基，常說他沒有講媒介效果，亦即，就算他指證的媒介內容確實是那樣的，但到底有沒有效果？然而，我們關切的效果本來就很難測量，你何從測量呢，對吧？小虹講的 global public，我覺得現在的科技對我們很大的幫助，你在 30 年前不可能想像，海外事情一發生，大為讀了〈杭士基談俄國入侵烏克蘭：它的起源、如何應對、與人類歷史的關鍵〉，數日內就將該文中譯後，由不同管道轉傳海內外包括對岸。那麼，眾人共讀這篇文章，至少在那一時刻，不也是一種 global public 的存在？我看到大陸的朋友，即便是親俄或者對中共很有負面評價而親美的人，對於 Chomsky 這篇文章所呈現的事實與論點，似乎也能接受。我覺得這樣就產生了 public 範圍的擴大，即便包括了很多原先同溫層的人，但很有可能，另一些人，即便基礎不同，在通過朋友或無意間所看到的資訊如大為翻譯的杭士

基文章，有可能會是一個開始，慢慢就使得這類論述得以擴充。我大概是從這個方式理解 **global public** 這個概念。至於要說多詳細去講，一來超出我的能力，二來這估計也不太容易。好，謝謝。

**郭力昕**：謝謝建三補充關於 **global public** 的意義，元鴻要不要回應一下小虹剛講的左派的問題？

**朱元鴻**：問題太大，太複雜，不太好回應，不過我試著提幾個看法。比方，我會區分 **career leftist**，他們形成某些學術群體，相互援引、相互糾集，一起開 **conference**，一起辦刊物。在學院裡面，甚至所有的聘任人員相互援引，這個是所謂的 **career leftist**。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找到 **career feminists**。我這個區分其實是 **Jean Baudrillard** 有一次回答問題的時候，他說他不是 **career leftist**，因為他完全不需要這個名分。但我覺得可能 **Chomsky** 比較不屬於 **career leftist**。這種不是 **career leftists** 的，有時會是 **career leftist** 非常 **bitter** 的 **enemy**，或者是他們首先去中傷或討厭的對象。

關於世界上的左派，跟中國的左派，有一個很明顯的差距。我留意中國的左派，特別是他們（在大陸脈絡下）跟自由派相對立的左派，幾乎都是 **statist**，國家主義的。事實上他們有的時候援引或邀請 **Alain Badiou**、**Slavoj Zizek** 這些人來的時候，都會有些扞格不入，原因就在這裡。因為這些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可能很相呼應，但是這些人沒有辦法呼應中國左派的國家主義。我覺得台灣的左派其實也好像有點複雜，不過感覺上在某些議題上，他們的觀點的和語言語彙的萃取，常常也從中國的左派那邊沿用，這是我的感覺。

最後關於那個 **global public**，我以前大概想過這個問題，事實上這跟我們講 **global civil society** 裡，比方說組織 **NGO** 的能力，還有在 **Internet** 上發聲的那個能力（有關）。其實在這方面，**global public**，如果有這個東西的話，當然我們會記得像 **Walter Lippmann** 這些人他在懷疑 **Phantom Public**。**Public** 是非常難界定的，但如果說有 **global public**，他的出現和議題的取向，會傾向於在 **civil society** 裡，這些使用 **Internet** 發表意見能力非常強的，可能是西

方和東亞的社會。這點可能是可以注意的，而且有的時候，這些發聲對於在地的，比方說像顏色革命，有的時候他的作用是反挫的。他的支援、他的聲援，其實可能會引起在地 local 的、nation 裡面對於這方面的反挫。OK，好，謝謝。

**傅大為：**我也回應一下小虹剛才提到關於 public 的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還滿有意思，跟我關切 Chomsky 的一些問題，其實有連接。不過我先講一下，像看到關於俄烏戰爭，Chomsky 寫的文章的時候，這個 public 感覺是怎麼樣。我們通常看到俄烏戰爭的報導，大概就是最近幾年，來批評俄國，批評一個國家侵略另一個國家，這是我們所注意到，一般主流媒體所注意的東西，大概就是跟著美國主流觀點跑。可是 Chomsky，比如剛才講說從 60 年代，甚至更早，一直到現在，美國所做的許多事情，跟現在世界所看到的許多事情，然後再把俄烏戰爭，放到巨觀的當代史或者是近代史的脈絡裡面來看，我覺得那給我的一種 public 的感覺，非常不一樣。這也是讓我們感覺是，原來不只是一個國家侵略另外一個國家，世界上好幾個國家都在不同的時段進行侵略，war criminal 一大堆，只是這邊的 war criminal 說那邊的 war criminal 是 criminal。常常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一個狀況，這大概是我第一個部分的感覺。

剛才建三提到，是不是我們看 Chomsky 的東西，就是同溫層上面的一些人？這個問題讓我想到了，其實 Chomsky 跟人的溝通，我覺得有個 legendary 的地步。大家知道，世界上的名人裡，哪一個人最容易跟他溝通、跟他討論的？我想大概就是 Chomsky。你寫 email 給他，要跟他訪談，他可以說他三個月之後給你訪談，這個訪談一定可以達到。你寫 email 給他，好像行德說過你的兒子等，都跟他 email 聯絡過，對不對？我是沒有，因為我目前沒有覺得有這個需要。很多人跟他從來不認識，然後有問題跟他聯絡，他都會花時間跟你聯絡、討論。我想這可能就不是剛才建三所講的一個同溫層，而是說他有一種跟庶民大眾、普通的中下階層，常常互相交流、互相談話。這讓我感覺到另外一種 public 的印象。他可以注意到很多事情的細節，是我們一般研究者或學者不會注意到的，因為我們學者反而是比較是在同溫層裡面。

第三個，我想講關於 public 的問題。我以為小虹要講 private，private 跟 public 這兩個字常常是相生兒。我自己想研究 Chomsky 作為一個 radical intellectual，我不是講他個人的歷史，那已被人家寫過很多遍了。我想講他的行動、他的實作，到底是什麼？我覺得 Chomsky 很有意思一點是，他很不喜歡談他自己個人的事情，他的工作狀態、他的辦公室、他跟學生的關係是怎樣等等之類，我那時候曾經跟蔡維天請教過。他的 public 是如此的龐大，至於他的 private 則小心謹慎的把它守起來，但問題是，我們這個 public 跟 private 總要有一種安排的方式，使得 public 才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那這是我覺得是作為一個 radical intellectual，可以借鏡的地方。關於這個部分，我能夠看到的很少，頂多是一些很有名的文章，談他的辦公室怎麼樣雜亂，他平常衣著看來像個年紀大的老學生等，但其他方面的東西就很少了。當然我也不願意窺人隱私，只是說他作為一個 intellectual 他這種身體的溫度是怎樣？怎樣能夠親炙到這樣的一個 intellectual？這是我比較是一直感興趣的。好，謝謝。

**蔡維天：**很高興有機會來聽一些我們平常接觸不到的 Chomsky 的面向，也很感謝傅老師給我們這個機會。我在聽大家的評論時，感覺如果是從語言學本身的脈絡去看，他這些想法其實並不是那麼神秘。他的治學方法基本上就是一個科學方法。所以很多事情講求證據，聽其言觀其行。他有些很出名的政治論點，我是畢業以後才慢慢發現。而在聽他做這些評論、演講的時候，有一種熟悉感，好像回到課堂上他講分析語言一樣。講到政治，感覺上一個很複雜的東西，由他來做評論的時候，就像一把刀直指人心，血淋淋的剖析事件的本質。所以我想有很多人，沒辦法接受他很多事情都推到極端。像剛才汪老師講說他覺得社會科學不是科學，其實我們以前也常常會對他一些 remarks 感到很驚訝，像是他說認知科學不是科學。那個時候，其實大家不曉得，語言學在美國是很弱勢的，你若要找語言學的書，必須去 cognitive science 底下去找，沒有語言學這個科目的。那他自己反而說 cognitive science 不是 science，你的證據在什麼地方，你論證方式從這個科學的方式來檢驗，到底成不成立？所以我完全不驚訝他這種 categorical 式的 comment。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他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治學觀點是「吾道一以貫之」，他無論在看語言，還是看政治，其實是一樣的。在這個意義上，剛才很多老師也提到，他是對自我完全的誠實。所以當他在對人的時候，是非常 liberal，像對學生，他從來不去干涉你寫的論文題目，然後口試委員自己挑，基本上就是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但是提到學術、政治，他就完全不留情面，包括對他自己在內。所以我常有個感覺，他要做到真真正正的誠實。所以他也不斷革自己的命，而且這個革命是一生一世的，不管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所以我們看整個語言學理論的發展史，從上世紀 60 年代開始，他革行為學派的命，發動所謂的 Chomskyan revolution。到 70 年代在他跟一批學生分道揚鑣，甚至打了一場轟轟烈烈的 linguistics war。直到 80 年代、90 年代，都主導了語法理論革命性的進展（分別為 Government and Binding framework 及 Minimalist Program）。所以我覺得在這一點上，他貫徹始終都是如此。MIT 系慶時一位學長對他的評論就是 relentless，一直到現在 90 幾歲，還是在網上跟同學們討論、回答問題，還是接受電視台訪談，批評俄烏戰爭、以巴衝突這些時事。這一點我覺得真是非常令人敬佩，謝謝。

**郭力昕：**謝謝蔡老師，行德要不要回應剛才蔡維天老師提到 Chomsky 認為認知科學不是科學？以及他的這種不留情面的，不管對人或對己的批評，可能也可以回應到剛剛大為講，作為一個基進知識分子的溫度在哪裡？這重不重要？會影響什麼？

**李行德：**因為蔡維天老師是 Chomsky 的嫡系學生，這方面最有發言權，我完全同意。語言學是一個實證的學科，要有一些客觀的證據，理論也要實證的基礎。所以我沒有什麼補充。倒是我另外覺得很有啟發的是，剛剛大為老師講的 public。的確，他把自己那麼無私的跟一般老百姓（對話），就是他 make himself available，我想不出另外還有誰能這樣做。因為實際上他年紀那麼大，時間不應該花在那裡，但是他可能就像剛剛蔡維天老師說，他想貫徹這個理念。我瞭解很多學生也不一定有什麼很重要的事寫信（給他），他也會回覆，往往是他自己的原則。這個真的很難得，因為他那麼忙的人。至於 Cognitive

science 是不是 science？跟自然科學比，我不知道蔡維天老師是不是同意，Chomsky 好像比較悲觀。現在大腦科學那麼發達，即使知道你做什麼行為時大腦在哪裡啟動，但是怎麼整合理論和實驗資料？Chomsky 很關注這個理論的建設，大概非常不容易，往往他更多指出這方面的困難。

**蔡維天：**其實我覺得他有一個方法論上的一個堅持，就是他很多事情是推到極端。在所有的語法理論的建構裡，革自己命的時候，其實很多事情他都推到極端。所以，我覺得這跟他這些評論也有關係，因為他基本上是個科學方法，不推到極端，沒辦法講出來這到底能極限到什麼地方。那時候我念書的時候，還沒那麼多的比如說認知科學，還是說我們現在講腦神經語言學，有這麼多新的突破可以去參考。所以，或許他現在會有一點不同的看法也說不定，謝謝。

**郭力昕：**請問楊儒賓教授是不是還在線上？楊老師聽到現在有沒有什麼回應，或者是評論意見？

**楊儒賓：**不敢哦，我是得到傅大為的這個免費入場券來聽，理論上是不需要回應，我也沒有資格回應。但是既然被點了，也要發聲一下。我比較好奇，就是大為為什麼要辦這個會啊？而且看起來好像會繼續推動下去。可能有這樣一個問題，剛剛在座的朋友也提到了，Chomsky 毫無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有全球的影響力；但是，通常我們也會自我要求，自己不太熟的，或者你沒有能力去涉及的，我們會自己要求，要有分寸。我想到最近的另外一個知識分子的例子，從各位的觀點，或者一般的觀點來看，這樣比喻是非常不成比例的比喻，但是也許可以做個對照，我想到林正弘老師。林正弘老師剛過世，他關心的範圍基本上就是在台灣哲學的範圍，但是他有個極大的長處，就是哲學界只要是任何人來找他幫忙，他這方面跟 Chomsky 一樣，他都一定幫忙，而且他花了很多的時間，也很盡力，我聽到很多的例子。老實講，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感動，也不能不幫他。很多事情對我而言可能基本上是損失，但因為是林正弘老師，他自己花了那麼多的時間，我覺

得我有義務要支持他。林正弘老師對哲學界以外，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可是他在台灣哲學界裡的影響，就很深遠。我就想到 Chomsky，剛剛也有人提到，可能是李（行德）先生提到他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支持，到底他能夠支持到什麼程度？而他的支持到底是正面或負面？我想可能是可以質疑的。我在反送中的時候剛好在香港，老實講，那一種勇武的情況，我不相信在台灣、在美國、在日本，那個社會可以容許。但我想香港問題一定很複雜，我也不敢說定。

我再說先前的一個例子，蔡維天也在場，大概還記得一點始末。就是 Chomsky 12 年前到台灣來的時候，我當時在清大中文系，想要提一個案子，頒給陳映真一個榮譽博士學位，因為當時陳映真已經身體很糟糕，不能再等了。我當然知道他有很大的爭議，但是爭議又怎麼樣？他有很大的那一種爆發的能量，代表一種非常非主流的觀點。我覺得台灣應該給他一個公道，所以我當時是希望能夠為他在清大提出榮譽博士案，能不能過，我想很難講，我知道這個頭銜競爭很激烈，但是至少我去嘗試。當時跟中文系講了，也間接地得到陳映真親人的同意。後來我知道語言所要提 Chomsky 當榮譽博士，這個案子就不用講了，一定不可能跟他競爭，榮譽博士的榮譽是要錦上添花的，後來果然 Chomsky 得到了榮譽博士。我非常好奇，他到了亞洲，好不容易到了台灣，到了中國大陸，獲頒清華大學的榮譽博士，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意義啊？我想對他可能沒有多大的作用，對整個國際的運動圈我認為幫助也不大。對台灣就很難講，也許清大有人認為這會增加清大的光榮，增加台灣的光榮，因為跟 Chomsky 這樣大的咖連接上了，極難得。但是，這種連接是什麼的意思？至少從我的觀點來看，Chomsky 得到一個榮譽博士，遠遠比不上陳映真得到榮譽博士學位的意義。因為陳映真得到榮譽博士學位，他跟清華跟台灣會有個獨特的連結，表示陳映真路線被看到了，但是這種作用在 Chomsky 就找不到。

我的意思是，一個這麼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學者當然要為更大的人群服務，但是他的發言權可能也要自我限制一下的。他對中東或歐洲的影響跟對東亞的影響，這兩者之間的影响是什麼樣的關係，什麼類型的影響，他對東亞夠了解嗎？也許要分析一下。我的問題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因為這個問題

是大為提出來的，我知道大為對這種問題一定都有比較獨特的想法，所以我等於也是跟大為請教。Chomsky 當然不是你引進來，但是你現在規模搞得這麼大，你希望他產生什麼影響？尤其我估計，他對東亞的歷史可能瞭解的不是那麼清楚，所以他能夠提供哪種幫助呢？如果是跟溝口雄三或者島田虔次、竹內好這些人所能提供的幫助相較，是哪一種類型的不同？對不起，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傅大為：**我先從剛剛建三提到一個事情，你說 Manufacturing Consent 你教媒體政治經濟學這麼多年了，一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用到這本書。其實我滿驚訝的，怎麼會這麼晚？我當年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很早就接觸過 Chomsky，Manufacturing Consent，那些電影等等之類這樣的東西。當然我的領域不一樣，我之前在忙著像科技與社會（STS）之類的東西，退休不再教書後才比較有機會來做一些跟我原來領域不太一樣的東西。但是 Chomsky 在你們領域，或者是力昕，在媒體（這個領域）。為什麼這麼晚？也許可以請建三來稍微說明一下。因為我知道建三接觸很多 alternative media，我常常也收到你一些 email，我對 alternative media 的一點瞭解常常還是從你的 email，進一步再傳過來。

回到那個儒賓的問題，我對 Chomsky 有興趣，除了因為我想研究一下 radical intellectual 這樣子的一個類型，我想進一步去瞭解這個概念的意義。其實我的那個計劃裡面，我想寫另外一個人是 Michel Foucault，但是我先來研究 Chomsky，然後來比較一下他們這兩個人。大家知道，Chomsky 跟 Foucault 有過一次的對談。在 Chomsky 這個研究程序裡面，因為我的計劃，本來就是要舉辦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座談會，這哪裡大？一點都不大，這比起 2010 年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談會小多了，而且也沒有公開宣傳。而且，有些朋友來也是以為是老 Chomsky 會出現了，那我真的是，是靠他來吸引一些人來座談這樣（笑）。

不管怎麼樣，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的政治跟思想上面，我自己個人常常覺得碰到一些死結，或者一些沒有辦法解決的東西，那麼我知道像宏倫講說有很多研究者，有很多新的東西研究出來，但是這個東西社會聽不到，你們

也許有講出來，但是我沒有聽到就是了。我們在政治，在台灣的現實政治、以及思想、行動上，知識分子碰到許許多多的問題。倒是 Chomsky 的一些做法跟 Chomsky 的一些風格、一種典範，反而是在現在台灣，我們現在目前碰到的這些問題上，可能是還滿需要的一種類型。你看俄烏戰爭一打，全世界開始搜尋海峽兩岸以後會怎麼樣？我們沒有其他的 perspective，可是 Chomsky 從頭到尾所呈現出來一種 perspective，可能是我們台灣還滿需要的。即使是他對於社會科學許多新的研究，他不見得清楚，但是他的立場，跟他對於台灣、中國，對於歐美，特別是對於南方國家的觀點，的確值得參考。

我覺得我們台灣，對南方國家真的是幾乎毫無所知，世界上這麼多的國家，這麼多東西來自於南方國家，我們想進入聯合國，那幾乎大都是南方國家在那裡，而美國是其中的特例，除了美國所謂的「自由世界、國際社群」那少數幾個歐美國家外，它是聯合國中連結最少、最孤立的國家。在聯合國的一些議題裡，例如聯合國絕大多數國家多次要求美國撤銷對古巴的經濟制裁，美國簡直是個莫名其妙的國家（不斷行使安理會否決權，而且只有以色列一國跟隨），甚至可以這麼講。所以在這個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台灣真的需要這個觀點。我們一天到晚想被世界看到，其實我們只是想被美國看到而已。世界根本看不到我們，因為我們根本沒有想要讓世界看到。但是像這個問題，當然很諷刺地是我們還是常需要美國的管道，因為我們跟拉丁美洲直接聯繫有很多其他的問題，透過 Chomsky 還有其他英文的另類媒體，才可以給我們一些有趣的、可以效法的一些觀點。好，謝謝。

**馮建三：**我也講一下，剛因為大為提到，我自己在反省自己。雖然杭士基如雷貫耳、我在 1993 年購入《製造共識》，在台出版的多本杭士基中譯圖書，我寫過一篇書介、一篇導言，但沒有進入他的媒介與美國外交研究領域，有兩個大原因。一個是被制約，這部份我得再作整理。第二個，便宜的講法就是忙著讀其他的東西，忙不過來。

比較重要的是，為什麼最近這幾年，我才開始細讀《製造共識》？一來是對古巴等拉丁美洲與南方國家的關注。二是「兩岸關係」，先前我不認真

關注，在讀楊儒賓老師 2015 年的《1949 禮讚》時，甚至反感，後來轉為接受。回想自己 7、8 年來這種變化，從不太在意兩岸關係，慢慢產生感覺，台灣再這樣下去，會有危險，不利兩岸，也不利世界和平。如果蔣渭水在日本殖民體制下，1925 年就大有氣魄，寫下台灣人應該成為日華的和平使者。當前我們若是秉持相同信念，自任中美和平使者，提出第三種兩岸關係而彼此接受，不就是兩岸和平，從而也就是貢獻世界和平嗎？這對台灣對大陸，都是好事情，對世界當然也是好事情。要釐定這個在台灣已經有前輩講了四、五十年的第三種兩岸關係，必須對美國的「國際觀」有個深刻的認識。杭士基在此鑽研與發言五、六十年，讓人尊敬乃至崇拜。以前，我是相對抽象地反對美國的國際行徑，細讀《製造共識》，既強化這個意見，也讓自己有「知其所以然」的豐富。知道、遠距離的認知是一回事，深入閱讀可以讓這個認知，更成為自己的構成部分。

過去，我的認知確實是抽象的，模模糊糊的認識，細讀之後，產生了具體也更深入的理解。國人太過於依附美國視野，如大為所說，台灣常說要被世人看到，其實是在說要被某些美國人看到，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來說，是有 140 個多國家譴責俄羅斯，但真正響應美歐、加入制裁俄羅斯的國家大概就 30、40 幾個。我們習慣用美國眼睛看世界，對此不自覺。近年來，我希望將杭士基的著作當作教材，先前僅列為參考，今年因為《製造共識》在台另有中譯本，是第一次用作教科書。以前，我很少用教科書，這應該是第一次，從中，也觀察學生的反應。現在雖然即將退休，但還是得繼續推進認識杭士基及其人文理念與關懷的工作。謝謝大為提供這個機會，讓我整理這些想法。謝謝。

**郭力昕：**謝謝建三回應。我們時間有點靠近尾聲，不過還有一些傳播學界的朋友還有機會評論或討論。念萱請。

**方念萱：**我在博班有兩篇跟著老師的研究計畫、採用 *propaganda model* 完成的論文，2002 年發表在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期刊上。我們分析 1983 年 *human rights violations*，主要是阿根廷的總統 Alfonsín 上任，我

們以 Herman 與 Chomsky 的研究方法進行分析。當時的研究主要是以 pair examples，基本上是針對不同陣營國家，捉對比較的概念，我們以 1983 年大概加起來有 60 個國家，主要是蘇聯陣營跟美國陣營，以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nual Report 裡各個國家違反人權的年度資料，比對《紐約時報》當年對各個國家違反人權的相關新聞報導，一個一個國家比較。從 propaganda model 的角度出發，《紐約時報》在冷戰時期對於與美同樣陣營的國家，紐時這個之為國家喉舌的媒體，是不是淡化這些同盟國家的人權戕害記錄？對於敵對陣營的國家，是否大事報導違背人權的狀況？所以我只是回應一下，就是說在傳播學界當時在我自己在博班的時候，來看 Manufacturing Consent，其實已經是個相當多人關注的 model、取徑。只是我那時候做出來的結果，有關 propaganda model 有其值得深究之處，因為我們採量化跟質化的方式，他的書中有關於的這個 friendly 跟 enemy 的 client 的 definition，我們當時覺得其實是應該要再去思考。因為我們主要當時用的是冷戰的時候的實證為資料，以這 model 檢視資料。我只是補充一下。我幾乎忘記了 20 年前的作品，當時確實就是採用這 model 進行研究這樣，OK，謝謝。

郭力昕：謝謝念萱，方念萱是政大新聞系的同事，有沒有其他的意見？元鴻請。

朱元鴻：我也提供我早期接觸 Chomsky 的機緣。我大概是在美國讀書的第二學期，也就是擔任助教的第一個學期。那個時候擔任助教的課程是 nuclear armament，是德州大學一個菁英的課程，大概 150 個學生左右。記得那個時候是、不是後冷戰，而就是冷戰期間，討論的是冷戰還有 nuclear armament 如何深度地破壞了美國的民主體制、經濟體制還有社會心理體制。那個時候我帶著讀 Noam Chomsky，1982 年剛出來的 *Towards a New Cold War*，相當厚的一本書。那個是大概 1984 年春，所以這裡可能跟我們傳播學界的同事，要點可能又有一點不同。

郭力昕：好，謝謝元鴻，各位、時間接近尾聲，就請許家馨先發言。

**許家馨：**謝謝宏倫的邀請。雖然我對 Chomsky 沒有太多的研究，很多時候都是擦身而過。但就從今天各位先進的討論裡提出一個想法就教於大家。當我們在談所謂 radical intellectuals 的時候，radical 似乎有兩種理解的方式，一個是 radical as opposed to the authority。The authority 可以是 government，也可以是某種學術建制，甚至是比如說軍工產業混合體等等，意指這個社會或者是某一個領域掌握權力的那一群人或者其文化。另外一個意思，radical 原始的意義，其實就是刨根啦，就是對於任何意識形態或任何可能影響著一個社會朝向一個可能更好的方向發展的那個根處去挖掘。然後，當你這樣做的時候，可能你批判的對象未必都是權威。可能是在某一種大眾的意識形態，甚至是某一種現在相當主流的，可能是一個文化的，甚至是某一種民粹，或者不是民粹而可能是自以為進步的這一個文化，都可以成為 radical 批判的對象。我之所說要特別這樣講，是因為我會回到制度上面的反省。

從 Chomsky 在六七零年代，他這些所謂的 radical intellectuals 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工作，某種程度來講，是在拆解那個時候的、你可以說是美國政治上面、在意識形態上一個很權威的體制。時到今日其實已經有很大的不一樣了。你從美國的政治結構來講，比如說當時政府參與越戰，是因為當時美國的政黨結構其實還是相當的菁英。

就比如說他們的候選人整個產生的方式，就總統候選人產生的方式，其實都是政黨大佬關起門來來決定，近年來在關於政治衰退或是民主衰退的討論，有特別指出一點，就是過去菁英好像很容易被批判，可是現在完全的就是比如說美國政治結構相當民主化了，就是一定程度來講，都是透過初選、透過選票。很多人也在開始反省說，民主化的結構真的有比較好嗎？

當年大家可以批判權威，但是權威被你批判成功了之後呢？川普的現象其實就是在這樣子一個背景之下產生出來。這在政治學界尤其在研究民主化或民主衰退的，最近大家越來越看得清楚了。於是我們陷入一個 dilemma，當你的 radical 只是主張在批判權威的時候，當然這個社會已經、結構已經相當程度也分散了權威，權威也分散化了。所以福山（Fukuyama）有在講 vetocracy，因為每個人都有 veto Power。任何一個重要的社會群體都有 veto power，都可以 veto 你的政策。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真的要 radical 的話，

反而不是批判權威，而是你如何建造權威？你如何重新去把一個社會重新去結構、甚至是如何製造共識。回到他那本書。如何讓一個高度分化、高度極化的社會重新再有共識出來？那所以我的意思說，如果要 radical 的話，當年他的處境跟我們的處境，有多大的不一樣？我們應該用什麼樣不同的方法來面對？這是我好奇的地方。

**郭力昕：**好，謝謝許家馨。請盧倩儀老師。

**盧倩儀：**我是針對剛剛楊老師提到，Chomsky 不是東亞的專家，他是不是不適合說這麼多？但我覺得，雖然 Chomsky 講的不是他專業的東西，但我們想像一下一個他都沒有說過的那個世界，我覺得還滿可怕的。Chomsky 很多時候演講，大家對他的介紹就是，類似就說他是這個世界上被 cite 過、被引用過最多的一個人類，他的東西他雖然不是在什麼一些 SSCI 那種 citation，他的影響力幾乎無庸置疑。那我覺得不是他要插手去管東亞的政治那些，他從早期是公共知識份子就是在批判美國的外交政策。那很不幸的，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是全世界，我覺得他那個批判美帝的方法不是用那種馬克思那種、可能一開始就會讓人聽了就不想再聽的那種方法。他有他非常誠懇，然後非常獨特然後也很多證據，而且很多（證據）感覺上是情治單位才有的，然後他的資訊量很大，他的腦容量特別大。所以他對美帝美國稱霸世界造成傷害那部分的批評。那個是他為什麼我覺得他要去講南美、中美及講東亞，這部分我都覺得是非常可貴的。而且事實上。幾十年下來為什麼他影響力一直在，就是因為我覺得這麼久下來，你再回頭去看他之前的擔憂，他之前的批評其實都被印證。現在這個世界就是快要完蛋了。

他最近的演講最常提到的三個大危險，一個就是核戰，可是這個核戰是他多年來一直在講它，現在又居然幾乎要被他說中，烏俄戰爭讓核戰那個問題再次出現，然後氣候變遷。氣候變遷講了多年，他說 1970 年代在 MIT 的時候，就同一個禮拜之內一個 MIT 的科學家、一個哈佛科學家打電話跟他講這件事情，所以他是多年來講氣候變遷，他一直講一直講就是整個全球 scale 的事情，所以這裡頭美國的角色太大，所以他又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這個

角度去關注世界上每一個地方我覺得是很重要的。我不能想像一個他說過的那些東西沒有被說的世界，

他講的那些東西都太重要。他講的第三個危險的東西就是民主的崩解，就現在這個世界上沒有 **reason**，沒有辦法理性，不是那種經濟學和社會科學那種理性，他說真的理性，沒有辦法就是因為 **propaganda** 就是媒體。所以，我知道楊老師覺得陳映真被他擠下來很難過。可是我會覺得最後也是所謂的「公共」，前面在講說公共知識分子，那個「公共」。那個公共並不是說「他反對專業」，但我們想像一個世界的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如果他是哪一個專業，他就只在那個專業說話，比如 **Chomsky** 只能講語言學的事情，我覺得那個世界就太可怕了。

**郭力昕**：謝謝倩儀老師。現在時間大概已經是 5 點多一點，我想我們可以整理一下今天的討論。

**傅大為**：最後可能是不是請那個黃正德老師，如果他在的話可以請他講幾句話。

**黃正德**：不好意思，我今天聽了大家的發言，學了很多。謝謝傅老師的邀請。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一點個人的經驗好了。沒什麼特別深入的東西。

第一點是關於杭士基如何在 **linguistics** 跟 **politics** 兩方面都有很多著作。他自己曾經說，他從事 **linguistic** 研究要花不少時間去思考，提出來的想法只是一種假設。假設不一定是對的，要慢慢去推理、求證並與人討論。他也期待學生對他在這方面的想法能適度地持疑並進一步檢驗、反駁或修正它。在 **politics** 方面，**Chomsky** 的出版比 **linguistics** 方面還多了許多，可是他說在這一方面不要花多少時間。他說他只是憑藉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把心裡的話講出來就好了，不需要語言學研究一樣地觀察、假設、求證。他覺得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然後完全不虛偽地把話給講出來就好了。他的政論演講一般都會引述有關的事實、數字和報導來的作為佐證。可是他說，他不需要很多時間來準備，只要把他的心裡話講出來就可以。

另外一點，是跟大家分享我親眼目睹 Chomsky 在教學工作的同時關心政治問題的經驗。我 1978 年到 MIT 留學的時候，越戰已經過了，他已不談越戰。當時他最忙著關心（原葡屬）東帝汶的情況。東帝汶於 1975 年從葡屬殖民地獨立之後不到 10 天，就遭到印尼入侵，其後 20 餘年間其人民連續遭到印尼軍政府的迫害，死亡不計其數。1978 年間 Chomsky 從自己的消息來源頻頻收到東帝汶人被殺害的案件，但查看全美國的主流媒體卻看不到明顯的報導，也看不到美國政府出面干涉或對印尼政府施壓（美國當時甚至是印尼軍火的重要供應來源）。我記得那幾年他為了要給東帝汶人伸張正義而忙得不可開交。在 MIT，一大半的研究生要他指導，除了上課以外還需要跟他面談。研究生面談時間通常排在星期二或星期五，幾乎每天的面談時刻表都排的滿滿的，他就利用前後換人的中間 10 分鐘休息時間忙著打電話，跟主要新聞媒體聯絡，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時報》與各電視媒體。打電話的目的是將在東帝汶發生的事實一一轉告給這些媒體，但令他氣憤的是他所提供的信息卻常常如石沉大海沒得到媒體或者政府的回應。他在 *Manufacturing Consent* 這本書（與 Herman 合著）裡面所批評的就是媒體。他批評媒體和政府的大咖們常常因為所謂的「國家利益」（其實是財團的商業利益以及個人的政治利益）不惜隱藏或者篡改重要事實來替人民製造所謂的共識，因此而致世界上的許多暴行得以延續。（東帝汶在遭受了 20 幾年的生靈塗炭之後，終於在聯合國與西方國家的協助下於 2002 年完全獨立並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Chomsky 在東帝汶顯然有許多朋友和粉絲。2010 年我們邀請 Chomsky 到台灣與中國訪問之時，他原來準備受邀順道前往東帝汶訪問，但因為行程過於緊湊勞累而作罷。這一點值得在此一註。）

Chomsky 認為這種媒體與其他利益團體為人民所製造出來的「共識」是在經濟發達的民主國家裡常見的一種暴力，不同於軍事政權或威權政府下顯而易見的暴力，這種隱性的暴力更應該予以揭發與譴責。

**郭力昕：**謝謝黃老師，可不可以請幾位引言人三分鐘，就今天的一個討論做一些總結、回應？

**汪宏倫：**我先提一下，剛剛提問的許家馨老師是我們中研院法律所的副研究員，我也非常高興他來參加，因為他的專業跟我們在座的朋友們稍微有點不一樣。他自己本身除了關心言論自由，主要研究領域是在法哲學方面。他除了關心很多具體的像廢除死刑、言論自由問題之外，對於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的這個問題，他其實也滿關心，所以我來邀請他參加。他剛剛提了一個問題，我覺得是一個滿嚴肅的問題，但是我沒有辦法回答，可能等一下請大為總結的時候，可以稍微提一下，因為剛剛家馨所提的那個 radical，就是大為把它翻成那個基進的、基礎的基，其實跟剛剛家馨所講的很類似，但是就像家馨剛提到的，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情境跟 Chomsky 當年的那個情境其實是不太一樣的，我們現在做為 intellectual、或 intellectual 應該做些什麼？或者可以做什麼？可能等一下可以請大為回應，因為這正好也是你辦這個研討會要談的主題。我另外有兩點。要不然就等一下回答，如果還有這個總結時間，我再來講。

**郭力昕：**好，是不是請大為發言？

**傅大為：**對不起，我就想回應一下剛剛許家馨的那個 comment，但是後來還是覺得黃正德老師可以先講一講。我想許老師你談的一些現象，我可能不完全同意。你說現在權威都已經分散成很厲害的這樣子，你說一個太陽花運動一下佔領立法院然後改變了很多事情，那你就舉這個例子，我覺得情況可能不是這個樣子，那即使有的話，大概也是在太陽花運動那個短的時間裡面，大概是這樣子。就有點像我們常常有時候會談到說像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初，臺灣解嚴的時候，臺灣解嚴那段時間裡面，就是說，其實權威的確是相當地的分散，那個很多很多不同的新的團體、各式各樣東西跳出來。那個時代我有經驗、我經歷過。但是那個時代其實後來就過去了，很多朋友就是緬懷那個時代，但是後來那個時代已經不是這個樣子。那又比如說像我們今天、那個俄烏戰爭，Chomsky 常常就是罵這個普丁還有俄國，他們這些笨蛋，為什麼呢？你侵略烏克蘭等於是把這個大好的機會、大好的禮物送給美國，把歐洲整個推到美國那邊去，他常是用這樣子的分析來說這個事情，其實俄

國前陣子如果不侵略的話，其實他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而且已經做了一半，然後到後來竟然變成這個樣子。那其實臺灣也是一樣，臺灣我們現在的情況，像俄烏戰爭一邊倒的論述、或者像防疫的問題，前陣子我相當注意防疫的問題，我們指揮中心的權威是非常強的，即使社會上有非常多的不滿，也只能挫折而已，到最近選舉來了，對指揮中心的不滿才透過選舉的槓桿，重新浮現。然後從這個你講的太陽花運動，是綠陣營上台之前的事情，而綠陣營上台之後，我們整個的、社會的權威是怎麼樣的狀況呢？綠營現在大概很少人還會想起當年「謙卑、謙卑、再謙卑」的話了。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可能是事實分析的問題，所以我大概不是很贊同你的事實認定，但是如果如你所說權威是非常分散的話，就有點像比如說當年解嚴之後的情況，那的確是有很多新的團體、新的、小的東西出來的話，在那個時候的話，新的問題也不見得是——就 radical 的團體來講的話，來「製造共識」，我覺得可能也不是，我大概不會用這個名字來描述那個時代。而是那個時代，就是說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好像是說來批判國民黨、批判主流權威、批判那個在戒嚴前的時代。可是到後來呢，我前陣子的反省是，我們後來那個基進的 politics，事實上是垮掉了，很多當年的這些互相合作的、互相抗爭的這些團體，事實上彼此之間互相已經不信任、或者吵架、或很多類似的現象發生，剛剛元鴻好像也有提到說，世界很多左派也是類似這樣的狀況，那麼，所以這個時候呢，我覺得，怎麼樣來思考這個問題呢？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值得進一步來思考的問題啦。我同意你講那個的確是一個問題，但是我們對事實的認定呢，可能有不太一樣的看法，謝謝。

**郭力昕：**謝謝大為回應。許家馨老師有要再進一步回應嗎？

**許家馨：**謝謝傅大為老師，很榮幸。其實我想關於事實的部分我們可以以後有機會再多談。那我剛剛舉太陽花的例子其實只是去說明我在談這個所謂的 political fragmentation，還有 vetocracy，這個現象到底可能意味著什麼？就背後並沒有要去說他是好或壞的問題，我只是想要描述這個現象。那我對這個現象會比較敏感，是因為在憲法的領域，我們越來越注意到說，權力分立的、

這樣子的一個政府結構。那他目前越來越容易，以美國來講，越來越容易陷入所謂的 *deadlock*，越來越容易陷入僵局，然後公共政策越來越難推行，所以，這裡頭跟權力的碎裂化，確實是有一個有很多的探討這樣子。當然臺灣可能還沒有走到那地步，如何避免走到那地步，或許是我想要提出來的、一個請大家一起思考的問題。

**郭力昕：**好，謝謝家馨，是不是就請幾位引言人分別用 3 分鐘左右的時間，稍微對今天的討論做一些補充思考、回應？先請行德。

**李行德：**好的，謝謝力昕。今天聽到很多著作，以後有機會要去學習的。剛剛有些老師談到 Chomsky 不是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這一點我是有保留的。我的看法是這樣，他在什麼意義上是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就是說，他不是引用某一些社會學、政治學的主流範式來進行研究，這種意義上的研究者。但是我感覺他的專業的知識，在他涉獵不同的領域的專業知識時，是相當驚人的。我這裡講兩個例子，一個就是說，我這幾天看他的另外一篇在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裡面講 *Objectivity and Liberal Scholarship*。他的附註裡面，談到西班牙內戰裡面的一些群眾農業合作化的運動，它裡面提到中國土改的一個名著、個案研究，William Hinton 的《翻身》。研究中國歷史的、或者當代歷史一般都知道。我很驚訝！他在那個時候就看得很仔細，而且都有評論。另外一個我想到，很多年前，有一個語言學家、寫語言學史的 Frederick Newmeyer，他在中文大學那個《21 世紀》期刊寫了一篇文章。裡面談到一個事情，就是說，以前有人挑戰 Chomsky、說他批評資本主義，那不如跟同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 Paul Samuelson 去辯論一下。他接受挑戰，並且進行了辯論，按照 Newmeyer 說，當時參加的聽眾並不覺得 Chomsky 占下風。我估計 Chomsky 不是跟 Samuelson 討論經濟學的某一些理論，而是在更高的層面去挑戰 Samuelson。就這個是我的感覺，我覺得 Chomsky 是嚴肅的研究者，只不過他不是在用主流的學術範式來進行研究。

另外一點，就是我想回應那個剛剛楊儒賓老師提到很重要一點，我這個沒怎麼想過，就是說 Chomsky 對亞洲知識分子有什麼 *relevance*、有什麼意

義？就是你現在今天瞭解他、今天讀他，有何意義？那我想試著回應一下。剛剛大為老師也說，Chomsky 是一種世界性的、跨種族國界的一種思想。我們在發展中國家，或者在亞洲，怎麼去思考他提出的一些問題，肯定是跟美國不一樣的。但是他提出了剛剛講的「知識份子的責任」裡面的幾種要求。就是說，發展中國家的知識份子，一方面想對社會發展有所貢獻，你要參加建制裡面的一些工作。另一方面，又需要跟建制保持一些距離，提出原則性的批判。那到底怎麼去承擔這種責任，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Chomsky 體現一種知識份子的應有的國際主義、應有的普世關懷，對世界上各地違反公義的事件應該有所回應。但是做起來相當不容易。特別如果是進行反對和抗爭，比如說假如今天自己的國家有擴張的傾向，真的有一些不公義的行為，那你怎麼去回應？

另外，也想回應剛剛盧老師。我感覺 Chomsky 對我的意義，就是說他挑戰各個領域的頂尖學閥、學術權威。他敢於去挑戰，不是說隨便挑戰，而是真正是用你的論述去挑戰。而且其實很多論述都非常有道理。那有可能是因為政治科學這一方面是比較不如，比如社會學，還有其他，成就那麼多。比如說，他在〈知識份子的責任〉裡面，批判 Herman Kahn 的“Thermonuclear War”。我記得我讀大學本科的時候，這些都是政治科學的經典。但是在 Chomsky 這裡，他就敢說，這種理論沒有什麼客觀性。他說“Kahn proposes no theory, no explanations, no empirical assumptions that can be tested against their consequences”。就是說，他真的把 Kahn 批得一文不值。但是你今天回頭過來看，可能 Chomsky 是對的。我記得 Chomsky 上課就這樣講，他說有一些範式，例如心理學行為主義，你回過頭來看，真的是一點保存的真理價值都沒有。社會科學，我覺得有不少這樣的例子。最後一個我就想指出，這一次重讀〈知識份子的責任〉，很大的啟發就是它讓我更深刻瞭解了什麼叫「冷戰思維」。比如它裡面提到 1966 年一些冷戰思維的反人道論述。它裡面就談到 Professor Rowe，他是一個在 1960 年代耶魯大學有名的政治科學家。他就主張用饑餓的策略來抵制中國、越南這些共產國家。Chomsky 舉這個例子，說我們的學術權威怎麼會想出這麼一種方法，而且覺得非常有道理？在〈知識份子的責任〉這篇文章裡，他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批判是很嚴厲的，他

不僅僅說美國雙標，而是說你連建立標準的資格都沒有，西方國家沒有資格充當民主制度的導師。他針對當時非常流行，而且被接受的社會學家 Daniel Bell 的著作，“The End of Ideology” 展開批判。這裡我引用一點，Bell 是說美國這樣的一個自由民主社會，透過社會福利而不是威權 authoritarian 的方法建立民主制度。Chomsky 就指出，西方國家的原始資本積累過程充滿專制、暴力和血腥。他認為，相應於美國社會這種發達的程度，美國民主制度的發展是相當不足的。完全沒有好的民主經驗可以提供給第三世界國家。這個我覺得很深刻。他認為，講什麼輸出兩黨制的民主制度，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極度的毫無意義，“a monstrous irrelevance”。Chomsky 如果沒有對於專業著作的相當深刻的專家認識，是不能提出這種與眾不同的觀點。我就說到這裡，謝謝。

**郭力昕：**好，謝謝行德。很高興行德有機會把 PpowerPoint 裡面沒有機會分享的、關於知識分子責任的這部份補充完。接下來請建三。

**馮建三：**其實我沒什麼結論，不過，剛剛聽到有關權威的討論，也許可以就此再次談談「兩岸關係」這個大議題。最近這幾個月，我與大為就俄烏戰爭的消息，有較多的聯繫，這就觀察到由來已久的問題，亦即近幾個月的新聞，讓人有怪異的感覺。我是說，環繞「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這樣的話語，反映在輿論，似乎變成僅在談兩岸會不會發生武裝衝突？如果發生，臺灣能不能撐得夠久？美國會不會來？這不是很奇怪，讓人擔心嗎？這難道不是有某種不知其名的「權威」，在「指揮」整個議題的走向嗎？按理，沒人希望有戰爭。那麼，更值得、必須討論的議題，難道不包括要怎麼不讓戰爭爆發嗎？現在，這個議題似乎變成一個 non-issue。是我自己的問題，沒有搞清楚狀況嗎？無論如何，得坦白承認，我是有些焦慮，雖然可能還是遠慮，不太相信會發生？化解這個焦慮與兩岸和平，仍然還是談兩岸關係是不是有第三方案。就此來說，政大選研中心三十多年來的民意調查，有貢獻但也有誤導，它的選項大致是一國兩制的「統一」，及不惜與對岸為敵的「獨」，然後就是「維持現狀」這個應該不能算是第三方案的拖字訣。這就等於將民意限制在

二選一，偏偏二者應該都不理想之外，也不能說已經窮盡其他可能。但長期以來，二選一的民調已經形成，這就坐視詭異也很危險的格局持續滲透與擴張，最後變成九成的人不願意對岸界定的「一國兩制」之統，這就注定這個方案必須排除，「與對岸為敵的獨」也就變成唯一的選項。然後，就是表面上沒有說，實質上對岸卻認定此間的主要趨勢是「倚美謀獨」。也許，如今僅談兩岸會不會開戰、台灣能不能撐得夠久、美國會不會派兵，就成為可怕、但國人除此之外，不再努力營造第三案的原因？但台灣能開戰嗎？烏克蘭在歐洲，面積僅次於俄羅斯，將近台灣十七倍而人口不到台灣兩倍。並且，2014年以來，美國與北約的強力軍事援助及軍事訓練烏克蘭，加上現在歐美的強力軍火運送，都無法嚇阻俄羅斯，那麼，我們真認為美國永遠可以嚇阻對岸，讓現狀永遠持續嗎？我們真認為「德不孤必有鄰」，自助就有人助嗎？如果真是讓對岸認定我們在「倚美謀獨」，對岸會等到我們宣佈獨立才動手嗎？提出這些可怕的可能，就是不愛台、就是投降派，就是在為對岸張目嗎？拉拉雜雜說這些，不算結論，就是把握最後的機會，再次重申一些想法。謝謝。

**郭力昕：**謝謝建三，再來請汪宏倫老師。

**汪宏倫：**OK，我想我也簡單談一下剛剛聽了非常多的朋友的分享跟發言之後的一些想法。剛剛聽到蔡維天老師提到他作為 Chomsky 的學生，近身觀察到的他的一些治學或者是為人的一些特色，我覺得滿同意的。其中有幾點，其實我在剛提到的十幾年前寫的〈值得從 Chomsky 學習的十件事〉裡面，大概也有寫到。雖然我先前跟他素昧平生，但是從他的著作裡面可以感受得到很多他的人格特質，這些特質是作為我們談所謂的 public intellectual 的時候必須要有的。包括比如說對於 integrity 的堅持，或是那種「吾道一以貫之」的精神。但是與此同時，我剛剛聽了蔡維天老師的分享，也讓我恍然大悟一件事。剛剛他提到 Chomsky 在方法論上的堅持，他覺得是對的東西，他會很容易把這些東西推到極端。我覺得他的評論恐怕也是非常受到這樣的性格影響，所以他的一些想法，有時候真的是讓我覺得講過頭了。比如說像剛剛李行德老師秀的那些 PowerPoint 裡面，其實非常具體地讓我們看見他是怎麼樣

批判社會科學。我剛講那個有他的時代背景，他所批評的那些人跟學說的確都存在，也都值得批評。可是社會科學不是只有他所講的那個樣子，還有很多不一樣的樣態，他有時候就會因為這些保守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保守的言論，就會把它推到極端，有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味道，我覺得是滿可惜的。也就是因為這樣，我相信剛提到，比如說像華勒斯坦這麼老牌的左派學者對 Chomsky 其實也是覺得沒有辦法接受。你如果看到 Chomsky 講這樣的話之後，我想任何從事專業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大概心裡面大概都不會太舒服。這是我今天我講的重點之一。但是他做為一個 public intellectual 可以學習的地方還是滿多的。另外，我也想要回應一下剛剛張小虹老師所提到的問題，其實也是我在引言的時候提到的，就是 Chomsky 的世界藍圖到底是什麼？其實我覺得我讀他的東西的時候，常常會有一個困惑：「到底你的世界藍圖是什麼？」很多人把 Chomsky 當成是左派的知識分子，問題是很多左派的也對他非常批評、無法接受；他對於馬克思主義也非常批評也不接受它，也不認為他自己是一個所謂的 Marxism。我們有時候會看到他說自己是所謂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但即使無政府主義者其實也有很多論述在談到底怎麼世界是比較合理的，我卻比較少看到他在這方面的鋪陳。到底他的那個世界藍圖是什麼？我到現在還是覺得有點困惑，所以其實張小虹老師提到是一個值得我們去釐清的問題。釐清這些事情可能是大為的工作，他辦這個研討會，然後他想要寫關於 Chomsky 的書的時候，可能可以進一步幫我們去釐清這個問題。

**李泳泉：**今天聽到很多好大家都這個精彩的見解，相形之下我的那個引言基本上是走在路上的這個所見所聞。總體上，我覺得 Chomsky 的這個重要之處，對臺灣如果說的是啟發的話，其中一部分是他的正義感跟行動力，這部分應該是我們可以學習的。那麼，譬如說剛剛我的這個比較 Unit 的那個專題跟這個《誠品好讀》專題來看的話，那當然整個專題的整個結構性、細膩等這個思考性非常的完整，誠品的話呢至少它還是清楚的表達，這個浪漫對實用性的這個功能，所以我後來在感嘆臺灣非常難得出現的另類週刊的消失，這部分我覺得說正好他就是缺少那種的時間力，哪一種作為另類聲音的這個

時間力而不是掛在嘴上。這個破（報）最大問題就在於它不夠務實、不夠責任跟理性的不足。所以這個部分正好是這個 Chomsky 在談到製造共識也好，知識分子責任也好，如果你的那個心思夠集中、決心夠的話，事實上是可以做得到，但是在臺灣的很弱的這個媒體的體質生態上面，勇敢跨出那一步，可是那個基本並沒有做得好、比較不足，這也是剛剛張小虹唯一提到的《破報》的一文不值，我是花很多時間在那個年代花很多時間去讀過《破報》的過程，對它真的期待結果是非常的失望，大概是做點這樣補充，今天從大家學到很多，謝謝。

**朱元鴻：**一個很短的 remark，今天宏倫帶出來的主題比方說他跟社會科學、比方說政治學之間的互相的陌生或乖離。我覺得這個主題，其實他剛剛講說這是傳大為應該去處理的問題，不過我覺得這個主題一點重要性都沒有。我覺得其實我們講說人生海海，這些學者他 Focus 在哪一個 continent 或者是哪一個 atmosphere，其實像這樣子的狀況很多，這種人物其實滿多的，你說他的教職或研究職位是在社會學，但社會學裡面的人對他也搞不清楚，他的影響力完全是在不同層次。所以我的感覺是這種情形常見，而且沒什麼重要性，就是沒有什麼一定要去把它解釋出來，就這點意見。

**汪宏倫：**我回應一下，剛剛元鴻說我把他跟社會科學之間的乖離丟給傳大為，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剛說的是說他的世界藍圖、那個願景是什麼？我是說這個是大為可以去思考東西。至於說，他跟社會科學的乖離，我同意就是說像剛剛元鴻說的，其實很多人在自己的學科沒被認可或是在其他領域得到認可，這問題有沒有重要，我覺得這是一回事。但是，我剛說的重點是，他們之間有相互可以借鏡的地方，但是卻相互沒有看到對方的優點，我覺得是有點可惜的事情。

**郭力昕：**我們就請大為作總結。

**傅大為：**不好意思，這不是總結，而只是暫時的一個休止符。我覺得剛剛那

個汪宏倫講的那個關於藍圖的事情，小虹也提到，我倒是覺得藍圖好像不是那麼重要這樣子。Chomsky 在很多地方有講過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他有講啦，就說因為做這個計畫要搜尋比較多的東西，但其實我不是那麼認真，因為最後的藍圖這個東西，我比較從傅柯的角度來看，那個東西可能用處不大，比較有用之處是他在這個過程裡面，他所展示出來一些做法、一些風格、一些特質這些東西，雖然可能有些不同的目的，但我們可以學習的是那些東西。很多聽眾會問他說你的無政府主義是什麼，他一時也說不出個的名堂，因為這世界上實在沒有太多這樣的歷史，他頂多說以前的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革命，你去看那個東西，裡面有非常仔細的描述等等這樣子。當然，像我們辦這個座談會，我覺得主要目的不是為我的寫書，我從大家學很多，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藉著這樣子的一個座談會，能夠引起大家對於 Chomsky 進一步的興趣，對於 Chomsky 的政治在臺灣或者是東亞、亞洲，他所可能有的意義能夠進一步去思考。那大家從一些不同角度的思考，我覺得可能是最好的一個結果是這樣的東西。所以我最後希望是這樣。

最後，其實我要謝謝比如宏倫一開始提到社會科學，Chomsky 跟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其實這問題我自己滿有興趣，因為我對這個科學哲學、科技與社會比較熟悉，為什麼 Chomsky 會這樣想？的確是有很多東西他沒有讀過，或者是像剛才行德舉的那篇著名的〈知識份子的責任〉文章，那是 1967 文章，所以在那個地方裡面，他所舉的就是那些人，現在後來的人當然很多很多，但同時，等到後來的時候 Chomsky 已經夠大了，他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再去來一一閱讀說你們社會科學到底做了些什麼好東西出來，他有更急迫的事需要做、或者與更廣泛的民眾交流（不過他也常說，如果有好東西，請告訴他，他願意聽一聽）。還有，我看他的書，我常滿驚訝他常舉出近年來，哪個人、哪個人寫了一本很好的書，與他正在談的問題密切相關。他常常在 interview 會提到這些事，我很驚訝他經常把人家的 first name 通通講出來，這人的記憶簡直不可思議，我現在已經常常忘掉人家名字，他常常舉出人文社會科學好的著作、說這個東西這個題目他是專家可以看等。我覺得這個部分他是用零星星的方式在他討論的脈絡中表現出來，而沒有拿一整篇文章說今天的社會科學的 overview，這已經不是他的

工作，不是他的重點，而且他寫出來人家也不會看，整個情況已經不一樣。

反過來講，我其實今天本來想有機會想要進一步談的，但是因為沒有時間，就是 Chomsky 跟自然科學的關係，這個問題我也很有興趣。比如說蔡維天一開始就說 Chomsky 就是科學、是方法。其實看他的背景，他自稱他是 Cartesianism，笛卡爾主義者，強調理性、強調科學這些東西，但這一套東西我們怎麼講，就是說在我們的領域或者我想在很多的人文社會領域，其實 70—80 年代以後，從後結構主義，Thomas Kuhn 等之後的發展，他已經跟這個新方向連結得很少，反之，他反對與批評後現代主義也是出名的。我感到好奇的是他的研究所，其實跟 Thomas Kuhn 是同一個研究所，可是他們似乎很少交談。

我去搜尋他寫的東西，人家訪問他說 Thomas Kuhn 提出科學革命的重要性，你有什麼看法？他就有點隨便講幾句話就跳過去。我覺得他也是他夠大，他不需要再去憂慮這些事情，他有更急切、他覺得更重大的事情他要來處理。一個人一生有很多階段，你某些階段你會注意的很多事情，在另一個階段時那些事情你已經沒辦法觸及到了，我常常感覺 Chomsky 也是這樣，從這裡我覺得說他對科學是有一種，當然他的語言學、科學是他成名的，真正揚名立萬在學術界的，所以他對於科學有非常強的信心，對於他的直觀對他這個東西有非常強的這種直覺、這種信心，所以我覺得多多少少也構成，就是很多事情他一下子就做判斷，這樣就會造成一種他跟其他的一些知識分子不太容易有進一步的交流。當然他的朋友很多，他 radical 的朋友非常多，其實我有時候也在追那些人，從許多早年的學生輩、到大咖例如 Said, Herman, Zinn 等人，但是他跟更廣泛的學界知識分子合作則不容易，我想如宏倫說這樣很可惜，他能做得很少。我也了解這已經不是他的工作了，一天到晚有無數的人，想要問他這個問題、問他那個問題，他覺得他可以接觸更多不受學界保守思考慣性所束縛的普通平民、接觸街道與小鎮上的人民，並以此為傲，我想就差不多是這樣。所以，我覺得他有一種對科學的信心，他對 MIT 一直很維護，因為很多學生運動對 MIT 作為一個戰爭機器，有非常多的批評，可是他一直維護 MIT 與贊助計畫的關係。但他的一些講法中我的確覺得是有些小問題，跟 Kuhn 後來在 Princeton 所講的東西不太一樣。他對 MIT

的科學家，相當尊敬，但細節這邊沒有辦法多講，所以我覺得他的風格，有時是來自於一種科學的權威，但這個科學的權威，我覺得我們其他人不需要有。我們可以學習他的長處，我們的科學成就沒有像他這麼高，我們也不會像他有這種科學的自信心與直覺，所以這裡的話，我們可以了解我們跟他的不同。最後，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各方面對 Chomsky 有興趣的朋友互相交流，包括杭士基的兩位資深學生教授，我自己學習到很多，非常謝謝。

## 訂 閱

零售：每期新台幣 500 元

個人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1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1500 元(或 50 美元)

機構訂閱：國內一年兩期 2000 元

海外一年兩期 3000 元(或 100 美元)

以上均含掛號郵資

郵政劃撥戶名 社團法人媒體改造學社

郵政劃撥帳號 50313103

# Communication, Culture, & Politics

Journal published by CMR, Taipei, Taiwan

December 2022 Issue 16

2 issues a year, in June and December

## Sponso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 Editorial Advisory Committee

Jin Cao	Fudan University
Chin-hwa Ch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liang Chang	Nanhua University
Wei-Xing Chen	China Media University
Yong Hu	Peking University
Guang-shiash Hu	Shih Hsin University
Yu Hu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Yng-ruey Jiing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angwen Kuo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n-Chuan Le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ing-Ling L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ung-Ta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Yuan-hue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ilong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nyu Lu	Fudan University
Yen-Yuan Ni	Ming Chuan University
Linchuan Qi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o Shan	Wuhan University, China
Ping Shaw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bin Shi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Chunquan Wang	Northwest University, China
Song-In W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Yu-Li Wang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Bu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Shieu-Chi W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Yu-min Wu	Shenzhen University
Yuezhi Zha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Jiang Zh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Guo-Liang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ian Zha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ina

##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Shih-Hung Lo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Editorial Board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u-Mei Li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ling Hu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Editorial Assistants

Chung-Po Li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Publisher

Publisher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CMR

Address 3F-3., No. 102, Sec. 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Taiwan (R.O.C.)

Phone +8862-2522-1499

Fax +8862-2522-4970

E-mail: editor.2015ccp@gmail.com

Website: <http://ccp.twmedia.org/>

ISSN: 2411-4006

Calligraphy: Yun-Chi Huang

Cover Design: Yiche Feng

## Subscription

Personal:

NT1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1500/per year(or US\$ 50/per year)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Institutional:

NT2000/per year

(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NT\$3000/per year(or US\$100/per

year )

(international, including shipping  
charges)

Postal Giro Account

50313103, Campaign for Media Reform

Some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lauses.



### **Research Articles in general**

- *On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A Contrapuntal Rereading Chin-Chuan Lee's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 *Intellectuals and Clientelism:  
C. C. Lee's Journalism History Studies*
- *The beautiful accident of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Marxism walking the middle way without guarantee*
- *An Eyewitness on the Critical Juncture of Taiwan Mass 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regarding the writings of Dr. Chin-Chuan Lee around the lift of  
Martial Law (1982-1999)*
- *Communication, Democracy and the Expectations for Media System-  
an Analysis of Chin-Chuan Lee's "On the National Benefits of Lifting the Press Ban"*

### **Research Notes**

- *Negative Impact from Platforms on Print Newspaper:  
The Alert for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 **Past and Present**

- *Chomsky 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a Panel Discussion*